

## 西方军事史

作者：J·F·C·富勒

---

高加米拉会战 梅塔弗尔会战·撒玛会战  
特里卡梅伦会战·塔吉纳会战 斯鲁伊斯海战和克勒西会战  
布雷顿福德会战·吕岑会战 纳斯比会战  
布伦海姆会战 罗斯巴赫会战·吕岑会战  
特拉法尔加战役 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  
莱比锡会战

### 高加米拉会战

---

坦恩博士在他所著的《亚历山大大帝》中，认为亚历山大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统治者，他的话也许是对的，不过事实却似乎证明他的确曾孕育一种神意的世界统治者观念，而统一的世界大帝国观念也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亚历山大认识到神与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所以应该杜绝城市与城市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视和对立情绪，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四海一家的都市。所以德罗森说：“亚历山大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纪元的开始。”韦尔克恩也说：“此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包括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如果不研究亚历山大的毕生事业，就可能很难加以了解。”

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个世界的征服者，而且他还创立了一种世界观，从此以后在每个时代中这种世界观都一再地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比拟他的这种崇高地位。在古代罗马，他受到早期诸帝的崇拜，在犹太民间故事中，他被尊称为救世主的先驱，在土耳其斯坦和巴达克汗的部落，人们还把他当作始祖看待。关于他的传奇，曾经从冰岛传到黄海，在这些传奇中他被描述为最后一个法老，内克坦尼波的儿子，阿伽门农家族的后裔，一个狂热的回教徒，一个神圣的基督教徒和一个全能的魔术师。这些神话固然荒谬怪诞，但都有其道理——因为亚历山大的确是人间英杰。

亚历山大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可能是10月。他的父亲菲利普自命为希腊神话中赫拉克里斯的后裔，从小就给他灌输向波斯复仇的思想。不过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母亲奥灵·皮亚斯，因为她把一种热情遗传给他，才使他能够实现这个世界观。她是一个特殊的女人，生性野蛮，神秘并且专制，她是埃比拉斯国王的女儿，据说她的祖先就是阿基利斯。在她的故国，她曾经朝拜过最古老的宙斯神庙（注：在英雄时代，宙斯神的影响最大，以后才被特尔斐神庙代替），并且也知道最神秘的阿蒙大神庙位于示巴绿洲。除了赫拉克里斯和阿基利斯，宙斯的儿子狄奥尼索斯——这是他和加德姆斯王的女儿丝美拉所生的——也算是亚历山大的神话式祖先，在马其顿规定有一天是祭祀他们的。狄奥尼索斯是一个“人神”，他曾经经过利地亚和埃及直到印度，传播一种崇拜葡萄的神秘宗教，并征服了他所经过的国家。

这些神话代表了奥灵·皮亚斯那个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现实情况，对和她和她的儿子具有广泛的影响。除了受父母影响之外，亚历山大也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在他十三岁时，菲利普就邀请这位著名学者来做他的老师。亚历山大跟随他在一个叫作梅加的小村中住了三年，受到他的陶冶。亚历山大对希腊文化产生了热爱，尤其喜欢背诵荷马史诗。据说在他进行的每一次战役中，他都随身带着一本亚里士多德注解的荷马著作。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也把仇恨波斯人的观念灌输到他的脑海中，因为波斯人曾经杀害亚里士多德的朋友和亲戚，阿塔纽斯的暴君赫尔-米亚斯。

有这样的父母和老师，加上他的天才和无限的精力，所以亚历山大做任何事都极为彻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的勇气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反过来说他也非常谨慎小心。

他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先知和实行者的双重人格，所以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行动方面，与同时代人相比，他都有鹤立鸡群之感。他一方面非常神秘，另一方面不断实践，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觉得他具有无限的吸引力。虽然他具有高度的幻想力，但是他的幻想力却很少超越理智的限度之外，而他对于细节的精明程度，又可以与他对概括观念的渊博相比拟。因此阿利安在他的亚历山大传中评论说：象这样一个与任何其他人都完全不相似的英雄，照他看来，似乎不能不说是出于天意，而非人力所能及。

据说亚历山大只有中等身材，肤色白皙，普鲁塔赫说他习惯于把头偏向左肩。他奔跑速度极快，连职业体育家也不是对手。当他无需在战场上调度部队的时候，他会把时间消磨在狩猎或者是审判司法案件，料理军务和读书等方面。他非常爱好自然，为了消遣，他喜欢猎狐和射鸟，他也极爱读书。当在亚洲腹地找不到其他书可读时（除了荷马以外），他就命令哈帕路斯从后方送些书来。哈帕路斯都一一遵命照办。

但是，在他所有的品行中，最能显示出他特立独行的还是他的道德观。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同情心被认为有失英雄气概，不过他却能同情人，特别是对不幸的人更能表示怜悯。在埃菲苏，他制止了当地人民屠杀寡头政治的执政者，因为他知道如果不制止他们，那么除了真正的罪人以外，所有与他们有私仇的人或是有财产的富人，就会都被杀死。在米内塔斯围城战中，有些被围的部队躲在一个岛上，亚历山大见他们准备死战到底，不禁表示同情，认为他们也是高贵而忠勇的军人，就与他们谈判，并允许他们参加他的部队。在伊苏斯之战以后，他也对特比斯的大使表示同情，部分理由是因为他很怜悯特比斯的遭遇，该国的灭亡使他感到很遗憾。当他从印度回来时，在通过戈德洛西亚沙漠行军时，有一些守卫仓库的部队因为饥饿把仓库中的粮食抢劫一空。亚历山大知道这些人实在是出于迫切需要才出此下策，就赦免了他们。

几乎在所有时代中，女人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军人的合法污点，可是亚历山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也足以表现出他比起同时代的其他人来，简直就象是生活在另外一种道德世界里。他不仅以皇族礼节对待被俘的大流士妻女，而且对强奸更是深恶痛绝，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行为在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次他听说巴尔米尼奥的部队中有两个马其顿军人曾经侮辱过某些佣兵的妻子，他立即命令巴尔米尼奥将这种人渣处死。另外有一次，美地亚的总督阿特洛伊帕特斯送给他一百个骑兵打扮的少女，亚历山大马上把她们送到离军队范围很远的地方，以免她们遭受马其顿或外国部队的侮辱。在围攻佩内色普迪斯时，他下达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命令：不准触及任何妇女。尽管他如此尊重妇女，但这还不算是他的最高美德。对于亚历山大所犯的错误，阿利安也曾经感到很遗憾，不过他却说：在古代帝王中，据我所知只有亚历山大一人能够根据他天赋的高贵理性，真正勇于改过。

关于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探讨的文章实在太多，但最真实的也许还是阿利安的结论。因为阿利安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亚历山大的部将托勒梅。这是当他做了埃及王之后写的。内容如下：

“他非常聪明，非常勇敢，对荣誉和危险都非常热心，对宗教则非常谨慎……他最善于选择正确的行动路线，不管情况如何模糊，他的猜想常常是正确的。他对于如何集中一支军队和如何装备它都十分内行，尤其善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使他们不断产生新的希望，同他一样充满大无畏精神，铲除了他们脑海中一切惧怕危险的想法——在他的所有特性中，这一点最为难能可贵。对于一切在不确定环境中所应做的事情，他都以最大的果敢精神去做，他最善于迅速地预测和把握敌情，不让任何人有时间考虑失败的可能。”

亚历山大继位之后，发现他的四周都是敌人，于是立即用惊人的速度采取行动。他首先进入提沙里，在特恩比迂回了底萨莱守军的侧翼，这样他赢得了一次不流血的决定性胜利，于是立即被选举为底萨莱同盟的盟主。接着，他又好比从天而降一样前进到了底尔姆基利，特尔斐同盟马上承认他是菲利普的继承人。他的南下速度是那样迅速，本来雅典正在准备脱离马其顿的控制，现在马上向他表示降服，于是科林斯邦联大会选举他为最高统帅，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因此在菲利普死后不过几个星期，他就已经完全稳固了他在希腊境内的地位，于是他出发去巩固北面和西面边疆，并使界外的野蛮民族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经过两次惊人的战役，一次在多瑙河上，一次在依里利亚，他就建立了他的权威。在这边的任务完成后，他不得不以最快速度赶回南面，因为希腊境内又在蕴酿新的危机，这一次是波斯人鼓动起来的。

公元前338年，卡拉克斯的胜利者阿塔克斯二世的儿子阿塔克斯三世被刺了，由他的一个远房亲属科多曼纽斯继位。科多曼纽斯改名大流士，就是大流士三世。他害怕马其顿兴起，乘亚历山大忙于北疆的时候，抓住这个机会送了三百个塔伦给雅典人作为贿赂。虽然雅典人拒绝了，但是狄莫西斯却接受了，而与此同时又有谣言传来，说亚历山大和他的全军都已葬送在依里利亚的荒野之中。于是特比斯人不等证实消息，立即包围了据守卡德米亚的马其顿部队，

雅典人也派了一支兵力去协助特比斯人。突然之间，特比斯人发现亚历山大非但没死，而且已经到了孔彻撒图斯——在特比斯西北面，相距只有十五英里左右。他的行军速度简直快得可怕，所以他的到来有如雷霆一般打在特比斯人身上。第二天他就已经站在特比斯城外，一个突击就攻占了城门，屠杀了六千个特比斯人。接着他将该城夷为平地，将它的土地分给同盟中的其他各国。为这个悲剧所震惊，雅典人立刻向他屈服，亚历山大却对他们待之以礼——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他认为雅典是希腊的文化中心，而且他也不希望强大的雅典舰队倒向波斯怀中。于是在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他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作战基地，从那里他可以发动对波斯的攻击。

亚历山大留下安迪帕特带着九千多步兵和一小队骑兵控制希腊，监视斯巴达，并在切西尼地斯湖集中了他的舰队，一共有160艘战船，在公元前335年年底或是次年年初，率领他的军队向西斯塔斯前进。当他的军队正在渡过阿拜达斯时，他首先驶向依比利亚去访问特洛伊旧址，以便在他神话远祖阿基利斯的坟上献上花圈以安慰其在天之灵。在阿拜达斯东面几英里远的阿利斯培，他赶上他的大军，共计步兵三万人和骑兵五千人。为了在深入波斯心脏地区前首先肃清左翼，他前进到格拉尼卡河上。敌方在那里有两万亚洲骑兵和两万希腊佣兵，由罗德岛的梅农指挥。公元前334年的5月或6月间，在这条河上他赢得了他的四个大会战中的第一个。接着他就征服了色雷斯全境，于是向南旋转，首先前进到沙尔底，该城投降了；接着又前进到埃菲苏，这个城市也投降了，再往前就是米里塔斯，它拒绝投降，经过围攻之后，于7月被占领。在那里亚历山大作了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他想夺取波斯人的制海权，但他却无法击毁波斯舰队，因为他缺乏工具，所以他决定占领东地中海岸上的一切港口和基地。他一共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

这些基地中的第一个是哈里卡那苏斯——就是波德罗姆。当他发现要攻陷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以后，便留下三千步兵和二百骑兵，由托勒梅去负责围攻，他自己再继续向戈德地门——即贝拉希沙尔——推进。他的兵力分为两个纵队，一个由巴尔米尼奥率领，经过莱地亚前进；另一个由他自己率领，经过莱西亚海岸前进。从戈德地门，他取道安基拉向塔苏斯前进。

于是，在公元前三三三年十月间，他到达现在亚历山大港所在的位置。此时，大流士在苏契已经集中了一支军队，这个地点在阿曼努斯山地以东。当他知道亚历山大正沿着海岸向南前进，就放弃了平原地带，越过了阿曼努斯山脉，进到了亚历山大湾的北端，在伊苏斯切断了马其顿军的交通补给线。当亚历山大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即赶回来，就在皮纳努斯河岸上，打了他的第二个主要会战——就是伊苏斯会战。他在那里击溃了波斯军，迫使大流士逃走。

亚历山大还是坚持着他的目标——占领波斯的海军基地——他不尾随波斯败军的后面，向内陆穷追，而仍然继续沿着叙利亚海岸前进。阿拉杜斯、巴布鲁斯和斯登都开门欢迎他。如果不是他要求对泰内的米卡斯神的祭祠权利，那么泰内人也会同样的迎降。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于是这个岛城开始受到围攻。这次围城战在历史上也要算是最著名的一次，它从公元前三三二年一月起，直到八月末才被攻陷。于是不仅所有的波斯海军基地，连所有一切腓尼基城市的舰队，包括塞浦路斯在内，全部都落入亚历山大掌握之中。于是这些因素使他对东地中海获得了绝对控制权，并且使马其顿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权国家。

他通过了今天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经过了两个月的围攻，加沙城也被攻陷了，于是埃及与波斯间的关系全被切断。亚历山大派遣他的舰队到佩鲁苏门，再进军达到孟菲斯，于是进入了埃及法老的都城。根据轶闻，他被拥上了设在佩塔神庙中的御座，上尊号为埃及国王。从孟菲斯，他沿着尼罗河下溯，到达坎诺波斯。在拉科迪斯附近，他选定亚历山大城的地址，在许多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以这一个最为著名。

公元前三三一年年初，他越过大沙漠，走了二百五十英里，去凭吊在示巴的阿蒙神庙。依照神话，这个地方曾经为他的祖先佩索斯和赫拉克里斯所征服。（注：佩索斯为赫拉克里斯母亲的祖父。）据记载：当他走向神庙的时候，有一个僧侣想用希腊语来向他致欢迎词，他本来是说：“啊，我的孩子。”可是因为他是外国人，发音不正确，使人听到好像是说：“啊，宙斯的儿子”。这个错误使亚历山大感到十分愉快，于是成就了一个神话，说神自己称他为宙斯的儿子。随后，他们一同去祭神，至于神签对于亚历山大有些什么启示，无人知晓。据说亚历山大认为这是极高度的机密，连写信给他的母亲时都未曾提及。

不管事实如何，似乎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在僧侣称亚历山大为“宙斯的儿子”之后，他又听到哲学家沙曼的讲演。在他指出神为所有人的帝王之后，更使亚历山大感到别有用心。从此他的思想大为改变，他认为既然太阳神阿蒙是普照全人类的，对于善恶都是一样。所以他

联想到所谓HOMONIA的观念，那就是和谐团结，万众一心的意思。如果没有这个观念，那么在一个城市国家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他认为这个观念应该加以推广，把整个世界包括在一起，变成神的城市，所以一切的人类应一律平等，而没有种族的分别。照坦恩博士的分析，这种对于HOMONIA观念的解释，要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地斯等人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莱特教授也持同样见解。他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虽然获益颇多，但是他却比他的老师前进了很多。他放弃了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界线，他勇敢地宣布：‘四海一家’。”

这个问题，也许可能要算是世界史中有关文明的一件最重要大事。坦恩这样的写着说：

“亚里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说，对待希腊人应如朋友，对待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却更好，他宁肯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的区别，而这样去实现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意图。因为亚历山大相信他负有一个神授的使命，以来调和全体的人类。他要做全世界上的调解者，把人类的生活和风俗，都混成一体。他要把善人当作是他的亲属，把恶人当作是异族；他认为善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而恶人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坦恩对于这个问题继续叙述如下：

“不管所有这些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很明显的，这却是思想上的一次大革命。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类，本来都是天然的兄弟，但恶人却并不包括在内。从此所谓“Homonia”的观念，已经不再限于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把希腊人与野蛮人联合成为一体。亚历山大的目的是要把和平代替战争，对于凡是他的兵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对他帝国中的臣民，都要使其万众一心，这样才可以消除人类之间的仇恨。因为人类既然是一个血统，所以他们的心灵和精神也应该是一致的。”

色诺芬曾经用赛鲁斯为例证，把一个理想中的世界统治者的图画，说给亚历山大知道。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也曾提出了哲学国王的观念。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亚历山大这个人惯于跳出事实的圈子，而进入沉思的领域。所以他自然产生了一种“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观念，因为只有一个太阳照耀在大地之上，所以人类也只应有一个唯一的统治者。”所以当他在示巴神庙中，接受了神秘的感召之后，这位受过哲学家教育的国王，就摇身一变而成为神授的国王了。通过了亚历山大这个人，西方世界才从东方接受了神权帝国和君主崇拜的观念。这第一个观念在罗马帝国中，和它的承继者，基督教帝国中，就更发扬光大了起来；而第二个观念则演变成为王权神授的观念。

这种对于HOMONIA观念的推广解释，对于世界观念实在是一个超级革命，以后就变成他所有征服行为的目的，使他从示巴一直走到当时所认为的世界尽头。在他回到孟菲斯之后，发现从希腊开来的增援部队，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亚历山大于是赶紧着手组织对埃及的控制。他指派了他的驻军指挥官，命令他们应该允许当地的省长，依照他们的旧有习惯治理他们的地方，但是由他们负责收集一定的贡额。在他占领的地域中，使用的都是这种老办法：他把地方的民政与军事控制，完全分开。前者他交给被征服人民的代表去处理，后者则交给他所选定的马其顿军人去负责。

公元前三三一年的春天里，他架桥渡过了尼罗河，发现他的舰队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从那里他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伯罗奔尼撒对抗斯巴达人的阴谋。接着他取道奥伦特斯河谷，向安提阿进军。向东一转，他就跃进了幼发拉底河上。在萨普撒库的附近，他发现了尼兹菲利门城，可以当作他的交通线上一个据点和仓库使用。最初他是想在尼尼微——现在的莫苏尔的附近，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后当他知道大流士正在这个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于是他就决定在亚述古都的西北面渡河，沿着它的左岸向下游走，以阿拉伯纳为目标。

在西方世界军事历史所有决定性的会战中，这一战要算是最惊天动地的。命中注定要在这场会战中获得胜利的军队，是菲利普一手所创造出来的。以一个军事组织家的立场上来说，他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认识到在军事组织中，机动是一个最主要的战术性因素。直到他这个时代为止，会战都被人们当成一种耐力的竞赛，谁能在战场上获胜，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纪念物，就成了这次会战中的胜利者。无论如何，因为它所不具有的弹性，一个方阵如果不解散其行列，就无法实施追击，而一旦解散之后，它又很容易被轻装骑马的部队所击败。菲利普却认识到在战场上的格斗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已，战术性的目的应该是在追击中歼灭敌人。当他组织他的陆军时，就注意到这个目的，他把各种不同的战斗人员，联合组成一个战术工具。当他的步兵咬着敌人的时候，骑兵就迅速调动以作决定性的打击：前者为弓，而后者为箭，箭就从弓上发射出去。

在菲利普之前，马其顿的骑兵由贵族所组成，它被称作为Hetairoi，意思是国王的伙伴。这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名称，远在荷马史诗中，阿基利斯的二千五百名精兵，也是使用这个名称。在菲利普的时代，步兵也早已逐渐由一群乌合之众的武装农民，变成了有组织的正规常备

兵，他们叫做Pezhetairoi，意思是步行的伙伴。菲利普把骑兵分成团，每团约有一千五百人到一千八百人，其中一个团为禁卫军。这种重骑兵装备长剑和盔甲，主要兵器是长枪，因为马蹬是一直到公元后六世纪才有的，所以长枪只用于刺击，而不像中世纪那样用来撞击，菲利普又用一种介于轻重步兵之间的步兵，来代替过去的重步兵。这种轻步兵的观念，是雅典将军埃菲克拉特斯在公元前三九二年首创的。这种步兵装备一枝长枪和一个小圆盾。马其顿的新型步兵使用长十四英尺的长矛，右臂携带一个轻型防盾，他们穿着胫甲和具有金属保护的战袄。菲利普把步兵的方阵，组织成步兵团，每团的正常编制为一五三六人，分为营连等单位，最小的单位为一列十六个人，但是亚历山大通常总是把它减到八个人。

除了方阵重步兵以外，菲利普又编成了三个营的轻装步兵，每个营一千人，作为右翼方面的快速骑兵和行动较缓的方阵之间的联系。三个兵种联合在一起，好比左面是一个运动迟缓的墙，右面是一个运动迅速的矛，而中间就是一个铰链。这个具有弹性的铰链在采取斜行序列前进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在骑兵与方阵之间的接触几乎必然会中断。而在所有的古代战争中，维持一个完整的正面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轻步兵也有一个营被指定为禁卫军。以上部队纯粹由马其顿人所组成，除此之外，菲利普也组成了相当数量的联军轻骑兵，主要是底萨莱人。除了马其顿的步兵以外，亚历山大也有希腊同盟所供给的大量步兵和一些佣兵。

直到菲利普时代为止，希腊的围城战都要靠饥饿来迫使被围者投降。为了加速这个缓慢的程序，菲利普从西西里学会了使用攻城机械，而这种工具早就被希腊和迦太基的工程人员使用着。

对于亚历山大的炮兵和工兵，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而对于他的补给方法，就更是一无所知。炮兵也可分平射（加农）和曲射（榴弹）两种，所投射的东西为石弹和标枪。而工兵则供给必要的工具和材料来建筑攻城槌、围攻塔、围墙、桥梁和营寨等。所有的战斗兵种和勤务部队都由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参谋组织帮助他。其中有一位秘书长、日记的记录员、国王计划的保管员、测量人员、战史家、还有许多专家和科学研究人员。就其整体而言，这种军事组织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是一支征服性的军队，而更是一支占领性的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组织，而且更加是一个科学开发性的组织。

大流士在伊苏斯失败之后，又另外招募了一支军队。因为据说他曾经让他的某些部队拥有剑和更长的矛一类的装备，这样比较易于对付马其顿人的长矛，由此可以推断他并非没有学会一点教训。他从巴比伦向北进军，渡过了底格里斯河的左岸，到达阿拉伯纳城——意即四神城——把仓库和家眷都寄托在这个城里。从那里他前进到高加米拉，在勃姆多斯河上，这条河是大扎布河的支流；它的位置在莫苏尔东北，距离约为十八英里，在阿拉伯纳的西面，距离约为三十五英里。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位置的理由，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广阔的平原——在克鲁姆莱斯附近——适宜于其大量骑兵的运用。

亚历山大渡过了底格里斯河，于九月二十日，在该河东岸休息他的部队，这时正好发生了月蚀的现象，于是他就向月神、日神和地神牺牲致祭。（注：从亚历山大选择的神名上看来，似乎当时的人类已经能够了解月蚀的成因。）

又过了几天，他的侦探向他报告说波斯军已经接近，他就立即准备迎战。他亲自率领一部分精锐的骑兵，用最高的速度向敌人方向前进，同时命令其余的部队以常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从俘虏口中他得知波斯王正在高加米拉，率领着四万骑兵，一百万步兵，和二百辆装有镰刀的战车以及少数的战象。（注：一、兵力的真正数字已经不可考。尤斯丁认为是四十万步兵和十万骑兵；库蒂斯认为是四万五千骑兵和二十万步兵，而狄奥多拉斯和普鲁塔赫则都是说总数一百万。二、当时的战车可能十分厉害，它的速度很快，镰刀可以把人马的肢体切去，其锋利程度使被切者甚至来不及感到痛苦，就发现自己的手脚已经被切断。三、在印度以外，战争中使用象兵，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纪录。）

这时，大流士正在忙于铲平地面和移去障碍物，把这个高加米拉平原变成一个巨型的阅兵场，在这个广场上他把他的部队，按照下述战斗序列展开：

左翼由巴克特里亚骑兵担负，杜罕人（赛西亚部落之一）和安其提亚人的部队也和他们混在一起，其次是波斯人的部队，骑兵与步兵混合在一起，其后是波斯苏西亚人，再其次是苏西亚卡都西亚人。以上所述为其左侧方面直达整个方阵的中央为止的全盘部署。在右翼顶点，所集中的为叙利亚低地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队，其次则为米提人，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帕西亚人和赛西亚人的部队，再其次为塔普里亚人和希卡尼亚人，最后是阿尔巴尼亚人和沙赛西尼亚人，直到整个方阵中心为止。在中央部分，大流士所在的位置为其皇族部队，这些波斯人的长矛上都饰有金缨，其次为印度人，当时被称为“移居的”卡利亚人，和马尔地安人的弓箭手。

在他们的后面则为乌克兰人，巴比伦人，红海各部落，和西塔西尼亚人，都组成纵深的队形。在先锋部分，左翼方面，面对着亚历山大的右翼，为赛西亚人的骑兵，几千名巴克特里亚人，和一百辆战车。在大流士的御林军骑兵的前方为十五头战象，和五十辆战车。在右翼的前面为亚美尼亚人和卡派多西亚人的骑兵，和五十辆战车。希腊的佣兵，紧靠在大流士和他的亲信波斯部队的两侧。正对着马其顿人的方阵，也只有这个部队才可能对抗得住方阵。

依照上述的叙述，是不难明确这许多的部队，实际上是如何集结的。依照坦恩的推测，全部第一线兵力均为骑兵所组成，而跟着他们后面的第二线则为步兵。右翼由马查斯指挥，而左翼则由比沙斯指挥。

在他把敌军的部署确实搞清楚之后，亚历山大就花了四天的时间休养军队和增强营地，装置鹿角和挖掘壕沟，渡过底格里斯河后的第四天夜里，大约二更时分，他突然命令拔营前进，以便在拂晓时与敌接触。差不多到了与波斯军相距三英里半的时候，他停止了下來，召集他的各位将领会商。他的副帅，巴尔米尼奧，建议他们应该就地扎营，再对敌方和地形进行侦察。亚历山大同意了，乘着营地尚在设防之际，他亲自率领着轻步兵和骑兵，四出巡视，勘察这个准备当作战场用的广场。视察归来后，他又再度召集将领讨论他所看见的一切，并向部下说明立即执行命令的重要性。

九月三十日，即会战前夜，当大流士正在发出一种午夜的归营号，亚历山大的军队也休息了。巴尔米尼奧走到国王的帐内，向他建议进行一次夜间攻击，但是亚历山大拒绝考虑。他已经计划好在即将会来的会战中，如何进行决定性的打击，同时他也认识到夜间作战的困难实在太多。亚历山大把他的兵力作了下述部署：

右翼方面由骑兵和轻步兵，和可以假定为三个团所组成的方阵。于是在正面的右端为克利图斯的皇家禁卫骑兵中队，在把他的左面是格劳西亚斯、阿里斯托、索波里斯、赫拉克里德斯、德米提流斯、梅里格尔和希吉罗布斯等人所率领的骑兵中队，全部的骑兵又由巴尔米尼奧之子，切罗塔斯任总指挥。其次为禁卫轻步兵营和尼卡罗尔率领的轻步兵。中间的重步兵方阵战斗序列如下：列努斯在右，其次即为佩尔狄卡斯、米里吉，米里吉尔、波里希普尔强、希门米亚斯和克拉提拉斯的部队。照例，这左翼方面的全部步兵又均由克拉提拉斯担任总指挥。再左面为艾利吉亚斯所率领的希腊骑兵和菲利普所率领的底萨莱骑兵。而整个的左翼又由巴尔米尼奧总揽其指挥权。在他的身边则由法尔沙利亚骑兵担任护卫。

说到这里为止，在这个战斗序列中并无什么特殊的意味。其排列都是正常的，与在格拉尼卡斯会战和伊苏斯会战中，都极为相似。但是战术问题却不同，而在观念上却与色诺芬所叙述的，赛鲁斯在提门布拉之战中，所面临的情形极为接近。亚历山大可能曾经熟读过色诺芬的著作，他又把那次半神话性会战的战术，应用在这个会战中。他在他的第一线的后面，还安排了一个第二线。他对于这些预备线的指挥官，曾经下达下述命令：如果他们看到第一线受到波斯大军的包围，就旋转向前承受波斯人的攻击。这个后方或预备队的战线，由两个飞行纵队组成，每一翼的后面摆一个。他们的位置与正面成为一个角度，如果敌人想绕过翼侧进攻，那么他们就可以攻击敌人的侧翼。如果敌人不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向内旋转，增强正面的兵力。

在右翼方面，部署有如下述：一半的阿吉里亚尼亚人，由阿图鲁斯指挥；一半的马其顿弓弩手，由布里索指挥；老练的佣兵（步兵）由克林德尔指挥，在前两个单位的前面，又有阿里提斯所率领的轻骑兵和阿里斯托所率领的配奥尼亚骑兵，而在他们的前面，则又有米尼达斯所率领的希腊骑兵（佣兵）。其余的阿吉里亚尼亚人，弓弩手，和巴拉克鲁斯的标枪兵，又排列在马其顿骑兵的前面，以对抗波斯战车的冲突。如果敌人的骑兵绕过右翼进攻，则米尼达斯的部队，就旋转并进攻敌人的侧翼。左面的纵队位置也是成为角状的：首先为西塔克里斯所率领的戴内斯步兵，次为柯拉鲁斯所率领的希腊联军骑兵，再次为阿格左所率领的阿德里西亚骑兵。在他们的前面又有安德罗马巧斯所率领的希腊佣兵。保护行李营的为戴内斯步兵。总共亚历山大全军有七千骑兵和四万步兵。

对于亚历山大这个巨大的战术部署，道奇上校曾经进行过如下评论：

这样的部署常被称为一个空心的大方阵，但事实上其意义不仅如此。这种部署具有较大机动性，这是方阵所没有的。因为这两个“飞行”纵队的组织和部署，都是使他们可以面对任何方向，对从前面、侧面和后面来的攻击，都可加以迎击。事实上，以后左面的纵队曾经遭遇到一个后方来的攻击，也终于将其击败了，所以库蒂斯说：严格的说来，他对于军队部署，是使其到处都可以构成正面。可以在所有的方向与敌人接战。

以上所述为亚历山大的战斗序列，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在整个会战中，因为他能够预测敌人的意图，并准备应付的对策，所以他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成功地发展出一种新战术。这次胜利的主因还是由于他具有先见之明。

当马其顿军逐渐接近波斯军时，亚历山大并不直接向他们进攻，而是向他们的左翼方面斜着走。大流士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沿着他的行军方向，跟着他走，赛西亚骑兵则以徒步前进，引导攻击。亚历山大继续斜着走，逐渐走出波斯人已经铲平了的地区。大流士害怕到那里将会使他的战车丧失作用，于是命令他左翼方面的前排单位，赶紧绕过亚历山大的右翼，以迫使他停止下来。为了对付这次攻击，亚历山大调动米尼达斯所率领的希腊佣兵（骑兵）向前，但是他们却被敌人击败，纷纷后退。接着，阿里奥斯托的配奥尼亚骑兵和克林德尔的佣兵也奉命进攻。为了对抗起见，比沙斯也派遣巴克特里亚和赛西亚的骑兵前进。这些兵力突破了马其顿骑兵的队形，使他们受到重大的损失，因为赛西亚骑兵的人和马都有较好的装甲保护。尽管如此，马其顿军的纪律和勇气也开始表现出来，他们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连续向敌人发起冲锋，终于将比沙斯的攻击击退。当马其顿骑兵首先发生混乱时，大流士也就抓住这个机会，发动他的战车部队，希望把敌人的方阵冲散。可是当他们接近时，布阵在马其顿骑兵前面的阿吉里亚尼亚人和巴拉克鲁斯的部下，用箭和标枪的阵雨阻止了他们。这样就结束了马其顿右翼方面第一阶段的会战。

第二阶段的开始，是阿里提斯奉命攻击那些迂回马其顿军右翼的敌军。接着，亚历山大亲自率领马其顿的骑兵，向内旋转，构成一个楔子，连同右面四个团的步兵，冲向敌军，此时敌军由于骑兵已经前进，所以正面出现一个缺口，他就率领骑兵直接向大流士冲去——这是这次会战的转折点。

这次骑兵冲锋，在左面还有长矛如林的步兵方阵密切支持。这个声势骇人的攻势使波斯国王受到震惊，立即逃出战之外。此时本来在亚历山大右方的波斯骑兵，发现后方已经受到阿里斯特的威胁，也开始逃走，马其顿人尾随追击，杀伤颇多。这个景象应该是足够惊心动魄，因为库蒂斯和狄奥多拉斯都说：由于大量敌军纷纷逃命，所以掀起满天尘雾，几乎使任何东西都很难分辨清楚，所以马其顿人才没能俘获大流士，只有一片喊叫声和马鞭啪啪的声音，可以作为追击者的向导。

当右翼方面战斗正在进行之际，左翼方面也同时发生了恶战。由于亚历山大的斜进，所以左翼的位置就落在右翼的后面，而亚历山大的勇敢冲进又使左翼与右翼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于是印度人和波斯人的骑兵，就从这个缺口涌入，直扑马其顿的行李营，试图救出大流士的家属。按照阿利安的记载，这里的战况变得异常危急。幸亏预备队的指挥官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就按照事先的命令，很轻快的旋转过来，在波斯军的后方出现，把他们杀伤了不少。

当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在大流士右翼顶点方面的骑兵，也绕过了马其顿军的左翼，从侧面攻击巴尔米尼奥。巴尔米尼奥就受到了敌人的包围，他立即派出一个传令兵，把他现在所处的紧急情况报告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正在追击波斯军左翼方面的残部，他马上率领马其顿骑兵转过头来，向波斯军的右翼攻击。此时波斯的骑兵也恰好退回来，却发现退路已被切断，开始进行顽强的战斗。双方苦战不已，但最后还是亚历山大获得胜利。

巴尔米尼奥之围已解，于是马其顿军再继续追击，一直到深夜为止。接着他们又用强行军向阿拉伯纳城赶去，前进了大约三十五英里，但是并未能俘获大流士，他早已溜走了。

这场会战中的死伤数目，连猜测也都很困难。阿利安估计波斯军被杀者为三十万人，而被俘者则更多，至于亚历山大方面则认定只损失一百个人和一千匹马。库蒂斯说波斯军战死了四万人，而马其顿军则为三百人。狄奥多拉斯则估计双方分别为九万人和五百人。

现在，亚历山大对大流士暂不作进一步追击，而改向巴比伦前进。这个城是未设防的，因为它的城墙早已被拆毁。当他进城之后，立即命令重建马尔达克的神庙。接着他又进到苏沙，在那里他夺获了五万“塔伦”的金条（每塔伦值英镑三磅十七先令十个半便士。总值12,000,000镑）接着又追到巴沙尔格德，在那里没收了十二万“塔伦”的金条（总值29,000,000镑），从那里又到了皮尔西波利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报仇行动，他烧毁了克尔克斯的故宫。当他在皮尔西波利斯的时候，接到安提波特儿的报告，说在米格罗波利斯的前方，他进行了一次大会战，击败了斯巴达军，杀了斯巴达国王阿吉斯。从此伯罗奔尼撒同盟被其解散，连斯巴达本身也被迫加入了科林斯同盟。

公元前三三〇年的冬天里，亚历山大离开了皮尔西波利斯，向艾克巴塔拉进发，在那里他又夺获了18万塔伦（总值43,785,000英镑）。但是这次大流士又逃脱了。最后他在十一天之之内，前进三九〇英里，才终于赶上了大流士，可是却发现大流士已为比沙斯所杀。大流士一死，亚历山大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靠着武力他已经变成了万王之王。因此，他又必须在东部各省建立权威，以使这个帝国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之下。并且尽可能使它们获得一个安稳的边界。

他征服了里海地区，于是向东前进到希拉特，在那里建立了在亚洲境内的亚历山大城。其

后向南前进到希尔曼德河上，这条河在戈德洛西亚北面边界上面：从那里又向东北走，在哈兹尼建立了阿拉恰西亚境内的亚历山大城。

在喀布尔，他又建立了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从那里，于公元前三二九年的春初，他越过了哈华克隘路，并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收伏了巴克特里亚，渡过阿克索斯河，进入了赛西亚。于是建立了一连串的要塞以保护他的北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贾克沙尔提斯河上的亚历山大艾斯恰提。

他与赛西亚人缔结了同盟，为了要收买巴克特里亚的人心，他又与该国元首，阿克雅提斯的女儿罗克沙拉结婚。到了公元前三二七年暮春时节，他才率领大约二万七千人到三万人的兵力，沿着传说中狄翁尼沙斯和赫拉克里斯所曾经走过的旧路，向印度前进。在喀布尔，他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一半由希法斯辛和皮尔地卡斯率领着，从克贝尔隘路进发。他自己率领一半兵力，经过齐特拉尔征服了许多山地中的部落，于是再从斯华特下行至印度河上的阿托克，在那里又与希法斯辛会合在一其。他渡过了印度河，进到了海达配斯河上。在公元前三二六年，他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婆拉斯，这是他的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如果单就战术而论，这次才算是最卓越。由于佩服他的勇敢，亚历山大让婆拉斯仍然复位为王。接着他灭了桑加拉，越过了阿西尼斯河，他的最后目标为达到恒河，直到海边为止。这很明显，是他理想中最安稳的东界。

可是他的军队跟随他已经走了差不多一万七千英里，并且已经到达了大流士帝国的东界，所以拒绝再往前走。他十分勉强地停止了前进，准备回国。在尚未掉头向西之前，他在海达配斯河上，建造了十二个祭坛，以谢神和纪念他自己的功业。此时在他的军营中有一个流亡的印度酋长，名字叫作桑德罗库图斯，几年之后，这个人居然效法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毛雅恩帝国，其首都设在恒河岸上的波利波塔。

既然无法用海洋来巩固他的东部疆界，按照他的看法，第二条最好的防线似乎就应该是印度河了。而如果能从海上使印度河河口与幼发拉底河的河口相连系，那么价值就更大，因为所有波斯的沙漠和印度的西部山地，都被囊括在其中。

亚历山大开始西归，在耶仑建立了一支舰队。公元前三二六年十一月间，舰队完成了，在对祖先赫拉克里斯和阿蒙等神祇奠酒上祭之后，他就开始出发。在南进途中，他与马利人打了一仗，几乎丧失生命，最后终于到达印度河的三角州上。他对该河出海口作了一番勘察之后，在巴塔拉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命令他的海军司令，尼尔巧斯率领一支舰队，大约有船一百到一百五十艘，向西行驶去寻找波斯湾。他再把陆军分为两部分，命令卡拉提拉斯率领较多的一部分，取道波南隘路和坎大哈，回到皮尔西波利斯。而他自己则带着较小的一支兵力，约八千到一万人，沿着戈德洛西亚沙漠的沿海地区，向波斯进发，目的是为了在海岸上为尼尔巧斯的舰队设立补给基地。在这次行军中，他损失了大部分行李和许多非战斗人员，但是他的战斗兵力都没有太多的损失。最后，三支兵力都能愉快的回来，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也被打通了。

公元前三二四年春天，他回到苏沙，为了庆祝他的成功，举行了一个巨大的欢宴，在这个欢宴中，他和许多部将，还有一万名士兵，都跟波斯女人结了婚。这个举动象征着征服者与征服者的界线已经不再存在。自从色诺芬的时代起，对于希腊有一个经常存在着的威胁，那就是有许多飘泊的希腊人，愿意出卖生命当佣兵。为了解除这个威胁，他下令所有的科林斯同盟国家允许这些人携眷返国。因为这个命令已经超出了最高统帅的权力之外，所以他又设法来解释这个变例。他向各国发出训令，要大家承认他是神，这样就可以不受同盟条约的限制了。各国都不敢不听从，于是流亡的人们纷纷回家。

不久以后，他又决定把所有服役年龄已满的老兵，都送回希腊去。他在阿皮斯作了这个合乎常理的决定，但是却引起了马其顿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猜测亚历山大的目的是为了讨好波斯人，故意排挤他们，并且将要把他的政府中心从马其顿迁往亚洲。不久这种不满情绪引起了全军叛变，只有步兵警卫军例外。军人们要求回家，并且请亚历山大与他的父亲和阿蒙去打仗好了。亚历山大把叛变的领袖予以拘押，使叛兵不敢乱动。接着他宣布解散全军，并开始建立一支波斯军队。这个惊人的行动使叛变消弥于无形，接着他又继之以安抚的工作。他举行了一次大宴会，一共请了九千个客人，这个欢宴也象征着他所希望在其帝国中所建立的和平。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战争中本来是死对头，现在都和他同坐一席，其他各个种族也都有代表参加。阿利安的记载说，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伴们用同一个碗喝酒，也举行一样的奠酒仪式。亚历山大起来为和平而祈祷，他说马其顿人和波斯人都是他的帝国中的人民，所以应该像一个社会中的伙伴一样（不仅是臣民）。他认为全世界上的人们都应该和平相处，万众一心。这也就是大家始终不曾做到的四海一家的观念。他从前即曾说过所有的人类，都是一个父亲的孩子，所以他的祷文也就表示他相信他是肩负神的使命来调和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在座诸人没有一个能够预料

得到这个祈祷其实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

公元前三二三年春天，他回到巴比伦，这也是他所选定的首都。在那里他接见利比亚的大使，该国的使臣把皇冕献给他，称他为亚洲之王。意大利诸国也都有使臣来向他朝贺。

在巴比伦，他忙于计划许多探险和开发的工作。其中一个去里海探险，想发现它到底是一个大湖，还是一个海湾。其次还有对波斯湾地区的开发。为了后者，他又在巴比伦建筑了一个巨大的海港，船只可以从那里驶出，以便在波斯湾的东岸上建立殖民地。他又想开辟从巴比伦到埃及之间的海路，并使后者经过上次尼尔巧斯所发现的航路，与印度联系起来，并且还想环绕阿拉伯航行，他想亲自领导这个远征。当舰队还正在建造的时候，他又改革方阵的编制，把波斯的轻装部队，与马其顿的重步兵配合在一起。

这些伟大的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完成。还在准备阶段中，六月二日他突然患了疟疾，病势日渐沉重，被抬入了尼布恰德里查尔宫中。六月十二日，他的老兵们排成纵列，在他面前沉默地鱼贯通过。他躺在那里已经不能说话了，可是他还是最后一次检阅了他们，抬起头来向他们行注目礼。第二天，公元前三二三年六月十三日的黄昏时候，他驾崩了，享年三十三岁，一共在位十二年八个月。他被葬在亚历山大城。

他逝世之后，他的大帝国随即分裂，一共变成了四个大王国——埃及由托勒梅统治，亚洲由塞鲁卡斯统治，马其顿由安蒂贡统治，而在印度则为康德拉古其兹帝国——可是他的四海一家的观念却永远不会消灭。当他从印度回到苏沙的时候，他曾经让马其顿人和波斯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结婚，这也象征着种族的融和。此后在他所建立的大城中，也就变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样许多的种族都混合为一体，而这种混合又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希腊文化。

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这些城市中最大的一个——亚历山大城就变成了这种新文化的动力来源。它成为世界的集会所。莱拉赫说：在这个城里，无尽的好奇心驱使人们，去追求和扩展各个方面的知识。他们希望能够知道一切，能够解释一切。他们遍读古籍，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们把今天所谓“科学”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与所谓哲学具有明确分别的。在那里发现了蒸汽动力，数学和力学的知识也都有发展。许多新的信仰和知识，向东西两面交流着。

由于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财政制度，也使得这种融合的程序加速。在他尚未出发作他的巨大冒险之前，他一定早已认清了他父亲权力的来源，大部分是因为他在戴内斯保有金矿。此外，在埃及的时候，他也一定认识到黄金是被当做神物看待的，在埃及国王的坟墓中都有大量的黄金殉葬。他夺获了波斯的大量存金之后，就把它们熔化铸成金钱。他不仅发行了货币，而且也创立了一种统一的标准以统一财政制度。在他死后，托勒梅垄断了在埃及的全部银行业，而经过他们在亚历山大城的中央银行，他们也处理与其他各国的贸易关系。韦尔克恩也曾这样的说：

在亚历山大的战争中，东西方过去的障碍物都被取消了，而在下一代中，有数以千计的希腊商人和技工到这个新世界中去，他们在象雨后春笋一样兴起的新希腊城市中，去寻找他们的好运。这样一来，这两个原先分立为二的圈子，就逐渐的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圈。当西部地中海也被吸入了这个在东方所发生的巨大革命性轨道之中时，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商业关系。它包括着全部有人居住的世界，从西班牙到达印度，并经过中亚到达中国。这个发展仅仅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最后才终告完成，但却是因为亚历山大征服了亚洲，才奠定了基础。

在他死后所建立的大王国，也都是以神授王权为其立国的基础。正如坦恩教授所说：自从他死了之后，所有的神话传奇就都开始附会在他的名字上面。以他为中心，整个东方的梦想世界都逐渐发展成形，他把文明世界从一个轨道中，纳入到另一个轨道之中。他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一切的情形都不再可能回到过去的状况了。

在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叶，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希腊文化才开始对于罗马社会发生影响。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在西庇阿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个影响更加不断扩大。韦尔克恩说：首先给亚历山大上尊号为“大帝”的，就是罗马人。研究希腊史的人可以在亚历山大和伟大的西庇阿·阿非利加之间，作一个对比，后者是汉尼拔的征服者和罗马世界帝国的创立者。罗马人称西庇阿为朱庇特神的儿子，把亚历山大的神话套在他的身上，说他是神蛇的后代。

以后，奥古斯都也是一个亚历山大的狂热崇拜者，在他的统治下，把皇帝当作神圣世界统治者的崇拜就正式建立起来，他把他的肖像刻在国玺上面，于是亚历山大的梦想至少有一部分兑现了。因为在罗马的和平时代，西方世界第一次尝试到长期和平的幸福。从亚历山大为神圣

皇帝的观念，再加上他自己所说的“神是所有人类的共同父亲，但是他却把最好的人当作是他的亲生子。”这句话，到基督教的建立，和把罗马皇帝的世俗统治转变为中世纪教皇的精神统治，其间只一步之差。更进一步说，尽管回教是基督教的最大对头，可是阿拉伯主义如果不跟在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主义相接触，它也许就不能创立起来。

---

罗马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完成亚历山大的心愿而已，因为可以看出罗马人已经吸取他的观念，但却并非有意如此，因为历史是由环境造成的。每个强国的生存史都有两个因素控制其命运——那就是内在和外来的冲突，就是所谓革命和战争。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因为衰老就决不会谋求和平；而使它们衰老得最快的，正是所谓的“安全感”。以上理论对罗马也完全适用。因为当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时，罗马正处在青年期，夹在两大强国之间——东面为马其顿，南面为迦太基。要想获得安全，这些强国必须加以消灭，因为任何强国的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绝对安全的疆界——这也是亚历山大的目的。

在西班牙就没有这种疆界存在，因为埃布罗河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所以一旦高卢战争结束之后，罗马人就把眼光集中在西班牙的银矿和市场上，在索格塔国内，扶持某政党去攻击托波雷塔人——他们是迦太基的臣民。汉尼拔采取了行动，罗马人警告他别管闲事，他拒绝了，在公元前219年开始攻击这个城市，经过八个月的围城战将它攻下。虽然罗马人并未出兵协助索格塔人，可是在次年三月，他们派代表到迦太基去，要求交出汉尼拔和他的部下。这个最后通牒被拒绝了，于是两国正式宣战。

汉尼拔有一切报复的权利，这是很明显的；可是当他包围索格塔时，他似乎早已充分了解可能的后果。虽然他可能是为了报私仇，但他也是为了取消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后果和使迦太基重获优势。它具有高度敏锐的政治才能，并且认识到罗马只不过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强国：它的优势地位是凭借武力而不是说服建立起来的。高卢人始终与他们为敌，当普里哈斯入侵时，也有几个同盟国曾经背叛它。从战略上来看，这个时机似乎非常有利；而在战术方面，汉尼拔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他知道自从亚历山大使用骑兵给战争艺术带来了新的革命，罗马人对这种革命似乎却很少认识。

反之，罗马元老院也认为这个时机似乎同样有利。在北部意大利，高卢人已经被击败，在那里已经建立了拉丁殖民地来控制他们。塔兰托和其他的南部港口都已加以据守，越过亚德里亚海，已经不再会有外来威胁，制海权已经控制在罗马人手中。不仅从罗马到西班牙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有了安全保障，并且从西西里可以向迦太基发动直接攻击。但战争却是一种机遇性很强的游戏，其中有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罗马的元老们对一切事情都有正确计算，但却有一个因素是他们无法计算的。他们可以估量迦太基人，但是却无法估量他们背后的天才汉尼拔。正如道奇所说，自始至终，汉尼拔就是一个枢轴，一切都绕着他旋转。在以后十六年以上的战争中，只有他一个人与罗马为敌，并且教会了他们如何征服世界。他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除了从他的战役中获得的那部分知识以外，关于汉尼拔的一切所知甚少，而且没有一件事是由友方叙述的。他出生于公元前249年，九岁即离开迦太基，和他的父亲一同去了西班牙，直到他的伟大冒险开始为止，他都没有离开过那里，不过他却一定追随他的父亲参加过许多次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他学会了战争艺术。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据说他能说极流利的希腊语，而且能读能写。他对希腊战史有极深入的研究。他比较瘦，但身体很强健，是一个优秀的赛跑选手，善于击剑和骑马，有着钢铁般的体质，他极能吃苦，头脑灵敏善于计算，能够把一切情况综合起来，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不受酗酒和美食诱惑。李维说他具有超人的勇气，敢于冒险，在危难之中却能有强大的判断力。虽然如此，李维又说他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比一般布匿人更可怕，他不信真理，不守信用，不畏鬼神，不信宗教，不尊重誓词。波里比阿也说他异常残酷，并且十分贪婪。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恶德可能都要大打折扣，因为他的不讲信义并不比他的伟大对手西庇阿更厉害。而他的残酷在那个时代也并不算是反常的。

当公元前218年春天，他从新迦太基城出发前往埃布罗河时，他的目标十分清楚。他并不想征服意大利，而只想破坏意大利同盟，以强迫罗马求和，就好像过去阿格多克里斯对迦太基曾施用过的故计。当他在特朗西梅诺湖大捷后曾经演说：“我来此不是要和意大利人作战，而是要帮意大利人同罗马作战。”他并非以征服者而是以解放者自居。以这个观念指导他的战

略，他率领着90,000名步兵、12,000名骑兵和37匹战象进入了近代所谓的佩尔比格朗地区。他之所以宁愿走陆路而不走海路，不仅是因为罗马人控制着海面，而且他更想唤起高卢人一同反抗罗马。所以他希望在尽量接近塞萨尔菲-高卢的地区，建立一个补给基地和兵源补充站，因为他与西班牙之间的交通线随时可能被切断。

从比利牛斯山脉，他毫无抵抗地运动到了阿维格隆以北不远的地方，因为罗马元老院完全没能猜中他的意图。他们一面命令塞姆普罗利乌斯在西西里集中一支军队准备对迦太基进行远征。另外又命令老西庇阿率领一支军队取道马西里亚前往埃布罗河。老西庇阿到达马西里亚之后得知汉尼拔正在他北面，相距五十英里以外，所以他已经追不上了，可是他却不是领兵从沿海道路赶回意大利，反而命令他的兄弟格纳乌斯率领大部分兵力向西班牙进发，去攻击汉尼拔的基地，他自己则率领少数人回到比萨。等罗马人知道汉尼拔的位置后，马上就派人通知塞姆普罗利乌斯领兵北上。此时，汉尼拔采取了一个与亚历山大在赫塔斯佩斯河上相似的行动，徒涉渡过了罗恩河，领兵向滨海阿尔卑斯山进发。

到底他从哪里翻过山脉，已经不可考，大致是在小圣伯纳德和吉尼维里山之间。他的最大困难并非山脉本身，而是具有敌意的阿罗布罗吉斯人不断攻击他的后卫。他一路的损失颇为可观，当他渡过罗恩河时，尚有步兵50,000人和骑兵9,000人（注：这个数字与原有兵力已经差了很多。主要原因是他在加泰罗尼亚留下了22,000人的留守兵力，其余21,000人则可以指明逃亡人数相当可观。不过上述数字可能不无夸张。因为波里比阿曾经说，这个军队的数量还不如其素质，其训练程度尤为优秀。）等他进入塞萨尔菲-高卢平原时，只剩下步兵20,000人和骑兵6,000人了。依照李维的计算，剩下的步兵只相当于他从新迦太基出发时的四分之一了。

这样重大的损失，是否由于领导的过失似乎很难说。不过却可以看出汉尼拔的军队纪律并不太好。反之，他在以后几年中，居然能赢得一连串的惊人胜利，就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公元前218年12月，在特雷比亚河岸上，他引诱塞姆普罗利乌斯接受会战。他使对手感到昏乱，在正面牵制他，另外分出自己骑兵的一半去绕过敌人侧翼，打击在敌人的后背上。于是罗马军大败溃逃（注：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双方兵力如下：迦太基人为步兵28,000人，骑兵10,000人；而罗马人为步兵36,000人，骑兵为4,000人）。次年4月，在特朗西梅诺湖北岸，他故意把部队放在塞维利乌斯和弗拉米利乌斯两军之间。然后他奇袭了后者，几乎使之全军覆没（注：罗马方面的损失为阵亡15,000人，被俘15,000人）。

汉尼拔于是向南移动，趋向亚德里亚海岸，在阿维都斯河边的坎纳夺获了一个罗马人的补给站。但他到那里去的主要原因似乎还是为了给他的骑兵寻找一个合适的战场。此时在杰伦纽姆有四个罗马的双倍军团，由他们的执政官帕卢斯和瓦罗率领。当他们知道汉尼拔的行踪之后，就前进到阿维都斯河，在它东岸扎营，在上游距离汉尼拔有三英里远。

因为迦太基骑兵占有优势，所以帕卢斯不主张出战，但瓦罗的想法却完全相反。由于两位执政官是隔日轮流担负总指挥，在他们到达后第二天是由瓦罗轮值指挥，于是他命令全军前进。双方发生了不具决定性的序战。

第二天，那是公元前216年8月2日，帕卢斯已经无法照他的心愿引兵退去。汉尼拔可能也认识到这一点，就把兵力布成一个新月形的阵势准备交战。在中央他集结着西班牙和高卢的部队，而把他的非洲部队置于两翼。在步兵阵线的两端，他又各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

面对着罗马人阵势，他首先击溃了罗马骑兵，接着就等候罗马步兵前进。他们压迫着迦太基的新月阵势向后退，一直到它凹入为止。于是突然之间，汉尼拔命令他的两军团非洲步兵前进，两面向内旋转，从侧面把罗马人卷入了口袋。最后，追击归来的迦太基骑兵就打击在罗马军团背上。

罗马军好像遇到地震一样，全部被他们吞食。（注：波里比阿认为罗马军的兵力为步兵80,000人，骑兵9,600人。而剑桥古代史则对于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估计罗马兵力应为48,000人。依照波里比阿的估计。罗马军的损失如下：骑兵除逃出了370人以外全部歼灭。实际未参加会战的步兵10,000人被俘，另外70,000人被杀。迦太基全部损失数字为5,700人。）

如果对特雷比亚、特朗西梅诺湖和坎纳这三个会战进行一次分析，那么这些胜利毫无疑问应归功于汉尼拔的战术天才。因为罗马人的战争思想太落后，所以使他的天才可以为所欲为，无往不利。罗马人的战争观念是非常呆板的，所依赖的就是匹夫之勇、纪律和操练。至于说到指挥，简直可说是聊胜于无。他们还是把将领当总教官看待——他只需善于调换检阅队形就够了，对于地形和战术要求简直很少加以考虑。因为他们过去的敌人都是缺乏纪律和操练的野蛮民族，所以在许多次战斗中，他们都是靠了纪律和操练取胜。又因为他们对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的战争一点都不了解，所以难怪被汉尼拔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愚蠢无知，累犯战术错误，而汉尼拔却有着惊人的机智、远见和想像力。不过这并非罗马将军们本身的过错，他们通

常并不缺乏勇气，而这却正是罗马军事制度的根本弊病。每个公民都可以担任将领，因为对于每个公民都假定他能精通战术。

正如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所说的：“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于将领的人选却年年都要用投票的方式来表决，这实在是一种咄咄怪事。”主要是由于政党政治作祟，因为罗马的几个大家族都互相对立，结果是建立了一支静态陆军，他们的将领是选举出来的，其标准不是经验和能力，而是他对政党利益的是否效忠。

相反，汉尼拔却是一位能够适应任何环境的将领，也许只有围城战是唯一例外。他凭着他意志驱使，在他的意大利战役中的前三年内，显出了无比的果敢；接着在以后的十三年中，他又进行顽强防御。他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能使他的行动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所以波里比阿的评论一点都不错：“对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无论好坏，起因却是汉尼拔和他的心灵。这个人的影响实在太巨大了，简直就是惊人。他的心灵可以适于一切人力范围内的任何工作。”他接着说：“一连十六年时间，汉尼拔一直在意大利与罗马人不断苦战。他的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他好比一个优秀的舵工，始终控制着这支巨大的兵力，虽然他的部队并非由一个民族，甚至并非由一个种族组成，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而且彼此间也从来没有冲突。像这样复杂的部队，没有一个敢不服从他的意志和命令，这也就可以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实在高人一等。”

再引证一位近代史学家的评论，蒙森曾经说过：“他特别具有发明天才，这也是腓尼基人的主要民族习性。他喜欢采用突然袭击和出人意料的路线。埋伏狙击和一切计谋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对敌手的性格曾作过谨慎研究，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他组成了一个当时最有效的谍报系统——甚至在罗马城内，他也经常派有侦察人员——所以他对敌人的一切计划都经常获得情报。他本人也常常化装，戴着假发亲自搜集情报。在这个时代历史书的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他的确是一个伟大人物，无论他到何地，都足以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那么象罗马那样的军事制度，对这样一个人又有什么应付的方法呢？完全没有，可是到了最后，罗马人的民族性还是获得了胜利。在坎纳会战之后的景象又是如何呢？汉尼拔希望这一战能使罗马共和国发生全面动摇，可是结果完全不然，尽管罗马已经瘫痪了，但却没有一个拉丁城市背叛它。如果汉尼拔是亚历山大，那么罗马也许还是会灭亡的。他现在应该明白，罗马联盟的力量就寄托在罗马城，除了罗马以外，他们空无一物。他的骑兵将领马哈巴尔劝他立即进攻这个首都，他却拒绝了。马哈巴尔怒吼道：“这是一个真理——上帝不会赐人以全能，他不会让同一个人拥有一切天才。汉尼拔呀，你知道如何获得一次胜利，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胜利。”正如李维所说，“大家都认为这个时间上的延误，已经挽救了这个城市 and 这个帝国。”

汉尼拔为什么不进攻罗马呢？霍华德说因为他正在构思一个新战略：准备使用迦太基的全部力量，使战争扩展到新的地区，这样就可以包围意大利。当他进行逐城争夺战时，其本国政府也在设法想把罗马人逐出西班牙，夺回撒丁，而更重要的是在西西里岛重建他们的势力。这样就可以迫使罗马求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汉尼拔也早已接受了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五世的请求，准备与他结为同盟。（注：在听说汉尼拔在特朗西梅诺湖获得了胜利之后，马其顿的菲力普五世也准备攻击意大利，而在坎纳会战之后，就与汉尼拔缔结同盟。于是罗马人在得到了佩加蒙国王阿塔拉斯的支援后，也就在公元前214年与他交战，这就是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1年，罗马人与阿托里亚同盟签订条约，到公元前205年战争才告结束，双方签订了弗尼斯和约，菲力普同意不再烦扰罗马的同盟国。）

可是这似乎并不是达到其目的最佳途径。如果罗马城被攻陷，那么西班牙、撒丁和西西里都会自动落入他的掌握之中。所以并不是因为他认定这个“新战略”是最好的，而是因为缺乏攻城工具，所以不得不如此。汉尼拔知道他攻不下罗马城，所以他被迫放弃攻势，与他的对手法比乌斯同样采取守势，从此都是想以消耗手段取胜。

为什么没有一个城市背叛呢？不仅是因为它们效忠罗马，而且也因为他们都有城墙，并且彼此间有道路联系。他们不仅可以安全的对抗汉尼拔的野战军，同时补给的供应也不至于发生问题。现在构成罗马战略的枢纽就是这些有城墙的城市，而汉尼拔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未尝不是一件怪事。如果他明白这一点，那么当他于公元前215年在卡普阿建立基地，并使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归入他的控制之中时，他就应该组织一支攻城部队，去击毁敌方战术中的核心。在以后四年中，战争就变成了反复进退的行动。到公元前211年，弗尔维乌斯攻陷了卡普阿城，于是汉尼拔所能做的就是渡过阿尼欧河，前进到罗马的城墙脚下，立马柯林门外，挥动他的宝剑。这虽然是一个英雄的姿态，但却已经迟了五年时间，实在是太迟了！

当双方在意大利境内都在进行防御战时，主要是受了汉尼拔的外交策动，在其他地区中也同时展开了激烈战事。在西班牙境内，汉尼拔的兄弟哈斯德鲁巴和马可以及吉斯戈的儿子哈斯德鲁巴（同名）正在与两位西庇阿（亦为兄弟二人）激战。公元前215年，撒丁也发生了叛乱，次年，罗马的摄政官马西卢斯进军西西里，因为叙拉古已经与迦太基订立了同盟条约。他对该城的围攻成为当时战争中的一件大事。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味的战争插曲，那就是阿基米德的发明天才在这里大显神通。波里比阿曾经说过：“在某种环境中，一个人的天才可以比更多的人数更有效力。”叙拉古一直坚守到公元前211年，最后由于内奸的行动才被攻陷。它沦陷之后，西西里岛上的抵抗也都中止了。

虽然马西卢斯在西西里获得了成功，可是西庇阿兄弟在西班牙却于同一年内遭到了惨败。他们的塞尔提伯利亚部队纷纷逃亡，所以兄弟二人都失败被害了。于是罗马又再度瘫痪，结果又用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新的指挥官。因为现在已经没高阶的人——如执政官或法官——候选，所以最后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人自告奋勇出来做候选人。虽然他只做过低级军官，但却获得了选民拥护，于是元老院只好勉强接受。他是老西庇阿的儿子，以后在历史上就被尊称为汉尼拔的征服者——阿非利加·西庇阿。

他出生于公元前235年，他第一次出名是在特雷比亚战役，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却救了他父亲的命。在坎纳会战中，他是一位低级军官。在那次大屠杀中，他保住了性命，以后当他听到莫特卢斯和部分青年贵族准备逃出意大利，他就跑到莫特卢斯的寓所，提着剑逼他宣誓说他们这批人永不逃亡。虽然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可是他的个性实在不易测度。蒙森对于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有少数人能够凭着他们的精力和铁一样的意志来约束世界，在几百年内采取新的路线和向新的路线行动。他却不属于这一类。可是却另有一种特殊动人的魔力环绕着这个优美的英雄，好像是一个闪耀的光圈一样。在安静的气氛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西庇阿又经常有轻快和敏捷的情调。他有足够的热心可以使人们的心灵温暖；同时又有足够的计算能力，使他在任何情况中都能追随智慧的领导。他虽然并不脱离平民生活，但却并不庸俗，具有一般人对天命的信仰，反之他虽然并没有讲出来，但他却用一种暗中说服的方式来使人相信他是神所特别保佑的人。一句话，他具有一种纯正先知者的本质。他站在人民上面，但并不与人民脱节。这个人遵守他的诺言，在行为上有王者之风。他认为他如果采纳了一个通俗的帝王尊号，那实在是小看了自己，但是他却永远不能了解共和国的宪法可以约束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具有如此信心，所以他忘记了仇恨和妒嫉，他有礼貌的承认旁人的好处，而同情地忘记旁人的过错。他是一个优秀的军官和一个精炼的外交家，但却并不特别显出他对这两行职业的专长。他把希腊文化与罗马人的民族意识充分的融合起来，他是一个口才极好的演说家，态度非常庄严优美，他能赢得人心，包括士兵和妇女、他的国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敌和他的伟大迦太基敌人都在内。”

自从他出任在西班牙的指挥官直到他最后一战为止，他创造了一个每战必胜的纪录，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有着希腊人的开扩心灵。其他将领对罗马人的失败很少能学得什么教训，可是他从其中获得的教训却远比从他自身成功中获得的要多。汉尼拔虽然是他的敌人，但同时也是他的老军士长，他不仅教授他战争的艺术，而且也使他学会了如何领导人和管理人。他最显著的天才是他对群众心理的了解。当他的部下在西班牙发生叛变时，他曾经发表过如下意见：“群众非常容易被领入歧途，也极易引诱他们触犯任何种类的过失。群众的本性像海洋一样是安宁和平静的，可是一旦有风吹来，马上就会波涛汹涌。所以群众是受领袖支配的。”

西庇阿从台伯河上开船，在公元前210年年底，在埃波里姆登陆。他达到时所面临的情况实在很难令人乐观。他发现除了卡斯图罗和索格塔两个要塞城市之外，所有在埃布罗河以南的一切地区都已丧失殆尽。但这种情况足以刺激他的统帅才能。他的第一个行动，在战争史上可算是最果敢和最富有戏剧性的——只是由于他能控制海洋，所以才能如此——那就是乘着两位哈斯德鲁巴和马可的兵力已经分散时，用突袭的手段攻占新迦太基城，于是使他自己占住了敌人东翼的位置，一方面可以攻击敌人后方，另一方面又能威胁他们的海上交通线。他在采取此项行动时，在攻城战中也表现出高度的战术技巧。他一旦占领该城之后，立即采取恐怖政策，洗劫全城以示威。他释放了拘留在该城中的西班牙人质，并送给他们许多礼物，送给少女的是耳环和手镯，青年男子则是匕首和刀剑。这种办法立即产生了显著影响，足以赢得当地人民的好感。

在他占领新迦太基之后，他把他的舰队和部队整补了一番，就向安达路西亚前进。公元前208年，他在巴古拉击败了哈斯德鲁巴的军队，却未能使之全军覆没。因为那位能干的军人向圣塞巴斯蒂安撤退，越过法兰西，最后终于进入了意大利。虽然有几个历史学家批评西庇阿不

应让他们逃走，可是这种批评并不合理。因为如果他为了追击哈斯德鲁巴而不惜深入一个不熟悉的险阻地区，并且让马可和另一位哈斯德鲁巴（吉斯戈之子）的兵力原封不动留在他后方，那才是一种战术愚行。

其次，他又集中兵力于卡斯图罗，向哈斯德鲁巴和马可进攻，在伊利帕他采取了一个卓越的战术，很像汉尼拔在坎纳会战中所使用的，使他们受到了决定性失败。哈斯德鲁巴逃往毛利塔尼亚——即今之摩洛哥。马可则逃往巴利里克岛，在那里他着手召募一支新军以援助汉尼拔。这一战决定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命运，到公元前206年秋天，整个西班牙都向罗马投降了。

此时，公元前207年春天，哈斯德鲁巴已经越过了阿尔卑士山，沿着十一年前他哥哥所走的旧路，前进到了波河流域，他在那里招募了10,000名高卢兵后，开始围攻布拉什迪亚城。

（注：他的全部兵力已不可考。剑桥古代史认为是30,000人。）他没能攻下这个城市，就一直挺进到弗拉米尼亚，就是今天的瓦罗，是亚德里亚海边的一个小港口，也是弗拉米尼亚大道的海岸终点。他在那里与罗马军前哨接触，那是司法官波西乌斯和执政官李维乌斯率领的联军，他们驻在圣加利卡，在弗拉明尼亚的南面，相距几英里远。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宿营过冬，有40,000名罗马步兵和2,500名骑兵，由执政官尼罗和弗拉卡斯率领着监视他。汉尼拔的意图是想与他兄弟在意大利中部会合，但是他同时也要顾虑他在布罗蒂乌姆（意大利的脚趾）的基地的安全，所以必须等知道哈斯德鲁巴的确实位置之后，他才准备北上。依照李维的记载，他最先没有料到他兄弟在越过阿尔卑士山时能够与他过去一样快。等到他听说已经在围攻布拉什迪亚时，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围攻战大致需要多少时间，所以他决定不必前进到坎努苏姆以北，而是等候他兄弟的通信到达。

于是发生了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在战争中常常会有这种无法计算的事件发生，而它们却往往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当他从布拉什迪亚解围而去时，哈斯德鲁巴派了四个高卢人和两个努米蒂亚骑兵送一封信给汉尼拔。这几个人穿过了整个意大利，但是没想到汉尼拔已经前进到坎努苏姆，所以还是在塔仑坦附近寻找。他们迷了路，被罗马搜寻粮食的支队捕获。当尼罗从这些人身上获知哈斯德鲁巴准备越过阿本尼斯山脉与他的哥哥在乌姆布尼亚会合时，依照李维的记载，他就认定面对这样的情况不能再用过时的老办法来作战——每一个执政官限制在他的省界之内，只能用他自己的兵力对元老院所指定的敌人作战。尼罗决心冒险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这种方法是临时应急的，结果也无法预知。在一开始，它也许会使本国公民所感到的震惊并不亚于敌人，但如果成功，那么这种巨大的震惊就会变成巨大的喜悦。所以他派人把这封信送往罗马城，并且向那些元老报告说，当汉尼拔尚在狐疑不决时，他所率领的6,000精锐步兵和1,000骑兵应迅速北上去增援波西乌斯和李维乌斯的兵力，留下加蒂乌斯继续监视汉尼拔。他又建议驻在卡普阿的军团应调到罗马，而罗马的部队则应调往拉尔尼亚。他对他要经过的地区都事先派人去下达命令，要农村和城市都把粮食送到路边以供军人食用，并且也要把骡马送来，使瘦弱的人不愁代步之物。他更知道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所以他不等答复就立即率军北上。

这个史无前例的步骤使罗马的元老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汉尼拔又被放出来了。过去的几次惨败和两位执政官战死所造成的恐怖印象依然存在。他们说过去在意大利境内只有一支敌军，一位敌将，就已经产生了许多不幸后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布匿战争，两支强大的敌军和两个汉尼拔了。

尼罗率领着他的7,000精兵，用最快速度日夜行军，当他快到圣加利卡时，先派人去通知李维乌斯，说他已经来了，准备在夜里秘密进入他的营地。为了不让哈斯德鲁巴知道他的到达，所以李维乌斯并未声张，所有尼罗的部下就暂时和李维乌斯的部下共同挤在同一帐幕之内。

尼罗到达之后，罗马的将军们马上召开了一个战争会议。虽然许多人都主张应等到尼罗的部队彻底休息和恢复疲劳之后再与敌人交战，可是尼罗却力主马上进攻，这样才能使哈斯德鲁巴不知道他已到达，汉尼拔不知道他已离开。他的主张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发出备战讯号，开始集中部队。尽管用了许多预防手段以求保密，可是罗马人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让哈斯德鲁巴知道李维乌斯已经获得了增援。依照罗马的军礼，当一个搜索巡逻队回来报到时，在司法官的营帐里，应吹一声号角，在执政官的营帐里，应吹两声号角。这样就使哈斯德鲁巴猜对在李维乌斯的营帐中一定有两位执政官，这当然是已经获得了增援，所以他决定不与敌人交战。那天夜间，他退到了梅塔弗尔河谷中，想从那里走上弗拉米尼亚大道，岂知黑暗之中，他的向导逃跑了，他为了找路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罗马人发现他撤走了。就追上了他，并强迫他接受会战。

哈斯德鲁巴的部队作了下述部署：中央部分，他安排利格尼亚人的部队，并由他的战象掩护。西班牙部队在右，高卢部队在左。高卢人所占领的位置为一个小山，俯视着一条溪流，似乎与利格尼亚军人的左端还隔着相当距离。面对着高卢人，在溪流对岸的高地上，就是尼罗占领的阵地。中央为波西乌斯，紧接着就是左翼方面的李维乌斯，他面对着哈斯德鲁巴直接指挥之下的西班牙军。李维告诉我们说，哈斯德鲁巴的战线是横线长于纵深，而罗马军的左翼则又伸展到战线之外。

由西班牙人首先开战斗。接着罗马的中央和左翼都参加了战斗。大部分罗马步兵和骑兵，西班牙部队和利格尼亚人都卷入了战潮。这些西班牙人都是老兵，也都熟悉罗马人的战斗方式，而利格尼亚人也是一个顽强好战的种族。这时又出来了战象，它们的第一次冲锋就把第一线冲乱了。可是当战况转烈，喊声大振之际，它们也丧失了控制，在两军战线之间摆来摆去，好像是无舵之舟一样。最后，多数都为象奴所杀死，这些象奴都带有长刀和木槌，专供杀象用。他们用木槌把长刀钉入大象的脊髓。

此时，在哈斯德鲁巴的左翼，由于地形影响阻碍了双方的交战。尼罗看见他的左方已经发生了激烈战斗，决定也参加进去。他留下少数兵力以牵制高卢人，自己则率领几个支队的兵力，躲过敌人的视线，绕过李维乌斯的后方，这正好像几百年之后马尔波罗在拉米莱斯所采取的行动一样。为了使哈斯德鲁巴受到奇袭，他先向西班牙部队右方冲锋，然后才攻击他们的后背，把他们压迫向利格尼亚人方面退却。

看到战局已经无可挽回，哈斯德鲁巴用马刺踢着马，直向一队罗马兵冲去，结果就战死在那里。他这种行为证明他不愧为汉密尔卡的儿子和汉尼拔的兄弟。对于这件事，波里比阿曾经有如下评论：“当认为前途尚有希望时，哈斯德鲁巴在会战中对于个人安全是十分注意的。尽管他并非没有准备，而且也并非没有胜利的希望，可是命运却剥夺了他的一切希望，逼得他非走极端不可。虽然如此，他还是勇敢的面对他的命运，而没有做任何对不起过去事业的行。”

根据波里比阿的估计，这次的损失，迦太基人，包括切尔特人在内，一共不在一万人以下，而罗马方面则死了约两千人。在会战结束之后，当天晚上尼罗又赶回去，行军速度比来的时候更快，到第六天，他又回到在汉尼拔前方的营地中。此时关于他的胜利，已经有了模糊不清的报告传到了罗马。最先，罗马人以为这只是道听途说，不敢相信。等到证实之后才全城狂欢庆祝，因为对他们的死敌，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捷。

当汉尼拔听到了他的兄弟失败和战死的消息后，他就退回布罗蒂乌姆。罗马人到现在仍然不敢攻击他，因为他的大名实在是令人谈虎色变。可是他们似乎认识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他们的这次胜利都算是一个决定性的成功。这一战结束了汉尼拔的希望，他再也不能击破罗马人对意大利的控制，它恢复了罗马军人的信心，也使罗马的同盟国和所征服的臣民，不敢不向罗马效忠。所以从此以后，主动之权即开始转入罗马人手中。

如果事实真象如此：当在坎纳获得大胜之后，汉尼拔因为相信包围意大利的战略更为有利，所以才放弃了向罗马进攻的念头，那么当他的兄弟在梅塔弗尔河上失败之后，他就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受包围的不是敌人，反而是他自己。到了公元前205年，他已经被孤立在意大利的靴尖上，西西里已经丧失，西班牙也完了，罗马与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五世也已议和。

（注：罗马人在依利里亚的作战，此处未曾加以论述，因为这只是战争的副产品，对双方都谈不上光荣。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未来的影响——就是使罗马介入了希腊世界，以及公元前200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爆发。）

因为汉尼拔已经被迫采取消极守势，于是主动权就转入了罗马人手中。他们的意图是慢慢地绞死他，但是西庇阿的想法却完全不同，自从他接管了西班牙的指挥权之后，他就开始照他的意思进行工作。他的想法是要把战争带到非洲，而以西班牙做为他的基地。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当他把迦太基人逐出西班牙之后，就有人劝他休息享福，他却回答说，他的决心要比过去更坚定，一心只想发动对迦太基的战争。他似乎一直都是以阿格多克里斯的战役为先例，他对这个人的果敢具有极大的敬佩。因为他是那样的深信必须把战争带到非洲去，所以在伊利帕会战不久，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访问毛里塔尼亚。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争取马赛里国王锡法克斯的友谊，（二）从努米蒂亚的国王马西尼沙手里获得一部分骑兵。（注：蒙森说这是一种“愚蠢的冒险”，而利德尔-哈特则认为是一个具有外交重要性的使命。马西尼沙的首都在西尔塔——就是今天的君士坦丁。锡法克斯的首都在西加——在奥兰之西。）

这次出使之后，公元前205年他回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受到人民的欢迎，但也受到资深年长将领们的反对，因为看到他还年轻，更加妒嫉他的成功。他被选为执政官，并指定西西里为他的省份，主要目的还是想排挤他，而不是利用他的才能。他发现在西西里所指挥的只有两个

军团，都是由坎纳会战后的败军残部组成的。他要求援助，被拒绝了，可是他并不灰心，反而着手积极招募，组织和训练这支“大复仇”的军队。

他派他的副将纳利乌斯在公元前205年渡海前往非洲。次年春天，他的部队在利雷拜姆登船，在乌提卡附近的法利拉角登陆，在那里立即与马西尼沙的兵力会合——他是被锡法克斯赶出了他自己的领土。西庇阿的远征军包括他的两个军团和那些他招募的志愿军，一共约为25,000人、40艘战船和400艘运输船。此时，哈斯德鲁巴（吉斯戈的儿子）回到非洲之后，已经又编成了一支迦太基的军队，共有20,000步兵，6,000骑兵和140头战象，并且还在等候一批赛尔提比亚佣兵到达。锡法克斯也正在召集大量的骑兵来支援他。

因为西庇阿的首要大事就是占稳一个作战基地，所以他开始围攻乌提卡，但是当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的兵力接近之后，他被迫解围退到两英里开外的一个岩石海角，他称之为加斯特拉角，就在那里宿营过冬。锡法克斯认为他已经陷于窘境——事实上也的确差不多——所以就向他提出和谈要求。西庇阿的狡猾程度似乎又胜迦太基人一筹，因为他的办法是迦太基人过去所未使用过的，他尽量拖延谈判时间，以便详细的侦察敌营。双方营地相距只有六英里，他的意图是想利用黑夜掩蔽，对敌营进行突然的攻击。

许多人都谴责这种行动是一种纯粹的奸计，可是我们也可以为他解释，应该记住当时西庇阿的情况实在危急，尤其是他的敌人拥有大量骑兵，足以使他们获取粮食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不过无论如何，事实终究是：由于西庇阿所采取的行动如此具有决定性，所以如果他不要这样做，那么他也许就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装出非常希望和平的样子，欺骗了他的两位对手锡法克斯和哈斯德鲁巴，使其产生一种虚伪的安全感。他突然签订了休战协定。于是他匆匆集中他的两个军团，在日落时开始出发，命令纳利乌斯和马西尼沙去进攻锡法克斯的营地，把火把投在营地上，而他自己则去放火烧哈斯德鲁巴的营地。

迦太基人的哨兵似乎是毫不经意，或者是睡着了。当他们突然在黑夜里看到火光四射，马上就混乱不堪。李维和波里比阿的记载都十分生动。后者记载说：“这种可怕的景象简直无法想像和形容。”而前者则告诉我们有四万人被杀死或烧死，被俘者为五千人，此外还有2,700匹努米蒂亚马和六头战象。简而言之，如果李维的数字不是太夸张，那么即令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已经逃走，可是他们的联合大军却差不多已经歼灭殆尽了。

乌提卡仍在坚守之中，所以西庇阿不敢冒险向迦太基前进，仍然回来围攻乌提卡。此时，哈斯德鲁巴和锡法克斯又与四千名赛尔提比亚佣兵会合，开始组织一支新军。西庇阿认识到汉尼拔有撤回非洲的可能性，所以必须在他回来之前，首先彻底击碎哈斯德鲁巴的力量。他于是率领一个军团和他的全部骑兵（现在实力已经大为增强）进行野战。在巴格拉达斯河的大平原上，他遭遇到了他的两位对手，采取一个他在伊利帕会战中所曾经用过的战术行动，把敌人击败了。在罗马历史上，仅只用骑兵的冲锋就击败敌人，这是第一次。哈斯德鲁巴阵亡，锡法克斯率领一部残余骑兵逃走，马西尼沙一直追到了西尔塔才把他俘虏了。对西庇阿而言，这个行动对于他有莫大的价值，不仅是使他可以扶助马西尼沙重登王位，而且同时也使迦太基丧失了最有价值的骑兵来源地，而使他们都为自己所用。

这一战的结果使迦太基城内发生了恐怖现象；他们再度向罗马求和，原来在波河流域作战的马可和在布罗蒂乌姆的汉尼拔都被召回了。西庇阿于是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使汉尼拔的势力撤出意大利。接着他提出一个宽大的和平条件，希望能获得他的第二个目标——胜利的结束这个战争。当和平谈判正在进行时，马可溜走了，虽然他的军队能够回到非洲海岸，但他自己却因为负了重伤，死在航海途中。

汉尼拔接到撤退命令时，他正在克罗顿。他首先杀死他的马匹，接着在公元前203年6月23日，在休战条约保护下，他的军队上了船，大约为15,000到20,000人，在小利普第斯登陆。于是他转经哈德鲁门坦去尽量搜集骑兵，这个行动使迦太基城中的爱国者大感兴奋，于是他们拒绝批准和约，并拘禁罗马使臣。为这个奸诈的行动所激怒，西庇阿在公元前202年，拆了他在突尼斯的营帐，向巴格拉达斯河流域进军，一边走一边烧毁沿路的村庄，用恐怖手段恐吓迦太基人，同时也切断迦太基城的主要粮食供应来源。这种行动使迦太基城中的居民大为恐慌，所以催促汉尼拔立即采取行动。于是几天之后，汉尼拔也拆了哈德鲁门坦的营帐，朝内陆方向的撒玛前进，它在迦太基城西南方，相隔五天行程，在那里他接到一个恼人的情报——马西尼沙率领6,000步兵和4,000骑兵已经与西庇阿会合。

看到敌人已经拥有如此优越的骑兵，认识到胜利的希望甚微，于是汉尼拔要求与他的对方会晤面谈。西庇阿应允了他的要求，第二天，双方指挥官从自己的营地前进，只有少数骑兵伴护。最后他们把随从留在后面，单独前进到可以对话的距离，每个人带着一个译员。汉尼拔指出战争的幸运是不可靠的，主张双方休战议和，条件为西西里、撒丁和西班牙都仍归罗马所

有，迦太基允诺永远不再攻击罗马。西庇阿也充份认识到他在军事上现在具有绝对优势，所以一口拒绝了这些建议，说由于迦太基人最近破坏了休战协定，他实在不敢再相信迦太基人的诺言。于是会谈结束，双方转回营地，第二天拂晓时，各自引军摆成战斗队形。

在素质和训练两方面，汉尼拔的军队比他的对方都处于劣势，他使用的战斗队形足以证明他自己完全了解这一点。他共有三个军团的步兵：他自己的部队、马可的部队和迦太基元老院匆忙中召集的迦太基和非洲部队。前二者是可靠的，第三者却不太可靠。所以他把马可的部队排在最前方，其中包括利格尼亚人和高卢人。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将采取分散的队形，因为汉尼拔又把巴利里克的投石兵和摩尔人的轻步兵混夹在一起。第三部分，由迦太基和非洲部队所组成，汉尼拔用他们组成第二线，位置就紧接在第一者的后方。至于第一部分，又位于第二线的后方，相距约二百码，那是他的总预备队，主要为布鲁提亚人。在他的第一线前方，他将八十头战象布成一条绵长的战线。最后他把他的骑兵两千人摆在两翼，迦太基人在右，努米蒂亚人在左。因为他的骑兵实力太薄弱，所以他无法再用坎纳式的战术，用他们去迂回敌人的侧翼。因此他的计划是想突破罗马军正面，这是一场赌博，成败的关键就要看他的大象是否听话。如果这些大象听话，那么罗马人的正面毫无疑问就会被冲乱，这不仅能使第一线的攻击大为省事，而且更可以激发第二线的勇气——这都是临时招募的非洲人。最后，凭着他的第三线精兵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打击。

西庇阿仍然保持正常的军团队形，但却能适应他面临的战术情况。他没有把他的各部依照三线棋盘格的老形式展开，照这种形式，是第二线的各部恰好掩护着第一线中各部的间隔。反之，他的第三线各部正对着第一线各部的后方，这样在战斗队形中产生了许多条甬道，以便迦太基的大象可以从那里通过。此外他的老兵则保留在较后方，所以即使迦太基的战象达到了突破目的，他们也不会陷入混乱。轻步兵则填塞在甬道之中，如果他们挡不住战象的冲击，可以立即撤退。左翼方面为意大利骑兵，由纳利乌斯指挥。右翼方面为努米蒂亚骑兵，由马西尼沙指挥。

这次会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汉尼拔的战象冲锋和骑兵的溃败；（二）汉尼拔的前两线兵力和西庇阿的前两线兵力交战；（三）双方预备队的交战；（四）马西尼沙攻击汉尼拔老兵的背后。

虽然李维的记载更富戏剧性，但波里比阿的记载却比较可靠。会战的序曲是双方的努米蒂亚骑兵开始松散的接触，这时，汉尼拔命令他的战象冲锋。但是当它们接近敌人时，由于罗马人号角齐鸣，响声震地，使大象们惊慌失措，于是左翼方面的战象反转身来向后冲，使汉尼拔的努米蒂亚骑兵立即发生了混乱。马西尼沙抓住这个机会立即追击，把对方的努米蒂亚骑兵赶出了战场。在中央方面，大象从甬道中追逐罗马轻步兵，使他们受到严重的损失。接着纳利乌斯的机会也来了，因为当战象正要冲到罗马人后方时，他也立即向汉尼拔的迦太基骑兵冲锋，并把他们击溃。好像是和马西尼沙比赛一样，他也开始猛烈追击。

不等双方骑兵都远离战场，步兵的战斗也开始了，正如波里比阿所说，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近战格斗。最初似乎是汉尼拔占了优势，但因为他的第二线未能支援第一线，所以第一线就慢慢后退。最后他们感到已经孤立无援，于是就向后方逃命。因为不准他们通过第二线，这些惊慌失措的人就不惜向自己人砍杀以夺取生路。结果这两线兵力混成一团，彼此自相砍杀。罗马的年轻士兵在壮年士兵支援之下，向前推进，又压迫他们向第三线退却。因为第三线拒绝他们通过，所以就纷纷绕过侧翼，落荒而逃。

这样就展开了第三阶段的战斗。战场上的景象十分凄惨，死伤枕藉，尸骨堆积如山，血流遍野。西庇阿命令把负伤的人抬往后方，扫清战场，以便作最后一次突击。他把年轻士兵撤到两翼，然后命令壮年士兵和老兵，以密集队形前进到他们中间。当他们越过障碍物（尸体），到了与年轻士兵成一线的位置，双方同时开始冲锋，引发最激烈的战斗。因为双方的数量、精神、勇气、兵器都大致相等，所以胜负迟迟未决。双方人员都发挥出最大的勇气，努力死战，一步不肯退后。

如果这次战斗只剩下步兵来决胜负，那么汉尼拔也许还可以战胜。但是西庇阿的运气却太好了，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马西尼沙和纳利乌斯的骑兵赶回来了，他们向汉尼拔的后面冲锋，许多人就站在原有的行列中被砍倒，那些想逃走的人也没有几个逃出性命。于是迦太基军完全失败了。罗马方面战死1,500人；迦太基方面则在两万人以上，而被俘的人数也差不多与此相等。汉尼拔由少数骑兵保护，逃回了哈德鲁门坦。

这次会战之后，西庇阿并未立即向迦太基城进攻。依照李维的说法，他是认为如果他去围攻该城，那么不等大功告成就会被召回，反而让他的后任坐收结束战争的荣誉。而波里比阿则说由于罗马人的自尊心，所以他宁愿采取宽大的态度。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颇有疑问。真正

的理由是西庇阿对长期围城战并无充分准备。象汉尼拔一样，他对野战固然很拿手，可是对围城战却并不内行。此外，战争已经延续了十六年之久，罗马人也已经疲惫不堪。无论如何，如果围城则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因为迦太基的城塞工事是十分坚固的。（注：迦太基城建立在一个小山上，靠近一个半岛的顶点，这个半岛与大陆相连之处为一个宽约三英里的地岬。这里有三道防线，最外面一道的城墙高四十五英尺，每隔二百英尺就有一个碉堡，封锁线内的半岛，周围约为三十英里。所以事实上迦太基是一个巨型的特强要塞，储备有各种必需品，足以支持长期的围攻。）所以最好是与迦太基缔结和约，而不是去占领它，因此西庇阿提出的和平条件非常宽大而且聪明。双方同意的条件如下：

- （一）迦太基交出所有战象和战船。
- （二）未得罗马同意之前，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
- （三）同意马西尼拉在他自己原有的王国中复位。
- （四）赔偿一万塔伦银币（共值2,970,000英镑），分五十年偿清。

这些条件为罗马元老院和人民所接受。斯库拉德在他的《罗马政治》一书中说：“这位汉尼拔的征服者除了证明他在军事战略上具有天才以外，在政治方面也获得了胜利。他成功谈判一个聪明的和约，如果汉尼拔只是在意大利被击败，决不可能获得这样一个和约。他的成功应归功于罗马人民的热心和忠实的支持。”蒙森是这样评论的：“政治问题的决定，可能应归功于这两位伟大的将军。他们所提出和接受的和平条件是能作为一种公正合理的限制，一方面限制了胜利者的凶狠报复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使失败者不至于铤而走险，困兽犹斗。汉尼拔对无可避免的事情敢于接受；西庇阿在胜利之后，知道持盈保泰，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伟大的对手都是有着高贵心灵的政治天才。”

毫无疑问，虽然在当时这两个伟大人物都没有完全认清这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从许多年后李维和波里比阿的记载上，却还是可以找得出西庇阿的心声。李维在开始叙述撒玛会战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在夜幕低垂之前，他们将可以知道在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谁将是世界的支配者——不仅是非洲，也不仅是意大利。胜利的酬劳就是整个世界。”波里比阿也说：“对迦太基人而言，这是一个为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利比亚主权的斗争；对罗马人而言，却是为了争取世界性的支配权利和优势。”（注：阿皮安的记载上说：汉尼拔认为这次会战足以决定迦太基和整个非洲的命运。西庇阿则说他一旦失败，他的全军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因为撒玛一战决定了西地中海的支配者，接着在东地中海的未来争霸战，也就随之决定了。甚至于在战争中，由于迦太基与马其顿之间的同盟关系已经不断使罗马有后顾之忧。现在他们既然可以不受迦太基牵制，所以当然更可以注视这个方面——事实上这也是必要的。

这次战争在当时产生的效果是这样的：西班牙被并为罗马的两个行省，不过却不断有叛乱发生。叙拉古附庸王国也并入了西西里省。努米蒂亚过去是迦太基的保护国，但现在却已经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罗马保护国。最后，迦太基也由一个强大的商业国家，变成了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商业城市。换句话说，罗马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建立了一个不可抗衡的地位。撒玛会战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之一：它使罗马民族越过了统一意大利的门槛，走上了支配世界的坦途。

## 特里卡梅伦会战·塔吉纳会战

---

查士丁尼一世，也被尊称为“大帝”，在东罗马诸帝中是最著名的一个，但他本人却是一个野蛮农民的儿子。他出生于483年，出生地为依利芮孔的达达尼亚地区。他在523年与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特欧多娜结婚，她是君士坦丁堡兽场中一个饲养熊人的女儿，也曾在亚历山大城当过妓女和舞女。这个女人有坚强的决断和勇气，对她丈夫具有极大影响，当他做了皇帝之后，就指派她共治天下。

查士丁尼是一个对于工作永远不感到满足的人，也是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被称为“永远不睡眠的皇帝”。他不仅自封为凯撒的继承人，而且也以最高宗教领袖自居。在他一生之中，有两个坚定的信念：（一）重建西罗马帝国，（二）镇压雅利安异教徒。所以他所进行的战争都具有十字军的意义，他认为他有领导世人进入基督圣城的使命。但是在他开始进行这个工作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侵略的借口，此外，当他嗣位之时，东罗马恰好正与波斯人进行战争。

他对人才有良好的鉴别能力，从禁卫军中他选出了一位军官来指挥东面的战事。这个人就是贝利撒留，他大约于505年出生于马其顿。530年他在达拉对波斯人赢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

不久他就被召回君士堡丁堡，并与波斯人匆匆地缔结了和约，原因是迦太基发生了革命。格斯里克的一个曾孙格里梅尔篡夺了汪达尔王希尔德里克的王位。希尔德里克以皇帝属国的身份向君士堡丁堡求援。于是查士丁尼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来发动他的第一次十字军远征。

当贝利撒留正在准备收复非洲的工作时，突然又发生了一个号称“胜利”的叛变，几乎使查士丁尼的皇朝告终。532年1月11日，皇帝在赛马会中受到观众奚落，纷乱的情形迅速蔓延。在君士堡丁堡城中，本有两个对立的党派，一为威尼蒂，另一为布拉西尼，现在却联合起来攻击皇宫，纵火焚城，并宣布拥护前帝阿那斯塔休斯的侄子海帕图斯为帝。情况十分危急，查士丁尼已经准备逃走，可是特欧多娜在议会席上大声疾呼道：“啊，皇帝呀，如果现在你只想着逃命，那是毫无困难的，因为我们有的是钱，而且在海上也有的是船。但是如果你考虑到逃亡之后怎样办，那么你就会宁愿死而不想要这种安全了。至于我个人，却相信一句古话——皇权是最好的坟墓。”

这番慷慨激昂的论调激起了皇帝和群臣的勇气。于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奉命镇压这次叛乱。纳尔塞斯是一位宦官，他是一个中年的亚美尼亚人，现任内务总管。贝利撒留率领军队作战，而纳尔塞斯则携带一大袋黄金偷偷地溜出了宫门，用贿赂的手段使威尼蒂的领袖再向皇帝效忠。当听说叛徒大部分集中在赛马场内，贝利撒留就设法冲进去，在另一位将领蒙都的帮助下突然发动攻击，一口气杀死了35,000人。这个“胜利”叛乱遂被镇压，我们对它的主要兴趣就是贝利撒留和纳尔塞斯两人都在这一幕中上场，因为他们两个人也就是后来收复意大利的主角。（注：威尼蒂和布拉西尼为赛马时的两个对立团体。前者受到皇帝的支持，而后者则由皇后加以鼓励。所以在平时，皇帝和皇后两人实际上分别控制着君士堡丁堡城中的流氓势力。）

这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实在很难找到同样的例子，比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古斯塔夫和华尔斯坦之间的差异可能还要更大。在532年，贝利撒留只有二十七岁，而纳尔塞斯却已经五十四岁了。贝利撒留从青年时代就一直从军，而后者却是到了中年以后，才开始参加军事活动。贝利撒留体格高大，相貌英俊。纳尔塞斯却身材瘦小，貌不惊人。前者具有旋风般的作风，勇敢到了鲁莽的边缘，同时又有有机敏的心思。他那鄙吝成性的主人给与他的工具，差不多总是不适当的，而他却从不畏缩，照样能够战胜敌人。纳尔塞斯却内心毒辣，态度恭顺，非常狡猾而且工于心计，如果他认为工具不适当，就决不肯用他的荣誉来孤注一掷。他们都是优秀的战术家，但是就战略才能来说，纳尔塞斯似乎还略高一筹，同时他也更擅长治国之道。

贝利撒留是一个仁慈的征服者，他总是尽量减少战争中的恐怖成份，有时不免有点妇人之仁，甚至使他在战略上受到不利影响。反之，纳尔塞斯却能正确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工具，决不能因为其他考虑而影响到政治目的。皇帝非常信任他，而对于贝利撒留则不一样，因为贝利撒留的成就太大，所以经常引起查士丁尼的疑忌。纳尔塞斯因为是个太监，没有篡位的可能性，所以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对比说来，贝利撒留的妻子安托尼娅却是他最大的包袱。她的出身也和那位皇后一样不高贵，不过那位皇后要比皇帝小二十岁，而她却比贝利撒留大二十二岁。可是在他们结合之后，贝利撒留对她的宠爱却始终不衰。在所有战役中，她总是随伴在一起，她对贝利撒留的影响之大，正如特欧多娜之于查士丁尼一样，可是却常常使他的名誉和事业受到不良影响。这个女人到了老年时更是淫佚放纵，可是非常奇怪，这个伟大的名将却始终愿意做她的奴隶。正如吉朋所批评的，他对她的那种无比耐性和忠诚，似乎不是在一个“男人”的性格之上，就是在它之下。

虽然在这个“胜利”的屠杀中，有许多无辜人民也送了性命，可是从政治观点上来看，这次流血却大有价值，因为从此在君士堡丁堡中的流氓势力被削平了，于是查士丁尼的权威不再有其他内在威胁。所以 he 可以集中全力来发展他的帝国计划，最眼前的目标就是从汪达尔人手里收复非洲，并在他们的地域中消灭雅利安主义。

在军事工具方面，他比起戴克里克和君士堡丁堡两位大帝就差得太远了，因为自从他们的时代以后，罗马的陆军已开始腐朽崩溃。过去庞大的边防军已差不多化为乌有，其他野战军也仅仅是在名义上存在着，而兵团的名称则已变成了古董。在阿那斯塔休斯、尤斯丁和查士丁尼三个朝代，罗马的陆军在名义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帝国正规常备军，分步兵和骑兵两类，但是已经衰朽，甚至连奴隶也成了招募对象。第二种是纯粹的雇佣军，各民族都有，尤其以匈奴人为主，他们都是以打仗作为发财的手段。第三种是拜占廷各地方官的武装卫士，虽然他们属于私人军队性质，但除了向直属长官效忠以外，同时也要宣誓效忠皇帝。查士丁尼派往收复非洲的兵力，就是由这种高度非民族性和雇佣性的部队所组成。

因为要征服的地区是那样广泛，而对格里梅尔的实力又无法作确实估计，所以查士丁尼分配给贝利撒留的兵力实在是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共有10,000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实际上几乎完全由蛮族组成，这是从帝国各地区中招募来的。也和一般的佣兵一样，虽然这些单兵都具

有良好的训练，但他们的忠诚也绝不可靠。在胜利时像野兽一样的凶猛，一旦失败，就可能反噬主人。

为入侵战作准备时，贝利撒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何处建立他的前进基地？把军队集中在埃及境内，然后取道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前进，因为补给的困难，这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若是把基地设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再渡过地中海，则未免又太冒险，因为不仅有遭遇风暴的可能，而且汪达尔人也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所以贝利撒留最后决定取道西西里前进。因为阿玛娜·希莎一向对于帝国表示好感，而她与汪达尔人也正在交恶，由于527年希尔德里克处死了她的姑母阿玛娜·伏妮塔，所以她保证东罗马远征军在西西里岛上将获得友好的接待。这个决定终于使她自己的民族遭受了灭亡的厄运，因为如果没有西西里作为基地，那么这次远征可能不会成功，而在它失败之后，意大利也就可能不会受到入侵，东哥特帝国就可能继续支持下去，这对西方而言应该是一件幸事。

533年6月22日，东罗马远征军在君士坦丁堡上船，共有500艘船（最大的载重750吨，最小的只有45吨），由两万名水手驾驶，有92艘快速的小战船护航，由两千名拜占廷奴隶划桨。因为风向不利，他们在伯罗奔尼撒的梅多尼停留了很久，因为食物不良，有五百名士兵病死。最后才达到了扎特，在那里又遇到飓风，花了十六天时间才到了西西里岛上的卡塔尼亚。应该感谢阿玛娜·希莎，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

现在贝利撒留面临的的就是情报问题，说起来似乎很奇怪，他对汪达尔陆军的实力和位置、以及在非洲的最好登陆点在那里，似乎都一无所知。他所知道就只限于这一点：汪达尔人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如果他的运输船只在中途被他们拦截，就可能会全军覆没。他与历史家普罗库波斯商量，后者在对波斯的战争中就是他选择的法律顾问。他派普罗库波斯到叙拉古去，表面上装作购买粮食，实际上却尽量搜集情报。他回来报告说，格里梅尔完全不知道这支远征军已经离开君士坦丁堡，而他的精兵正由其兄弟特查宗率领，在撒丁岛上镇压一个由查士丁尼煽动起来的叛乱。

没有浪费一分钟，贝利撒留立即命令部队上船，扬帆出海。他一路经过马耳他和戈佐，在九月初望见非洲海岸，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之日已经快三个月了，他在崩角以南130英里的卡普特瓦达登陆，受到当地人民欢迎，他建立了一个设防营地，到处散发查士丁尼的布告，说远征军只讨伐格里梅尔一人，绝非对人民作战。接着向北朝迦太基进发。他的前卫为300名骑兵，由约翰率领，另有600名匈奴骑兵掩护他的左翼，而全部舰队则在他右面沿海岸行驶。9月13日，前卫到达阿德西姆隘路——从迦太基算起的第十个英里的里程碑。当听到敌军登陆的消息之后，格里梅尔的第一个意图就是设法拖延战争，以等待他的兄弟的精兵可以召回应战。同时他也痛恨他祖先的政策，把非洲城市的要塞工事全都拆毁了，以至迦太基处于无掩蔽的地位。以后，他又听到贝利撒留的兵力是如何渺小，于是命令在迦太基负责指挥的兄弟阿曼图斯，准备进攻入侵者；同时他也将希尔德里克本人和他所有亲友都一律处死了。

格里梅尔的计划未免过于复杂：他决定等敌人已经进入隘路之后，就联合起来从三个方向向敌人进攻。阿曼图斯从迦太基城出发，攻击敌人的前卫，辛巴穆德从西面越过山地攻击敌军左翼。普罗库波斯认为贝利撒留能够逃避毁灭实在是万幸。事实上，因为精确的时间配合才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没有钟表的时代，要想使三个纵队同时作战，根本上就不可能。

9月13日，阿曼图斯出了迦太基城，在其他两个纵队尚未就位之前就开始攻击，结果他本人负了重伤，于是他的部队在恐怖中四散飞逃。接着，辛巴穆德也开始发动攻击，但又被匈奴人的侧卫击溃。等到这两支兵力都失败之后，格里梅尔还一点都不知道，由于在山地中迷失了方向，并未能打击在敌军主力的后背上。当他他到达阿曼图斯战死的地方，却与贝利撒留的先头部队遭遇，他将他们击败了，败兵纷纷逃走，而且使未曾交战的八百名步兵也随之溃散。如果格里梅尔知道如何把握时机，那么胜利已经是属于他的了。因为当时在场的普罗库波斯曾这样说道：“如果当时他要立即实行追击，我认为即使是贝利撒留也会感到无法支持。反之，如果他立即向迦太基城进发，那么约翰的部队就会被全歼，因为他们正在三三两两地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简直毫无秩序可言。如果他退入城中自保并捕获我方离城最近的船只，那么我们的胜利希望和回国的退路也就完全断绝了。”可是格里梅尔却完全出乎敌方意料，当他发现他的兄弟尸体已经残破，不禁抚尸大恸，立即放弃了继续攻击的念头，而忙着为他兄弟料理丧事。此时，贝利撒留已经收集了残余部队，在黑夜尚未来临之前，发动了一个反攻，把汪达尔人击溃了。

第二天，拜占廷的陆军进到迦太基城边，发现汪达尔部队大部分都已撤出该城。9月15日，城门打开，贝利撒留引兵入城，受到居民的欢迎。他心里还时时害怕他的敌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城防工事，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些工事差不多都已成为废墟了。此时，格里

梅尔已经退到了一个叫作布拉里吉亚的地方，在迦太基城西约一百英里。在那里，他集合了他的残部，仍然还是一支强大兵力，他派人到撒丁去要求特查宗赶快前来支援。当特查宗到来之后，格里梅尔的兵力就更加强大，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说他的兵力要比对方强过了十倍。

（注：这是过份夸大的说法，因为在特查宗前往撒丁时，兵力也不过五千人。）于是他派人潜入迦太基，破坏了供给城内饮水的水道。其次，他知道贝利撒留部队中的匈奴人，对他们服役的条件感到不满意，所以又派人去活动，使他们答应在下次战斗中倒戈攻击罗马人。以后，格里梅尔退往一个叫作特里卡梅伦的地方，距离迦太基大约只有十八英里，在那里建筑了一个设防营地，静候贝利撒留出击。

当贝利撒留听说他的匈奴部队不稳定之后，就用各种手段来笼络他们。最后结果是他们决定在下次会战中，不马上打击拜占廷军的后背，而是先采取观望态度，等看清楚哪方面获胜之后再动手。这一事件足以说明出来雇佣军的危险性，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抢劫，而胜利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手段而已。

当他的匈奴部队暂时决定保守中立之后，贝利撒留决定采取果敢行动与命运赌博，尽管他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还是照样进攻。在这种环境之下，这算是一个果敢的决定，但是他对敌人的判断却是非常正确的，从他对部队的训话中就可知道。他说：“现在说到汪达尔人的乌合之众，你们每个人都不必去考虑。因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勇气。”

他命令约翰率领全部骑兵（1,500骑）领先进发，第二天，大约是533年12月的中旬，贝利撒留率领他的全部步兵，连同剩余的500名骑兵，也向特里卡梅伦进军。那天夜间，他在距离敌营相当远的地方宿营过夜。当格里梅尔知道他来了之后，就向自己的部队训话说：宁可战死而不要使格里梅尔的荣誉含羞。大约在正午时候，他引兵挑战，突然前进到约翰的骑兵部队前面，那些人正在准备午餐。他本应抓住这个好机会，不等敌人布阵就开始攻击，但他却停下来等候。如此缺乏将才，焉有不败之理。约翰迅速命令他的部下上马，把他们分为三个集团，自己指挥中央的兵力。贝利撒留也听到敌人进攻了，便把步兵留在后面，亲自率领500名骑兵赶来助战。此时，格里梅尔也把他的骑兵分为三个集团，由他的兄弟特查宗指挥中央的兵力。汪达尔人奉到的命令只准使用刀剑。

普罗库波斯告诉我们说，隔了相当长时间战斗才开始。约翰率领一小队经过挑选的精锐骑兵，越过夹在两军之间的一道溪流，向汪达尔人的中央部分冲锋，但马上被特查宗击败，约翰退回本阵之后，接着又进行第二次的突击，但仍被逐回。最后，他集中兵力作第三次尝试，在喊声震天之中，发生了激烈的格斗。特查宗被砍倒了。这是拜占廷方面挥动全部骑兵进攻的信号，他们渡过溪流向敌军进攻。敌军从中央部分开始崩溃，不久即全部溃散。这时，匈奴人看到罗马人获得了胜利，也就依照他们自己的约定，马上加入追击。汪达尔的骑兵全部被驱逐到他们的设防营地中，而拜占廷军也就马上开始洗劫死人身上的财物。

骑兵的战斗所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而主力会战还没有开始，因为贝利撒留的骑兵无法攻击汪达尔人的营地。此外，双方的死伤都不算重。罗马方面在五十人以下，而汪达尔人大约为八百人。到黄昏将近时候，拜占廷的步兵才赶到，贝利撒留命令他们攻击敌人营寨。当格里梅尔一看到他们到来，马上忘记了他早上勉励部下死战的训话，一言不发就跳上马背，向通往纽米迪亚的道路逃走。国王逃走之后，全军马上大乱，所有人员各自逃命，唯恐逃得不快。于是贝利撒留很轻松地大获得全胜。

这支无头军队如此崩溃固然令人叹为观止，可是接着在拜占廷军方面所发生的情形也同样奇怪。当汪达尔人弃营逃走之后，遗留下来的财富实在不少，于是贝利撒留的全军马上就也就瓦解了，三五成群的各自去搜寻他们自己的好运。在这个地形险恶的区域中，到处都有受到敌人狙击的危险。可是他们既不害怕敌人，也不尊重贝利撒留的命令，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发财。如果敌人真的发动攻击，那么罗马军就可能一个都逃不掉。

第二天上午恢复秩序之后，贝利撒留命令约翰领兵追击。直到534年3月，汪达尔王已经绝食度日时才投降。不久，贝利撒留凯旋归国。当贝利撒留离开非洲之后，穷凶极恶的税吏也来到了。在他们勒索之下，有许多已经与汪达尔妇女结婚的拜占廷人也都开始叛变。同时，当地的雅利安人因为被禁止不得为他们的孩子举行洗礼和进行一切宗教礼拜，所以也揭竿而起。接着在全面纷乱之中，摩尔人也乘机作乱，在这些收复的省区中扰乱蹂躏了三年以上的的时间。吉朋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上说：“在有些地区，一个陌生人可以漫游一整天而看不到一张友人或敌人的脸。当普罗科阿斯最初在那里登陆时，他对当地城市乡村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很感羡慕。不到二十年光景，这个一度繁荣的景象已经变成了满目凄凉。有钱人都逃往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据普罗库波斯的《密史》记载，在战争和查士丁尼皇帝的统治下，非洲人口损失超过了五百万人。（注：这个数字明显是过分夸大）

非洲的征服使查士丁尼有了一个良好的补给基地，便于向意大利方向作战。534年，当汪达尔王国灭亡之后，提阿达哈德也恰好杀害了阿玛娜·希莎，于是他马上以此为借口出兵。共有两支兵力，一支由蒙都率领入侵达尔马提亚的哥特省区，另一支由贝利撒留率领侵入西西里。因为这位皇帝生性鄙吝，所以这两支兵力都小得可怜。蒙都的兵力也许不过三四千人，而贝利撒留也只有7,500人。

检讨这次战争的初期经过，使我们发现贝利撒留以少胜多的原因似乎是他有超人的将才和优越的兵器，而同时在意大利，也和非洲一样，所有的罗马籍人口都一致拥护他。他知道以这样微弱的兵力要想与哥特人野战，绝难获得成功。同时他又知道哥特人对围城战最不擅长，所以他尽量避免缠斗，尽量利用有城墙的城市来增加他的力量，而且也强迫敌人在围攻时自动消耗兵力。但他的战术却绝非静态的，因为他也经常从所据守的城市向敌人发动突击，他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拥有比较优越的“投射”能力，他自己这样解释：

“一切差别就在这里：所有罗马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匈奴人都是优秀的骑弓手，可是哥特人却没有这种作战方法的经验。他们的骑兵只惯于使用长枪和短剑。他们的弓箭手是徒步进入战场，并且得到重装骑兵掩护。所以他们的骑兵除非在近战中，否则当对方使用弓矢时，根本没有自卫能力，因此可以很容易地用弓矢歼灭他们。至于说步兵他们绝对无法对抗对方弓箭的攻击。”

535年年底时贝利撒留在西西里登陆，在那里受到人民的欢迎，除巴勒莫以外，其余所有城市都自动开门迎降。一旦当巴勒莫被攻陷后，提阿达哈德马上感到非常恐惧，立即向查士丁尼求和，愿意以接受一笔钱为条件自动献出意大利。但是谈判进行时，贝利撒留又被召回非洲去镇压一个叛乱，而蒙都在达尔马提亚境内战败被杀。这些意外事件使这位懦弱而多变的哥特王马上改变初衷，并拘禁罗马的使臣。于是贝利撒留奉命进兵，他在536年5月渡过墨西拿海峡，围攻那不勒斯，并从一条水道进入该城。此时，拜占廷政府又运用外交手段与法兰克人建立了同盟关系，正好像当它与汪达尔开战时曾与东哥特人保持友好关系一样。于是提阿达哈德开始面临两面战争。

当那不勒斯被攻陷之后，提阿达哈德被族人废弃，另外推选一位叫作维格蒂斯的武士为王。为了稳定地位，维格蒂斯与妻子离婚，改娶阿沙里克的妹妹，提阿多里克的孙女缪塔萨为妻。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收买法兰克人，把高卢境内的哥特领土都割让给他们，以换得他们退兵。第二个行动是撤出罗马城，只留少数驻兵并把城市托付给教皇塞维利斯代管。这些行动可以说很聪明，但也引发了无穷的祸害。536年12月10日，尽管教皇对维格蒂斯发过誓，他还是开门迎接贝利撒留。维格蒂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遂于次年3月，率领大军十五万人（注：相当夸大）开始围攻这个永恒的圣城。这次围攻即令不是时间最长的，也算最惨烈的一次。

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毁灭罗马城的引水道。这个水道为一百万罗马人每天供水三亿五千万加仑。市内的浴室、喷泉、花园和住宅，以及数以百计的水磨（磨粉或其他工业）都依赖这个水源。虽然以后这个水道修复了一部分，但整个系统却始终未能完全复原，所以从此罗马城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大约在3月31日，维格蒂斯企图对罗马城进行一次大规模攻击，但却被贝利撒留的各种“投掷”兵器所击退，以后他就完全采取封锁政策。到了4月间，贝利撒留获得1,600名骑兵增援，他决定出击，准备一击之下结束战争。可是在那个紧急关头，他的部下却忙于抢劫哥特人的兵营，而不去切断敌人的退路——台伯河上的梅尔维亚桥。

12月又有援兵5,600人开到意大利，率领他们的是一位能干但头脑僵化的将领，也叫约翰，贝利撒留兵力既已增加，应该可以向敌人后方作战。他命令约翰和2,000名骑兵，进入皮色伦，蹂躏弗拉米尼亚大道在亚德里亚海边终点周围的地区。约翰却不遵从他的命令，并未首先毁坏维比罗和奥西莫两地的要塞就向利米尼挺进。凭着他的勇猛，在第一次突击下就攻入该城。这个果敢的行动，距哥特人的首都拉文那已在30英里之内，于是将维格蒂斯的算盘完全打乱了。他于538年3月12日，自动解围离开罗马向北退却。这正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一样，罗马之围对维格蒂斯而言，实在是哥特王朝在意大利的坟墓。

虽然约翰违反命令是罪大恶极，可是在他占领利米尼之后，贝利撒留应该采取的正确路线，就应是得就错就错，扩张现有战果。可是他却并不如此，反而命令约翰撤出该城。约翰当然不肯服从，于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很紧张，而维格蒂斯也就针对这个弱点，立即赶往利米尼城，将约翰困住。同时，罗马防御战的成功，使贝利撒留的威名大振，引起查士丁尼的疑惧，害怕他会变成一个危险的敌人，于是就派亲信纳尔塞斯也到意大利去，表面上是帮助贝利撒留完成这个战争，实际上却是严密监视他。

纳尔塞斯的军队在皮色伦登陆，假定为安柯拉，那么距离利米尼就在60英里之内了——它

的南面。当他登陆之后，马上为了援救约翰与贝利撒留发生了争执。纳尔塞斯主张应该加以援救，而贝利撒留则表示反对，因为前者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后者只好顺从他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次非常优美的陆海军联合作战，达到了解围的目的。因此约翰当然只感谢纳尔塞斯，而不感谢贝利撒留，所以使两位主将之间的意见更为加深。

结果一切行动都采取折中和拖延方式，结果到539年年初，本来已经收复的米兰城又被哥特人攻克。哥特人的将领乌莱斯是维格蒂斯的侄儿，在占领该城之后即继之以大屠杀，根据普罗库波斯的记载，人民被害者共为三十万人。祸不单行的是意大利到处又在闹饥荒，单以皮色伦一个地区而论，饿死人数据说即有五万人之多。不久，这种二元化的指挥方式实在无法维持下去，于是贝利撒留迫不得已向皇帝提出了强硬的抗议。结果是查士丁尼只好召回纳尔塞斯。在解除了纳尔塞斯的烦恼之后，贝利撒留开始围攻费素里和阿西莫，这是在拉文那以南哥特人所据守的最后两个据点。正当作战之际，突然又有十万法兰克人，在法兰克王索迪伯特率领下侵入意大利，到处蹂躏，所过之处都成为废墟，并同时击败了哥特人和罗马人。不过因为当地病疫流行，迫使他们还是撤走了。（注：法兰克人所使用的兵器为刀剑，短把而两面开锋的战斧和护盾。他们的攻击方法为前进到极近的距离投掷他们的战斧来攻破敌人的盾牌，然后再用刀剑冲锋。）

到539年年底，这两个最后的据点都已被贝利撒留攻克，于是他才向拉文那进攻，这是维格蒂斯的最后根据地。但此时，匈奴人又有侵犯依利里亚、马其顿和戴内斯的趋势，同时又发现维格蒂斯已经写信给波斯王卡斯罗斯，唆使他从东面进攻罗马帝国，所以查士丁尼不免有点害怕，于是在540年年初，派出一个使节团到拉文那去，对维格蒂斯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利条件——在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均为哥特人所有，以南的领土，包括西西里在内则归还东罗马。这是一个合乎政治家风度的建议，因为在意大利的北面还有凶猛的伦巴第人，西面又有同样凶猛的法兰克人，所以波河以北如能让这个哥特王国继续存在以作缓冲国，对罗马帝国是有利的。但是贝利撒留一心只想无条件结束这个战争，把维格蒂斯也和过去的格里梅尔一样当作俘虏献到查士丁尼脚下，所以他拒绝参加和谈，并禁止皇帝的使臣进入拉文那，并加强了围攻。

为饥饿所苦，而且也知道贝利撒留不肯妥协，于是维格蒂斯提出一个非常特殊的提议，也可说是最不自私的：他要求贝利撒留做西罗马的皇帝，换句话说，就是接受哥特人的王冕。贝利撒留过去曾经发誓，在查士丁尼有生之年决不造反，我们对于他的忠诚殊有疑问。不过他这次将计就计接受这个条件，似乎不算是一个光荣行为。他派人去跟维格蒂斯谈判，答应了一切要求，不过惟一保留条件就是必须等他入城之后才举行接受皇冕的宣誓典礼。540年春天，拉文那开城迎降。等到地位站稳之后，贝利撒留马上就取下了他的面具，虽然他没有洗劫这个城市，可是却拘捕了维格蒂斯以及所有重要的哥特贵族，并没收了大量的哥特财富，把三者都送回了君士坦丁堡。

这个背信行动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具有决定性，因为当拉文那被占领之后，意大利东北部的城市都望风迎降，只有维罗拉和帕菲亚两城例外。前者由依尔迪巴德据守，后者由乌莱斯据守。依尔迪巴德是西哥特王的侄子。所有剩余的哥特勇士，都纷纷逃往这两个城市，他们首先想拥护乌莱斯为王，在他拒绝之后，终于选举依尔迪巴德为王。

贝利撒留的不光彩行为最终不免害人害己。查士丁尼还是感到害怕，不敢让这位野心勃勃的大将留在拉文那的皇宫中，于是将他召回君士坦丁堡，甚至不让他举行一个正规的凯旋仪式，541年的春天，他被派往幼发拉底河去结束东罗马与波斯之间的战争。

当贝利撒留离开意大利时，提阿多里克的帝国已经只剩帕菲亚一个孤城。依尔迪巴德率领一千名残兵据守着它。可是不等这一年过完，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大军，大部分是由拜占廷逃兵所组成，在特雷维索附近进行了一个大型的会战，击败了东罗马军，并收复了波河以北的全部意大利领土。他之所以能有这么伟大的成就，是因为自从贝利撒留去后，战争的指导分别交给十一个将领负责，其中没有一个人具有最高指挥权。所以他们根本不打仗，而只忙于抢劫。而且当意大利收复之后，东罗马的税吏也就像一群蝗虫一样飞来。这个国家早已残破不堪，哪里再禁得起他们的勒索，结果遂使人民铤而走险，终于形成无政府状态。

541年春天，依尔迪巴德被暗杀，承继他的人为艾拉克，他只做了八个月的国王，又为依尔迪巴德的侄子托提拉所杀。托提拉是一个很杰出的军人，因为他具有宽宏的度量，骑士的精神和过人的勇气，所以霍德金认为他是东哥特这颗大树上开出来的一朵最名贵的奇花。452年年初，他被选为王，在范查击败了罗马军，越过了阿彭尼斯山脉，又在莫吉罗击败了约翰。这一战使他几乎收复了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全部领土，只有罗马城和少数几个要塞例外。差不多贝利撒留征服的地区，已经完全丢光了，到543年5月，他已攻下那不勒斯，于是决定开始围攻

罗马城。最后，这些事实引起了查士丁尼的注意，于是在544年春天，决定再派贝利撒留到意大利去收拾残局。

贝利撒留在戴内斯境内招募了一支兵力，一共不会多于四千人，他首先解救阿特南多，再沿海岸进到波拉，于是渡过亚德里亚海到达拉文那。在那里他上书查士丁尼，要求给与人员、马匹、兵器和金钱。不久，在545年秋天，托提拉开始围攻罗马城。这个城的守将是比沙斯，他把小麦屯积起来，然后用高价卖给军民食用。这个围攻使贝利撒留进到了波尔托和阿斯提亚，这是罗马城的港口，并在那里建立他的基地，但结果他却劳而无功，到546年12月17日，罗马城被内奸出卖给托提拉。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这个城市的总人口一百五十万人，不到五百个男人幸存下来。

哥特人又提出了和平建议，这一次查士丁尼却把决定权交给贝利撒留，结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因为此时，约翰的部队正在蹂躏鲁卡尼亚，所以托提拉在把罗马所有的剩余人民撤出之后，就只留一支小型守军在那里，而自己去迎击约翰。贝利撒留立即乘这个机会，设法攻占该城。托提拉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回来，在两次攻城不下之后自动撤到了提弗里。

这样相持了两年之久，到549年年初，贝利撒留觉得劳师无功，自动要求皇帝把他召回君士坦丁堡。他的财富已经大大增加了，可是名誉却已经不如以往。（注：558年贝利撒留又奉命征讨匈奴人。到562年，因为有人指控他造反，被削除兵权。563年他又获得信任。两年后，在查士丁尼逝世前八个月他先死了。）

此时，托提拉又三度围攻罗马城，结果又是内奸卖城投降。于是他又提出和平要求，可是查士丁尼这次却不肯接见他的大使。不久东罗马军在意大利的据点就只剩下四个城市——拉文那、阿特南多、安柯拉和克罗托拉。

查士丁尼本来已经选定他的侄子日尔曼拉斯做意大利的统帅，但他尚未赴任就先病死了。差不多与此同时，托提拉又占领了雷吉阿，越过海峡进入西西里，并再度征服了撒丁和科西嘉等岛屿。

当日尔曼拉斯死后，意大利诸将就都希望他的女婿约翰继任统帅。查士丁尼却觉得约翰的阶级不过与他们相等，恐怕他们又不服从他，于是决定派内务总管纳尔塞斯出任统帅。虽然纳尔塞斯已经55岁了，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注：他死于573年，一直活到95岁。）这个任命是很得人望的，因为纳尔塞斯一向以慷慨出名，挥金如土，所以许多拜占廷武士都愿意加入他的部队。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亲信，所以地位比贝利撒留还要强硬，皇帝对他的要求几乎无不答应，照普罗库波斯的说法，真是兵多财足。

当纳尔塞斯集中其兵力时，托提拉用三百艘战船去夺取亚德里亚海的控制权。他首先洗劫了科普岛，然后进到了艾普拉斯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并毁灭了那些准备从希腊为纳尔塞斯军队运输补给的船只。同时，他也加紧对安柯拉的围攻。这时，拉文那的守将是法利里安，就向在萨罗纳的约翰求援。虽然约翰曾经奉命必须等待纳尔塞斯到达后才准开始行动，可是他却发挥了主动精神，率领38艘战船出海，与法利里安的12艘战船联合赢得了一次海战，使安柯拉城解围。普罗库波斯曾经评论说：“这次会战击毁了敌人的精神，削弱了托提拉和哥特人的力量。”

于是托提拉再次求和，结果遭到查士丁尼拒绝，他似乎非常痛恨哥特人，非把他们从罗马境内肃清不可。为了增强他的地位，托提拉又与法兰克王索迪伯特谈判同盟条件，他的军队已经占领了芬尼提亚的大部份。他们约定在未击败罗马人之前，彼此间决不进行战争。

最后，在552年春天，纳尔塞斯已经动员了他在萨罗纳的兵力，从陆路进入意大利。他的兵力正确数字无法知道，普罗库波斯只是说得异乎寻常而已，可能是两万人左右。和所有拜占廷军队一样，大部分都由蛮族佣兵组成——匈奴人、伦巴第人、吉普德斯人、西里西亚人，还有一部分波斯人——但主要却是靠他本人和大量的金钱。当他到达亚德里亚海的道路末端时，他发现法兰克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另外在查罗拉城，有一支哥特部队由特亚斯率领以作支援。因为他的船只数量不够，无法将他的人员从伊松佐河口运到拉文那的港口克拉西斯，所以他命令他的部队沿着海岸走，与舰队保持接触，而利用这些船只在河川和咸水湖上当渡船使用。

他平安到达了拉文那，与那里的罗马守军会合，停留九天之后才进到利米尼，该城正由哥特人乌斯德拉斯据守。纳尔塞斯把他击毙了，于是沿着弗拉米尼安大道前进到了法罗。在那里他知道只有坚固的佩塔图萨要塞尚在固守之中，于是向南前进到了西尼格里亚，从那里再转西，在卡格里跃到弗莱米尼安大道。从卡格里再作十四英里远的行军，就到达了阿德恩生碉堡，它监视着越过阿彭尼斯山脉的隘路，从这里向南即为一平谷地。当他听说托提拉已经迎面来到，纳尔塞斯就开始宿营，准备会战。

托提拉本来在罗马附近，当他听说纳尔塞斯已经到达拉文那的消息后，马上召回特亚斯，并率领他的全军（只留下了2,000骑兵随后赶上）越过了图斯卡尼，并在塔吉纳村中建立他的营地，在敌人南面相距约十三英里（注：他的兵力实数已不可考，但可能比罗马军要少得多。）在那里或是半路上，他接见了纳尔塞斯派来的使节。这个使节告诉他说前途已经毫无希望，劝他立即投降，不过又说如果他决心作战，便请他选定一个日期。他回答纳尔塞斯说，八天以后，我们决一雌雄好了。纳尔塞斯认为这是一个诡计，决定第二天就出战。他的判断并不错，因为第二天上午，托提拉已经前进到距离他的战线只有两箭射程那么远了。

两军在一个狭窄的平原上彼此相对，这个平原夹在希吉亚与塔地罗之间，在阿彭尼斯山中，东面为该山脉主峰的山麓，西面为一列丘陵——即古比奥山地。在罗马军战线左翼的前面，有一个独立的小山，它可以控制一条通向罗马军后方的山路。纳尔塞斯认识到这个小山的战术重要性，在会战前夜派了50名弓箭手去将它占领了，第二天上午虽然一再受到哥特骑兵攻击，但却始终坚守不退。

在会战中，双方都排列自己的阵线。托提拉还是依照哥特人的惯例，把骑兵列在前面，而把所有的步兵（多数为弓箭手）列在第二线，他的想法是要在一个冲锋之下，就击破敌军的中央部分以赢得这次会战。依照普罗库波斯的记载，说他命令全军只准使用长矛，不准使用弓箭或其他的兵器。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他希望他的步兵干什么呢？这一点似乎颇为费解。

为了应付这种正面攻击，纳尔塞斯采取了一个新奇的战斗序列。阿曼爵士曾经指出，在克勒西会战中，爱德华三世也曾模仿他这个办法并且还把它当做是自己的发明。纳尔塞斯命令八千名伦巴第人、西里西亚人和其他杂牌部队都下马，中央正当着弗拉米尼安大道，摆成一个坚强的方阵。在它两翼，各用四千名罗马徒步弓箭手做为掩护。这两个侧翼向前倾斜，如果敌军冲入中央位置，就不仅会扑个空，并且两面会受到弓箭手的包围，暴露在箭雨之下。纳尔塞斯和约翰（日尔曼拉斯的女婿）指挥左翼，而法利里安和另一位约翰则指挥右翼。为了保护他的弓箭手，纳尔塞斯又把罗马的骑兵排列在他们的后面，每翼五百人。在左翼的小山之外，他又放置了一千名骑兵，命令他们一等敌人步兵开始行动就立即冲到他们后方予以夹击。

纳尔塞斯把主动权让给托提拉，等候他进攻。这个等候的时间颇长，因为哥特王想等他那两千骑兵到达后再作战。为消磨时间起见，他就一个人在两军之间的空地上，单独穿着光彩夺目的盔甲表演马术。最后大约正午时候，当那两个千骑兵到达之后，他就命令全体用膳而自己脱下盔甲，穿上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他这样做是想引诱敌人也解散行列吃饭，可以向他们发动奇袭。不过他失望了，因为纳尔塞斯早已下了严励的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阵地、坐卧或吃饭。不过他并非不准他们吃一点东西，所有人都只能站在原地进食，不准放下兵器而已。

中午用膳之后不久，哥特骑兵遂展开了会战的序幕，一直打到夜幕低垂时为止。虽然普罗库波斯的记载很简略——因为他并非目击者——可是实际经过却不难想像。哥特人并不注意敌军两翼的弓箭手，直向中央方阵冲突，结果是中央的骑兵为敌军方阵前的矛林（像刺猬一样）所阻，而两侧的骑兵又被弓箭射翻。立即有数以百计的哥特人落马，这些逸马四处飞跑，在他们的行列中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似乎只有第一次冲锋是有组织的，以后就是零星集合起来兵力各自为战。因为记载上始终没有说哥特骑兵退到步兵的后方重新组织兵力。快到黄昏时候，罗马人才开始进攻，这时哥特骑兵已无抵抗余力，立即向后退走。正如普罗库波斯所说的，他们并非想退到步兵的后面喘息一下再战，而是想逃走。这时哥特步兵却不展宽他们的间隔来收容骑兵，也不站稳脚跟援助骑兵，却在骑兵的前面抢先跑了。混乱之中，他们更是互相残杀，这是夜战中常见的情况。这是枪矛和弓箭联合使用的第一次战斗，已经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会战中杀死了6,000名哥特兵，所有被俘者也一律被屠杀，包括许多过去的罗马逃兵，连同托提拉本人在内，他是在会战中（初期或最后）受了重伤，被捉到卡普莱村中，就死在那里。

会战胜利之后，纳尔塞斯首先斥资遣散了他的伦巴第部队。他希望他们赶紧走，因为他们的野蛮简直使作战都受到了影响。其次他才开始肃清哥特人的残部，他们已经选举特亚斯为王。当纳尔塞斯占领罗马之后，就把特亚斯的残军封锁在萨诺达两个月之久。最后当哥特人退到利特里山之后，在一场会战之中把特亚斯又击毙了，哥特人才全部投降，条件是允许他们在各要塞搜集他们所埋存的金钱之后就离开意大利，到他们所选择的任何野蛮王国中去作自由人。

现在只剩下法兰克人尚未被击败，当纳尔塞斯封锁萨诺时，他们在罗萨和布西林兄弟率领之下，又大举侵入意大利半岛。554年，在卡西里伦被纳尔塞斯歼灭，他所用的战术仍大致与塔吉纳会战相似。这是554年，查士丁尼这才完成他在532年就已决心完成的任务。在非洲消灭了汪达尔人，在意大利消灭了东哥特人之后，他已经使以前西罗马帝国的大部分领域完全没有

雅利安主义的残余，同时他的领土也已经包括整个的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南部、西西里、撒丁、科西嘉和巴里克群岛。除了西班牙和塞浦路提马尼亚境内尚有西哥特人（后者为夹在东比利牛斯山脉与罗恩河之间的地区）和在普罗芬斯境内尚有法兰克人以外，地中海又再度变成罗马人的内湖。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但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又如何呢？特里卡梅伦会战和塔吉纳会战的重要性就应该在这些事件中去寻找。

也和非洲一样，经过二十年战争，在长时间的围攻、饥荒、屠杀、破坏、抢劫和疫病之下，意大利也变成了废墟。狄尔教授在剑桥中古史中曾经说过：最大的城市，像那不勒斯，米兰，尤其是罗马，几乎已无人烟，乡村也变成了赤地，意大利的业主们因为效忠拜占廷和仇视托提拉，结果得到的是完全毁灭的报酬。吉朋的批评更为苛刻，他说：查士丁尼的战争、征服和胜利，好比是老年人的回光反照，把最后的余力消耗殆尽，更加速了其衰颓。收复非洲和意大利，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未尝不是赫赫战功，但是灾难却继之而来，显出征服者的无能，并使这些不幸的国家化为废墟。他又说：查士丁尼的臣民受到战争、疫病和饥荒的三重迫害，人口的显然减少是其统治期中的最大污点。这些地球上最美丽的地区，以后都永远不能恢复原貌。

那么查士丁尼胜利的后果又如何呢？从幼发拉底河直到“赫丘里斯之柱”，到处都是战争、财政性的压榨和宗教性的迫害，使东罗马诸省都变得人穷财尽，民不聊生，这好像是为未来的回教征服者开路一样。查士丁尼死后不到一个世纪，这些地区就被他们征服，甚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也还有许多地方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非洲的摩尔人，本已为汪达尔人征服，现在又重新回到他们的原始野蛮生活，所以在下个世纪中，当然就支持不住沙拉森人的侵入。至于在意大利方面，当哥特人被消灭之后，纳尔塞斯所指挥的税吏，在以后十二年当中，把那一点在战争中尚未消毁完的剩余财力完全榨干了。到568年，阿尔班率领的凶猛的伦巴第人又侵入该地，这是日尔曼民族在旧有的西罗马帝国领域建国的最后一个。他们迅速占领了波河以北地区——现在这里仍然称为伦巴第——以后逐渐向南扩展，到处抢杀，除了拉文那和罗马以外，他们最后蹂躏整个半岛的北部三分之二的地区。589年，在佐托率领下毁灭了在卡西罗山上的圣本尼迪克特派寺院，到774年才为查理曼大帝征服，而被融入他的帝国。

如果意大利不被入侵，也没有这次塔吉纳会战，那么东哥特将继续统治意大利，于是中古将完全改观。罗马也不会变成一个废墟，一个无政治重要性的二等城市，而仍然继续在西方文化和文明中，作为一个积极活跃的中心。哥特的活力和拉丁的文明若能融合在一起，则可以使自从阿德莱罗普会战以来就不断在西方爬行着的悲惨景象一举廓清。虽然对查士丁尼而言，塔吉纳是他最大的一次胜利，可是对于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和以后许多年的历史而言，都应该算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大灾难。

## 斯鲁伊斯海战和克勒西会战

---

爱德华三世于1312年11月13日出生于温莎，他是爱德华二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法国的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姐姐，查理于1322年继承其兄菲力普五世为法王，所以爱德华是查理的外甥。1325年，为满足伊莎贝拉的要求，爱德华二世将奥斯坦德公国交给他的儿子统治，查理四世也欣然同意，因为他可以获得移交费六万利弗尔。

9月10日，这位年轻的王子接管了这个公国，变成查理的属臣，象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与前几代法兰西国王的关系一样。十五个月之后，爱德华二世被迫退位，于是在1327年1月13日，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五岁——被拥立为英王，于1月29日加冕，就是爱德华三世。

差不多一年以后，查理四世逝世，留下妻子和一个女儿，并没有儿子。他的妻子虽有孕在身，但是1328年4月1日又生下一个女儿。此时菲力普四世的侄子，法罗的菲力普——即查理四世的堂兄弟——以继承人只应限于男性为由，获得法兰西贵族议会的承认，于5月29日在莱门斯加冕为法兰西王，就是菲力普六世。

他当选的消息传到英国之后，伊莎贝拉大感不悦，因为她的儿子在开普坦世系中要更有理由获得法王的继承权。为了争夺这个权力，在菲力普加冕之后，英国派了一个使节团从伦敦前往巴黎为爱德华提出继承权要求，并对菲力普的篡位表示抗议。但英国宫廷却没有贯彻这项要求的实力，所以抗议也只是一纸空文。不久，菲力普利用英国的弱点开始进行报复，他也派出一个使团到伦敦对爱德华说：在菲力普的所有臣子中，只有他还没来朝贺，希望他也能照办。

因为英国政府采取敷衍政策，所以给了一个模糊的答复。

菲力普马上又派出第二个使节团，带去一个最后通牒，说如果爱德华不向法王宣誓效忠，那么奥斯坦德领地将予以没收。这个威胁使爱德华不能不就范，因为这时他并没有用武力保卫他的公国的能力。1329年4月14日，他回信给菲力普，说一等他国内的困难情形略有改善就渡海来朝。6月6日，他如约入朝，在亚眠大教堂中，他正式成为菲力普的臣子。

在这种往来中，我们已经触及百年战争的主因——实际上与法国王位继承权的问题并无直接关系，反之主要是由于爱德华身为奥斯坦德公爵，造成一种不正常的臣属关系。对一个普通的法国臣子，法王可以用威胁的手段使之屈服，但是因为爱德华又身兼英国国王，若如此待他，则难保不会引发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换句话说，从法理上来说国王可以做另一个国王的臣子，但事实上国王就是国王，彼此是平等的，进一步说，只要爱德华还是奥斯坦德公爵，则他不仅还是法国国王的属臣，而且可以在法国境内为英国人保持着一个桥头堡。而且除非他诚心臣服，否则他并无任何道义上的的束缚，可以尽量的扩张这个桥头堡。菲力普也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不能把英国人赶出奥斯坦德，那么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则必须坚持爱德华的臣属关系应该愈紧密愈好。反过来说，爱德华也明白，如果他不能完全取消这种臣属关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则应使其尽量只保持有限形式。最后当菲力普命令没收格伊内时，正如佩罗教授指出的，正是走向对爱德华宣战的道路。于是后者遂以王位继承权要求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在封建冲突中他居于劣势，而在王朝斗争中他却可以与对方平起平坐。

除了封建性事务以外，还有其他因素掺杂在一起，终于使这个冲突成为定局。在这些因素中，比较重要的是在十三世纪中神圣帝国已经崩溃，而教廷自从迁到埃菲格伦之后，也已日渐式微，所以英国与法国之间，无论是在世俗和精神方面，都已经丧失了平衡力量，没有人来给他们排解纷争。另外还有一个苏格兰问题。自从1295年以来，苏格兰就与法兰西缔结了同盟关系，后者也利用这个关系来牵制和削弱英国人的力量。对弗兰德的关系也是一样，自从1328年卡塞尔之战以后，这个地区也已经完全与法兰西国王发生了联系。虽然爱德华无法破坏这个同盟，但他却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来削弱它，那就是使弗兰德的纺织工必须依赖英国的羊毛。

所以总起来说，百年战争的起因并不仅限于王朝和封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中各种条件所造成的。教皇的权威已在消亡之中，帝国的影响已经趋于湮灭；王国开始兴起，贸易逐渐成为王国之间的主要竞争手段；制海权的问题开始出现了；从十字军时代产生的骑士精神也经演变成了好勇斗狠的风气；而最重要的却是西欧太小了，不能供两个强国发展。这一切因素，以爱德华的继承权的面目出现，造成所谓百年战争，这是中世纪的一大浩劫，尽管有它带来的愚蠢和灾难，但却为更加伟大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撒播了种子。

在这个长期斗争中，严格说来并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决定性会战，可是战术性的胜利却并不少见，尤其是以在战争开始时和将要结束时更为突出。

当爱德华被迫在亚眠向菲力普表示臣服之后，法国政府就算赢得了第一个回合，因为英国的软弱使他们受到了鼓励，就开始想赢得第二个回合。于是就发生了爱德华宣读誓词的内容问题，事实上，它固然不像其他法国诸侯所宣读的那样“正确”，但与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一世，和亨利三世等宣读的并无太多差异。它仅是简单的臣服，而无效忠的意义。于是没有经过进一步磋商，法国政府于1330年7月28日命令爱德华到法国宫廷中来当面解释他的“臣服”是具有效忠的意义。

此时英格兰的伯爵们正在造反，反对伊莎贝拉和她的男宠莫提美尔。爱德华对母亲训政也感到十分厌恶，于是与这些贵族同心协力废了他的母后，并在特布恩将莫提美尔处死。因为国内混乱之际，他无力拒绝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于是在1331年3月30日写信给菲力普说：“我们承认在亚眠的宣誓具有效忠的意义。”四天后，他又亲自访问法国，在这个短暂逗留中，菲力普认为这个书面的承诺可以令他满意，于是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于是菲力普着手准备参加十字军，因为欧洲正在宣传这种运动。虽然如此，只过了一点时间，这场巨大火灾的第一个火花就被点燃了——不是在海峡那边，而是在特威德河以北（指苏格兰）。

当罗伯特·布鲁斯——1314年布莱克本的胜利者——于1329年6月7日逝世之后，苏格兰的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大卫，他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依照1328年5月订立的北安普敦条约，被爱德华承认为苏格兰王。这个条约也规定过去在苏格兰有领地而被没收的人，除三个人例外其余都应该予以发还。

1331年11月，大卫在斯科尼加冕，爱德华的宠臣巴列欧就出发去收复他丧失的领地。

（注：他是约翰·巴列欧的儿子，在1291年，爱德华一世强迫苏格兰人接受他为国王）。1332

年7月31日，他率领一小队士兵和弓箭手侵入苏格兰，8月11日他在都柏林莫尔击败了苏格兰的摄政，获得了一个惊人的胜利。此时，爱德华得知大卫正在接受菲力普的资助，于是自动废除了他本来喜欢的这个北安普敦条约，率兵北上包围贝尔维克，并于1333年在哈里登丘陵彻底击败了苏格兰人。大卫逃往法国，受到菲力普的优待。他表示除非爱德华的部队撤出苏格兰，否则他拒绝停止援助苏格兰人。

当情况恶化之后，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自告奋勇出面调解。1335年11月，他劝说爱德华和大卫两人同意作短期休战，以此作为调处他们争端的第一个步骤。不久他又对菲力普说，希望能获得全面和平，否则十字军行动只好暂时延期。这却使菲力普大为恼火，因为他早已决定领导这次冒险，于是为了对爱德华施加压力，就不由分说命令他本来集中在马赛准备输送十字军前往圣地的舰队开往诺曼底，好像他是准备介入战争支援苏格兰一样。

这个行动马上使英格兰有了反应。英国议会认为英国有受到入侵的威胁，便于1336年9月投票表决筹募战费，同时命令舰队集中在英吉利海峡。对这个反挑衅的答复是菲力普把部队开到格伊内边界，并于1337年5月24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宣布没收格伊内地区。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加速了战争爆发。1332年，菲力普的妹夫罗伯特被指控毒杀了他的妻子，于是被判剥夺其爵位财产，放逐出国。他首先在海纳德避难，但是菲力普宣布谁收留他就对谁兵戎相见，于是罗伯特在1336年底渡海赴英，爱德华待以殊礼，他劝说爱德华反抗菲力普，并再次提出对法国王冕的要求。如果以奥斯坦德公爵的身份，爱德华受到誓约束缚，他不能支持罗伯特反对其合法的长上，不过如能宣布菲力普的嗣位为不合法，那么他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工具是现成的——就是他对继承权的要求。所以1337年11月1日他派林肯主教到巴黎去，带去一份最后通牒，在这个文件中他称菲力普为法兰西的“自立为王”者。虽然他尚未立即要求法国王冕，可是这样的称呼就表示菲力普是篡位者，所以他在亚眠的宣誓已经没有遵守的价值。所以，在1337年秋天爱德华赢得了第三个回合，这个从1328年以来已经冷却的冲突现在升温到了沸点。

如果按照现在的字义来解释，要想征服法兰西——那就是说要加以占领——应该是一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问题。不仅因为十四世纪的法兰西王国是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国家，而且它也差不多有两千万左右的人口。但在1377年，经过了1348到1349年间的黑死病之后，英国的人口却只不过是三百七十万人而已。而对这个优势，我们却应记住在法国仍然保持着封建制的战争观念，就是以精选人员为基础，而不是依赖广大的人力。虽然法国的骑士在数量上也多于英国，但纪律却较差，而且仍然认为步兵在战场上出现是有辱尊严的。

与法兰西作一对比，英格兰是个比较统一的王国，爱德华有一个好得太多的财政制度，可以使他方便地招募和维持兵力。为了赢得他的会战，他惟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击败法国的骑士。法国人的封建战术还是设法将敌人挑下马来加以生擒以便勒索赎金，而爱德华却比较注重“杀伤”。在观念上，他的战术要比封建式更为“近代化”一些。由于他的祖父曾从威尔士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长弓，这种兵器使他把“火力”当作战术基础，而不仅限于冲力。所以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那么在战术上法国人是处于劣势的。但是由于法国面积巨大，连相当长期的占领都是不可能的，当然更不必说永久性占领。

遵照他的祖父在1297年拟定的计划，爱德华决定经过低地国家进攻法兰西，目的是牵制菲力普的兵力，使他不能去夺取奥斯坦德——也就是说把战争拉向北线。虽然与佛兰德伯爵路易缔结同盟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但是利用金钱收买——总数为三十万弗罗林——他赢却得了布列坦尼公爵约翰三世、莱茵河上帕拉廷伯爵雷格那德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等人的支持。此外，他又与海纳德、吉尔德斯、林堡、尤里尔和布拉班特等诸侯签订了条约。

此时，佛兰德的路易——他本是法国人——为了表示他对菲力普的效忠，已经在坎德萨岛上——在斯鲁伊斯下方——设置了一支强大的守军，足以明显阻碍英国与低地国家之间的海上交通。爱德华就以这件事为借口，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攻占该岛。1337年11月11日，在箭雨掩护之下，德贝公爵和马麦率领他们的部队在该岛登陆并毁灭防御工事。百年战争自此开始，一直延续了116年之久。

同时，为了使佛兰德内部发生混乱，爱德华禁止英国羊毛输出。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佛兰德人在亨特的纺织业公会领袖阿特维尔德领导下推翻了路易伯爵，并与英格兰缔结了一个商业同盟。在这次成功之后，皇帝卢德格也责备菲力普霸占了某些本来属于帝国的封地，并要求他把法兰西王国交还其合法主人——英格兰的爱德华。最后，皇帝又任命爱德华为帝国总督，统治莱茵河以西各省，并要各省都向他效忠。

为了扩大其同盟圈子，爱德华已经负担了巨额的战争债务。此时菲力普却不声不响忙着对英吉利海岸作战。他利用诺曼底人、西班牙人、不列颠人和热那亚人的舰队扫荡海峡，早在

1336年，英国到加斯戈尼之间的商船就已经要采取护航的方法了。1337年，海峡中各岛及威特岛都遭到蹂躏；次年，朴茨茅斯、普利默斯和南安普敦都被焚毁。1339年5月，黑斯廷斯的大部分也被焚毁，到7月底，法兰西和热那亚的联合舰队不仅使多佛尔、桑德维斯、切尔西和莱伊等地受到巨大损失，而且也更紧密地控制着海峡，没有一艘离开英格兰的船只不被抢劫，所有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这些损失中的最著名的是克里斯托弗号和爱德华号两艘大船，都是运送羊毛前往弗兰德的。同时在格伊内，拉佩尼城自1338年4月被围，到1339年也沦陷了。

为了挽回这种颓势，并且使自己所借的重债能有点保障，1339年7月16日，爱德华发表了一个宣言，送给教皇和各枢密主教，提出他对法国王冕的要求。其次他在维尔沃敦和布鲁塞尔与他的那些并不太热心的同盟军会合，一共约为15,000人。为了向他们表示决心，他正式宣布撤消他对菲力普的臣属关系，于是将这个封建性斗争转变成王朝性的战争。接着为了表现其真正的侠士精神，他率领四千骑长枪兵以最高速度前进，突袭位于斯卡伯河和谢尔德河交点上的蒙塔格纳要塞。他未能攻下该要塞，又继续挺进，突袭在康布雷附近的伊维科。

因为对秋季战役没有准备，菲力普就在圣昆丁召集贵族开会，而爱德华则前进到康布里西斯，沿路蹂躏。当他于9月25日到达马可营时，菲力普已经移到佩龙尼。10月18日，他从那里致书向爱德华挑战，请爱德华自己选定任何一个“公正的战场”，以便进行一次正常会战。但是爱德华却退向拉卡培里附近的弗拉门戈纳，于是菲力普也跟进到布伦菲沃斯。10月23日，两军准备会战。爱德华准备还是像在哈里登丘陵时一样，采取防御行动，并无攻击意图，菲力普与他的顾问商量一番，认为这天星象不利，所以也等候对方进攻。结果是双方都按兵不动，到傍晚时候，爱德华退往阿费斯尼斯，11月1日回到了布鲁塞尔。所以这就是爱德华为了争取法国王冕进行的第一次战役，结果虽未流血，但所费不少。他已经举债三十万镑，并且糟踏了教皇的美意。此时在加斯戈尼，法国人已经攻占了贝叶和伯尔涅，而波尔多也受到直接威胁。

虽然如此，爱德华却并不灰心，为了使他与弗兰德人的关系“合法化”，因为他们还是应该效忠于法国王室的，所以在1340年1月25日，他公开宣布自己兼任英法两国的国王，并且在他的御甲上，把百合花标志扣在狮子旁边。弗兰德人解除了向菲力普效忠的誓词，承认爱德华为法国国王。2月21日，他回到英格兰。

一旦回国之后，爱德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筹措金钱以继续战争，但是不等议会通过新的战债，他又准备返回弗兰德。因为菲力普已经在那里向爱德华的同盟军发动攻势，两军正在谢尔德河上对峙。此时，教皇也并未停止活动，在菲力普主使下，他对背叛的弗兰德人宣布给予弃门的处分。为了安抚他们，爱德华写信给他们说只要他一过海之后，他会从国内带来一批神父来为他们做弥撒，不管教皇怎么说。

为了不使他的敌人重返欧洲大陆，菲力普集中了一支强大舰队，由海军将领库尔特、贝胡切特和热那亚海上职业军人巴巴内罗三人统率，监视英吉利海岸，防止爱德华渡过海峡。如果他敢冒险，就将他活捉。当这个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虽然违反本意，爱德华还是听了忠告，暂时不出发，等到在奥威尔所集中的同样强大的舰队准备就绪后再渡过海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而且西风也开始吹拂，于是大约在1340年6月22日星期四一点钟左右，爱德华上了战船托马斯号，全部舰队都出发了。（注：这种船为两头稍平的宽底船。现在还叫作“雄鸡船”）可能一共有船147艘，分三个支队，分别由莫莱爵士、亨廷顿公爵和阿伦德公爵三人统率，爱德华亲任最高统帅。跟着走的还有一个运输船团，以补给仍留在亨特的菲莉帕女王的宫廷。

星期五快到中午时分，当他们驶近弗兰德海岸时，可以看见集中在斯鲁伊斯港中的法国舰队——依照当时的历史家佛罗萨特的记载——桅杆好象树林一样。6月28日，在他写给他儿子康韦尔公爵的一封信上，爱德华估计敌人的实力为190艘，共有人员35,000人。虽然时间还早，由于潮汐的关系，英国舰队并未驶向在东面十英里远的斯鲁伊斯港（注：这个港口已经淤塞，现在的斯鲁伊斯是一个内陆城市），而在布兰肯堡投锚，另外派了一队骑兵上岸侦察敌人。他们回来报告说：敌方舰队中有十九艘特别巨大，其中有一艘就是被俘的克里斯托弗号。

6月24日星期六拂晓时，双方舰队都准备采取行动。巴巴内罗是一个职业军人，力主进攻，但是那两位法国海军将领却坚持要在港内进行消极防御。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法国舰队前进到港口坎德萨岛的附近（注：该岛现已与大陆连接），而巴巴内罗则率领他的快速支队出海迎敌。一旦到港口之后，把最大的船放在前面，因为他们的侧翼是有安全保障的，为了使正面不至被突破，他们又用铁链和绳索将前排船只联在一起。在船上顶层的堡垒中准备好了石块和投掷兵器。在前列中有克里斯托弗号，上面载满了热那亚弓手，在它的附近又有爱德华号、卡瑟琳号和玫瑰号，这三艘船也都是从英国人手中俘虏来的。

爱德华的舰队也分为三列，最大的船只在前面，由莫莱爵士指挥。每三艘船中，一艘载着重

装甲兵，两艘载着弓手，互相间隔，似乎有些船上还装有原始的火炮和抛石机。后方还有一个预备支队，也由弓弩手负责，另有三百名重装甲兵奉命保护装载妇女的船。

因为爱德华握有主动权，他对风向、潮汐和日光都可以等待，直到中午过后，潮流才合用，于是斯鲁伊斯会战开始了。

在军乐声中，莫莱爵士背对太阳，直向法军前列冲去，一面高呼着：“圣乔治，前进！”另一面则高呼“法兰西！”当他的船只在投锚地撞上法国舰队之后，英国的弓弩手就不断发箭以掩护装载重装甲兵的船只，当后者抓住敌船之后，就跳过敌船，用肉搏战来肃清敌人。从船顶上投下了大批石块，打击那些在下层交战的人员。大船克里斯托弗号、爱德华号和玫瑰号马上都被英国人夺回，卸下法国旗，升上了“雄狮与百合”的英国旗，弓弩手们马上驾驶着克里斯托弗号，去攻击热那亚快船。法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出其传统勇气，据说有整船的英国兵，都被石块击毙。但是决定性的兵器却还是弓箭，在多数情形中，都是它们扫清了法国船只的甲板。

在会战之前，爱德华曾经从布鲁日和邻近城镇中召集拥护他的人前来助战。依照佛罗萨特等史学家（但非全体）的记载，他们都欣然应召而来。他们乘着小船从后面攻击法军。巴巴内罗认为大事已去，率领他的二十四艘快船向公海中逃走，躲过了这场屠杀。

当第一列战败之后，法军放弃了一切希望，第二和第三两列的人员，在恐怖中纷纷下小船逃走，人多船少，挤在一起，许多都翻了。虽然如此，这场血战还是继续打到日落时才停止。按照爱德华自己说的，直到深夜才将法国的三列舰队都全部歼灭。

爱德华在托马斯号上停了好几天，奏乐设宴以庆祝胜利。当他登陆时，为了使他的诺言兑现，让三百名神父列队游行，到阿登堡的圣母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弥撒。其次，他又前往肯特去看望菲莉帕女王和她新生的儿子，根据他的出生地，给孩子取名为戈特的约翰。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这次胜利从战术上来看，可算是英国舰队有史以来所获得的空前胜利。但是对于谢尔德河上的战役，却并无太大影响。他本应该在战略方面，扩张这一战果，可是爱德华并不如此，反而决定围攻托尔莱，很明显是由于他有诺言在先，为了使弗兰德国人承认他为法兰西国王，这个城市也是代价之一。7月23日，他把司令部设在柯尔泰与托尔莱之间，并开始围攻后者。此时，菲力普的陆军扎营在亚耳与阿门特里斯之间。菲力普并没有急于进攻的必要，因为事态发展对他有利：在加斯戈尼，他的兵力正在迅速发展，在苏格兰，苏格兰人也已收复佩斯。托尔莱的围攻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并且曾用火炮轰击。因为缺乏金钱，已经无法使他的杂牌部队再团结一致，于是爱德华被迫解围而去。9月25日，他勉强同意签订了埃斯普里切休战条约，它的有效期到1341年6月22日为止。

斯鲁伊斯会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爱德华第二次弗兰德战役的影响，这次胜利使英国人直到下一代都能完全保有海峡的控制权。若非如此，那么战争可能不会拖这么久，而在心理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克勒西会战，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11月30日，爱德华回到了英格兰，到1341年，当他在苏格兰的战事日趋恶劣之际，大陆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他不能不向南看。4月，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死了，没有子嗣，于是又发生了继承权的争执。争这个位置的人有两个：（一）查理，菲力普四世的侄子，他曾经与约翰的侄女结婚；（二）蒙特弗伯爵约翰，约翰的异父兄弟。菲力普支持前者，爱德华则希望成立一个盎格鲁不列颠同盟以对抗法兰西苏格兰同盟，所以支持后者，结果使英法之间又发生了新的战争，一打就是二十年。依照拉姆西爵士的说法，它使百年战争变得有可能了。

虽然菲力普并未正式参加这个战争，但是他的儿子诺曼底公爵和他的兄弟阿伦肯伯爵却与查理合作。11月21日，他们迫使南特投降，并侥幸俘获了约翰。但是他们没想到约翰的妻子伯爵夫人却具有“男人的勇气和狮子的雄心”（佛罗萨特的说法）。她可算是圣女贞德的先驱，她对亨内伯特堡垒的英勇防御，是百年战争中的大事之一。它激起了爱德华的侠义精神，1342年5月，当这位伯爵夫人已经面临最后关头时，爱德华就派曼尼爵士率领三百名骑士和二千名弓弩手去救援她。曼尼解了该城之围，但兵力却不够强大，不敢冒险向内陆推进。所以在北安普敦公爵和罗伯特率领之下，又派了一支部队前往。罗伯特在凡内重伤殒命，而9月30日北安普敦公爵却在莫莱克斯苦战获胜。这次胜利使爱德华受到了鼓励，于是10月23日，他渡海到达布列斯特，决定他的第三次战役准备在布列塔尼进行。还是和上两次一样，仍然毫无结果，1343年1月19日，在马勒斯托伊特签订了一个为期三年的休战协定，包括苏格兰、海纳德和弗兰德都在内。

双方都利用这个休战期间来推动自己的利益。当教皇克莱门特六世看到最后解决希望已经化为乌有，于是劝说双方于1344年10月到11月间，在埃菲格伦举行一次会议。在会议中，爱德华首先提出对法国王冕的要求。他要求扩大格伊内的范围和完整的主权——解决一切臣服关

系。

虽然菲力普的顾问们力争奥斯坦德的没收已经无可改变，可是菲力普却同意归还这些领地——包括爱德华现在正占领的地区在内——甚至于扩大范围，惟一条件却是必须臣属于他。

因为双方都不肯让步，所以战争又继续下去，于是爱德华决定从布列塔尼和格伊内两面同时攻击法兰西。1345年6月，蒙弗特伯爵（他已从法国逃回）和北安普敦公爵被派往布列塔尼，不久之后，德贝公爵也乘船前往波尔多。爱德华听到阿特维尔德的统治权已经发生动摇，所以在7月5日他也出发往斯鲁伊斯。7月7日，他在斯鲁伊斯遇到阿特维尔德，可是当阿特维尔德返回亨特时却被刺杀。7月26日，爱德华又回到英国。

9月，蒙弗特伯爵死在布列塔尼，而北安普敦公爵也没有很多成就就宿营过冬了。反之，在南面的德贝公爵却比较成功，原因是他采取温和的手段获得民心。他攻下了伯格拉克，在一个卓越的作战中解了奥伯罗彻之围。在这些成功之后，安格拉姆和许多其他的城市就都开门迎降。于是他回到波尔多，去渡过1345-1346年间的冬天。

这许多的损失使得菲力普不能不采取行动，1345年年底他召集了诺曼底、皮卡迪、勃艮第、洛林、普蒂芬斯和朗格多等地的民兵，集中在陶劳斯，由诺曼底公爵担负指挥。1346年的初春时节，这位公爵出发了，4月间开始包围“锥石”要塞——在加伦河和罗特河的交汇点上——由许多英军所据守。这个要塞非常坚强；不久这次围攻就变成了整个战争中最著名的一战。一直压迫到8月20日，这位公爵却突然解围而去。因为在那天从北面有惊人消息传来，说爱德华已经再次侵入法兰西了。德贝——现在升为兰开斯特公爵——也听到了英王登陆的消息，认为“锥石”现在已经安全了，就率兵向桑顿基和波-陶进攻以牵制法军并与爱德华相呼应。

从斯鲁伊斯回国之后，爱德华马上就开始组织一支新军，以推进在加斯戈尼境内的战争，因为从过去的经验上他知道封建式民兵不适合于欧陆战争，所以他决定用所谓委派制度（即相当于配赋制）来招募一支精兵，这种制度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曾偶然使用过。依照这个制度，每个地区的地方官和招募委员，首先造出一份全部地主名册：凡是地租价值五镑的地主，就应负责担负一名弓弩手；十镑的负责一名骑马步兵；二十五镑的负责一名重装甲兵，至于最大的封建地主则应供给整队的人员。例如理查德负责供给了十四名骑士、六十名骑马步兵和八十二名弓弩手。牛津公爵负责供给了二十三名骑士、四十四名骑马步兵和六十三名弓弩手。地主们自己不能服役的，可以自由寻找替代人，如果交不出人来，则处以罚金。弓弩手一镑，骑马步兵三镑六先令八便士，重装甲兵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弓弩手是从自由农民中去招募，这个阶级是完全在农奴之上的。（注：英国自从被诺曼底征服之后，就以射箭作为“国技”，所有自由农民均有弓箭，所谓自由农民实际上是一支常备民兵。）法国人因为缺乏有训练的本国弓弩手，只好雇用热那亚人和其他十字弩手。

这里对所谓“长弓”也应略加说明。这种兵器一直支配着法兰西战场，直到阿金库特之战为止，此后也就迅速被淘汰了。这是爱德华一世从南威尔士学来的。它是用六英尺的榆木制成，箭长三英尺。与诺曼底人的短弓相比是一个威力远为强大的兵器，又比“十字弩”轻便得多，它的箭能透过双层的锁子甲。

1298年，爱德华一世首先在福尔柯克以华莱士所率领的苏格兰人为对象来试验这种兵器，结果效力非常惊人。爱德华在布莱克本却未使用，结果被布鲁斯击败，1332年在杜布林莫尔之战中，长弓又再度被英格兰人学会了。这一战是由爱德华、巴列欧等人为收复失地而与苏格兰的摄政唐纳德交战的。前者的总兵力为500名骑士和1,000名到2,000名弓弩手。后者所指挥的据说有2,000名骑士和二十万步兵（这是过份夸大的数字）。

因为明白认识到在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英国人首先乘黑夜向唐纳德进攻。但是拂晓之后，他们发现敌人已经严阵以待，于是在一个丘陵地的斜坡上占领阵地。除了四十名骑士以外，其余都完全下马，排成方阵，弓弩手在两翼向前伸出。唐纳德完全没有注意这些弓弩手，直向中央冲锋并突入敌阵。于是两翼上的弓弩手向内旋转，发射出非常强烈的“火力”，结果苏格兰军秩序大乱，几乎被全歼。英军上马追击，大获全胜。1333年，爱德华在哈里登丘陵之战中也是采用这种战略。此后约有一百年，一直是英国人的基本战斗模式。

爱德华把兵力集中在朴茨茅斯，依照莱门爵士的记载，这支兵力一共有3,680名英格兰弓弩手，3,500名威尔士兵（一半弓弩手一半长矛兵），2,743名骑马步兵和1,141名重装甲兵（骑士），总数约为一万人。这是一支有纪律有组织的精兵，由国王发饷。在战术方面，他们较优于法军。因为在英军方面，“火力”和冲力已经结合在一起，而法军却完全只靠冲力。爱德华的战术是防御性的，而菲力普的则是攻击性。前者是先用弓矢去使敌军丧失“组织”和“士气”，然后再加冲锋来竟全功。后者还是跟哥特人的战术一样，从头到尾都以冲锋为主，

而每次冲锋，其秩序都会比前一次更为混乱。因为在摧毁敌人组织和士气的阶段，骑兵很少担负决定性任务，所以爱德华通常总是命令重装甲兵的大部分下马组成方阵，以抗拒敌人的骑兵攻击和保护他自己的弓弩手。他的正常阵形，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单元下马在前，中间隔有一个间隔，另一个单元在后，骑马或准备乘马作为预备队。弓弩手则从前排两单元侧翼成角度伸出。若是可能，这个外翼总是倚托着一个障碍，例如森林、河川或村落为原则。为了自卫，弓弩手都是就地挖掘堑壕，并在他们阵地前插上铁头栅栏。因为这些障碍物再加上弓箭“火力”，法国的骑士总是避开弓弩手而向下马的重装甲兵冲锋，当他们冲过来时，弓弩手就从两侧加以袭击。552年在塔吉纳之战中，也是使用这种战术。此外，专门攻击下马的重装甲兵也有另外一个理由：依照骑士的规则，攻击步兵对骑士来说是有失尊严的，而且步兵也没有勒索赎金的价值。通常在胜利后，对敌人的步兵一律加以屠杀，以免他们变成土匪。在十四世纪根本就没有收容俘虏的集中营。

他在作军事准备的同时也发动了宣传战，他诋毁菲力普是想彻底根绝英国人，这个宣传文件在英国各地散布着。此外，他拒绝教皇的调解，凡此种种都使菲力普看出大规模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了。所以菲力普就致书苏格兰王大卫，请他不要丧失这个打击英国人的机会。

1346年7月11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远征军出发了。依照弗罗萨特的记载，原定的目标为加斯戈尼（因为英王知道在“锥石”要塞中的英军的处境是如何窘迫，所以决定亲率大军去解围）。但是正当渡海之时，却有一位流亡的诺曼底人戈德弗雷向爱德华进言说，如能在诺曼底登陆将更为有利。因为这个省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之一，而诺曼底人久不习武事，而其全部骑士必已随其公爵去围攻“锥石”。爱德华接受了这个忠告，命令舰队向科汤坦半岛的圣瓦斯特-拉-霍格驶去。究竟他的真正战略目的是什么，还是很难猜透。正如阿曼爵士指出的那样，从爱德华对于克勒西战役的指导就可证明他并没有任何合理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获得结论：这次远征不过是一个“骑士式的冒险”而已，或者是故意深入法国以激怒其国王。

第二天，7月12日，爱德华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为了卸载在那里停留了六天。7月18日，他开始向瓦洛内斯进发，取道卡朗坦、圣洛和弗特莱，于7月26日到达克恩。爱德华本意是让那个要塞闭关自守，但这个城却没有城墙，于是遭到彻底的洗劫。爱德华命令把所有负伤人员和战利品都送上船去，这时他的舰队已移到奥恩河河口，但舰队却突然叛变，并已扬帆回国。似乎这个丧失纪律的事件反而帮助爱德华解决了他的战略问题。因为没有交通线，他不可能再留在现有位置，如果向南去和兰开斯特公爵会合，一定会一头撞上诺曼底公爵的优势兵力，所以只能向北。惟一可行的路线是再向东走，以便在弗兰德建立一个基地。

他7月31日从克恩出发，于8月7日达到了埃尔博。他发现在罗恩的桥已经拆断，于是前进到塞纳河西岸寻找渡口。8月13日，他到了巴黎附近。在他行军时，对于所过地区都采取极其野蛮的蹂躏手段，而法军却在塞纳河东岸观望。他到达了波以西，修复了那里的桥梁，于8月16日强渡塞纳河，并挺进到格雷塞。此时，菲力普非但不阻止他渡河，而且使巴黎的人民感到震惊的，却是菲力普反而向圣丹尼斯退却。

从格里赛，爱德华再用强行军向北走，于21日到达艾莱尼斯，该地在索姆河以南约十英里处。在那里，他的侦察人员发现在阿伯维利的一切桥梁和徒涉场，不是被破坏就是有法军据守。菲力普已经到了亚眠，他的兵力也一天比一天强大。

因为不能在艾贝纳里渡河，爱德华就向阿切克斯推进，于8月23日到达那里。于是他悬赏征求能为他指点徒涉场的人。有个蒙斯村的土著叫作戈宾的跑来应征，他说在阿伯维利以下十英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作“白醋牛肉”的徒涉场，在落潮时可以渡过。因为菲力普正在跟踪而来，所以一分钟也不能丧失，爱德华于午夜出发，在8月24日清晨到达该地。他停了一两个小时等待退潮，接着在弓弩手掩护下，全军强渡过河。等菲力普赶到，潮水已经涨起，隔断了他的进路。当天晚上，爱德华到了诺耶里斯，第二天上午继续退却，到达克勒西森林和村落。此时，菲力普回到了阿伯维利，并从那里的桥上渡过了索姆河。

在到达克勒西后，爱德华决定接受会战。他说因为爱德华已经到了他祖母遗留的地区，所以他决心保卫它。此外，他也发现这个位置适合于他的战术。另外有些作家认为他是被迫挺身而斗，否则士气即将崩溃。这种说法却不可信，因为克勒西距弗兰德只有三天行军距离，而菲力普在他后方又隔了一天的行军距离。

因为他猜到菲力普一定会采取从阿伯维利到赫斯丁的道路前进（事实的确如此），而且除非他绕到敌人的左面（这是不合于骑士风度的），否则必定被迫进行正面攻击。爱德华选择了一个位置来等候敌人，并且同时适合他的战术和兵力。这是夹在克勒西村与瓦迪科特之间的一个平缓高地，今天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景象。（注：作者曾访问过这个古战场，发现村落的位置还是与十五世纪地图所标示的差不多。）在高地东面——就是爱德华最理想的作战正面之

前——有个洼地，称为“克勒西谷地”，在它的另一面就是艾斯提斯村，在它南面为芬坦村，在阿伯维里-赫斯丁大路的西面。从芬坦村有一条小溪梅耶向西流经克勒西，在它南面就是克勒西大森林。从克勒西到瓦迪科特的距离约多于三千码。

爱德华的陆军还是照习惯分为三个单元，两个在克勒西-瓦迪科特大路东面高地的前沿，中间留了一个空隙，后面一个单元可以假设是在大路上。右前方的这个单元——就是靠近克勒西的这一个——名义上由威尔士亲王指挥，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所以实际负责指挥的是华威克和牛津的哈尔科特两位公爵，左面则由北安普敦和阿伦德公爵指挥。爱德华亲自指挥第三个单元，将指挥所设在靠近克勒西这一端的一个磨坊里，那个磨坊所在的圆丘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为了保护他的右翼，爱德华掘了一连串浅壕，在右前方的正面上也掘了堑壕。

弓弩手的部署还是像上文所述与正面成斜角。外面两个侧翼与克勒西与瓦迪科特两个村落相连接，里面两个侧翼则掩护中间的空隙，构成一个V字指向东面。

依照佛罗萨特的记载，右面一个单元约有8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弩手和1,000名威尔士人。左面为800名重装甲兵、1,200名弓弩手。后面为700名重装甲兵、2,000名弓弩手，共计8,500人。虽然兵种的区分不一定正确，但总数似乎还合理，因为在圣瓦斯特-拉-霍格登陆时，爱德华的战斗兵力不过一万人。

在战线后方，爱德华在森林附近设立了一个大辐重场，把所有的行李车辆和马匹都集中在这里，据说爱德华还有三门火炮，可能位于弓弩手一翼。摆阵完毕之后，爱德华由他的两位元帅随护，骑马缓行视察部队，鼓励人员努力作战。接着他们奉命吃午餐，吃饱休息之后，再列成阵势，大家都坐在地上，将头盔和弓弩放在前面，当敌人到达时，他们的体力和精神都可以很饱满。

此时，菲力普已经在阿伯维利集中了他的部队。同他在一起的有：瞎眼或半瞎的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和他的儿子查理，就是罗曼斯王；马约卡国王詹姆士三世；菲力普的兄弟——阿伦肯的查理；菲力普的侄子路易；弗兰德的路易；海纳德的约翰；洛林公爵鲁道夫和法国骑士的大部分。在中世纪，从来没有在一个战场上集中过这样多的骑士。依照罗特估计，法国共有重装甲兵8,000人，支援他们的是4,000名步兵，其中包括一批热那亚十字弩手，由多里亚和格雷马蒂分任指挥，法国的骑士（重装甲兵）也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队由波希米亚王和阿伦肯及弗兰德两伯爵指挥；第二队由洛林公爵和布罗斯伯爵指挥，第三队则由菲力普和罗曼斯王指挥。

（注：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法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

因为不能确定英军位置，所以在8月26日，菲力普沿着阿伯维利-赫斯丁大路前进，另派莫尼勋爵和三个骑士先去侦察敌情。他们回来后，莫尼报告说爱德华正在克勒西，建议国王暂停前进，宿营过夜，以便后队可以赶上来，然后在次日上午再用全军进攻。

菲力普命令照这个建议行事。于是佛罗萨特这样记载道：“前面的人停了，可是后面的却说必须前进到与前排平行的位置再停止；由于后面在推进，所以前排也就停止不了，国王和元帅们都无法使他们停下来。于是他们虽未奉命，还是照样前进，直到看见敌人为止，当最前面的法军看到英军后，马上秩序大乱向后倒退，这又使后面的部队受到惊骇，以为已经发生了战斗。于是在阿伯维利和克勒西之间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人，虽然距离敌人还有三个“里格”（约等于三英里），他们却拔出刀剑，大声喊杀，好像疯了一样。除非在场的人，否则很难想象其混乱情形。”

黄昏时候（下午六时），天突然变黑，大雨倾盆，加上雷声怒吼，并发生了非常恐怖的日蚀现象。在大雨之前，有一大批乌鸦在部队头上飞过，发出极大躁音，大雨来得快也去得快。太阳又露了出来，但是法军却面对着它，而英军则背向着它。此时，热那亚人已经稍为恢复了秩序，被调到前面，由阿伦肯和弗兰德两位伯爵的兵力跟随在后面，开始向洼地中央进发。但他们接近英国人时，高声大喊着恐吓他们，但是英军沉静不出声。他们再喊一次，英军还是不动，当他们大喊三次之后，就开始发射他们的方头箭。于是英军的弓弩手都前进一步，用力迅速的射出他们的箭，好比雪片一样的飞来。热那亚人感受到这些箭的威力——它们射穿了他们的手臂和头部，透过了装甲，甚至割断了弓弦，于是他们纷纷向后奔逃。看到这个情形，法国国王不禁怒吼道：“给我杀掉那些流氓，因为他们挡住我们的进路……”

英军弓弩手继续发射，不久他们的箭就射到法国骑兵的身上，使他们的马乱跳乱跑，又践踏在那些逃走的热那亚人身上。为了想抢上前去，彼此互相竞争，法国的骑士们就用他们的刀剑在乱军中砍路前进。英军弓弩手又将箭转向法国骑士射击，关于这个战斗的情形，我们可以将阿曼的《战争艺术》中的话引述一段如下：

“弓弩手就把箭向他们中间射去，几乎不需瞄准就可箭无虚发，每一箭都可以射中人或马，射透他们的头、臂或腿，并使马发狂。有的站立不动，有的向两边冲，有的回过头来跑，

于是秩序大乱。所有第一批的法国骑士们都溃散了，或死或逃，甚至于根本没有看见杀戮他们的人。”

在被击败之后，法军第一列并未让出正面好让第二列来进攻。于是当第二列冲锋时发生了极大的混乱，瞎眼的波希米亚王就这样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法国骑士退却之后，爱德华军中的威尔士人，就挺着长刀冲上去杀人，被杀死的有许多公侯贵族，以后使英王感到非常后悔，因为对于杀死的人就不能再勒索赎金。

关于阿伦肯伯爵和弗兰德伯爵所作的突击，佛罗萨特有下述颇饶兴趣的记载。因为他们的马匹躲避敌方的弓矢，所以把他们的主力自动的拖到了英军下马骑士的面前。尤其是在英军右翼方面更是如此。威尔士亲王的部队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华尔维克派人到磨坊去向英王求援。当听说亲王还安然无恙，爱德华就向使者说：“回去代表我告诉那个差你来的人，在今天之内不要再派人来求救，而且不管情况如何，只要我的儿子活着，我就决不会来，好让他自己经历一点磨练。”话虽如此，他还是派了杜汉主教率领三十名骑士去增援他的儿子。

或许他不派较多兵力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左翼的英军，在北安普敦指挥之下，已经向右旋转，攻击法军的侧翼了。当这批法军被逐退之后，菲力普所率领的第三批兵力又到了，结果只是增加了混乱。

从头到尾，据英国人计算，他们一共遭受了十五次单独或连续的突击，最后一次已经是午夜了。在整个会战中，法军完全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每批骑士都只有一个观念，就是接近敌人，所以自始至终，一直混乱不堪。根本就不存在追击的问题。爱德华始终控制着他的部队，整夜严阵以待，到第二天拂晓，包费斯和罗恩两地区的兵员还不知道会战已经失败，仍然继续前进，于是很容易就被英军击溃了。这一战中菲力普头上受了箭伤，他的坐骑也中了箭。海纳德伯爵劝他离开战场。他骑马回到布洛叶要塞，在那里休息了半夜之后，才又前往亚眠，于拂晓到达。

到8月27日上午，当最后一批法军都已被击退之后，爱德华才允许他的部下解散行列，去搜劫死人身上的财物。这时才发现被杀的人中有波希米亚国王、洛林公爵和弗兰德以下十位伯爵，以及1,542名骑士，普通士兵可能在一万人以上。英军的损失据报非常轻微，共为两位骑士、一位乡绅、四十多名士兵和几十名威尔士人而已（这个数字当然不可靠）。

8月28日星期一，爱德华从克勒西前进到蒙特埃尔，从那里又安闲的进入了加来，9月4日他到达该地城外。这个要塞有两道城墙和一道护城河围着，所以无法进攻，于是爱德华决定在向陆地的方面将其包围，因为他是海峡的主人，所以又可以从海上加以封锁，除非有外力解围，否则这个要塞的沦陷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此时的法王菲力普，似乎因为战败而灰心，在六个月之内毫无行动。更使他精神颓丧的是苏格兰国王大卫，因为支援他而入侵英格兰，并已经前进到了杜汉，可是在1346年10月17日，却在“内维里路口”受到了决定性挫败，并且本人也被俘了。直到1347年6月，诺曼底公爵才在战场上出现，于7月27日向加来前进。但是当他发现爱德华太强大了，于是不敢进攻，六天后自动退去。8月4日，戴维尼开城投降了。9月28日，双方同盟国之间签订了一个休战条约，有效期到1348年7月9日为止。10月12日爱德华返回英国。

加来是这个战役的惟一战略性收获，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也是整个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惟一收获。它的确是一个重要收获，正好像以后的直布罗陀对英国一样。爱德华一方面使它变成了一个坚强堡垒，另一方面也使它成了一个高度运转的商业中心，因为他命令所有英国输入欧洲大陆的货物，必须经过加来。这个要塞不仅使他和他的后代在法国获得了一个桥头堡，而且正如罗特斯雷将军指出的那样，在蒸汽船尚未发明之前，只要能坚守加来，就可以使英格兰永远免除被入侵的危险。这个要塞保留在英国人手中达两百年以上，直到1558年1月8日被格斯公爵攻陷，于是英国才再次面临一连串的入侵威胁，于是只不过三十年之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出现就使之成为现实了。

不过克勒西一战对战争的最大影响还是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军事强国。从此以后，英格兰的国威上升到了如此高度，使英国人必须永远加以保持，不敢丧失。正如阿曼爵士所说，英吉利人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胜利，在欧洲大陆上很少有人注意。而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所指挥的法兰西战争，也根本上未能使他们获得些许荣誉。但克勒西之战却是一个启示，不仅对法国人如此，对英国人也一样。法国是被它打晕了，而英格兰却被它灌醉了。所以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是它成了百年战争的精神基础，战争将会一直拖下去，直到另一次精神上的“惨败”出现后，才使它结束。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巨大会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检讨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战争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乏军事上的新发明，甚至于像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经开始设想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问题了。可是在火炮尚未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主要是如何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当要塞问题已经被解决之后，如何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注：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文纳的血战中，加斯顿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这一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是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出价值。这种新兵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一个楔形的架子上发射。它的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表演，证明火枪兵在开阔地中也有独立战斗的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变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非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兵为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兵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之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兵，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王子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长方形的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他们角上。但是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他们的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来保护火枪兵，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遂大受限制，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的使用。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的火力，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这些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面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一个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个时期，其他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些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招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当他们接受了一次战争合约之后，一般兵员都是临时招募，对种族和宗教的界限都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要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就行了，当他们被俘或是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招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较，通常只能算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同等重要。正如切凡特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遍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手中。任何个人都没有这样大的财力来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兵，所以只有国家才能担负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专利，而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经大众化，这种发展实为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所表现出来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都已经普遍仿效西班牙的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所要对付的也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为瑞典国王查理士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他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反对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了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斯承继了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了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正如许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这正好比亚历山大对于罗马人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普在他的《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像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是那样不怕死，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于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一个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却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是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介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一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便利而牺牲他的主义。他很善于选择他的部下，他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纳沙的莫里西欧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了本国语言以外，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他的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今以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曾经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人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观念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经常具有战争的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为什么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青年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他们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曾经说过：

“他不仅使他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以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他坚持所有的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自古以来，他也是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兵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以他的统帅才能而论，切门尼兹对此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时，以及用野战工事来增强他的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拟。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又善于猜测敌人的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他的兵力，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兵器。”

另外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下述评论：他一向都是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于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力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赶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创立了一个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一个兵种，合并他们的战术，而且他更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他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落伍了，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的制度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白地认识到最具优势的兵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将他们的长矛从十六英尺削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他们的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兵混合在一起以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个火枪兵和54个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在每个单位中，都是左右翼为火枪兵，而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的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来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前者只有部分装甲，而后者为骑马步兵。前者在中队组织中，所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冲锋，而不是用跑步，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他们的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

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则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他的骑兵放在步兵的两翼，但他也常把骑兵摆在每一条步兵横线的后面，并且时常把火枪兵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把敌人的散兵线驱退之后，他们就退回好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度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的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为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注：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为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可以算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能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也减少了口径的种类，他一共采用了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者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注：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所谓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着，使他们在在一个火枪兵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中，他们恰好可以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所用的是有良好设备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一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一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内法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斯特森，是一个卓越的军人，在1630年还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个战争的本质有明白的了解，因为此时他写信给他的首相阿谢罗森·阿斯提拉说：“欧洲的一切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个单独的战争。”

四年以前（1624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高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个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已经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斯塔尔沙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之间休战之后，就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海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往斯塔尔森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当1628年10月法国的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一个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的援助。他的计划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人的工具。他希望这个战争不是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应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去，就是前进到奥德河上，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现在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他知道由于统治手段的暴虐，华伦斯坦的身份已经跌价了；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斯道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了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斯拉夫向他投降。于是再进入梅克伦堡，使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在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兵力去协助防守该地。

当他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个艰巨的工作。比起他的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注：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则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的团结，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能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清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数小国，原因之一就是莱茵河以东，本来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的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领土。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伯河、威塞尔河又都

流过新教的地区入海，而这个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人却已经与瑞典人签订了一个条约。1631年1月23日，这个《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它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人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中每年再付给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土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提内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德堡。为了牵制前者，古斯塔夫进到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于4月13日将其占领，但是提内却很狡猾，并不尾随他前进，而是直接向马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德堡，但他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土，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兵力又可打击他的背面，费了许多口舌他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是占领库斯特恩以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了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动，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德堡听天由命。

提内率领二万五千人到达了马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都葬身烈焰之中。（注：该城被毁并非故意，因为提内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于是古斯塔夫也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他的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希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提内的进攻。这一战却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提内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两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上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有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提内想撤退已经不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的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已是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提内出战。他派了一个使者向提内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提内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提内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一个在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阵地，在左方有一个小高地，上面即为布雷顿福德村，而右面是斯顿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的地理记载，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平原，布满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提内是一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一个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士·格兰特对他有下述形容：“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长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为由一线或两线的步兵所组成。一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所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的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则由福斯登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一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置在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面。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间，他在他的旅行车中通宵与约翰·赫普伯格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中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的火光，那就是提内的阵地。在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半旅，这样使火枪兵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关于后者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的：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着赫普伯格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为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充任预备队。在右翼方面，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所组成，中间夹着火枪兵，另有一个骑兵团供支援用。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在左翼方面，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兵，第二线为两个步兵团。团属的火炮都分别位置在各旅团的前面。而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的正前方，由托斯特森指

挥。在霍恩元帅的左面即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而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的记载上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一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会战开始了，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轰轰打了两个半小时之久。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像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经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觉到他们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提内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个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兵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一直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逐退，在最后一次时，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逐出战场之外。（注：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只使用手枪，等到敌军的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发生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的右翼方面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于是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他的马，向艾伦堡飞逃。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被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提内也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马上就不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掩护，而且受到了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他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又命令福斯登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提内就不能稳操胜算了。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兵力来应付提内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了魏特森和赫普伯格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过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提内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他们，打击在提内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斯特森也调转了预备队的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却已成为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列。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的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东西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遗留下来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员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已经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尔斯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里才放弃了他的追击。

这次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可算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这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粉碎了，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一个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迪勒尔教授说这是“归还救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西比”。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的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作一个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是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则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了。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是很有远见的，他说：

“总结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的宗教和政治制度的一个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固体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提内过去曾经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的智慧来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主义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莫不如此。”

在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后，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

纳，而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而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是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同。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它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要到了。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他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忱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上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亨为基地，并获得了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他的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于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第五，是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在占领了巴拉亨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日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连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了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吴兹堡，推进到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再进到梅兹，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的一切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日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沙提亚、下巴拉亨和科隆等地，都已经站稳了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个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的制度，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而已。

怀着这种观念，1632年春天，古斯塔夫又向提内挑战。后者自从在布雷顿福德战败之后，又已招募了一支新军，此外洛林公爵也率领12,000人与他会合，使总兵力达到四万余人。古斯塔夫在多瑙华尔斯渡过了多瑙河，并在李赫河上与敌人遭遇。在烟雾掩护和炮轰之下，他在河上架了桥，于4月16日击败提内，提内负了重伤，十四天后去世了。

自从罢免华伦斯坦之后，斐迪南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在提内惨败之后，他就更想启用他了，因为尽管事实上他很害怕这位凶恶的魔王，但却找不到另外的人选。这个人的眼光是超越时代的。华伦斯坦的目的，很明显是想使这个帝国在一个虚名的王室下统一起来，而由他自己任首相，总揽一切。所以他认为宗教纠纷必须停止，容忍之道必须请求，为了相忍为国起见，只有用金钱贿赂为唯一有效的工具。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计算为根据。他是一个占星家，一个生意人，毫无道德和慈悲心，累积了大量财富。他的态度沉静、含蓄、神秘，没有人敢问他。他是快要启蒙的权力时代的标准产物，这样的人在以后的时代中，可以做一个工业或银行大王，受到万人景仰。

失望之余，斐迪南只好向他求教，华伦斯坦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对军队应有绝对和无条件的控制权，皇帝对他应完全信赖，不得他的同意不准下任何命令，一切被充公没收的领土都由他控制，加速取消“归还敕令”，他还还要有一个选帝侯的头衔。这些条件全部被皇帝接受了，于是这位捷克人才又以“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将军”的头衔再度出山了。

华伦斯坦的第一个行动是争取萨克森的约翰·乔治，第二个行动则为动摇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的信心。但是他都未获成功，于是在1632年4月，他开始进兵波希米亚，这本来是在萨克森人占领之中。他攻占了布拉格，强迫萨克森人撤退，6月27日，又与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会合，总兵力增至六万人。他前进到安堡，并在纽马克与瑞典人发生了冲突。古斯塔夫撤往纽伦堡。华伦斯坦跟踪追击，于7月16日，到达弗斯，就在附近掘壕安营。

两军对峙达几个星期之久，整个日尔曼和欧洲都在焦急和期待中等待消息。9月4日，由于缺乏补给，古斯塔夫向敌方阵地发动了一次突袭，结果被击退并损失了三千人左右。十四天后，因为军中患病人数已有数千之多，所以古斯塔夫放弃了对峙，决定向维也纳进军，以吸引华伦斯坦离开萨克森，可是后者却看透了他们的计划，不但不随着他走，反而直趋萨克森，而马克西米利安则率领骑兵的剩余部分，去防御巴伐利亚。接着，华伦斯坦也派人去通知霍克和帕本海姆——他们正留在威赛尔河上——与他会合在一起，意图为集中兵力对付萨克森，而使约翰·乔治退出战争。

这个企图马上就变得很明显了，于是约翰·乔治拼命向古斯塔夫求援。瑞典国王此时本已在途中，10月22日又回到了纽伦堡。11月2日，萨克斯-魏玛的伯恩哈德也在安斯塔德与他会合，11月8日他占领了南门堡的柯森隘路。他在那里又催促约翰·乔治——他的军队正留在托尔高——率领所有一切能动用的兵力来与他会合。

此时，莱比锡已经为霍克占领，因为冬季将临，华伦斯坦假定古斯塔夫也一定会暂时休战，所以就决定在吕岑周围宿营过冬。为了避免人数过于拥挤，他又派帕本海姆与他的骑兵去

占领哈里。虽然此前华伦斯坦的防御战略似乎都比对方略高一筹，可是面对着古斯塔夫这样一位勇将，分散自己的兵力未免是个冒险的决定，11月14日古斯塔夫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就决定设法使敌人接受会战，尽管他在数量上还是居于劣势。

11月15日上午一点，他出发往帕高，以求与萨克森人会师。他在那里停留了四小时，但还没有听到萨克森军的消息，于是他继续向吕岑前进，希望能对兵力仍在分散状态中的敌人作一次奇袭。但是道路太坏，使他的行动大大延迟。在李巴赫与一部分敌军遭遇，经过一番激战才把他们打散。那天夜间，他宿营的地方距离敌军有一英里左右。他举行了一个战争会议，克尼法森主张迂回，伯恩哈德主张攻击，但是古斯塔夫却已经立下决心。他说：现在骰子已经掷下，不能放过华伦斯坦而不攻击。

在敌方营地，华伦斯坦正在患了脚气，必须用轿子抬着走。他整夜都忙于设防，因为他希望尽量避免战斗。11月16日上午2时，他知道古斯塔夫的部队已经逼近，才派人去送一个紧急命令给帕本海姆，他说：敌人已经接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丢开，率领你的部队和炮兵赶紧回来。你明天上午必须要到达此地，因为敌人已经越过了李巴赫隘路。

两军现在对峙着的吕岑平原，是低而且平，从西南到东北，中间有一条莱比锡大路贯穿，这条道路的路基较高，两面都有沟道；在吕岑以东约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条曲折的小溪，叫作弗罗斯格拉本，有许多地方都是可以徒涉的。华伦斯坦还是想象在纽伦堡一样，只打一个纯粹防御性的会战，所以他在莱比锡大路北面不远的地方对兵力作一线展开。他的右翼倚托在吕岑城北一个小高地上，这上面有几个磨坊。他的左翼则直达那条溪流。他把沿着大路的沟道，改掘成为战壕，把火枪兵放在它里面。他的兵力确数已不可考，可能为25,000人，但帕本海姆的8,000人尚不计算在内。他把全军分为中央、右翼、左翼三个部分。中央部分由四个步兵大“方阵”组成，由他自己指挥。右翼由柯罗里多指挥，左翼由皮科洛米尼指挥，都是骑兵。他也守着吕岑城，这个城已被他纵火焚毁，他的火炮约为60门到66门，分为两群，一在右翼前方，一在中央右端前方。

古斯塔夫于拂晓时开始进攻，但大约在8点钟时，突然起了浓雾，所以只好被迫停止。他就乘机向部下训话。他的目的是切断华伦斯坦与莱比锡间的联系，这不仅可以让他丧失基地，而且也使约翰·乔治可以自由使用这条道路，这支兵力是他所昼夜企望的。他的兵力可能为18,000人，分为二线，大致区分如下：中央两线的兵力都是四旅半步兵，分别由布拉赫伯爵和克尼法森指挥。在两翼方面为骑兵，队形与布雷顿福德会战相同。他自己指挥右翼，伯恩哈德指挥左翼，在中央后方只有一个骑兵预备队，由欧姆上校指挥。在步兵前方摆开了26门重炮。至于40门团属火炮则分布在火枪兵前面。

根据当时参战的弗利伍德的记载，战斗情形如下：当雾消去之后，炮兵就开始发射，敌方马上就加以还击。本来天气已经晴朗，部队在10点钟左右开始前进，可是马上又起大雾，彼此间几乎都看不清楚了。就在那个极短的清朗期间，古斯塔夫率领右翼的骑兵向前冲锋。他被战壕中的敌方火枪兵击伤，他自己的手臂和坐骑的颈部都被射穿，但他仍不肯后退。于是跳过壕沟，直向敌军冲去。（注：当时，主将亲自进行白刃战的风气还很流行，这样负伤战死的人也很多。）

他击散了华伦斯坦的火枪兵，击溃了一部分克罗提骑兵，并把皮科洛米尼的重骑兵也驱退了。此时，伯恩哈德也率领左翼前进，逐退了柯罗里多的骑兵。中央的步兵也前进，并夺获了华伦斯坦的中央炮位，但不久又退回了。

由于大雾的原因，关于这一个阶段的战斗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报导。很明显，当古斯塔夫听说他的中央部队已经撤退，就率领一团骑兵赶往接应。在大雾中与他部下分开了，他带着三个护卫人员冲入敌方一群骑兵之中，他的头部和身上都中了弹，立即毙命；两个护卫人员被敌人砍倒，但有一个人逃走了。

古斯塔夫的阵亡，不但没有使他的部下丧失士气，反而激发了狂热的报仇心理。他们现在改由伯恩哈德指挥，继续进攻。此时，帕本海姆也赶到了，他打击在瑞典军的右翼上，又把他们逐回到原有位置。正当此时，帕本海姆也阵亡了，于是会战变成了混战。国王的遗体被抢回了，华伦斯坦的火炮曾经失而复得达两次之多。最后，瑞典军不惜牺牲，拼命苦战，于是帝国军终被击溃，当夜幕将垂时，战场上已经没有敌人了。瑞典军并未追击，损失也无确实估计。弗利伍德说帝国军被杀者约为三四千人，而瑞典军约为一千五百人。同时他这样感慨说：“如果上帝愿意让他（古斯塔夫）今天不死，那么我确信他必可使日尔曼境内的一切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这的确是很可能的，金德里在他的《三十年战争史》中说：“这是绝对可能的，他是可以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在日尔曼建立一个国家，使该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步，提前一百年以

上。”布莱斯也说：“在四个战役之中，他毁灭了皇帝的陆军和威望，蹂躏了他的土地，用空了他的国库，使他的力量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即使今后再获成功，也还是无法挽回这个颓势。”正与亚历山大一样，古斯塔夫也是大业尚未完成就死了。他遗留下来的任务太伟大了，使他的后继者担负不起。如果不是黎塞留的煽动，那么战争可能就此结束。帝国已经崩溃了，华伦斯坦的信用也破产了，终于在1634年被刺身死。但是由于法国人尚未获得莱茵河西岸的控制权，所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黎塞留继续鼓动战争，劝说所有各国应以全面和平为目标，并且说个别的解决是既无利可图而又不可靠，这样他就逐渐使哈布斯堡的诸侯将他们的势力消磨殆尽了，并收回了二十年来法国因为不协和无能而丧失了的土地。话虽如此，黎塞留虽然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却并不是战略家，他从来没有认清战争是一种艺术。

1634年9月6日的诺德林根会战是另一个转折点。在这一战中，伯恩哈德遭受到决定性挫败。到了次年春天，整个日尔曼南部又重新归入皇帝手中。1635年5月30日，皇帝与约翰·乔治之间签订了布拉格和约，于是同盟也解散了。

因为在法国支持之下，瑞典不肯承认这个和约，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侵入和征服——一面为法国和瑞典，另一面奥地利和西班牙。前者的目的是一贯的，就是拆散哈布斯堡包围圈。现在一切理想都已消灭，包括斐迪南的、古斯塔夫的和华伦斯坦的都在内。战争现在变得更为野蛮，也变成了波旁王室对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战争，完全是一种权力之争。农民叛变了，只有军人才能活命，一大群挨饿的妇孺跟在军队后面，好像尾巴一样。（金德里曾举了一个例证：一支38,000人的军队，却有127,000人的妇女、小孩和其他随营人员。）战火差不多一直烧到了巴黎的城门口，使居民都惊惧不已。战斗互有胜负，而整个地区却已人烟绝灭。慢慢地大家开始厌战了，于是才又有一线和平的曙光出现。

斐迪南二世死于1637年2月15日。他的遗嘱希望他的国家从此永不分裂，这样就建立了奥地利王朝。法兰西王朝的创立者黎塞留也在1642年12月5日逝世。接着路易十三也在1643年5月4日逝世，继承人为路易十四，他出生于1638年。十四天后就发生了罗克洛伊会战，西班牙式的军事制度也随之告终。托斯特森为当时的名将，于1645年3月6日赢得了约考的会战，于是萨克森与瑞典之间才建立和平关系。三十年战争在1648年秋季以瑞典人对布拉格的围攻为结束。

冲突无法继续下去，因为斐迪南三世（1637-1657年）已经不再能抵抗法国的压迫，他的帝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郊，不再能供养他的军队。和谈早已开始，1648年10月24日，帝国与法国和瑞典之间都分别签订了和约。这个条约就称为西伐里亚和约，在以后一个半世纪中，这些欧洲国家都能继续维持正常关系，经过轻微的修改，它一直维持到1789年为止。

根据这个和约，加尔文派取得了与路德派的同等地位，并且规定1624年元旦为一切宗教纠纷总解决之日。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于是所谓“宗教改革”获得了合法依据。（注：不过宗教改革的原有意义已经完全丧失了，新教已经不再是一种宗教，而变成了一种政治制度。）罗马的宗主权被取消了，所谓基督世界的瓦解已成定局。欧洲的地图也要重画了。上巴拉亭归并了巴伐利亚，下巴拉亭则由腓特烈之子查理·路易所有。勃兰登堡获得了哈贝斯塔特、明登、坎明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典则分得了上波美拉尼亚、布里门、费尔登、梅克伦堡、斯特丁和鲁根岛。萨克森保留着鲁沙提亚和马德堡的一部分。瑞士共和国和联合省都独立了。法国现在变成了欧洲和平的公敌，获得了上下阿尔萨斯、梅兹、托尔、凡尔登等地。日尔曼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国，在这些国里又产生了农奴制，而迷信变得十分猖獗，许多被指控为巫师的人都被烧死。学校都已被毁灭，教育、文学和艺术备受摧残。早在1648年以前，整个国家就已变成了野蛮的世界。

日尔曼市民有秩序和繁荣的生活都被毁灭了，他们的家庭妇女被拖在佣兵式军队的后面做尾巴，一半像妓女，一半像吉卜赛人。

1880年，德国驻伦敦的大使哈兹费德亲王向格兰维里勋爵说：“德国在三十年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损失，至今仍未恢复，所以德国政策的重点应为阻止这种类似的灾难再发生。”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个国家所受到的损毁程度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连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也不足以比拟。据说人民死亡总数为八百万人，此外在战场上被杀死者为三十五万人。在屠林吉亚有某一个地区，1618年，在十九个村落中共有房屋1717栋，而到了1649年只剩下了627栋了。本来一共有1773户家庭，现在只剩下了316户，占有这627栋房屋。在同一地区中，本有牛1402头，现在只剩下了244头；本有羊4616头，现在一头都没有了。在波希米亚，原有三万五千个村落，只有六个幸存；人口由二百万人减到了七十万人。在亨尼堡一地，人民死亡了百分之七十五，牲口死亡了百分之八十，房屋毁灭了百分之八十。而愈是富饶的地区，则损失也就愈重。

西伐里亚和约为历史上的主要里程碑之一。哈布斯堡王室开始转向东发展，一代人之后，

奥斯曼帝国开始缩小了，他们向多瑙河上去补偿在莱茵河上的损失，瑞典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国，直到1709年波尔塔瓦会战后才开始衰颓，日尔曼的领导权移到了霍亨佐伦家室的手中。由于日尔曼的分裂使法国的安全大为增加，于是继续与西班牙交战。此时，在北方又有两个新强国兴起，联合省变成了一个发展中的商业帝国；此外还有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格兰。当西伐里亚条约签字的墨汁未干之际，英王查理一世的人头就已经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刽子手的笼中打滚。这是平民阶级向天授王权挑战的开始。

## 纳斯比会战

---

当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他的王旗时，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大致上都是拥护他的，至于南部和东部则大都拥护国会。（注：英国人口此时约为五百万人，其中伦敦就占了三十五万。）英国民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拥护国王的；拥护国会的；还有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态度但希望双方的斗争不要扰乱他们的生活。最后一部分人最多。

制造业中心、海港和大城镇——最重要的是伦敦——大部分都属于清教徒，所以在物资和财力两方面，都是国会占优势。也可以说金钱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要从平民中召募军队并不困难，可是这些人多半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才当兵。此外，由于海军反对查理，所以国会能够获得海岸控制权，并且在这些港口中获得关税收入，每年在250,000镑以上。

在领导能力方面，最初无疑是查理方面占了优势，虽然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缺乏人力并不太重要，因为双方都是乌合之众，谈不上有组织。但是由于缺乏船只和金钱，使查理与法国和荷兰之间的交通以及从海外购买军需物资的渠道都不畅通。所以，制海权对于他的最后失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如此，因在战争初期国会方面采取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引发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了时间，而军事措施也都不彻底，所以这种优势大部分都被抵销了。

查理在诺丁汉召集兵力，并任命林德塞公爵为统帅，这是一位六十九岁衰老无能的将领。而叛军——号称圆颅党——则集中在北安普顿，由埃塞克斯公爵任统帅。双方都感到缺乏金钱，不能按时发饷，所以部队纪律废弛，逃亡者很多。武器和弹药也都不够用，一切工作都无效率可言。一方面是纷纷要求人马的补充；另一方面是允许军官们自由招募新部队，而已有的旧部队则任其自行消失。强迫拉夫和征用物资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最后。双方军队都算不上是有组织的战斗力。在这种环境中，突然上帝为查理送来一位救星——鲁普特亲王（1619—1682年）和他的兄弟莫里斯从荷兰来到英国。

鲁普特是那个不幸的巴拉丁选帝侯的第三个儿子，所以也是查理的外甥，虽然只有二十三岁，却早已是个有经验的老兵，因为他从十四岁起就一直参与丹麦和日尔曼境内的战争。到英国之后，查理就命令他指挥骑兵，并很聪明的决定他与林德塞保持相互独立的关系。这个人有无限的勇气，头脑顽固，性情活泼而暴躁。他对科学和炮兵也很有研究，不仅是一个好军人同时也是一个好海员。他穿着猩红色上衣，镶着银边，骑着黑马，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只猴子和一头白色哈巴狗。

对王党而言，鲁普特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领袖人物，他能给予他们精神鼓励，正像以后的姆拉特一样，他是一个杰出骑兵将领，采用古斯塔夫式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向敌人冲去。虽然他比克伦威尔略为逊色，但在内战开始时，一切环境却都与克伦威尔的成名时期有很大差别。和克伦威尔不同，鲁普特并没有时间来训练他的部队——其中多数都是青年和头脑呆板的骑士。要指挥他们可说十分困难，在冲锋时要想掌握他们就更不可能，这正好比滑铁卢之战中的情形。这些人是训练不足而热心有余，所以鲁普特采取的战术就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对着组织尚不够坚强的敌人进行旋风式的攻击。一时他的名声大振，使圆颅党望而生畏，好象当年西班牙人看到追克一样。正如华尔维克爵士在剑桥近代史中所评论的：“他使国王的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如果他的谨慎能与勇敢相称，那么一定会战无不胜。”

虽然这个战争的战略很复杂，但双方的战略目标却十分单纯。对国会而言，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坚守伦敦，这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基地。其次，为了使他们的叛乱合法化，就必须俘虏国王，因为不利用国王的权威，他们的行为在人民眼中看来总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埃塞克斯

所得到的命令就是：“救出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人，以免他们受失意分子利用。”反之，王党的目标就是要攻占伦敦，因为这是叛乱的中心。可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既不能用封锁的手段——因为查理没有舰队；又不能靠围攻——因为查理又缺乏攻城部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引诱圆颅党离开伦敦城，在野战中将他们击碎，再趁他们失败颓丧之际，一鼓作气冲入城中，不让他们有设防守城的机会。

要执行这种战略，查理需要更多兵力。可是他现在在诺丁汉只有一万人，而埃塞克斯在北安普顿却有两万人。所以查理决定向西移动，前进到谢里威萨布尼和威尔士的边界，那里的人民都是拥护他的，所以可能招募更多兵力来对抗埃塞克斯。为了训练和组织起见，他可能要稍息一下，接着就准备迅速直扑伦敦，在途中击败埃塞克斯，并希望他的失败能够刺激城内的王党起事，于是里应外合攻克该城。这虽然是个赌博，但却并非毫无希望。

9月13日，查理从诺丁汉拔营启程，向谢里威萨布尼进发，并于9月20日到达该地。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夺占了切斯特，这个地方控制着到威尔士的道路——这是他最理想的招募地区——并且从那里又可以与爱尔兰取得接触。因为行动诡密，使埃塞克斯一时不知所措，直到9月19日，他才开始向沃彻斯特进发，目的是想使他自己处在谢里威萨布尼与伦敦之间以掩护伦敦。在全国各地区都已有战斗爆发，朴茨茅斯也被国王的军队占领。

查理于10月12日从谢里威萨布尼出发，经过布雷德诺斯、伯明翰和肯尼沃思等地前进。他的意图是想迂回埃塞克斯的北面侧翼，然后再一直前进到他后面，切断他与伦敦的联系。国王的前进使国会大为震惊，于是一再命令埃塞克斯设法使国王接受会战。同时，在伦敦城中经过训练的兵力，都集中起来由华尔维克公爵指挥，开始准备守城。埃塞克斯转向东面，费尽心思以求与查理接触，于10月22日，到达肯宁顿。此时，国王正在埃德科特，在他东面相距约7英里。

10月23日就发生了埃吉山之战。虽然战斗颇为激烈，但却不具有决定性，但是当埃塞克斯退向华尔维克和考文垂时，查理与伦敦之间就已经没有障碍物了。但是他的陆军已经解体，弹药都已用尽，所以在他尚未建立一个基地之前是不可能向前再推进的。因此他决定前进到牛津，于10月29日到达。到了之后他又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应该宿营过冬还是继续前进。最后由于受鲁普特的催促，才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已经损失了许多时间，所以埃塞克斯已经可以取道圣阿尔班，赶在他的前面先到了伦敦。

11月12日，鲁普特把叛军的前哨赶出了布伦福特，第二天在特恩汉森林与埃塞克斯的主力遭遇。因为双方兵力的对比为二比一，使查理觉得对一个已经掘好工事的敌人发动进攻所冒的危险实在太大了。所以在经过短暂的炮战之后，查理仍然返回牛津，以后在整个战争中，牛津一直都是他的司令部。

因为伦敦具有如此重大价值，所以查理决定进行另外一次夺取该城的尝试。他的计划是集中两支辅助军队与自己在牛津的兵力会合：一支由新堡公爵指挥，位于约克；另一支由霍普顿爵士指挥，位于康沃尔。等三支兵力都准备周全之后，就以牛津的部队取道泰晤士河谷前进到伦敦；而那两支兵力也分别由南北两面会师城下，这两支兵力封锁泰晤士河上的一切船只，而国王的陆军则切断伦敦的陆上补给。

理论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计划，但是凭查理率领的这种乌合之众却实在不合适。局部地区的征兵都不愿离开家乡，因为害怕离去之后家乡会遭到敌人蹂躏。进一步说，因为圆颅党在霍尔和朴里茅斯都占有坚强阵地，所以那两支兵力如果向伦敦进发，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掩护他们自己的家乡，除非他们能够先行解决敌人，否则难免后顾之忧。

正讨论这个计划时，王后也已经荷兰回来。在1643年上半年，全国之内到处都有局部性的战争。7月26日，鲁普特攻下了布里斯托尔，这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这也使查理的威望上升到最高点。

于是向伦敦发动三面攻击的机会似乎已经成熟。可是正当开始行动之际，新堡公爵的部下却因为霍尔仍在国会军手中而不肯南行；同时霍普顿的人员也坚持必须等到朴里茅斯攻下之后再向东进军。威尔士人对格罗切斯特仍有国会军驻守也感到不放心，因为这里也威胁到南威尔士的王党。现在查理既然无法向伦敦进攻，所以决定先攻取格罗切斯特。8月10日他开始围攻该城。埃塞克斯奉派赴援。

9月5日，当埃塞克斯接近格罗切斯特时，查理解围转移到科特斯伍兹的阵地，在那里由于受到敌军迂回，又退到纽布格。9月20日，双方发生激战，如果第二天查理再继续压迫，那么埃塞克斯就可能会被击败，他与伦敦的联络也会被切断。可是查理却于当夜退回了牛津，从此伦敦不再受到威胁。

正当查理忙于作战时，议会却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自从1640年以来，反对党领袖与苏格

兰人之间一直暗中勾结。现在两院决定采取积极行动，派代表前往苏格兰去寻求军事援助。8月7日国会的代表团到达莱斯。

詹姆斯·格拉海姆，即蒙托斯侯爵，是苏格兰的王党领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赶往格罗切斯特城下的国王营中。他劝说查理允许他集合在苏格兰境内忠于王室的兵力抢先发动攻击。但是查理却拘于小节，认为这并不合法，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代表团在莱斯提出签订一个政治同盟的建议时，苏格兰人拒不接受，相反，他们却主张建立一个与1638年相似的宗教条约，国会代表却马上加以接受。这就是说取消主教制度，使英格兰教会改走苏格兰教会的路线。进一步说，也等于要毁灭在爱尔兰的天主教。

九月初这个协定完成了，9月25日，神圣集会和英国的众议院都宣誓接受，所以违反了多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愿望，长老会在王国中成为国教，为了酬报如此巨大的让步，苏格兰人同意派一支部队去帮助英国国会，而一切维持费仍由国会担负。

这个条约从两方面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一）它使国会赢得了第一次内战，（二）它在宗教方面引起了所谓独立主义者，主张各教会应有自治权（即宗教中的民主制度），结果造成了国会与陆军之间的裂痕。这又导致第二次内战，使国王被杀，并建立了克伦威尔的护国制。

1644年1月19日，苏格兰军共有步兵18,000人和骑兵3,000人，由列文指挥，渡过了特维德河。为了封锁其进路起见，新堡公爵立即赶往北方以增援新堡的王党兵力。他指挥的部队，步兵不多于五千人，骑兵不多于三千人。4月11日，在约克夏指挥国会军的费尔法克斯勋爵父子向希尔拜进攻。因为害怕腹背受敌，新堡公爵自动撤回，4月18日进入约克城防守。列文接踵追来，4月20日与费尔法克斯父子在塔德卡斯特会合，不久即开始围攻约克城。6月2日，他们又与曼彻斯特公爵所率领的东部同盟部队（约一万人）会合。

查理在牛津感觉到如果约克城沦陷，那么整个北方也就完了。所以他必须援救约克城。于是只好从南方抽调兵力去增援在谢里威萨布尼的鲁普特，并派他去解救约克之围，这样做也就等于不惜使牛津丧失，因为埃塞克斯正在阿里斯布里，而华勒尔也在法恩海姆。查理决心冒险，5月16日，鲁普特从谢里威萨布尼北上。2月13日，蒙托斯侯爵也已奉派为英王在苏格兰的副将，此时率领了一支小部队，越过边界以分散敌军兵力。

虽然新堡公爵认为会战是不利的，但是鲁普特却性如烈火，他在7月2日前进到了马斯顿荒原，面对国会军和苏格兰军展开了他的部队。敌军位于托克维兹与长马斯顿之间。双方都各有骑兵约7,000人，但王党步兵仅11,000人，处于一对二的劣势。

上午五时开始会战，结果是王军大败，主要原因是国会军的左翼骑兵在克伦威尔指挥之下进行了很巧妙的运动。在这次战争中这是最大的一次会战，对查理而言是一个最大的灾难。新堡公爵放弃了一切希望，辗转逃往欧洲大陆。鲁普特收集了六千余名残余骑兵，退往里奇蒙，从那里再回到兰开斯特。7月16日，约克城投降了，两天以后，王后从法尔茅斯前往法国，从此与国王遂成永别。

现在战争的命运操在国会党手中，因为他们只要把费尔法克斯和列文的兵力向南推进与正在牛津附近的埃塞克斯与华勒尔的兵力会合，就可以围捕查理了。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北方的三支兵力却分散了；列文去围攻新堡城；曼彻斯特回到林可谢尔，费尔法克斯出发削平在约克夏境内的其他王党据点。在南方，华勒尔的部队大部分由民兵组成，开始自动解散了；而埃塞克斯进入了康沃尔，于8月间在弗威被困。9月2日，他的步兵都被迫投降了。虽然如此，对于国会方面而言，马斯顿荒原会战在这次战争中依然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最重要的是它使一位英雄人物出头了。他就是奥利佛·克伦威尔。

克伦威尔出生于1599年4月25日，祖先亦为贵族，他在1640年被选为剑桥的议员，战争爆发时被任命为第67骑兵队的队长。在马斯顿战役之后，鲁普特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作“铁甲”，这个绰号是很适合的，等到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他的整个部队也都号称“铁骑”了。他的出身和教育都是非军事性的，克伦威尔从未受过战争训练。虽然如此，他却具有罕见的指挥能力和决断意识，这都不是可以通过学习得到的。而且当他投笔从戎之时，他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他有许多亲属与他合作，使他能以自己为核心组成一个克伦威尔系统的军事集团。他的儿子奥利佛是第8骑兵队的指挥官；他的未来女婿伊尔顿是第58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约翰·哈姆佩顿是第20步兵团的团长；他的妻舅瓦尔顿是第73骑兵队的队长；他的表兄弟瓦列是第6骑兵队的掌旗官；他的邻居曼德维里勋爵，就是未来的曼彻斯特公爵，是第10步兵团的团长。在克伦威尔的精神领导之下，这个集团发生了联合的观念。正因为如此，在1642年12月12日（埃吉山之战前夕），国会才通过组织地方防御同盟。于是才成立了东部联防军，包括诺弗克，苏弗克，埃塞克斯，哈特福德谢尔，亨廷顿和林肯等县，而以剑桥为核心——克伦威尔就

是剑桥的国会代表。这个同盟以后变成了国会军的骨干。

克伦威尔虽然在精神上是这个同盟的缔造者，但他在第二天是否参加了埃吉山之战却已不可考，不过大约是在此时，他曾经与哈姆佩顿进行过一次值得追忆的谈话。十五年后他在他的第二次国会致词时还曾经提到它。他说：“当我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军队几乎到处在失败。我就对哈姆佩顿说：你的部队都是些残兵败卒，而敌人的部队都是绅士出身的青年人。你想这些卑微的人在精神上敢向那些具有荣誉、勇气和决心的绅士们挑战么？所以你首先应使部队具有精神，否则失败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他的伟大观念，如果没有用纪律约束的群众，那么再卓越的领导能力也毫无用处；而所谓纪律，不仅要求官兵应该知道他们是为为什么而战，而且还要对“他们所知道的事情产生热爱”，因为没有热情则纪律还是会落空。所以他告诉部下应敬畏上帝，激发他们的良知。

1643年1月，克伦威尔回到剑桥，开始对他的部队实行精神教育。3月，他的兵力扩充为一个团，下辖五队，他自己升任团长（上校）。到年底，他的兵力增加到九队以上。巴克斯特说：“他特别注意把有宗教信仰的人吸收到他的部队中去，这些人比一般军人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是为了金钱打仗。”另外有人在1643年5月对他作了下述报导：“克伦威尔上校有二千名勇士，具有良好的纪律。凡是说下流话的都要罚款12便士；酗酒的人都要受禁闭。若是谁喊他们为‘圆颅党’也要受罚。他们到处都受到欢迎。如果所有部队都像他们这样有纪律那该多好呀！”

1643年9月，克伦威尔曾经写了两封有名的书信，也可以说明他心中的想法。他写信给斯普林格爵士说：“我希望你对骑兵队长的人选必须慎重。对骑兵而论，素质要比数量更重要。如果你选择敬畏上帝的人当队长，那么全队中的忠实份子都会追随他。”9月11日，他又写信他的朋友奥利佛说：“我已有了一些可爱的同伴，你应该敬重他们，你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忠诚的基督徒，他们希望把他们当人来使用！”这最后一句话也是克伦威尔在建立纪律时的全部秘诀。

马斯顿会战之后，在1644年11月到1645年2月之间就继之以终归失败的和谈。克伦威尔此时就认为非采取激烈手段不可，否则军事方面难有起色。长老会的领袖曼彻斯特是主张和平的，克伦威尔也主张和平，但却认为应从胜利中寻求和平。当危机加深之后，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愿意接受克伦威尔领导。华勒尔早已向国会报告说，一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军队是永远无法赢得战争的。

克伦威尔决定把将领的问题提到国会中去加以解决，并坚决主张肃清一切政治将军，例如曼彻斯特和埃塞克斯等。这个提议的结果就成为“自动辞职的决议”。所有上下两院的议员都一律免除军政职务。12月19日下院通过了，到1645年4月3日，才勉强为上院所接受。同时在1644年11月23日，国会又决定组成两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委员会以研究改革军制的问题。最后建议成立一支总数22,000人的陆军——其中14,400人为步兵，7,600人为骑兵和龙骑兵——这些人员应有正规的薪饷，费用由遭受战祸最少的地区担负。1月11日，下院通过了这个“新军方案”，2月15日也为上院采纳。不久就成立了一支常备性的国家军队，这是职业化的部队，其纪律则大致依照克伦威尔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仅仅是一种军事革命而已，因为正如哈里森在克伦威尔传中所说：“以铁骑军为骨干而组成的新军，使全国的兵权都归入独立派手中，使之能进行彻底改革。”因为新军不仅是一支军队，而且更是一队“圣经”的战士。“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国会，这个国会比起那个在西斯敏斯特教堂正式开会的国会要更大更坚决，在精神和意志上也更团结。从这时起，革命的动力就已从下院转入军队手中。”

一旦大家同意之后，在克伦威尔的提议下，国会任命小费尔法克斯为总司令，他是一个纯正的军人，完全不带地方色彩，现年只有33岁。在他下面为中将级的骑兵司令，少将参谋长及步兵司令等人。所有将领和军官都经过谨慎选择，但有人却说他们与其是良好的军人，不如说是优秀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完全靠薪饷维持生活，那在当时是很宽裕的。

步兵的招募却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所需数量不过14,400人，但是华勒尔全军只能供应600人，埃塞克斯约3,000人，曼彻斯特约3,500人。所以为了补足缺额，只好采用强征的方式。尽管如此，到1645年5月，步兵总数比应有的编制额还是要少三四千人。他们分编成十二个团，每团十个连，平均120人，又分为78名火枪兵和42名长矛兵，在战斗时列成六个纵深的横队。骑兵的招募似乎比较容易，只需要6,600名骑兵和1,000名龙骑兵（即乘马步兵）。前者分为十一个团，每团为六队，每队100人，其装备为刀剑、两支手枪、一顶钢盔和只有胸背两面的轻甲。龙骑兵只有一个团，共十连，所使用的武器为火枪。他们的正常战斗队形为十列，在战斗时，有一列人负责守马。

炮兵过去一直被忽视，现在也改组了。全军的火炮总数增到了56门，其中有许多都是六、

七英寸口径的，还有少数大到十二英寸——那是攻城用的臼炮。每门火炮配用三个人员，一名炮手，两名弹药手。另外有两团火枪兵保护，但是操作人员却还是和从前一样混杂。纵列中也有少数工兵，不过也还是和现在一样，英国军人一向都不欢喜挖掘工事，但必须围攻时，像1650年对爱丁堡要塞的情形，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就被迫来担负这种工作。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虽然红衣并未首先被认定为制服，但克伦威尔的步兵却早已采用了，以后新军成立后就成为步兵的通用军服，一直沿用到1914年为止。这些人员带有背囊，但无水壶，也有分拆成块的帐幕，主要口粮为面包和干酪。虽然没有野战病院，但却有军法总监和宪兵司令，指挥少数的骑马宪兵以加强军纪和提高士气。体罚是准许的，但不得超过六十鞭，虽然这个部队是由“圣人”组成，但少数犯罪者也还是有的。

这支新军规定只向国王与国会效忠，现在集中在温莎，由斯基彭少将指挥，穿上他们的红衣，开始接受训练。

当新军正在组织成形之时，在牛津的查理正焦急的向两个方向看去：向西为康沃尔，德文，索默斯特和多尔斯特，目的是想在海上建立一个基地，并组成忠于国王的西部同盟以对抗那个忠于国会的东部同盟。向北则为苏格兰，在那里蒙托斯侯爵已获得胜利，使王党的希望增加了。为了执行前一个计划，他派了格林勋爵去围攻陶顿，他于1645年3月11日到达该地，关于后一个计划，国王的军政部长华克爵士曾说那是鲁普特的主意，因为他极想击败苏格兰人，以雪前一年失败的耻辱。

为了准备北方的战役，鲁普特到格罗切斯特等地去强征兵员，而查理则在牛津准备一切，以便与他会合，但是突然一切情形都发生了变化。4月20日，克伦威尔（尚未解职）奉命前进到牛津以西以阻止查理与鲁普特的会合。他在以后七天之内，连续攻下了几个王党的坚强据点，并扫清了骚扰四乡的零星骑兵。不久，国会对陶顿的被围感到恐慌，命令费尔法克斯率领他尚未编训完成的新军约11,000人，从纽布格前进去救援该城。费尔法克斯于4月30日出发，于5月7日到达布南德福德。

克伦威尔的突袭已经使查理丧失了机动性，因为没有挽马，炮兵无法行动。所以查理把鲁普特召回牛津，等发现他的骑兵实力还不够保护国王前进时，于是又召回格林。格林把围攻的任务交给格林维里爵士，在费尔法克斯从纽布格出发的那一天，格林也启程回牛津。5月7日，查理在牛津举行了一次战争会议。当时有人劝他放弃北上计划，并用全部兵力打击正在布南德福德的费尔法克斯。鲁普特却表示反对，主要原因是他手下的北方骑兵，在南格达里爵士指挥之下希望回家去，同时他对于才智过人的格林感到妒嫉，不想在指挥上有这样一个对手。查理是一个不求甚解的人，就决定采取折中方案，虽然可能会使双方都高兴，但却种下了最后失败的根源。他全部兵力不过11,000人，居然还分为两部分，让鲁普特往北，而格林往西。

这个决定又引起了另外一个变化，因为国会方面一听到国王已经在行动中的消息之后，马上就命令费尔法克斯前进并围攻牛津。华克说：“这把我们计划全破坏了。”克拉伦顿指出：“牛津的防御情况非常良好，不可能被攻陷，”所以费尔法克斯如果屯兵坚城之下，对于查理而言是最有利的。虽然如此，国王和他的群臣还是不能决断。此时蒙托斯于5月9日在奥地恩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所以现在是向北与他会师呢，还是向南以迎击费尔法克斯呢？结果又是采取折中办法，同时改向南行并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为了要想引诱费尔法克斯离开牛津，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攻击国会方面占有的某个要地。

符合这个条件而距离最近的城市就是莱切斯特，这座城由佩伊爵士据守，守兵也很充足。王党决定攻占它。5月31日，经过苦战终于达到了目的。几天之后，查理写信给王后说：“自从叛乱发生以来，我觉得希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伸手可及。”

实际上，查理所处的地位非常危险，因为列文在北，而费尔法克斯在南。他本应暂留在莱切斯特，先集合兵力再行动，可是他却贸然跳入最后一个泥沼。他本已从西部召回格林，此外吉拉德也率领了三千名步骑兵正向南威尔士前进，也奉命来援。可是此时，他却又收回成命，改命后者不要行动，并命令格林先占领纽布格以压迫费尔法克斯解除牛津之围。他自己决定从蒂斯特直接向牛津前进。当他作出决定之后，他又绕道往德文郡，在那里停留了五天，目的是为了搜集一些绵羊以便带往牛津饲养。到6月13日，他才知道费尔法克斯已经离开牛津，率领一支远比自己实力更强大的部队，前进到了北安普顿，在他的东面约十五英里。这才使他大吃一惊。

事实真象是这样的，当国会知道莱切斯特沦陷的消息之后，就命令克伦威尔确保艾里岛以保护东部各县，又命令费尔法克斯解围前进。后者遂于6月5日采取东北向路线开始行动。6月7日，在谢林顿与费尔莫顿上校的二千五百兵骑兵会合。他们在这里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并向国会要求以克伦威尔升补空着的中将空缺，并指挥所有骑兵。6月9日又前进到了斯通斯塔福德，

12日就到达了北安普顿大路上的基斯林布里——距离德文郡只有八英里。

这个前进使查理受到了突然袭击，斯普林格的记载说：“国王正在狩猎，全军毫无秩序，马儿都在吃草，对我们的到来事先毫无所知。”因为费尔法克斯的步兵尚未能够赶上，所以决定暂不前进。费尔法克斯军就宿营在那里，第二天上午六时，他们正在举行战争会议，克伦威尔突然率领六百名骑兵来到，当即受到了全军官兵的热烈欢迎。查理也不敢再耽搁一分钟，集合了分散的人员，退到了哈尔波罗，意图退回莱切斯特，再从纽瓦克方面去调集部队。到黄昏时，又听到伊里顿已经把鲁普特的一部分兵力赶出了纳斯比。王军方面又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决定不再退往莱切斯特，而是就地仓促应战。6月14日，查理把他的兵力展开在哈尔波罗南面一英里远的一个长岭上面。

在哈尔波罗以南约七英里远的地方，就是纳斯比村。它位于一个小山顶上。在它周围都是旷野，也缺少树木，中间为一些宽岭所分隔，称为“丘陵”。其中有一个夹在东法恩登与奥克斯顿马格那两村之间，阿斯特里爵士指挥的王党步兵就位于这里。当圆颅党尚未出现之际，大约在上午八时，鲁普特已经感到不耐烦了，命令他的搜索部队队长去寻找他们。他回来之后，仍然没有关于敌军的情报，于是鲁普特亲自策马前进，到了克里普斯顿村南面的高地上，看到正如他所想象的，敌军已经在全面撤退之中。他立即送了一个命令给阿斯特里，叫他前进到灰山。阿斯特里照办，遂放弃了原先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时鲁普特并不清楚的事实真相却是：6月14日上午三时，费尔法克斯在纳斯比以南约四英里到四英里半远的地方，检阅了他的部队，因为相信查理会继续撤退，所以就命令全军取道克里普斯顿，直向哈尔波罗前进。可是当他们开始前进不久后，就发现王党不但不后退，反而已经向哈尔波罗以南前进。当费尔法克斯看到远方的敌军时，克伦威尔就建议说，磨山是一个较好的阵地。所以全军开始转向前进。当领先部队正由斯基彭集合时，他又奉命令从山地的北坡移到南坡，目的是希望使敌人猜不到他们采取何种部署。鲁普特误以为敌人是在全面撤退，就使得王军放弃了良好的防御阵地，匆忙中还把许多武器留在后面。

现在查理也开始集合部队。全部数量是步兵不多于三千五百，骑兵不多于四千，共分成三线。第一线，中央为阿斯特里所指挥的步兵，右面为鲁普特的骑兵，左面为南格达里的骑兵，都是以中队为单位分为两线，第二线由霍华德的步兵所组成，在步兵团中间又夹着骑兵中队。第三线为国王和鲁普特的步兵团，再加上国王的近卫骑兵，共约五百人。

费尔法克斯也采取了平行的队形，全部为骑兵及龙骑兵六千五百人，步兵七千人，共分为二线。第一线，由斯基彭的步兵居中，前面没有前哨，左翼为克伦威尔，右翼为伊里顿，都是骑兵。第二线为三个步兵团。为了保护左翼起见，欧克的龙骑兵团又沿着南特弗德树篱布防，这道树篱横越战场，从费尔法克斯的左面到查理的右面。

十点钟时会战开始，王军进入宽广荒原，开始向对面的山脊爬登。此时，圆颅党也进到峰顶，伊里顿被枪弹所击中，受到了重伤，他那一翼立即发生了混乱。鲁普特一看见这种情形就立即冲锋，把敌人这部分骑兵逐出了战场。又和平常一样，他控制不住他的部队，于是在疾驰之下，他们追入纳斯比村。在那里，鲁普特命令费尔法克斯的辎重纵队投降，但却被掩护的火枪团击退。

现在再说中央方面，华克尔记载说：“当我军前进到山顶时，叛军虽向他们射击，但都瞄得太高，未能命中。双方步兵前进到了短兵相接的距离时才彼此可以看清楚，于是立即发生了肉搏战，我们的刀剑和枪托发挥了很大的功效。我看见他们的军旗纷纷倒下，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混乱。如果我们左翼的表现能有右翼和中央两面的一半好，那么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了。”在这个决斗中，斯基彭受了重伤，他的正面混乱不堪，向后撤退。加丁勒教授说：“在如此混乱之中还能转败为胜的将领，未来无疑将征服英国。”

这位将领就是克伦威尔，他正率领着3,600名骑兵，冲下山坡迎击对面来的南格达里的骑兵。当双方接近之后，克伦威尔命令冲锋，立即把敌军击溃，使敌人秩序大乱。现在克伦威尔就显示出他是一个真正高明的骑兵将领了。他并不像鲁普特那样乘胜穷追，他只命令三个团去对付已经击退了的敌方骑兵，而把其余兵力向左旋转，打击在阿斯特里的暴露左翼上。此时，查理也和他的预备队中的骑兵一同前进以来阻止对那三个骑兵团的追击，这时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外事件。克拉伦顿的记载是这样的：当国王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正要开始向敌人冲锋时，在他旁边的卡尼华斯公爵突然用手抓住国王的马缰，嘴里用苏格兰粗话向他说：“你找死么？”不等国王了解他的意义，就把马旋过头来，率领部队向右跑，既不向敌军冲锋，又不去援助自己的部队。

于是王军的中央部分完全孤立了，克伦威尔控制着他们的正面并攻击他们的侧翼。而欧克的龙骑兵则攻击他们的背面。王军已经完全丧失了秩序，当国会军接近时，他们就纷纷弃械投

降了。正当此际，鲁普特回来了。他认为要想救出这些步兵已经没有希望，于是赶紧追上国王与他们会合。他本来还想回头阻止追兵，但是他的部下都不肯听命，于是只好一直逃走，而敌军跟在后面穷追。查理的残余兵力一直跑到莱切斯特才停下。

这是一次完全的胜利，如克拉登所说：“国王与王国都在这一战中输光了。”五千名战俘，十二门火炮（查理一直未使用）和王军的全部辎重都完全落入了费尔法克斯手中。此外还有八千套武器，四十桶火药和一百十二面军旗。王军的死伤数字已不可考，估计在会战中损失约为七百人，在追击中再加上三百人，其中包括一些营妓和军眷。

国王最重要的损失是他的私人文件，包括许多他写给王后的信件草稿和副本。从这些文件中又发现他曾经寻求爱尔兰和其他外国军队的援助，并且准备取消反对英国天主教的法律。于是国会把凡是可诬赖他的文件都公开发表。这对国王的声望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但是纳斯比会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查理的失败，也不是他的名誉损失，而是这个会战是新军的第一次大胜，而这支新军又主要是由独立主义者组成。由于纳斯比的胜利，宗教独立派的势力大张，对长老会实为致命打击。（注：英国的主教制度是代表一种王室控制的宗教形式。长老会是宗教中的贵族政治，由长老们进行集体控制。而独立派则是主张在宗教中实行民主的原则。）

克伦威尔在这一战之后，于6月14日黄昏时候曾在哈尔波罗向国会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结论是：“在这一战中最诚实的人曾为你们作忠诚的服务。先生们，他们是可以信赖的，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你们不要使他们丧失。我希望这一战能使所有参战人员获得其应有的酬谢。他们曾为国家的自由而冒生命的危险，我希望他们为了良知的自由而信赖上帝，你们为了他们所争的自由而信赖上帝。”这是对长老会的寡头政治的直接挑战，所以后来下议院在发表这个报告时，特别把这一段删去了。

纳斯比会战与马斯顿会战不同之点是：马斯顿会战若能继以激烈的扩张，就可以使国会战胜国王，而纳斯比会战则使独立主义者战胜国会。它使英格兰免受苏格兰教会的瘫痪性寡头政治的统治，而使这个国家接受了克伦威尔的统治，虽然也是寡头政治，但却具有活力。在摄政时代中，就可以找到纳斯比会战对历史的影响。

战争又拖了一年，查理的情况日益黯淡，最后因为害怕落入国会手中，于1646年5月5日向苏格兰人投降了。可是苏格兰人因为想取得欠款四十万镑，于1647年1月把查理送给英国国会作为交换，并离开新堡回国。

国会重新获得了国王，也就等于获得一切宪法上的权力根据，为了能自由利用它以在英格兰各地建立长老会制度起见，国会两院在1647年3月通过了一项计划，解散陆军中的全部步兵。但是伊利顿和克伦威尔却知道只有陆军是唯一足以约束长老会迫害热忱的工具，所以在他们心里另有计划。他们认为国王是权威的基础，军队是权力的来源，二者若能结合起来，那么独立派的地位就可以绝对稳定了。所以在5月31日——即军队预定解散的前一天——克伦威尔命令副官乔治骑马到国王被监禁的地方霍姆比，去把国王弄到在新市的陆军司令部中来。到了6月7日，为了避免惩处，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到了那里。

7月17日，伊利顿本是独立派中的最激烈分子——他的态度远比克伦威尔更积极——就拟定了一个新政策。它的内容为主教应取消司法权，宗教条约也废除，所有新教各派都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现有的国会自动解散，未来的新国会任期为两年。在国会之下另设国务会议，责任为执行外交政策和控制海陆军。这的确象一个政治家拟定的政策，当它被提交国会之后，军队也奉命向伦敦进军，并且于8月6日进入该城。

从这时起到10月底，克伦威尔曾竭尽全力来使国王复位，条件则为遵守这个新计划。可是查理却拒绝合作。反之，他又秘密与苏格兰人勾结，后者答应拥护他复辟，条件为在英国建立长老会统治，并压迫其他教派。这又造成了第二次内战，到1648年8月17日，经过普雷斯顿会战才被克伦威尔消灭。

伊利顿对查理完全丧失了耐心，十月份他拟定了陆军请愿书，坚持主权在民的观念，并要求迅速审判国王。国会害怕伊利顿更甚于查理，拒绝受陆军支配。为了消除下院中对国王有利的份子，12月6日，伊利顿派佩莱德上校率领一团人马到国会，逮捕一百余人。

圣诞节前不久，查理被送到温莎，并对他进行最后说服。在他拒绝接见上院代表邓迪之后，下院就通过组成一个法庭来审讯国王的叛国罪。当上院——现在议员总数已经少于十二人——反对时，下院却不顾一切地在1月6日组成了一个法庭，实际是没有合法根据的。1月19日开庭审理，查理直接向这个法庭的权威挑战。虽然如此，在1月27日仍被判处死刑。1月30日，他以高贵和冷静的态度，在白厅前接受了死刑。民众的态度是沉默而恐惧的。

克伦威尔一直都想营救查理，可是等到查理拒见邓迪勋爵之后，才一改态度，力主审讯国

王。我们必须先了解克伦威尔这个人，否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克伦威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实际上，他不是个单纯的个体，而仿佛是由几个人混合成为一体。由于他的活力惊人，所以无论在那方面的表现都是强而有力的。（一）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性、单纯和多情感的人，一个浪漫和富有幻想力的人。（二）他是一个性情激烈，刚强的人。（三）他是一个具有决断和钢铁意志的军人。（四）他是一个工心计，善投机的政客，对一切都没有固定方针。（五）最后他自认为是上帝的代表，替天行道，所以敢做任何残酷的行为。作为政治家而言，他完全是个投机政客。

事实上，除了完全信奉上帝以外，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政策。所以他对每个情况的处理，照他说都是遵从上帝的指示，也就是说，他只看需要与否，而不顾及后果。他口头请求容忍，而他自己却毫无容忍的度量；他坚持作公开讨论，而实际上却压迫言论自由。一直等到他自己继承了查理的地位之后，才明白国王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他如何解决呢？不仅步了查理的后尘，而且他施行的暴政比起查理残暴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于说到“替天行道”，他把一切都归于天命，对任何问题的解决无不托付于祈祷。像所有清教徒一样，他可以称为“自欺的伪君子”，对于任何残酷的行为，照他看来，在圣经中都可以找到有利的依据。所以他是以“自欺”的方式来“欺人”。

对于他的暴行，有些未免夸张，有些未免掩饰，不过下述事实却是不能改变的——在十二年战争中，爱尔兰一共牺牲了五十万人，总人口减到了一百万人以下。

当查理受审时，克伦威尔首先是不停跪在地上祈求上帝指示。可是不等宣判，他早就在死刑执行令上签好了字。以后，当某些审判官不愿在这个命令上签字时，他却把他们拖到桌子边，握着他们的手签字，并向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当查理被杀头之后，英国就受到克伦威尔的统治达十年之久。以上所述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自大、暴烈、不稳定和神化。

如果查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执仅为财政问题，那么他一死之后，一切问题当可自动解决。但是实质上这场纠纷却是宗教纠纷，独立派与长老会之间的仇恨并不亚于长老会与主教制度间的仇恨。所以查理死后，克伦威尔补上了他的空缺。关于克伦威尔在宗教方面的措施，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现在只讨论他因为要使人民不注意其国内暴政，所以决定对外采取侵略政策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又可以说是纳斯比会战的一个真正具有永久性的后果。

虽然不无牵强之处，但却可以说因为查理凭借“军舰准备金”所建立的舰队，完全不用武装商船，所以它们可算是英国职业海军的始祖。在十一年当中，皇家海军所增加的新船，不少于207艘。

1638年，查理已经任命了一位海军元帅去指挥他的舰队。当叛变爆发之后，海军宣布拥护国会，由华尔维克公爵出任该职。同时，国会设立了一个海军委员会以代替旧有的海军局，1649年又撤消海军统帅，而代以一个海军小组委员会。以后在国务会议之下，就是由这两个委员会来进行建立新型海军的工作。前者改善了海军的待遇问题，使他们能按时领取优厚的薪饷，后者则注重司法问题，其所出台的《战争条例》，成为以后一切海军法律纪律的基础。在委员会以下，有三个海军上将，分别由波海姆，迪恩和布莱克担任，负责海上船只的分配和调动。这三个人中，布莱克对海军指挥和战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前二人都都是新陆军中的上校。波海姆在青年时代也曾任海军军官，而后二人都曾经在商船上服务。）

在1649年，布莱克的年龄是五十岁。他的职业本为商人，但对海军却具有相当知识，因为当时的商船都有武装以对付海盗和私掠者，所以他可能也有海战经验。在第一次内战中，他曾在新陆军中做过团长，因为既有战绩又有海上经验，他就成为克伦威尔选拔的海军指挥官之一，不久他们就被称为海军上将了。关于布莱克，克拉伦顿曾有下列评论：

他是第一个不遵守旧规的人，显示出新科学的价值。他也是第一个使船只与岸上炮台互搏的人，过去大家都认为炮台是无敌的，现在他却发现出这只是徒有虚名。他把一股新的勇气注入了海军，使他们知道只要有决心，任何事都可做。他教会了他们不仅在水上打仗，而且还要在火中打仗。

有了强大舰队的支持，克伦威尔也就采取了古斯塔夫的路线，想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而以英格兰为领袖。以后在1653年，他更向荷兰人提出这样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英格兰和联合省应把欧洲以外一切有人居住的地区加以瓜分。可是荷兰人在英国内战中，已经把英国的大部分海运贸易都接过来了，而且现在也不再受法国威胁，所以当然不愿接受这个建议，因为这毫无疑问会使它在商业方面比英国落后。当荷兰人表示拒绝之后，1651年10月9日，克伦威尔就以“航海法案”为报复，禁止荷兰船只载运英属殖民地的货物。这是对荷兰人的商业优势的直接挑战。1652年5月19日，当荷兰海军拒绝英国人执行搜查权利时，第一次荷兰战争暴

发，到1654年4月5日才结束，英国算是胜利了。

由于在欧洲建立一个新教帝国的企图失败了，所以当荷兰战争结束之后，克伦威尔就决心支持法国以对付西班牙，这一次的目的地是比较实际的——为了要寻觅一个海外帝国。可是他的动机还是混合的。一方面把西班牙人逐出殖民地，这对上帝是一种服务；另一方面获得大量的财富，又是对英国有实惠的。他设计一个对西印度群岛的远征，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他觉得对它实行袭击也并非不荣誉的。

1654年12月，这支远征军出发并攻占了牙买加，于是西班牙向英国宣战。其次，克伦威尔又与法国订立攻势同盟，条件为在英国舰队和六千名陆军协助下，法国人应代英国人征服敦刻尔克，格兰维林斯，马迪克等西班牙城市，以便英国人可以在欧洲建立一个桥头堡以支持北欧的新教徒。说也奇怪，法国人居然表示同意，1657年5月，英军在波罗根登陆。9月25日，马迪克投降，次年6月14日，又赢得了杜尼斯之战，敦刻尔克投降，并移交给英国人。其他沿海各城也都迅速降服。

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逝世。现在西班牙已经力竭，遂与英法议和，1659年11月7日，签订了比利牛斯和约。依照这个和约，阿韦斯尼斯，洛西伦，菲立普维里和马林堡都割让给法国，此外还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不过略有附带条件。西班牙又同意把菲立普四世的女儿特蕾莎嫁给路易十四。并且有一个约定书，如果她的嫁妆付清了，则她应放弃对西班牙王室的继承权。但以后始终没有付清，所以路易十四也就不承认这个约定书了。

虽然荷兰战争使英国获得一些经济利益，但西班牙战争却是一个灾难。它使法国在欧洲大陆称雄，却破坏了英国的贸易，而让荷兰坐收渔人之利。它使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债增高到二百五十万镑以上。所以詹姆斯曾经说过：“在摄政时代，经济的不安定和政治的不安定是并行的，所以毫不奇怪，伦敦本是反对查理一世的重心，以后反而对他的继承人表示莫大的欢迎。”

虽然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在国内也完全不能建立一个国会式的政府，但是克伦威尔还是为他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极其重大的遗产。在1647年，他说他不知道要往何处去，这是不无先知之明。九年后他又说一切都是天意，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正如詹姆斯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所评论的：

“在国内，一种积极信仰的教条帮助工业主义的成长。在国外，它也象征着帝国主义的开始。上帝的选民应该比同辈居于较高的地位，基于同一理由，上帝所选择的国家也应该支配他的邻国。”

于是从清教徒的宗教烟幕中爬出了工业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成为英吉利文明的基础。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克伦威尔之流所能梦想得到，但是自从纳斯比一战之后，他的权力政策却使这种文明觉醒了。祭品已经献上，神喻也表示是吉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不久英格兰在时代中所担负的角色就可以与古罗马相提并论，在以后二百五十年之中，把它的帝国之威遍洒了四海。

## 布伦海姆会战

---

从表面看来，威廉三世之死使法国占了优势，使它所期望的统一局面有了确实的希望——英格兰的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并无特殊能力的女人，联合省为之大感震惊，而帝国（奥地利）也仍然显出年老无能的惯态。可是世界上总是有奇迹发生，上帝注定了要由一个人来扭转乾坤，他就是约翰·邱吉尔·马尔波罗第一公爵（1650-1722年，他在1702年才晋封公爵）。更巧的是他又有一个能干的帮手，他的妻子莎拉·叶琳格丝，能够深得女王的信任，对国事的指导具有重大影响。

他是温斯顿·邱吉尔爵士的儿子，1650年6月6日出生于阿什，1667年开始从军，到1701年8月8日，威廉三世任命他为驻联合省大使兼联军总司令时为止，其间他曾经历过多次陆海战役。这些经验对他来说非常有价值，使他对战争的现实有所认识，又因为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所以他对法国人的性格有深刻的了解，以后他对自己的对手常能判断如神。

在他证明自己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后，很自然的成了同时代许多小人物的妒忌对象。虽然如此，他的德行也并非无可指责，在他的时代，权谋术也是成功的基础，如果他不

那样做，也就不可能升到如此高位。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才时，必须以他所处时代的标准为准则。有人指控他是投机小人，曾经阴谋叛国，当然他曾经与流亡在圣泽门的废王派通信，可是到1701年，威廉三世却任命他主持军政。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因为这个军事和外交上的重任所需要的正是机智绝伦的性格。

不管他在人格方面得失如何，以将才和治术而论，马尔波罗在当时实在可以算是高人一等。他有礼貌和耐性，对愚蠢的人能很愉快的加以容忍，在天才之中很少有人能有如此性格。虽然他具有至高的勇气、活泼的想像力和充分的常识，但是他最难能可贵的特点还是他的自制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的心智丧失平衡，不管是同盟国的老顽固们也好，愚笨的政客们也好，或是敌人的运用能力也好。以将才而论，他具有一种极其少见的魄力，能够对战争进行总体观察，他能够把海权与陆权，战略与政策都融合成为一体。没有一件事情能逃过他的观察，即令是在战术方面或行政方面，任何细节也都不会被忽视。他是一个谋略家，经常使敌人感到神秘莫测；他也是一个管理者，他的部下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感到缺乏。在计划一个战役时，他可以忍受无限痛苦，在执行一个计划时，他又能不惧任何困难。在他那个时代中，大家都相信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而他却总是设法引诱敌人接受会战，而最后更是证明了一个有活力的攻势通常也就是最理想的防御。一个同时代的人对他曾有下述评论（见瓦德诺亲王致威廉三世书）：

“基尔奇有火气，兰黑有思想，马凯有技巧，柯尔切斯特有勇气，但是对于马尔波罗公爵却很难加以适当的评语。他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无法说明的因素，上述各人的美德好像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军事方面他实在是一个全才。”

罗伯特·帕克曾经在马尔波罗的麾下服役。他也有下述评论：

“至于说到马尔波罗公爵，所有的人都同意法国将领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连法国人本身也有同感。这在他的十次战役中都有确证。他从来不会让机会溜走。在所有的情形中，他都具有如此巨大的判断和预测的能力，他从来不打没有胜算的会战，从来不围攻没有必克把握的城镇。他的态度乐观，心智清明，脾气冷静，即使在会战的高潮中，思想还是同样的敏锐惊人。”

这就是那个为部下所敬爱，被称为“约翰伍长”的人。最值得玩味的，是一百年之后另有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也被他的部下称之为“小伍长”（指拿破仑）。这个伍长实在是那个伍长的先驱，他也可以说是古斯塔夫大王的继承人，因为他打破了十七世纪末的战争公式，而又回到了那个瑞典大王的旧路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做了开路的工作。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应首先分析自从1648年以来在战争艺术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交通还是停留在原始状况下，陆军的数量依然不太大，因为骑兵仍然是决定性兵种，所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粮秣的影响。水运和草地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弹药库的建立，结果又使围城战压倒了野战，使大家一致承认防御要比攻击更为重要。由于希望避免会战，所以又导致所谓“闪避战略”，它是重视运动而非战斗的。杜伦尼（1611-1676年）是这种战略的名家好手，但却并不是它的奴隶。但是他最著名的对手蒙特古里（1609-1650年）却定下了这样的原则：“成功的秘诀就是要有一个坚固的实体，无论在哪里都是如此强硬而不可透入，它好比一个机动的要塞，可以随时阻止敌人，而且还应有自卫的能力。”

马尔波罗却摆脱了这一类战争形式，回到了古斯塔夫的攻势战略和克伦威尔的攻击战术上。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想像力，能够认识到他这个时代中的军事变化，并了解其意义。自从1648年以来，出现了两个最重要的变化：（一）普遍采用燧发枪；（二）用刺刀代替了长矛。（注：“刺刀”一词可能是由“Bayonette”一词演变而来的，这是十五世纪的末在拜约尼（Bayonne）所制造的一种短匕首。1647年在历史上才首次提到枪上的刺刀，这种刺刀插在枪口中，使火枪不能同时发射。1663年在丹吉尔之战中，英军就曾使用过它。到1687年，范邦才建议路易十四采用“接合式”刺刀，这种刺刀可以装置稳定而又不妨碍射击。两年以后，法国陆军全部采用了它，1697年以后，英德两国也采用了。到了1703年，法英两国也已完全取消了长矛。霍姆上校说：“刺刀的出现代表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战争的开始。这个十二英寸长的短刀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除了燧发枪兵以外，在1667年又新创了一种掷弹兵，以后也编成了连，每一营有一个连。所以在1650到1700年之间，我们发现共有四种不同的步兵——即长矛兵、火枪兵、燧发枪兵和掷弹兵。到了1703年，又缩减成为一种主要形式，都使用燧发枪和接合式的刺刀。

这种兵器数量的减少，使队形和战术都大为简化，火线均为四列，通常也用三列，代替了纵队和六列的横队。一个营通常为八百人，在组织上分为左右两翼，每一翼又分为连，排和组。英军一排为五十人，而法军则为一百人。过去是一列连续的放枪，现在是各连或排在接近

射程三十步到五十步时始开始射击，然后在浓烟掩护之下开始用刺刀冲锋。

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些变化都是对进攻有利的，所以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以进攻为主。用持续的步兵攻击，先把敌军钉住，然后再用骑兵的冲力将其击破。他的骑兵中队分为三线，像克伦威尔的骑兵一样，手持刀剑用疾驰冲锋。在布伦海姆之战中，帕克告诉我们说：“骑兵奉命首先缓缓前进，到了与敌人非常接近的时候，才拚命的向敌军冲击。”卡尼也告诉我们说：

“马尔波罗只准每一名骑兵在一个战役中，携带三发弹药，这是专门用来在马匹吃草时供掩护用的，而不是为了进行正式战斗。”此外对于步兵，则特别重视射击训练。应该记住马尔波罗指挥的军队是由许多不同国籍的人员所组成的，荷兰、日尔曼和英国人都有，这也使他增加了很多困难。

战争开始时，英国的陆军和海军不同，兵员并非强迫征召而来。每个上校（团长）自己招募他的部下，所有薪饷被服都是包发给他的，所以造成了广泛的腐败情形，使部队中常常由罪犯充数，所以纪律必须十分严厉。提费尔扬曾经提到有一名士兵在1712年，奉命应鞭答12,600次，但是打到了1,800次时，他已经快要死了。在1703年到1704年之间，英国逐渐通过了一套征兵法案，于是这种招募的方式被取消了，在某种限度内，承认强制征兵合法。通常是在夏季作战而在冬季补充兵员和训练他们学会当时那种复杂的操练。

1702年5月15日宣战，马尔波罗面临的情况，其困难程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法西两国形成了一个统一阵线，而所谓的大同盟却分裂成为两个集团，一个是英国与联合省，另一个是奥地利。在奥地利以西为巴伐利亚，虽仍守中立但态度很值得怀疑；它与法国之间隔着一个巴登，其统治者马格拉夫·路易却决定站在利奥波尔德一边。在奥地利的东面是匈牙利，正为叛乱所苦，在其南面则是意大利境内的西班牙人，所以奥地利正在三面受到威胁，又因为萨伏依的维克多·阿曼达斯二世也与法国缔有同盟关系，由于这个便利，法军早已占领了波河上游，可以对在米兰的西班牙人进行增援。从全局上看，法国占有内线的便利，可以分别向联合省或奥地利出击，西班牙可以直接支援法国，或是以意大利为基地与奥地利作战。

马尔波罗的战略任务，第一是要阻止联合省遭受法军蹂躏，第二是防止奥地利被法西联军击败。前一个任务要求用联合省作为作战基地，在北面击败法军；后一个任务则须在南面击败西班牙。关于后一个任务，由于在1701年6月葡萄牙已经与法西两国缔结同盟，所以西班牙的地位已经大为增强。因为英荷两国海军已经不再能利用葡萄牙的港口，所以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或是在意大利境内，要想对西班牙进行一次攻击，其先决条件必须是在地中海或附近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为了适应这种战略情况，马尔波罗决定了一个两面的计划。

（一）因为巴登的路易挡住了黑森的隘路，所以他决定攻击薄富尔元帅所率领的9万法军。他们正占领着马斯河上的一切要塞——只有马斯特里赫特例外——并且也占领了科隆选帝侯国，所以也就切断了联合省与奥地利之间的交通线。

（二）同时，罗克将军和一支英荷合组的远征军应攻占卡迪兹，并为舰队建立一个基地，从这里就进一步企图获得地中海的控制权，以切断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并从南面威胁法国。

1702年的战役是从意大利境内开始的，指挥帝国陆军的尤金亲王（1663-1736年）发现范德姆元帅所指挥的法西联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使他很难维持在默顿的位置。接着在7月间，马尔波罗率领4万人开赴战场，因为配属在他司令部中的荷兰代表既懦弱又顽固，所以错过了四次机会，使他未能把敌人引上钩。虽然如此，法国人却已被逐出马斯河和下莱茵河流域，列日以下的马斯河都已通航无阻，若非如此，则1704年对多瑙河的远征将成为不可能。

8月，罗克的海军出现在卡迪兹前方，陆军14,000人由阿蒙公爵率领，但由于计划错误和缺乏主动精神，人员的行为也很卑劣，所以攻占这个港口的企图终成泡影。在返航时，10月间为了掩饰这次失败的耻辱，对威戈进行了一次临时性攻击。法军损失很重，船只不是被焚毁即被俘虏。虽然威戈不足以据守当作基地，可是这次突袭所完成的工作，却几乎可以与卡迪兹的攻占相比拟。但是因为在此之前恰好又发生了另外一个事件，结果使它的成功完全被抵消了。9月间，巴伐利亚与法国合作，其条件为马克西米利安·艾曼纽尔的领土应大量扩张，而且一旦皇帝利奥波尔德被击败了之后，就应由他承继帝位。换句话说，就是由威特尔斯巴赫王室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这个同盟使路易十四可以由守势转为攻势，而一直前进到维也纳。

马尔波罗已经控制了马斯河和莱茵河下游，于1703年侵入科隆选帝侯国，并于5月18日占领波恩。被召回日德兰之后，他的那个构思精巧的占领安特卫普计划，又因为荷兰将领柯贺恩的不服从而被破坏。此时，法国诸元帅中最能干的一个——维尔罗依——于1702年10月14日，已经在弗雷德林根击败了巴登的路易，并于1703年春季攻占斯特拉斯堡对岸的基尔，越过黑

森，并于5月间在乌尔姆附近与巴伐利亚选帝侯会合在一起。他主张立即向维也纳进攻，但是这位选帝侯却加以反对，他把他的兵力开往提罗尔，企图将这块土地并入巴伐利亚版图，并且搜集增援兵力，建立巴伐利亚与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此时，维尔罗依监视着路易以掩护这个作战。而路易正从斯托尔霍芬前进，并已经与斯泰罗姆元帅所率领的19,000名奥地利军队相会合。同时在波河的范德姆也奉路易十四的命令，取道布里勒尔隘路，想与这位选帝侯携手，以便把战争带入奥地利帝国的核心部分而结束战争。范德姆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到8月间，巴伐利亚留在提罗尔的骑兵终被逐出，同时提罗尔的山地部队也阻塞了布里勒尔隘路，范德姆遂不能达成会师任务。

假使巴登的路易和斯泰罗姆，能趁巴伐利亚选帝侯不在时联合进攻，那么维尔罗依就有可能被击败，但是他们却很愚蠢地把兵力分散了。维尔罗依在奥格斯堡首先击退了马格内夫的攻击，然后再于9月20日在霍切斯塔特使斯泰罗姆遭受了决定性失败。路易也立即放弃了奥格斯堡，退回宿营过冬，虽然这个季节已经太迟，不适宜再继续作战，可是维尔罗依仍然劝巴伐利亚选帝侯再进行一次突击维也纳的企图，因为匈牙利的叛变正使奥地利人感到头痛。但是这位选帝侯不肯听话，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维尔罗依被召回法国，而由一位能力极低的马尔辛元帅代替。同时，塔拉尔德元帅占领了欧德布里萨克，11月间又占领了兰道，于是使法国本土与在巴伐利亚境内宿营过冬的4万法国部队之间的交通情形大为改善。到1703年年终时，奥地利的情形已经困难到了极点，于是利奥波尔德把尤金从意大利境内召回，并将拯救帝国命运的重责全部交托给他。

不过同盟方面也有两件有利的事情，足以使这一连串灾难减少部分效力。第一是葡萄牙与法国脱离了关系，第二是萨伏依也背叛了法国。前者应归功于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梅沙恩父子。他们巧妙地使用外交手段，再配合威戈突袭的心理效果，使葡萄牙的彼德二世转移到联军方面，于5月间签订了梅沙恩条约。依照这个条约，葡萄牙同意接受英国的布匹以交换葡萄酒，而联军则同意派遣一支英荷联军前往里斯本，并宣布立查理大公为西班牙国王。

至于萨伏依，维克多·阿曼达斯对于法国的诚恳一向都表示怀疑，而且觉得法国愈强则愈不可靠。当范德姆要求把图林交给法军统治时，他就决定倒向联军方面，于10月25日与皇帝签订了条约。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至少就目前而论，奥地利的南面侧翼可以有了安全的保障。

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收获，可是在1703年秋天，情况还是非常危急，所以马尔波罗提出警告说除非他的部下肯服从命令，否则他就不愿再指挥下去。10月12日他写信给荷兰代表吉尔马森说：“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也是为了同盟国的公共利益，我必须告诉你，根据过去的一切经验，使我们知道为什么我军殊少成功的原因，主要的是因为缺乏纪律。除非这一点能有所改善，否则将会毫无希望。”随后他回到英国去思考来年的计划。

现在，马尔波罗已经认识到在未来的战役中，法国人的企图必然是要把皇帝逐出战争。这个目的达到之后，他们就可以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日德兰。为了预防起见，马尔波罗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计划，一方面拯救皇帝的危难，而另一方面又能为荷兰人所接受，如果不行，那么至少应该能瞒住他们。上两次战役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因为法军的战线和要塞是如此坚固，所以要想在日德兰获得迅速的胜利似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认为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把他的军队移到多瑙河上游阻止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向维也纳进攻。他明白那里是主要的决斗战场，而且也认识到荷兰人永远不会同意他到那里去，而且即使他们同意了，这种运动也还是非常危险的。不仅是距离遥远，一支大军很难迅速通过，而且这种运动还包括越过法军中央的侧翼在内，而马尔波罗手中的唯一掩护兵力就是路易的那支小部队，他们现在驻在斯托尔霍芬，对这个任务显然不能胜任。所以这次行军的最后目的，不仅应使在莫斯里河上和阿尔萨斯境内的法军无从知悉，而且同样也不能让荷兰人知道，否则他们马上会大感惊恐。此外，为了依照梅沙恩条约的规定，他又决定派罗克护送查理大公，率领一支远征军先到里斯本，当他们登陆之后，罗克的舰队即应继续进至利维拉，利用萨伏依的陆军，并与法国境内叛军联合起来向土伦攻击，以击毁该港中的法国舰队，并把法军向南方吸引。（注：差不多在1704年2月底，罗克和远征军达到了里斯本，当军队登陆之后，大公即被宣布为西班牙的查理三世——这就是前后历时八年的半岛战争的开始。罗克的舰队进到土伦，但当他发现萨伏依公爵不能拨出任何部队来参加联合行动，于是他就回到直布罗陀海峡。在那里他接受了强大增援，使舰船数量增加到了五十艘以上。他于是决定进行一次他一向想干的冒险勾当——攻占直布罗陀。8月4日略经困难之后终于达到了目的，因为这个岩石岛上的防御并不坚强。三个星期之后，他在费里兹马拉加的海外，击败了图洛斯率领的法国救兵，这支舰队也有五十艘战船。这一战使英国人赢得了地中海的控制权，在此后的战争中，法国人对于英国人在地中海的优势，再没有作进一步挑战。）

到底是谁最先提出应在多瑙河上进行主力攻击的事实已不可考。科克斯在《马尔波罗公爵回忆录中》说：“作出这个决定的是尤金亲王，马尔波罗曾与他密商全盘战役计划。”这种说法似乎不正确，因为那时马尔波罗和尤金还未相识，而且没有通信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在1703年8月间，马尔波罗1704年的战役计划是取道莫斯科里河侵入法国，同时在那年秋天里，他曾接到帝国大使拉蒂斯拉伯爵的许多通信，指出如果没有帮助，维也纳的丧失将成定局。虽然如此，似乎直到1704年3月为止，马尔波罗还是坚持他的莫斯科里计划。1月间，他又通过海格与荷兰当局商谈，他们害怕联合省会丧失掩护，所以强烈表示反对。当他于2月回到英国后，他继续接到拉蒂斯拉伯爵的紧急呼吁。最后到4月，拉蒂斯拉直接送了一个备忘录给安妮女王，说：“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已经获得了法国的大量援兵，所以帝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所以请陛下命令马尔波罗公爵迅速增援。”此后马尔波罗才开始提到这种观念。最后多瑙河战役计划终于代替了那个莫斯科里计划，这个新计划中的一部分就是启用尤金亲王代替斯泰罗姆，奉皇帝之命他应前进到日尔曼战场与马尔波罗和路易并肩作战。

马尔波罗对他这个计划极力保密。1704年4月21日，他回到联合省。他于5月10日达到了马斯特里赫特，在那里他发现情况是这样的：面对着他的维尔罗依的位置在门海格纳之线以内（即安特卫普——迪斯特——那穆尔之线）。只有柯基尼斯伯爵率领1万人看守着莫斯科里河。在维也纳周围所有的帝国陆军约为3万人，在乌尔姆有巴伐利亚选帝侯和马尔辛元帅和率领的45,000人监视着他们。在4月间，有1万多法军取道霍伦萨尔，越过黑森与他们会合。巴登的路易正率领3万人驻在斯托尔霍芬，不足以阻止敌军援兵的前进，尤金手中只有1万人的兵力，但并未设法阻止敌人前进。为了掩护这支增援部队并保护法国与巴伐利亚之间的交通线，塔拉尔德率领3万人位置在斯特拉斯堡和基尔。

尽管敌军的兵力分布已经很难对付，而最大的困难却还是荷兰人。为了使自已不受他们牵制起见，在离开英国之前，马尔波罗首先决定所有由英国人发饷的部队，均应由他本人直接指挥。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当他告诉荷兰代表说，未来的战役是在莫斯科里河上时，他们马上就开始阻止他。虽然如此，他还是把联合省的防务和7万人的兵力，交给奥费奎尔奎将军，于是把他自己部队的第一个集中点定在科伦根以西二十英里处的贝德堡，时间是5月16日。他所指挥的兵力总数为90个中队的骑兵和51个营的步兵，其中分别有19个中队和14个营，连同火炮38门，是由英国人组成的。他从贝德堡写信给英国驻维也纳的代表斯提普尼先生，要他向皇帝报告他进军多瑙河的意图，但却嘱咐不要让荷兰人知道了。5月18日，他检阅了他的部队，两天后就向莱茵河进发。5月23日他进入了波恩。他在那里得知维尔罗依已经渡过缪斯河，正在骚扰胡伊；马尔辛也已经获得了增援。而奥费奎尔奎却发挥了主动精神，也正在输送援兵给他。帕克对于这次进军有如下记载：

“我们时常是连走三天，有时四天，然后再休息一天。通常总是凌晨三时开始行军，每天走四个里格或四个半里格（一里格约合三英里），大约在晚上九时达到宿营地。因为我们是在同盟国中行军，所以有指定的官员为我们人马供应一切的必需品。当我们尚未达到之前，这些东西就都已经全预备好了，所以军人根本无事可做，除了撑帐幕、煮东西以外就是躺下来休息。的确，从来没有那一次行军比这一次更有秩序和规律，人马也不疲倦。”

5月25日，马尔波罗和他的骑兵到达科布伦茨，四天后他的步兵也都赶上了，于是不向莫斯科里河前进，全军越过了两架浮桥，改向梅兹进发。

照帕克的记载，所有人都感到莫明其妙，法国人也一样，他们现在猜想敌人是向菲力普斯堡进军，因为最近在那里建造了桥梁。6月3日，骑兵在获得一部分日尔曼部队增援之后，在拉登堡渡过了尼卡尔河，6月7日，不再向莫立普斯堡前进，全军从魏斯罗赫转向辛泽姆。现在他的最后行动已经无法保密了，马尔波罗这才把他的真正意图告诉荷兰当局。法将塔拉尔德本来是在兰道等候着，以便当他在菲力普斯堡渡过莱茵河之后予以迎击。所以听说他调换方向之后，不免大吃一惊，而法国宫廷在巴黎获得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也一样。现在黑森保护着他的右翼，马尔波罗开始直向劳芬前进。

6月10日，到达莫德西姆，尤金亲王和巴登的路易也在那里会师。6月27日进入了金根，开始分配职务，决定由巴登的路易与马尔波罗一起作战，而尤金则控制莱茵河，以防维尔罗依和塔拉尔德增援巴伐利亚部队。马尔波罗的兵力总计约7万人，分为200个骑兵中队，96个步兵营和48门火炮，在前进了250英里之后，才终与敌军接触。敌军共约6万人，由马尔辛和选帝侯指挥，正在乌尔姆东北25英里处的德林根挖掘工事。尤金只率3万人留在斯托尔霍芬一线，面对着留在斯特拉斯堡的维尔罗依所部约6万人。

6月30日，马尔波罗进到巴尔默色芬，7月1日又到了阿姆迪根，位于要塞多瑙沃斯以西约15英里。后者是一个重要据点，他必须赶紧加以占领，因为一旦他占领该地之后，他就可以到

达通往罗德林根的道路以开辟另一条新的交通线，并且也可以在多瑙河上占领一个桥头堡以打通到奥格斯堡和慕尼黑的道路。若想对多瑙沃斯实行围城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必须花费好几个星期时间。而且当马尔波罗围城时，塔拉尔德不仅可以切断他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打击在他后背上，并与马尔辛等人进行前后夹攻。早在6月30日，选帝侯已经匆匆的派了德·阿佐元帅率领14,000人经多瑙沃斯到达舒伦堡，这是一个卵形小山，正好控制着这个要塞。

既然不能围攻，所以马尔波罗决定实行突击，尽管他的部将反对，因为经过15英里的行军后，部队一定已经疲惫不堪，可是他仍然命令于7月2日攻下舒伦堡。他认为如果赶紧攻击，不仅可以使德·阿佐损失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内马尔辛和选帝侯也可以在德林根渡过多瑙河，进到北岸以增援舒伦堡。从战略上来说，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马尔波罗到多瑙沃斯的距离要比马尔辛等近10英里。因为这等于在行军上占了半天便宜，所以他决定不听诸将劝告，将攻击日期定在7月3日。

7月2日清晨，英军前卫开出了阿姆迪根，道路漫长而又糟糕，一直走到正午才到了多瑙沃斯正面的沃尔-尼茨河，架桥搁误了三个小时。为了使德·阿佐误以为在7月3日以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所以就在这里开始架设营帐。此时，马尔辛和选帝侯为了支援多瑙沃斯已经开始前进，而德·阿佐则忙于挖掘战壕。

马尔波罗的攻击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决定从西面攻击舒伦堡，这是它最强的一侧；不仅因为这一面与他最接近，而且因为这边也受到多瑙沃斯的保护，是敌人认为最安全的一面。他集结了两个纵队，左面一个主要为英国步兵，负责突击工事的西北顶点或把它攻破，若不可能，则用激烈的攻击把德·阿佐的预备队吸引住，以便为右面纵队开路。右面这个纵队在马格内夫指挥下从多瑙沃斯与舒伦堡西南顶点之间前进，以便从后方攻击这个阵地。

上午五时，马尔波罗的炮兵开火了；但是一直等到过了一小时又一刻钟之后，戈尔中将才率领左纵队前进，6千人共分三线，以8个营为支援，8个营为预备队，只有35个骑兵中队。据当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经过如下：

“我们前面的斜坡是如此险陡，所以当敌人（英军）纵队开始前进时，就丧失了踪影，等到再看见的时候，距离我们的堑壕只有两百步了。他们前进的速度，加上他们的喊杀声，真是气势惊人。当我听到之后，命令我方也冲锋以掩盖他们的声音，使其对我们的部队不产生恶劣影响。英国步兵奋勇攻来，一直冲上防壁，但是我军的抵抗勇气也可与他们相等。第一次攻击历时一小时以上，对激战的情形很难叙述。双方都在进行极其惨烈的肉搏，死伤枕藉，这种地狱般的惨状真是难以形容。”

这次突击被击退了，英军都退到丘陵以北的谷地中。接着第二次突击和第三次突击也一样，虽然如此，攻击者花了重大的代价，却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就是吸引住了德·阿佐的预备队，也就是说为右翼纵队打开了通路。

多瑙沃斯的守军指挥官，本应防守连络要塞与旧堡（古斯塔夫所建）之间掩护防线，它恰好挡着舒伦堡的西南侧翼，现在他却反而把兵力撒入主要要塞。这不仅便利了马格内夫的前进，而且因为地形关系，舒伦堡的守军也无法了解这些运动，此外，德·阿佐也认为他已稳操胜算，因为到夜幕将垂时，将有强大增援从奥格斯堡到来。现在已经快到夜间7点钟，沿着丘陵的南面，只有内坦科特一个团的兵力成单线布防。于是柯罗尼记载道：

“大约在傍晚7点半，他们到达距我方侧翼在枪弹射程内的地域，我方几乎没人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当我突然注意到我方步兵作了一个很特殊的行动，突然立即停火了。我向四周一看，想发现这个行动的原因，于是看到有几列步兵，穿着灰白的制服，在我方左翼出现了。因为他们停着不动，从衣服和方向上来看，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援兵到达了，其他人也都与我的判断相似。”

这时，马尔波罗开始作最后一次突击，敌军夹在两条火线之间，终于崩溃了。最后，那35个中队的骑兵也发动追击，于是敌军损失惨重，大败而逃。这样就结束了这个十分冒险的会战，这也证明了拿破仑所说的，在战争中没有冒险就没有胜利。它一共花了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等会战结束之后，选帝侯的援兵才赶到，但却只好坐看德·阿佐被歼灭，在他的总兵力中一共损失了1万多人。马尔波罗的损失也很惨重——死1,400人，伤3,800。

这场会战的结果也可以与其观念和执行的冒险程度相称。多瑙沃斯陷落了，通往罗德林根的道路和多瑙河上的桥梁都已到手。同时也获得了一条退却路线和一条进入巴伐利亚的前进线。当听到了战败的消息后，这位选帝侯立即拆毁李赫河上的桥梁，并在奥格斯堡掘壕固守。马尔辛向塔拉尔德求援，后者于7月1日已经渡过莱茵河，7月16日，正要围攻维尔林根时听到了这次惨败的全部消息。7月22日他解围向乌尔姆前进，于7月29日达到。这个运动立即使尤金处于极其困难的地位，因为本来他应追踪塔拉尔德，但同时又要监视维尔罗依。于是他向北前

进到图宾根，于7月27日达到，目的是想欺骗维尔罗依，使他相信他不是追踪塔拉尔德。接着他在斯瓦比亚丘陵中失去踪影，率领全军向多瑙沃斯进发。

重要桥梁到手之后，这个惊人战役的第二幕也展开了。因为塔拉尔德已经快要来到，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设法引诱巴伐利亚选帝侯出战——这也可以证明马尔波罗的情报很完善，当法军越过莱茵河两天之后，他就已经获得了消息。因为巴伐利亚选帝侯拒绝会战，又因为塔拉尔德仍然在战场上，所以马尔波罗也不能进行围攻，于是他在7月8日渡过李赫河，开始蹂躏巴伐利亚，对于居民采取恐怖手段，使他们纷纷向他们的选帝侯要求保护或和平。7月13日，在选帝侯夫人劝诱之下，选帝侯已经准备讲和，可是正当此际又听到塔拉尔德到了。所以他还是继续奋斗下去，但却很愚蠢地分散其大部分兵力来保护他的领地。这对联军而言，当然是一个具体的利益，但是现在塔拉尔德已经接近了，秋天也快到了，而英国国会于11月间又将集会，所以马尔波罗必须赶紧获得一个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尔波罗必须摆脱马格内夫的牵制，因为他是个智力迟缓的人，而且也难以信任，所以他假装同意围攻因-格尔斯塔特。7月31日，他写信给尤金亲王说出其计划大纲：他应派遣一个支队去协助马格内夫围攻因-格尔斯塔特，而尤金和其余的兵力则与马尔波罗会合在一起，不仅是为了掩护这个围攻，而且更要引诱塔拉尔德、马尔辛和选帝侯的联合兵力出战。

8月10日星期六，塔拉尔德和他的同盟军开始向北运动，想在德林根渡过多瑙河。第二天，尤金从他设在姆斯特的营地中——距离多瑙华兹只有两小时的行军里程——写信给马尔波罗说：“敌人已经行军了。可以判断其全军都会在劳恩根渡过多瑙河，德林根平原上已经挤满了部队。所以我决定在今夜命令步兵和一部分骑兵，开进到我多瑙沃斯前方所指定的一个营地。一切的关键就是速度，希望你明天赶来援助我，否则恐怕会太迟了。”马尔波罗立即出发去支援他的同僚。

此时塔拉尔德已经进到霍切斯塔特，沿着多瑙河向下走，距离德林根约为5英里，在那里听到马尔波罗与尤金会合的消息。因为马格内夫不在一起，这位选帝侯（名义上的总指挥）就假定马尔波罗会退向罗德林根，于是力主攻击。塔拉尔德却怀疑这个建议，只同意采取一种折中方案——向下游前进三英里，达到布伦海姆村略西的一个位置；他们在8月12日到了那里。以后他们就自己安慰自己，认为胜利已经在握，幻想马尔波罗会被迫撤退。正如泰勒在《马尔波罗战史》一书中指出的，他们不相信尤金和马尔波罗会那样不尊重战争规律，对一个占有坚强阵地而且数量占优的敌军，居然敢于发动一个正面攻击。那天夜间，在法巴联军的营地中，精神达到了最高潮，谁都相信马尔波罗和尤金一定会撤退。

法巴联军的营地是设在一个平缓高地的顶上，在一个叫作尼贝尔的浅沼泽溪流以西，相距约一英里。它的右翼倚托在布伦海姆村，接近多瑙河，塔拉尔德的司令部就设立在那里。有一条泥泞的毛威尔溪流通过该村。在尼贝尔河的左岸上，向上游约行一英里半是安特格瑙村。再进一英里半是奥布格瑙，马尔辛的司令部设在此处。奥布格瑙以西又隔一英里半，就是在破碎地区中的鲁特青根，那是选帝侯司令部所在地。所以这些营地被这四个村落（或堡垒）所保护，而尼贝尔河在第一和第三两个村落之前，又构成了一道护城河。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坚强的阵地，右翼有多瑙河，而左翼则有森林和丘陵的掩护。

8月12日拂晓，马尔波罗用望远镜观察敌军营地，照米勒的报导：“大约下午一点钟时，我们可以看见敌人在扎营，从布伦海姆到鲁特青根都可以看见他们的帐幕。”双方兵力的确切数字已不可考。米勒估计联军为52,000人，法巴军为60,000人，邱吉尔在他的《马尔波罗传》中估计前者为步兵66营，骑兵160中队，火炮60门（马尔波罗本人所说的数字为65营），共为56,000人；而后者为步兵84营，骑兵147中队，火炮90门，共约6万人。

当法巴军营中都已安寝之时，联军方面却正忙碌不堪。8月13日凌晨两点钟。联军每部分各组成四个纵队，前面有40个中队的骑兵，开始沿小径向西进发，一小时后利用已架好的桥梁渡过基塞尔溪流。这时黑暗而且有雾，尤金在右而马尔波罗在左，炮兵和工兵则沿大路向霍切斯塔特前进。在莱亨溪流，塔夫汉小村西面不远处略停了一下，以便收回前哨兵力，共为20个营和15个中队，包括3个英国步兵旅在内。他们构成第九个纵队在左面前进，由寇特斯勋爵指挥。继续前进到施韦林根，又停顿了一次。马尔波罗和尤金带了大约40个中队的骑兵前进到沃尔佩茨塔滕以北的高地去侦察敌情。现在已经六点钟，再过一个小时，雾升起了，敌人才惊醒过来，放了两炮。

突袭可以说非常成功，即使到现在，两位法国元帅和选帝侯还沉醉在他们自己的假设中，仍认为敌人非撤退不可，所以首先还是判断这是一个掩护主力退却的行动。甚至到了大约7点钟时，塔拉尔德写信给路易十四还是说敌人已经撤退。等到敌军仍不停前进时，塔拉尔德才突然认识到真象，立即下令准备战斗，接着法巴阵营中就紧张万分。据当时目击者的报导，对于

这次破袭有如下记载：

“首先放号炮召回采集补给的人员，战鼓雷鸣之中，大家都来不及拆营，赶紧在营前列阵。在忙乱中大家都感到混乱和害怕，那些突然听到号炮归来的人，也都士无斗志。敌人的突然出现使指挥官神经失常，尤其是他们已经进入宿营过冬的阶段，都在收拾所抢掠得来的财富。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战，如果事先毫无准备，那当然居于不利的地位。”

大约到了八点半钟时，联军进到了敌军炮火射程之内，英国炮兵也开始还击。此时，塔拉尔德匆忙决定了他的计划，因为时间太短不能变更部署，就转而采取守势。除了两翼有良好的保护——多瑙河和森林丘陵，而且四英里长的正面上又有沼泽式的尼贝尔河，他的部队与选帝侯及马尔辛没有照习惯联成一线，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这是时间仓促的缘故。

塔拉尔德决定：他自己防守右翼，从多瑙河上到奥布格瑙村为止（该村本身在外），马尔辛据守中央，选帝侯则在左翼。他还决定左翼和中央都应尽量接近尼贝尔河右岸，阻止敌军任何渡河企图。至于右翼则退后1,000码，以便让敌军左翼渡河后，可以受到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面火力的夹击，然后法国骑兵再从正面加以突袭，就可以把敌人逐入沼地中。虽然这个计划有许多地方可以批评，可是考虑到时间缺乏，那么这个计划如果用以对付任何普通的敌人，似乎也算是合理的。

依照这个计划，塔拉尔德又把他的兵力分配如下：

（一）布伦海姆，他用9个营步兵担负防守，以7个营供支援，而以11个营充预备队，留在该村后方。

（二）在布伦海姆与奥布格瑙之间，他展开了44个中队的骑兵（共5,500人）分为两线，以9个步兵营和4个中队的龙骑兵支援。

（三）在左面，他把马尔辛的骑兵32个中队，再加上14个营步兵，位置在奥布格瑙。

（四）在奥布格瑙的左方为32个中队和17个营——也是属于马尔辛的。

（五）最后由选帝侯指挥，共51个中队和12个营，位置在鲁特青根，其中一部分留置左后方。

从侦察的结果，马尔波罗和尤金看出敌军是右翼强于左翼，所以，还是和在布伦堡一样，他们决定应攻击右翼，因为这样就可以获得突袭的效果。因此他们获得一个有如下述的概括观念：尤金应努力攻击敌人左翼以分散敌军注意力，而马尔波罗乘机对右翼方面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马尔波罗又发现塔拉尔德对防御兵力的分配是很有能力的，其枢纽在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两个村落。如果不能对这两个村落中的守军加以牵制，那么当他前进时就不免要冒着极大危险。所以他决定对这两个村落应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加以攻击，以使敌方步兵都忙于自卫，这样当他在两个村落之间前进时，他们就不能向其侧翼实行反攻。如能攻下两村，当然最好，否则也应该控制住他们，不让他们的牙齿合拢。此外，因为他不知道在渡河时是否会受到阻击，所以他所将取的战斗序列也是不合常规的。

他把兵力一共分为四线：第一线为17个营的步兵，以占领右岸为目的；第二线和第三线分别为36个中队和35个中队的骑兵，负责主力突击；第四线为11个营的步兵，据守尼贝尔河左岸，以便在突击失败时可以掩护骑兵撤退，在左翼方面有寇特斯的纵队，任务是突击布伦海姆。最后，他命令工兵在河上修建五座桥梁，并修补那座已经被破坏了桥梁。

当尤金的纵队正在沃尔佩茨塔滕以西的丘陵森林地区中辛苦的前进时，寇特斯已经肃清了布伦海姆以东尼贝尔左岸上的敌人，把法军逐出了磨坊，占领了河的右岸。接着他就和他的纵队在接近布伦海姆村的一个谷地中前进，前方的高地上有敌炮五六门，他们在几个小时中都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忍受着炮击。双方炮兵对战达四个小时之久，这时为了鼓舞士气，马尔波罗命令牧师举行一次礼拜。而且在法军炮手可以完全看得见的情况下，他为了以身作则，亲自纵马缓行于行列之中。一颗炮弹飞到他马前，使所有人都大惊失色，因为在一瞬间，他在灰尘中已经完全消失了。

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因为尤金方面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马尔波罗很感焦急，不断派骑兵到右翼方面去探听消息。泰勒对当时的情况有很生动的描写：

“太阳照耀在田野中，农作物显出金黄的颜色，与红色和蓝色的军服、闪亮的钢铁相映成趣。两军的军乐相对吹奏，互相起伏呼应。隔着这条沼泽式的河川，炮火横飞，人马单独的或是成群的被击倒，负伤的人慢慢地向后方运送。因为现在已经是正午，天气炎热异常。时间已经过了一半，而联军的死伤数字已经达到两千人，这时尤金的副官才从遥远的右方跑来。时机到了。”

十二点半，马尔波罗转向他的将领们说：“先生们，各就各位。”十五分钟后，寇特斯命

令他那领先的英国旅，由罗威率领向布伦海姆突击，在他的掩护之下，右面的部队就趋向尼贝尔河。罗威命令一直等到他用刀剑砍在法军所建栅栏上时，大家才准放枪。当他前进到了距离敌军三十步以内时，他自己和所属部下的三分之一，都被敌火击倒。可是这个旅仍继续挺进。在浓烟中，布伦海姆的法军守将克莱姆·波尔特中将（侯爵）感到恐慌，就召集他的支援兵力7个营，不久更丧失理智，又召集预备队11个营，这额外的12,000人都挤在这个小村之中，有许多人简直无法动弹。所以这一大堆部队对塔拉尔德已经不再有价值了，而正在坚守的塔拉尔德却正在盼望他们援救。

虽然如此，第一和第二两次突击还是被击退了。接着法国的禁卫军——这是他们最优秀的骑兵——也从布伦海姆的两翼前进，但不久也被联军逐退。在北面侧翼，他们遇到了巴尔米斯上校，他用5个中队击败了敌军8个中队。当正准备作第三次突击时，马尔波罗突然叫停，因为他发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法军已经被固定在这个村落中。此外，他的先头步兵已经过了尼贝尔河，骑兵主力也正在渡河。

当激战正在布伦海姆周围展开之际，在奥布格瑙又发生了一个危机。在这方面，一共10个营的兵力由霍尔斯坦贝克亲王率领着，已经前进到了该村，但却被守军逐回。守军由布南维里侯爵率领，一共9个营，包括爱尔兰旅在内，这就是绰号为“野鹅”的部队，当霍尔斯坦贝克的兵力在混乱中向尼贝尔河上败退时，马尔波罗的中央右翼就暴露在敌方攻击之下。此时，马尔辛在奥布格瑙的后方正集结了大量的骑兵，准备从这个缺口打击对方中央的右翼，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马尔波罗认识到这一点，立即亲自驰往该地，并派了一个副官去通知尤金，要求他马上派遣弗格尔的骑兵旅来掩护这个缺口。虽然尤金本人正在最恶劣的地形中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情况也是同样紧急，但他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于是当马尔辛的骑兵向尼贝尔河冲击时，弗格尔就恰好打击他的左翼，并把他们击退了。这个冲锋也救了霍尔斯坦贝克，于是他再次前进，这次就把布南维里的步兵赶到奥布格瑙村，并把他们围困在那里。现在联军可以自由地从他们面前经过，并攻击敌人的骑兵。

虽然马尔波罗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为到了下午三点钟时，布伦海姆和奥布格瑙这两个堡垒已经丧失了攻击力，可是从一般人眼中看来，胜利却似乎已经属于法军。白天的时间已经所余不多，尤金正在与选帝侯作殊死战，但是毫无进展，如果联军再不前进，就会被迫后退，法军骑兵现在还大部分完整无缺，所以如果在他们前面退走，结果无异于溃败。但是马尔波罗却深知，只要尤金能够继续坚持下去，那么胜利就是他的，因为许多法国步兵都被封锁在这两个村落进行纯粹消极的防御，所以中间的门户洞开，这也就注定了塔拉尔德的覆亡。

虽然尤金明知在他的正面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也知道除非他能坚持，否则马尔波罗就无法获得胜利。所以这两位名将之间的合作十分良好，到四点钟时，马尔波罗的全部中央兵力都已渡过了沼地，于是他又改变了他的攻击序列。把骑兵分为两线摆在前面，步兵也分为两线摆在后面。在决定点上，他展开了压倒优势的兵力，因为塔拉尔德的兵力不过五六十个骑兵中队和步兵九个营，而他的兵力却分别有90个中队和23个营。他一直等到了四点三十分，当他听到尤金已经攻到鲁特青根的周围时，才让他的整个中央部分开始行动。直到这时，塔拉尔德才认识到敌人心里是在想些什么。他把他的预备队9个营展开在奥布格瑙以南以阻止联军前进。马尔波罗也立即命令三个汉诺威营和一些炮兵去对抗他们。经过一番苦战之后，这3个营被击退了，于是马尔波罗的骑兵也全线随之退回。现在可以说是塔拉尔德的最后机会，但是他的骑兵却未能配合。

大约在下午五时三十分，马尔波罗命令他的炮兵用葡萄弹向这英勇的九营敌军扫射，在火力掩护下，他命令再次全面前进。在鼓号齐鸣中，分成两线的骑兵高举着军旗用整齐的行列向敌人前进。突然间他们加快速度直向敌人冲去。

敌人的大多数骑兵都发生了恐怖现象，胡乱放了一阵枪之后就拨转马头向战场外逃跑——包括近卫骑兵在内。有些逃往霍施塔德，有些逃向多瑙河，有30多个中队冲下了险陡的河岸，到达了低湿的河边。此时那9个营的步兵已全部被歼，不留一人。帕克的记载说：“第二天上午我骑马从那里经过，还看到他们成行地倒在那里。”

法巴联军此时已经崩溃。塔拉尔德虽向马尔辛等求救，但也枉然，因为此时尤金正猛攻鲁特青根村周围。他的求救只使马尔辛和选帝侯产生了一种全面危急的念头，于是在右翼尚未遭到迂回之前下令退却。现在已经是7点钟，马尔波罗暂时收住他的缰绳，匆匆地用钢笔在一张酒店帐单背面写了一个短筒给他妻子：“我没有时间多说，但请你报告女王，让她知道她的陆军已经获得了一个光荣的胜利。塔拉尔德元帅和其他两位将军都已被俘，而我仍在追击中。送信的人是我的副官帕克上校，他将当面把会战的经过讲给她听。”十天内这个捷报送到了温莎宫。

写完了这封信后，他的骑兵仍在追击溃退的法军，而尤金也在追击马尔辛和选帝侯，于是马尔波罗把他的注意力移到布伦海姆。这里的敌军27个营仍在寇特斯和增援的阿克尼勋爵监视下。克莱姆·波尔特已经疾驰向多瑙河逃走，落入水中淹死了。到9点钟，他的部下都投降了，会战遂告结束。

这一战代价如何？联军的损失为死4,500人，伤7,500人，其中包括英军2,000人，相当于原有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依照米勒的估计，敌军的损失共为38,000人，包括战死、溺毙、负伤、被俘和逃亡都计算在内。对于选帝侯和马尔辛未能作进一步的追击，并非马尔波罗的错误，因为他手中已经没有预备队，夜色已深，而他还有15,000名的俘虏和无数的胜利品，使他难以处理。

马尔波罗对他这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感到得意扬扬，也的确应该如此。8月14日，他写信给他爱妻说：“这是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不错，布伦海姆会战已经使路易十四的伟大计划为之破碎。它也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正如邱吉尔所说：“它改变了世界政治的轴线。”如果马尔波罗这一战失败了，那么巴伐利亚选帝侯就会代替哈布斯堡王室而继承帝位，于是慕尼黑就会压倒维也纳，而帝国本身也会变成法国的附庸。现在却是选帝侯被逐出国，国土也被英国兼并。同样重要的是，布伦海姆一战也击毁了斯图尔特王室的阴谋，如果法国统一了整个西欧和中欧，那么英国毫无疑问将陷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对英国而言，自从阿金考特之战以后，布伦海姆之战是他们在外国所赢得的第二次最伟大胜利。它击破了法国陆军的常胜威名，使他们陷入耻辱和嘲笑之中。从1704年以后，路易十四所寻求的就只是光荣的和平而已，虽然战争继续拖了八年之久，加上拉米莱斯（1706年）、奥登那德（1708年）和马尔普拉克特（1709年）三次胜利，使马尔波罗的声名更为大增，但路易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赶紧结束战争。最后到1711年，英格兰为了恢复贸易也呼吁和平。于是1712年1月29日开始谈判，1713年4月11日，在乌提赫特签订了一连串的和约。法国保持着在上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在默认法西两国永不合并的条件之下，菲力普大公被承认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主人，称为菲力普五世，于是路易总算打破了哈布斯堡的包围圈，完成了黎塞留和马萨林两位首相的工作，也使法国获得了安全的保障直到1792年为止。此外，他也承认英国的新教继承权。西属日德兰割让给奥地利，以后被称为奥属日德兰，此外还有纳普尔斯和米兰，一直保持到1866年为止。联合省也分得了某些边界要塞，而萨伏依也升格为王国，并获得了尼斯和西西里，以后在1720年，这个岛又与撒丁交换。在所有分赃者中，最后还是英国人分得了最大的部分：从法国方面获得了阿卡迪亚、纽芬兰和赫德森河附近的地区——这也是法国势力在北美被逐出的开始。从西班牙方面获得了直布罗陀和米罗卡，这保障了其海权在西地中海的地位。此外，英西两国之间又签订了一个极有利的商约，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英国获有往西属美国输入黑奴的专利权，为期30年。在乌提赫特和约签订之后，英国在海洋上和在世界市场中都获得了优越的地位，正如马汉少将所说的：“不仅是在事实上，而且也在它的自觉之中。”提费尔扬教授却说：“这个伟大而无声的海权革命的完成却是由于马尔波罗的陆军在欧洲上的胜利和外交上的成功。因为马尔波罗认识到海军战争是同盟国对付路易的全部努力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在1702年到1712年之间，英国海权的基础都是以任何敌人不能击败它为原则。”

但是这个革命还要往下深入；这是由于有英格兰银行的机构和国债，才能使英格兰用黄金和钢铁来赢得战争。威廉的战争前后达九年，共值三千万镑以上，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拖了十二年，共值五千万镑左右。在总数八千万镑中的一半，是用租税来支付的，其余则完全是靠借债。这个办法的发明，就是预支未来的繁荣来救济现在的贫困，所以战争从此之后就利用负债的方式来作为基础。伦敦银行家在政治权力上所获得的地位日益增高，远远超过了地主，这个国家和帝国的疆界已经变成了海洋，其命运也就逐渐把握在他们手中。

## 罗斯巴赫会战·吕岑会战

---

菲特烈大帝属于一种独特的君主，仿佛是古代暴君或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王子，而不像他这个时代中行将崩溃的专制帝王和正在兴起的立宪君主。

他既是文人也是军人，并且把哲学与战争结合起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自我表现和矛盾，很难发现其真正个性。比如说很少有伟大的军人像他这样铁石心肠，敢于挑起战争，但是也很少有人能像他对战争具有如此彻底的认识，知道用这种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如何没有希

望。在《军事条令》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对胜利者和对于失败者具有同样致命的危险，那么凭借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就足以征服世界。”在他所的许多诗句中，对战争曾经有如下描写：“这个铜头巨怪，战争之魔，一心只想饮血和毁灭。”虽然如此，他却坚持说：“我们不应该讥讽战争，而是应该铲除它，好比医生铲除热病一样。”

虽然在他内心深处是谴责战争的，但他对于和平的观念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从各种资料来看，他确实承认战争是一种“原罪”。有一次当他与教育部长舒尔茨谈话时，舒尔茨对他说，过去大家都相信人性是恶的，现在却又相信它是善良的了。菲特烈的回答却是说：“啊！我亲爱的舒尔茨，你并不认识这个该死的人类！”对国王的身份而言，他心胸广阔，热爱自由。他说：“我同我的人民已经获得了一个双方满意的谅解。他们说他们所想说的话，我做我想做的事。”他对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一律大度包容，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可以“经由他自己的道路进入天堂”。他开放言论自由，取消严刑逼供，发展科学研究，免费给穷人供食，为数千名老妇开办养老院，但是却不让她们白吃，而是让她们从事纺织，这可以表现出他讲究经济的个性。虽然如此，有时他会十分野蛮。有一次他说道，获得情报的最好方法，就是抓住一个富人，给他换上穷人的衣服，将他送往敌国去，同时威胁着他说：“如果在一定时限之内不回来，就烧了你的房子，并把你的妻儿砍成几块。”

他有如一个由普克和马基雅维里混合形成的怪物，由雷神之槌在火神的铁砧上锻炼成形。

除了亚历山大——可能的话再加上查理十二世——以外，在古今所有名将中，菲特烈是最具有进攻意识的。科灵在他的《战争的演变》一书中作了如下评论：“菲特烈二世所呼吸的空气中只有进攻精神；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任何作战中，即使面对优势的敌军，他也总是采取攻势。他自己就是后续力。”有一次他说，凡是不主动进攻而坐以待敌的军官，他都要加以处罚。他总是采取攻势，而且几乎总是先下手为强。他说：“我们部队的整个力量完全寄托在攻击上，如果没有真正的理由而放弃攻击，那才真是蠢蛋。”

他不喜欢长期战争，不仅因为成本太高，而且军人的水准也会日益低落，我们应该了解在十八世纪，攻势成功的主要基础就是士兵在操场上的技巧（也就是运动的技巧）。此外，他也认识到因为战争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而建军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士兵吃得饱肚子。所以补给才是一切作战的基础。战事拖得越长，补给就越感困难。虽然如此，但因为他也跟查理十二世一样，总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结果常常遭到惨败，大有得不偿失的味道。

拿破仑对菲特烈大帝的评价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越是危急关头，越显示出他的伟大，这是我们所能说的最好的赞誉之词。”

“使菲特烈显得杰出的，不是他的运动技巧，而是他的胆大妄为。他所做的事情，有很多是我所不敢做的——他会放弃他的作战线，有时好像完全不懂战术。”

“在七年之间，普鲁士凭一国之力挡着欧洲三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普鲁士的陆军力量，而是菲特烈大帝一个人的功劳。”

当我们探讨他的历次战役时，发现使他成为如此伟大的将才的原因不仅是他的勇敢精神，而且他对当时的战术条件也具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同时知错能改。他认识到那个时代的战术，是如此迟缓和笨拙。自从他开始其毕生事业时起，他就决定以机动和迅猛的火力来作为他的战争体系的基础，这也是当时的战术所缺少的因素。他曾经说过：“一个普鲁士的步兵营，就是一个活动的炮兵连。他们的装弹速度极高，使其火力可以比其他任何部队都高出三倍以上。仅此一点就使普鲁士军占了三比一的优势。”虽然有此说法，不过在他早期的作战中，他更多的是倚重刺刀，但他不久就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在后来各次会战中，都是全力发展枪炮的威力。

他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曾经首创第一支真正的骑炮兵部队，从1759年以后三十年中，在欧洲只有普鲁士拥有骑炮兵。因为奥地利人总是采取守势，他们的火线常常位于山顶，而预备队则在山后方，所以他也主张更多地使用榴弹炮。奇怪的是，他从未认识到训练有素的轻步兵的价值，尤其是在科林会战中，使他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奥地利的轻型步兵，这就使人有些疑惑不解了。

以他的小战术为基础，菲特烈又进一步发展其特有的大战术。过去，由于兵力的调动异常迟缓，所以总是进行正面交战，这也是十七和十八两个世纪中的通病。不过菲特烈却认识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自己一翼的机动性远对方优越，那么等对方慢慢把兵力部署好之后，就可以立即转向它的一个侧翼，重新展开攻击敌军，使对方来不及调换正面。以上所说的就是其大战术的精华，说起来好象非常简单，似乎很容易模仿，但事实上除非攻击方具有优越的机动性，否则不易成功。因此拿破仑说：“他的‘斜形战斗队形’只是对于不善运动的敌人才有效果。”

菲特烈对这种战斗队形作了如下解释：“你面对敌人缩回一翼，并增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利用后者的兵力，尽量对敌军的一翼进行侧翼攻击。十万人的大军，如果在侧翼只受到三万人的攻击，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击溃。这种部署的优点可以概括如下：（一）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可以与较强大的敌人作战，（二）它在一个决定点上攻击敌军，（三）如果你被击败了，那只是你兵力的一部分，你还有四分之三的整体兵力，可以掩护你撤退。”

为了获得最高度的机动性和迅猛的火力，菲特烈主要的就是靠操练，有关这一点曾经有过许多无稽之谈。虽然那是非常的严格，甚至有点野蛮，但是菲特烈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把它作为一种达到目标的手段。不过他对于那个时代的军人，也的确不太尊重。在他的《军事条令》中这样说道：“一支军队的大部分都是游手好闲的人，除非将领们不断监视，否则这个由人组成的机器就会自动崩溃，于是所谓纪律之师就只剩下一句空话了。”他又说：“如果我的士兵都开始自己思考，那么就没人肯当兵了。”此外，他还说：“军人所应做的就是要具有‘团队精神’，就是承认他自己的团队是举世无双的。因为军官总是要领导他们走向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这些人又不受荣誉感支配，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军官有甚于眼前的危险。”

虽然他发表了这些高见，可是他对他的部下却并非不慈爱，有时他的态度也是很友善亲密的。有一次，一个逃兵被押到他的面前。国王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我？”这个掷弹兵回答说：“陛下，说老实话，我们的情况太糟了。”于是菲特烈开玩笑说：“好吧，今天让我们再打一仗，如果我失败了，明天我们大家一起逃走好了。”随后就把这个逃兵送回原来的部队并且不加处罚。

虽然后来这种普鲁士式的操练法被人当成一种战争艺术，可是菲特烈本人却从未如此解释。拿破仑曾经说过：“有一次在波茨坦宫前阅兵时，当他看到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年轻军官对这个斜形战斗队形的运动非常感兴趣，不禁掩口而笑。”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除非有菲特烈的精神，否则这种菲特烈式的操练并无用处。只要从他的《军事条令》一书中摘录出几条意见就可以知道他并不只是一个操典专家：

“我们注意的主要目标应为敌人的军队”（原书四十九页）

“在战争中，狐狸皮有时也和狮子皮同样的必要，因为当实力失败时，狡计却反能成功。”（原书第五十二页）

“这是战争中一条永远的公理——确保你自己的侧翼和后方，而设法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原书第一〇一页）

“你的骑兵的得胜的一翼，不要让敌方骑兵能够再度集合起来，而应保持良好秩序以向他们追击。”（原书第一一八页）

“如果毫无理由地让士兵流血，这是非人道的屠杀。”（原书第一二〇页）

“虽然对伤患应该立即加以帮助，但却不可忘记杀敌的责任。”（原书第一二一页）

“如果还有任何事尚未完成，那么你就不可自以为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原书第一二二页）

“我的错误是对我的军官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确信，我一定会竭尽一切努力来加以改正。”（原书第一二六页）

“对于会战有一条定理，那就是强迫敌人作他本来不想做的事，因为你的兴趣刚好与他对立。凡是他不想做的事也就是你最希望他做的。”（原书第一二六页）

虽然菲特烈需要和平，而且在埃克斯-拉-查佩里和约签订之后，他也曾经说过：“从今以后，除非为了自卫，我连一只猫都不会加以攻击。”可是他却没能认识到他这个获得成功的侵略行为的含意。它使奥地利怀恨，法国畏惧，于是两国捐弃旧嫌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于菲特烈而言，这是很不幸的；特蕾莎的首相考尼茨亲王却能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菲特烈的侵略已经使法奥之间的对立传统过时了，所以他向女王建议设法要求法国协助收复西里西亚，而以奥属日德兰作为报酬。特蕾莎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考尼茨开始游说法国宫廷。第一点，他指出如果法奥两国继续争斗，那么只会使菲特烈一人得利。第二点，由于俄国女皇伊莉莎白非常想吞并东普鲁士，而只要用马德堡为代价，就可以收买萨克森，用不来梅也可以收买瑞典，所以如果以奥属日德兰为交换条件，而法国同意支援奥地利的话，就可以组成一个七千万人的大同盟，从而把普鲁士和它的四百五十万居民从地图上抹掉。虽然这个建议与法国的传统政策相违背，但是法国宫廷中的真正有权势的幕后人物庞巴杜夫人——曾受过菲特烈的侮辱——竭力帮忙。但是在未获最后同意之前，英国人却采取了一个行动，使危机急转直下。

当英国正在与法国忙于进行“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时，因为担心汉诺威的安全，不惜出重金收买俄国，要他们把重兵集中在西部边界以保障汉诺威的安全。

菲特烈一听到考尼茨谈判的风声，他马上就企图拉拢英国，表示愿意保障汉诺威的领土完

整。英国政府立即接受了他的好意，因为与俄国女皇谈判的协定尚未批准，所以英国政府中途取消了这个谈判。接着在1756年1月，英普两国缔结了一个同盟，因为那是纯粹防御性的，所以并不影响菲特烈对于法国的条约义务。虽然如此，菲特烈却早已认识到一旦有战争发生，侵入汉诺威必将是法国计划的一部分。最后在5月，为了对抗这个“西斯敏斯特条约”，法奥之间也签订了一个“凡尔赛条约”，这也是防御同盟的性质。因此，到1756年夏天，欧洲就分化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面为英国和普鲁士，一面为法奥两国，外加俄国、瑞典和萨克森的支持。

对于奥地利而言，考尼茨计划是一个胜利，但是对于法国而言，这却是一个乔装的灾难。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已经证明了法国海外殖民地的脆弱地位，在海地和印度，英法之间早在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殖民地战争。所以如果欧洲再爆发新的战争，那么法国必然是主要成员，于是它的海外帝国的大部分就会化为乌有。后来果然如此。菲特烈从他的间谍方面获得消息，得知俄国女皇正鼓动特蕾莎加强她的军事准备，他认为如果等她准备好了再开战，对普鲁士将大为不利，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说：“让我的敌人骂我是一个侵略者，这是小事，但却不能让整个欧洲先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虽然普鲁士的地理位置使菲特烈采取的内线作战方式在这个环境中非常有利，但普鲁士却缺乏可供防御的边界，而且面对着敌军，他的兵力处于一比三的数量劣势。在南面，如果奥地利人与萨克森人携起手来，他们距离柏林就只有四十英里；在北面，如果瑞典军集中到斯塔尔松德，相距就在一百三十英里以内；在东面，如果俄国人渡过了奥德河，相距将只有五十英里；在西面，如果从哈里附近进入普鲁士，那么法军到柏林也只得有一百英里之遥。不过其间却有一个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军队还停留在不同的准备阶段中，奥军尚未与萨军合作；俄军还没有越过波兰的荒原，瑞典人也还没有渡过波罗的海，法国人也没有渡过莱茵河。

7月，菲特烈要求维也纳保证在波希米亚境内集中的奥军不是用来对付普鲁士的。结果只得到一个闪烁其辞的答案。于是菲特烈决定不再等候，他留下了11,000人防御瑞典，26,000人防御俄国，37,000人防守西里西亚，而亲自率领70,000人，于1756年8月29日，突然不宣而战侵入萨克森。9月10日占领了德累斯顿。于是菲特烈封锁住皮尔拉，10月与奥军在洛博西兹遭遇，接着也将他们击败。

菲特烈入侵萨克森，使欧洲各国大为震怒，认为他不讲道义，于是帝国会议一致同意废除菲特烈。同时，同盟国决定出动五十万大军以击碎侵略者。

一等到道路已经没有积雪阻碍，菲特烈就进到了布拉格，在那里又与奥军遭遇，于1757年5月6日将他们击败。他一面围城，一面继续向南前进，6月18日他在科林鲁莽的攻击道恩元帅所指挥的奥军，对方兵力差不多要比他多两倍。菲特烈遭受了一次惨败，在33,000人的兵力中损失了13,000人，结果被迫解除布拉格之围，并撤出萨克森。

道恩的胜利使同盟国大感兴奋，于是决定从四面八方围剿菲特烈。他们的计划如下：萨克斯-希尔德堡豪森的约瑟夫亲王指挥帝国陆军33,000人与苏贝斯元帅所率领的30,000人会合起来以收复萨克森。恩斯特斯元帅和黎塞留公爵共同指挥100,000人，攻击在汉诺威的库伯兰德公爵；俄军17,000人已经占领了梅美尔，预定侵入普鲁士；瑞典军17,000人，在斯滕纳伯格伯爵指挥之下，预定在不来梅登陆；而100,000奥军，在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指挥之下，继续攻击菲特烈在科林的残部。这样一总算起来，差不多有390,000人集中起来对付他，不过菲特烈并不害怕，他面对道恩撤出了他的25,000人，跑了一百七十英里的路程赶到艾尔弗特去威胁苏贝斯。

1757年5月1日，法王路易十五与特蕾莎签订了第二次凡尔赛条约，允许每年给与以三千万“利弗”（法国古银币）偿付俄国人，作为支援的代价。

6月间，恩斯特斯开始行动，7月26日，他在汉斯滕贝克偶然地击败了库伯兰德公爵，因为本来双方主将都已下令撤退，可是有一个支队没有奉命行事，结果使法军获得了一次意外的胜利。随后，黎塞留公爵代替恩斯特斯，他与库伯兰德私自签订了一个条约，条件是允许英法两军整装回国。几星期之后，英法两国政府都不肯批准这个条约，而黎塞留却不去与苏贝斯会合，反而依照法军的老习惯开始洗劫普鲁士。苏贝斯也是一路走一路洗劫直到马德堡，这是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兵工厂，此后就以向柏林进攻为意图。

这时，俄国也已经进入普鲁士，其野蛮行径闻所未闻。为了阻止他们，菲特烈命令列瓦尔特元帅率领25,000人，从大亚格恩多夫向俄军八万人进攻。8月30日，他发动了攻击，但是却遭到了失败。于是到柏林之路已经畅通无阻，可是和通常发生的情形一样，俄军因为缺乏补给，自动的逐渐“融化”掉了。虽然如此，到10月份，菲特烈的地位实在已经危殆不堪，连他自己都认为战争已经输定了。

虽然认识到自己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但是他却不能坐以待毙，所以他决定还是向法军进攻。他留下贝文公爵率领41,000人在鲁萨提亚对抗查理亲王的112,000人，他自己在8月25日出发前往德累斯顿去集中他的兵力。从德累斯顿他又前往艾尔弗特，于9月13日到达，而苏贝斯则退往埃森纳赫。菲特烈于是把十万“萨拉”付给黎塞留，贿赂他按兵不动，自己一路尾追着苏贝斯，肃清了戈萨，并留下了塞德里兹将军在那里监视他。9月19日，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进往戈萨，但在遭遇塞德里兹之后即匆匆撤退。

当菲特烈作战之际，贝文被逐回到了布雷斯瑙，而哈迪克伯爵则率领了3,500名奥军，攻击到了柏林。10月16日，哈迪克进入普鲁士首都，在获得了三十万萨拉的黥金之后才离开。听到哈迪克突袭的消息，菲特烈马上留下七千人，由凯斯元帅率领，负责防守萨尔河，自己亲自赶去救援他的首都；但到10月20日，他才知道已经太迟了，于是决定赶回来。而当菲特烈不在的时候，苏贝斯已经获得了增援——布罗格列元帅所率领的15,000人——开始侵入萨克森，10月27日，到达威森菲尔斯，在那里他要求莱比锡的凯斯投降，但遭到断然拒绝。

回来之后，菲特烈又与凯斯会合在一起，使骑兵增加到大约22,000人，苏贝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退回到萨尔河上。10月30日，菲特烈离开莱比锡，第二天进入威森菲尔斯，并立即攻击法军前哨，但却发现桥梁已被破坏。凯斯也发现在梅尔斯堡和哈里的桥梁都被破坏。虽然现在菲特烈的地位很危险，可是苏贝斯却愚蠢的放弃了萨尔河之线退往莫亨。菲特烈修复了这三座桥梁，于11月3日渡过萨尔河，在莫亨附近的布劳恩斯多夫宿营。他命令塞德里兹率领骑兵1,500人去突袭敌营，并决定次日进行主力攻击。可是这个突袭却促使苏贝斯乘着黑夜撤到另一个比较稳固的阵地。菲特烈发现这个营地十分坚强无法攻克，于是在11月4日撤营前往罗斯巴赫。

苏贝斯的懦弱使他的军官们大为不满，其中包括包尔色特——他在1744年到1747年间的战争中享有盛名——他认为菲特烈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所以建议苏贝斯绕过菲特烈的左翼，从而切断他的退却线。此外，如劳易德少将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联军的人数对菲特烈的兵力几乎占有二比一的优势，所以他们趾高气扬，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进攻，并准备用一个冲锋就解决这个战役，因为他们的部下已经十分疲惫，似乎不愿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旦决定之后，对包尔色特的建议根本未作执行的准备。直到11月5日，当有些联军的部队已经出外搜劫之后，苏贝斯才从希尔德堡豪森方面获得如下通讯：“对敌军的攻击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时间，他昨天的行动很明显表示他并不准备攻击我们，而似乎是想切断我们与弗莱堡之间的交通线。所以我主张我们立即前进，占领希芬罗达高地，并从那里攻击他。”直到这个时候，苏贝斯才开始准备。

双方准备交战的战场是一个宽广开阔的平原，缺少树木，罗斯巴赫村位于一个低缓的小丘上，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联军营地。在罗斯巴赫与梅尔斯堡之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在溪流南面，就是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山。卡莱在《菲特烈的历史》中形容道：“这种松软的沙泥只有拉车的马可以感觉到，而走路的人则感觉不到，因为他们很少见到如此平坦的山地。”平原的南面是萨尔河，在数英里外有威森菲尔斯小村，位于罗斯巴赫的东南方。收到希尔德堡豪森的通讯后，苏贝斯就派了部分法国骑兵，由圣戈曼伯爵率领，前进到罗斯巴赫以西三英里处的格罗斯特去监视敌营，并且保护法军的左翼。苏贝斯命令他的部队在上午十一时拆营，成三个纵队前进。前卫是奥地利和帝国骑兵，中央为法国和帝国的步兵，后卫为法国骑兵。在佩特斯塔德，前卫暂停下来与法国骑兵会合，在举行了一次将领会议之后又继续前进，并向莱因哈特斯韦本的方向作了一个左向的旋转。他们的行动异常迟缓，军乐悠扬，旌旗招展，仿佛胜利游行一样。

菲特烈一直严密监视着敌军的运动。他在位于罗斯巴赫的高屋顶上派了一位军官——高德上尉，并且派出许多巡逻队，有些一直深入到了法军所放弃旧营地之内，并从农民的口中获悉苏贝斯已经选择通过威森菲尔斯道路，但是他却无法判断敌军的正确方向：（一）可能向弗莱堡前进，因为他们缺乏补给；（二）可能向威森菲尔斯前进，但又似乎不像，因为那里的桥梁还未修复；（三）可能向梅尔斯堡前进，以切断菲特烈在萨尔河上的交通线。两点钟左右，正当国王用膳的时候，高德冲进房间，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佩特斯塔德，并正向普军的左翼旋转。菲特烈亲自爬上屋顶，看了一下马上就明白了敌人是想从侧面和后方来攻击他，并驱使他离开自己的交通线。下午两点三十分，他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的执行是那样迅速，所以有一位法国军官形容说：“好像是在歌剧中变换布景一样。”

到下午三时，营帐都已拆卸装车，部队纷纷开动。当此之时，三十三岁的塞德里兹将军，率领三十八个中队的骑兵，首先疾驰而去。他前进到罗斯巴赫溪流上，除右翼方面留有少数骑哨外，其余毫无掩护地直取雅努斯和包岑两个小丘，紧跟其后的就是步兵和十八门重炮；菲特

烈命令将重炮阵地放在雅努斯山上，右方为步兵，而左侧是塞德里兹的骑兵。在罗斯巴赫留下了七个中队以监视圣戈曼。

尽管运动如此迅速，但苏贝斯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错觉，似乎普军是在全面退却。所以他命令他的前卫赶紧向雅努斯山前进，他如此匆忙地下达了命令，因此对于如何部署兵力竟完全没有指示，也没有命令战斗人员留下他们的包裹和营具。这些步兵以三个绵长的纵队前进，领先的是法国的皮德蒙和梅里两个团。在右纵队的前面和侧翼是两个团的奥地利装甲骑兵和帝国骑兵；预备队为十个中队的法国骑兵，另有十二个中队保护左翼。对于地形完全没有进行侦察，也没有前卫，全军完全是在盲目前进。

现在战术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是想迂回菲特烈的斜形攻击队形。他们的理由是：既然我们在数量上占了优势，而他也已经丧失了主动，现在我们所要做就是绕过他的左翼攻击他，于是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可是实际情形却完全不同。到下午三点三十分，他们就正好暴露出一个侧翼——前进纵队的头部——让菲特烈加以攻击——因为这时他的位置恰好适合这种进攻。使联军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到了这时，他们还是认为普军处于全面撤退之中，所以苏贝斯又把布罗格利所率领的骑兵预备队也放到前面，从而使普军的攻击目标更加明显。

此时，塞德里兹率领着他的四千名骑兵，正在包岑山地后面监视着联军纵队缓缓地接近。当他们靠近之后，他不等命令就率领部下冲上前去。几分钟后，他把自己的烟斗在空中摇了一下，这是发动攻击的讯号。据当时参战的法国骑兵军官卡斯提斯记载说：

“我们还来不及布列成阵形，普军的全体骑兵就冲上来了，仿佛一堵坚硬的墙壁，以极高速度推进。他们的右翼攻击奥地利骑兵，这时在纵队中能够立即应战的人员还不到三四个中队。他们的左翼则向我们（法军）进攻。”好比一把锋利的钢刀，普国骑兵在这一大堆尚未展开的敌军中来往冲突了四次，驱逐敌人向弗莱堡溃退。最后，塞德里兹收回了他的部下，在塔格维本的谷地中休整。

当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雅努斯山上的炮兵也同时向溃逃中的联军步兵开火，在这个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普鲁士的亨利亲王率领七个步兵营快步前进，攻击领先的敌军以支援骑兵。他这个攻击是具有决定性的，正如一位沃尔腾堡的龙骑兵所说的那样：“那些炮火使我们整行地被撕裂，普鲁士的火枪兵成了可怕的刽子手。”

联军步兵被逐回后，前后挤成一团，于是塞德里兹又抓住这个机会，再度从后方打击他们，迫使他们落荒而逃。至于普鲁士炮兵，狄克尔在《七年战争》一书中有如下评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说，这一天的成功是属于炮兵的。如果他们也像在科灵会战时那样消极无所事事，那么敌军可能已经展开前进了，他们的失败也就不会如此彻底，而骑兵的成功也就不会那样卓绝。”

到下午四点三十分，会战的胜负已经完全决定了。

菲特烈的右翼在伦德斯塔特，左翼在莱因哈特斯韦本，在火炮掩护之下全面向崩溃中的敌军攻击。联军的退却变成了溃败。圣戈曼说：“在周围四十英里之内，到处都是我们的士兵，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法军的纪律都非常恶劣。虽然普军并未追击，原因是由于黑夜已经降临，而菲特烈又急于赶回西里西亚，但由于纪律废弛，却使他们自己变成了乌合之众和惊弓之鸟。

普军损失为死165人，伤376人。联军方面为死伤3,000人，被俘5,000人，其中包括8位将军和300名军官。另有火炮67门、7面国旗、十五面军旗和许多行李。从政治上来说，很少有其他会战能比这一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自从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带着法国加入三十年战争之后，向东对日尔曼扩张一直都是法国人的目标。巴拉廷曾经累次遭到入侵和蹂躏，可是正好比凤凰从自己的灰烬再生一样，日尔曼的民族精神兴起了，而罗斯巴赫战场上的菲特烈则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虽然欧洲人不能预测罗斯巴赫一战对未来的影响，可是整个欧洲却突然认识到法国陆军已经腐败透顶，它那不可击败的神话已经破产。坦波霍夫将军在他的《七年战争史》中说：“在整个战争历史中，没有一个会战可以像罗斯巴赫会战这样产生特殊强烈的印象。无论敌友，无不耻笑联军的将领。当苏贝斯失败之后不久，路易十五居然升他为法兰西元帅，于是大家就笑得更起劲了。”

英国人听到菲特烈胜利的消息之后，到处都放焰火表示庆祝。英国国会于1757年，只是很勉强地通过给与菲特烈164,000镑的军事援助；而到1758年，却自动增加到1,200,000镑。从金额的增加上即可以反映出英国人的思想。虽则如此，这个会战的成果却极为有限，因为苏贝斯和希尔德堡豪森的溃败，只不过表示菲特烈的工作刚刚完成了一半，而西里西亚的情况仍然危险到了极点。

为了整补部队，菲特烈停留了一个星期；11月13日，菲特烈率领13,000人从莱比锡出发，

于11月28日到达了170英里以外的帕赫维兹。此时，施维德-尼兹要塞已于11月14日向奥军投降。贝文则于11月22月在布雷斯瑙被击败，并已放弃该城。在帕赫维兹，菲特烈命令杰森将军去指挥贝文的败军，并命令他们于12月3日集中在该城。同一天，菲特烈前进到纽马克特，用一个轻骑兵的突袭将它占领了。在纽马克特，他获得确实的情报，知道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都已离开他们在洛赫的营地，并且进到了利萨，其右翼靠着尼配恩村，左翼则在萨格舒茨村。菲特烈的迅速前进使他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以为他在罗斯巴赫之战以后一定会宿营过冬。

12月4日，查理和道恩把重炮留在布雷斯瑙，匆匆渡过施维德尼兹河，在该河以西占领阵地。全军共有84个营，144个中队和210门火炮，总人数在六万到八万之间，分成两个部分：右翼由罗切斯率领，得到尼配恩泥沼的掩护；中央位置在吕岑，左翼由纳达斯特指挥，位于萨格舒茨后方，战线向后绵延，并有鹿角保护。右翼骑兵位于古克维兹，左翼骑兵则在吕岑。单以防御而论，这个阵地是很坚固的，不过却太长了一点，两个侧翼之间的距离达五英里半。面对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阵容，菲特烈只集中了36,000人，其中24,000人为步兵，共分四十八个营；另有12,000名骑兵，分为128个中队。他一共有火炮167门，其中重炮61门，还有十门是超级重炮。战场是一个开阔的平原，菲特烈曾在此地进行过演习，所以对于地形早有充份认识。

12月5日上午五时，普军从纽马克特前进，菲特烈一马当先。在行进到距吕岑一半距离时，他命令全军暂停，把他的将领们召集到一棵桦树下，对他们作了如下训示：“如果我让奥地利人占领了西里西亚，那么我将一无是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决定违背一切战术规律，向查理亲王发动进攻，尽管他的兵力差不多要比我们强三倍。我必须冒险采取这个步骤，否则一切都完了；而且我们必须击败敌军，否则就全部死在他们炮火之下。这是我的想法，这也是我的做法。现在大家回去，把我所说的话向各团转达。”

菲特烈计划向前直进，达到布雷斯瑙道路，在奥军的右翼方面作佯攻，然后利用敌人阵地过分延伸的弱点，横越过其正面前进，打击联军左翼，将他们赶离交通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决定把全军都放在帝国军的左翼，用他的右翼进行最有力的打击，而将左翼缩回。有了这种预防措施，就不会重犯布拉格会战中的错误，也不会像在科林会战中那样遭受重大损失。

在部队休息完毕之后，菲特烈命令继续前进，直抵波尼村。前卫共为十个营和六十个中队——菲特烈亲自领先——主力分为四个纵队在后跟进，各团的军乐队一路吹奏。军人们开始高唱军歌，歌词如下：

我要尽忠职守，  
我的地位是您赐与，  
我要快乐而勇敢的工作，  
我这样工作，一定能成功！

有一位军官问国王是否应命令他们停止唱歌。菲特烈回答说：“绝对不必，有这样的部下，上帝在今天一定会赐给我胜利的。”

在波尼与敌军发生了接触。天刚拂晓，地面上还罩着一层薄雾，透过雾幕可以看见一长线的骑兵横越着大路展开，左端消逝在雾中，已不可见。最初他们以为是奥军的右翼，但是为了更有把握起见，普军同时从正面和侧翼发起冲锋，才发现那是罗斯提兹将军率领的五个团——它立即被击溃，有八百人被俘，包括身负重伤的罗斯提兹将军本人在内。接着又暂停了一下，不久晓雾全部消除，于是看见整个奥军战线，从尼配恩一直延伸到萨格舒茨，看得是那样清楚，几乎连人数都可以数得出来。

波尼村的丧失对于奥军的最后失利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菲特烈从那里可以望见联军的全部部署，而这个高起的地形却使奥军看不见普军主力正分为四个纵队向该村前进。在他们行将到达之际，菲特烈派出前卫中的骑兵去追击罗斯提兹的残部，也就是说向奥军的右翼逼近，这一方面是由罗切斯伯爵指挥的，他看到普军接近，以为这就是主力的攻击，于是立即要求道恩元帅给以紧急增援。于是道恩将他的骑兵预备队和左翼骑兵的一部分送往这一面。这时，普鲁士军主力的四个纵队合并成为两个纵队，到达波尼之后，就在高地掩蔽之下，向右作了一个旋转，然后向南面前进。坦波霍夫这样说：“不可能看到比这更美丽的景象：各纵队前锋彼此平行，相互间的距离又如此一致，仿佛阅兵一样，只要一声口令就可以变成横队。”

行军序列如下：右翼在前，杰森率领四十三个中队，莫里斯亲王率领六个营，前卫为威德将军率领的三个营。左翼在后，由雷佐将军率领，包括其余的步兵，侧卫为德雷森将军所率领的四十个中队。每一支骑兵各有十个中队的轻骑兵提供支援。后卫由沃尔腾堡的尤金亲王率领，包括二十五个中队。

由于菲特烈的部队突然失踪，站在弗贝尔维兹的磨坊上的查理亲王和道恩元帅，就以为敌

军全面退却了。道恩说：“普军已经走了，不必干扰他们！”可是正午不久之后，又看到普军的先头部队在洛勃迪兹与萨格舒茨之间出现了，从那里他们威胁到奥军已经减弱的左翼。

突然面对着拥有压倒优势的敌军，纳达斯特立即向查理紧急求援。不过已经太迟了，大约在下午一时，威德在六门火炮支援之下，由莫里斯追随在后，开始突击萨格舒茨的防线。同时，纳达斯特也向杰森的先头骑兵中队冲锋，把他们向南面驱赶，一直追击到六个支援营的附近，他们的火力阻止了奥军骑兵，于是杰森脱离了险境，扭转头又向纳达斯特冲锋，把他逐入拉德勒森林。

到一点三十分，纳达斯特的这一翼已被击溃，在萨格舒茨与吕岑之间的战场上，遍野都是逃兵，而普鲁士的轻骑兵则在后面追击，再后即成双列前进的步兵。右面为威德，中央为莫里斯，左面为雷佐，全部都有重炮兵的支援，用纵射打击飞逃中的奥军。

当普军前进时，查理才知道已经受到突然打击，匆忙召回去增援罗切斯的骑兵，在等候他们的同时将步兵分别投入战斗。虽然吕岑的防御很弱，但奥军却决定在那里坚守，利格尼亲王是当时奥军中的一位上尉，对此有很生动的记载：

“我们拚命逃跑。我们的中校几乎最先被击倒。接着我们丧失了少校，最后军官只剩下三个人。混乱之中，我只好暂代指挥官，把所有人员集中起来，最多不超过二百人。我们退到风磨所在的高地上。”

吕岑镇中的拥挤情形，和布伦海姆的情形一样糟糕，因为部队实在塞得太多，纵深从三十列到一百列。虽然如此，但是据坦波霍夫的记载：“激烈的战斗还是继续不停，敌人在失望之余困兽犹斗，一营又一营的兵力开上去，都不能成功。于是国王决定使用他的左翼。最后，这些近卫军在其资深的长官（现在为莫伦道夫将军）率领下以无比的勇气向前推进，经过半小时的激战，终于迫使敌人放弃了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从村子里出来，因为奥军已经把一炮兵连撤到北面的山岭上，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步兵重新展开，正好与原有正面形成直角。菲特烈命令他左翼剩余的兵力前进，但却被敌军炮火赶了回来，于是他在布特堡小山上设立了炮兵阵地，包括超级重炮在内，将奥军扫退。圣保罗在回忆录说，会战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可怕的炮兵比普鲁士的步兵贡献更大。

当奥军被扫退时，正是四点钟。到了薄暮时分，罗切斯已经把奥军的右翼骑兵，集中在弗罗贝尔维兹，看见雷佐的步兵暂停不前，就向他的侧翼发动冲锋。对于罗切斯而言，可说是不幸之至，因为在拉达克斯多夫村后，正好隐藏着德雷森的四十个中队，这是他看不见的。突然之间，在布特堡炮兵阵地的火力掩护之下，他们冲入开阔地，三十个中队从正面向罗切斯冲锋，贝茹斯的龙骑兵攻击他的侧翼，而普特加梅的轻骑兵则迅速绕到他的后面。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攻击，结果罗切斯被杀，其部队被击溃。接着，德雷森向右旋转，从后方向奥军的步兵冲锋，而威德则从吕岑附近，攻击敌军侧翼。夜幕将垂时，奥军已经全部崩溃，他们的退却演变成了狂奔。

菲特烈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利萨为止。他发现这个小镇挤满了溃兵，当他骑马进入该镇时，遇见几个奥地利军官，手里拿着蜡烛，他下马对他们说：“晚安，先生们，我敢说你们一定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我想在这里找个睡觉的地方。可以吗？”

12月6日，他命令休息一天，第二天前进到布雷斯瑙，并派杰森率领一半骑兵和九个营的步兵及轻装部队，继续追击查理。他们一直追到12月9日，又俘获两千多人。布雷斯瑙于12月19日投降，俘获守军17,000人和81门火炮。

如同所有会战一样，对吕岑会战的损失估计有着各种不同说法。可能普军的全部死伤数字一共是六千人，而奥军则为一万人，此外还有21,000人被俘，并损失了火炮116门，军旗五十一面、车辆四千。依照菲特烈估计，在这个战役中，奥军的全部损失为41,442人，依照坦波霍夫的估计，则为56,446人。不管哪个版本更准确，但这种损失却是有毁灭性的。除了施维德-尼兹要塞以外，西里西亚全境都已收复；而且普鲁士也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个会战，坦波霍夫有如下评论：

“无论是在执行或后果方面，要想找出一个可与吕岑会战相比拟的例子，那么在古代史中勉强可以找到一个，而在近代史中却可说是绝无仅有。它在军事科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菲特烈独创的战争体系，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都有上佳的表现。”

拿破仑也说：“吕岑会战，在运动、机动和决断三方面都是杰作。单靠这一个会战，就足以让菲特烈永垂不朽，并可被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名将之一。他在战役中所作的一切调动，都是合乎战争原则的。他没有当着敌军的正面侧进，因而他的纵队是敌人看不见的。在波尼战斗发生之后，奥地利人就认为他一定会攻击前面的高地，可是当他们坐待之际，他却在地和雾

幕掩蔽之下，以前卫作佯攻，而将主力继续前进去攻击敌军的左翼。”

对于本章所讨论的两个会战，如果能够加以比较，则似乎颇有趣味，因为它们都是斜形攻击队形的代表，但一个是最坏的，另一个却是最好的。在罗斯巴赫会战中，真是毫无战术可言，联军的指挥官根本没有计划。他们如能坚守萨尔河一线并继续采取守势，那么菲特烈就会不战而败；可是他们却偏偏放弃防守，使敌人获得交战的机会，这正好满足了菲特烈的愿望。他们对于这种运动完全是外行，好比对一个并不了解的体系死搬硬套一样，他们在敌人完全可以看见的情况之下前进，越过敌人的侧翼，并且也没有前卫。步骑炮三个兵种之间，根本没有合作可言，而且圣戈曼也始终没有尝试去发现敌人在干什么。在吕岑一战中，菲特烈是运动、集中、破袭，然后打击。三种兵种的部署和合作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不过更重要的是，他的部下对他的将才具有深刻的信心，这是使菲特烈获胜的主要原因。

虽然在这个卓越的胜利之后战争继续拖延了五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菲特烈也曾经遭受了很大的挫折，不过从整个七年战争来看，菲特烈个人总算是成功的，奠定了他作为古今伟大名将之一的身份。1758年8月25日，他在佐恩多夫击败了俄军，但是10月14日，他在赫克尔希遭到奥军的破袭，失败了一次，虽然如此，他还是把他们逐出了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第二年8月12日，他在库恩斯多夫为俄军所惨败，柏林也被俄军占领，不过他还是击退了敌人。但他的精神却是永不言败的，1760年8月16日和11月3日，他在利格尼兹和托尔高，又连续击败了奥军。（注：要想在这些会战中评论菲特烈的指挥艺术，必须注意到他在数量上总是远比对方居于劣势。在佐恩多夫他以36,000人对52,000人；在赫克尔希，以37,000人对90,000人；在库恩斯多夫，以26,000人对70,000人；在利格尼兹，以三万人对九万人；在托尔高，以44,000人对65,000人。”

1761年，恶运再次降临，到1762年，英国人背弃了他，与法国人缔结了一个单独的和约。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使十三年之后，当美洲殖民地反叛时，英国人在欧洲竟找不到一个同盟国。这件事本身固然可以算是战争的重大后果之一，但却不能把帐记在菲特烈头上。

无论如何，罗斯巴赫和吕岑这两大会战，不仅拯救了普鲁士，使其免于亡国，而且他们的记忆从此支配了日尔曼的历史，再透过历史支配了日尔曼人的心灵。这两个会战产生了民族的团结力和优越感，使日尔曼人民能够渡过拿破仑战争的难关，并且从这里，一步一步，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德国，终于代替法国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这样也就结束了六百年来英法争霸的局面，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特拉法尔加战役

---

战争重起时，英国所处的是自从1781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它现在不仅面临着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而且还必须对付法西两国保持着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从提克斯克直到热那亚的所有港口都可以供拿破仑使用，以担负造船和避难的任务。另外，他也确有入侵英格兰的明显意图，因为在所有法国港口中都可以听到造船工场的敲击声。他那个逐渐建立大海军的计划——目标为法国战舰130艘，西班牙60艘，荷兰20艘，热那亚15艘——也并非空谈。因为从1805年起，尽管连年征战，可是到了1815年，法国舰队的实力还是增强到战舰103艘、巡洋舰55艘。（注：到1814年，英国海军共有战舰240艘、巡洋舰317艘和其他小船611艘。）

所以英国海军现在不仅要应付在英吉利海峡中的联合舰队，而且还要阻止联军方面的船只——包括已经有的和尚在建造中的——离开港口出现在公海上。换句话说，在这种封锁下，即使有一个支队漏网逃走了，也决不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就是不会再有第二个支队又随之逃走。特别是当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了。

联军方面的战舰分布在以下地域：土伦11艘，卡塔赫纳5艘，卡迪兹10艘，维罗尔9艘，罗彻福特3艘，布列斯特21艘，提克斯尔6艘。前两个地方被纳尔逊用12艘战舰加以封锁，第三个地方被奥德爵士的五艘战舰封锁，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地方由杰维斯和他的部下负责，一共用三十七艘战舰在乌桑特和比斯开湾中进行封锁，第七个地方则由凯兹勋爵的九艘战舰，在北海方面加以监视。此外在英国港口中还有5艘战舰，在东西印度还另有12艘。所以在欧洲水域，英国海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其实极其有限。

虽然实力并不充足，但因为英国海军部遵守英国的传统海军政策，把重兵集中于海峡西

面，所以对于这个弱点多少有所补益。只要乌桑特的岸边有一支强大舰队存在，同时面对位于北海沿岸的凯兹支队时，任何用平底船团入侵英国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如果对方的被封锁支队逃出了港口，而负责封锁的舰队又无法迫使它接受会战予以歼灭，就应该立即集中到乌桑特的附近，以增强那里的舰队实力。所以乌桑特乃是英国海军防御战略的重心，因此在所有舰队中，杰维斯的舰队居于重要地位。如果他被击败，那么凯兹就失去了掩护；进一步说，如果凯兹也被击败了，那么除了气候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阻止法国船团从布鲁日渡海攻击英国。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他并不太了解海军战术，而且也不太注意风向和潮流，不过作为一个海军战略家，他并不需要学习什么新东西，因为战略原理本身就是互通的。

虽然这个以特拉法尔加会战为顶点的战役，始于1805年3月2日拿破仑给在布列斯特的坎特曼中将和在土伦的维伦纽夫中将的命令。不过为了清楚地说明整个战役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回溯到1804年12月12日，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之日。

在那一天，拿破仑命令维伦纽夫突出土伦港，驶往西印度群岛，并在马丁尼克与梅塞斯会合，后者应从罗彻福特突出以与他会合。以后，在六十天之内他应尽量使英国领地遭受损害，维伦纽夫则应驶往维罗尔，救出被封锁在那里的支队，是由科顿上校所指挥的五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然后再进向罗彻福特。

1月11日，梅塞斯率领五艘战舰和四艘巡洋舰，从罗彻福特潜逃出来向马丁尼克驶去。一个星期之后，当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前往波里西欧海峡中的马达里拉群岛时，维伦纽夫率领十一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驶出土伦港。听到维伦纽夫逃走的消息后，纳尔逊不考虑其他的可能性，认为维伦纽夫一定会驶往马耳他或埃及，于是立即先向东赶去，于2月7日到达亚历山大港。当他发现并无敌踪时，又赶往马耳他，在那里才知道由于遇到了风暴，维伦纽夫已经被迫返回土伦。因为仍然相信维伦纽夫的目的地为埃及，所以在3月26日，为了拦截他的舰队，纳尔逊就让他支队停驻在撒丁岛以南的海面上。四天以后，他才听说维伦纽夫已经再次出海，不过纳尔逊当然不知道维伦纽夫是在执行拿破仑3月2日的训令。

这个训令的目的是想在马丁尼克集中一支拥有40艘以上战舰的舰队，主要部队为坎特曼的布列斯特支队，共有2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以及维伦纽夫的土伦支队，共有1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在航行途中，前者应救出被封锁在维罗尔的科顿支队，共有四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后者应救出在卡迪兹的西班牙支队，这是由格拉维拉所率领的7艘战列舰。在马丁尼克，梅塞斯也要率领5艘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加入进来，等到全部兵力集中之后，就由坎特曼任总司令，指挥这个联合舰队向乌桑特进发，攻击那里的英国舰队，并继续向布鲁日前进。维伦纽夫所奉的命令，是要在坎特曼之前先达到马丁尼克，在那里等候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后坎特曼还未来到，就驶往卡迪兹，在那里另有新的命令等候他。

为了方便起见，在没有说到以下的作战过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这两位主将——维伦纽夫和纳尔逊的性格。

维伦纽夫要比纳尔逊小五岁，一个生于1763年，另一个生于1758年。他是一个法国贵族出身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属于少数未被清算的幸运儿，并且升官极快。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饱学之士，若在海军部中工作似乎十分适当，但并不适于担任指挥工作。虽然他并不缺乏个人勇气，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不相信拿破仑的侵英计划，他对于他的部下和盟友都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在尼罗河口的战斗中，他所指挥的舰只是两艘逃走的法国战舰中的一艘。从此以后，他对于纳尔逊总是心存畏惧。

纳尔逊的个性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果敢而富有想象力的战术家，具有独立的眼光，有野心，对于自己的名誉非常敏感，有时甚至向慕虚荣，而且常常侮辱他不喜欢的人。他的精神勇气十分罕见，比如在圣文森特海战中，他单独脱离战线去突击西班牙前卫舰队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格林菲尔在纳尔逊的传记中说：“这种个人的主动精神，超人的英勇行为，都是海军史上史无前例的。”他在尼罗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等各次战役中，所表现的英勇都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虽然如此，他却是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他从未认清战略学是一种科学，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但它至少是以事实而不是以直觉为基础的。在1804年和1805年之间，最重要的战略性的事实就是拿破仑的海军对英格兰的威胁，可是在这一时期纳尔逊的信件中，总共只有一次提到“侵入”的字样，而且最巧合的是，这还是当拿破仑已经放弃了侵英企图之后的事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中海方面，即使是并不聪明的维伦纽夫，在斗智方面都可以占他的上风。纳尔逊所未能认识到的是，在这个时候，战略重心是在英吉利海峡而不是撒丁岛的海岸和尼罗河口。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依然是英国有史以来的最伟大海军将领。

3月10日，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还停留在撒丁岛西南角上的帕尔马湾，当他听说维伦纽夫正在装载部队的消息，他立即扬帆往土伦。他在那里发现一切的征候，都表示维伦纽夫是准备出海了，但他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认为维伦纽夫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埃及。所以他又回到帕尔马湾，因为从那里他可以掩护纳普尔斯和西西里，封锁通往埃及的主要海路，如果维伦纽夫的目的地是出大西洋，那么这个位置也便于向西迎击。3月30日，维伦纽夫按照拿破仑的训令，从土伦出发向卡迪兹前进以会合格拉维拉的支队，然后再驶往西印度。

纳尔逊于4月4日才第一次获得维伦纽夫离去的消息。3月31日，他的一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60哩的海面上，发现了维伦纽夫的舰队——在帕尔马以西约300哩。这个消息使纳尔逊向海军部报告说：“我将向埃及推进。”他的视线仍注意着埃及，相信维伦纽夫是先向卡利塔岛进发，然后再绕过非洲海岸以达亚历山大港，所以他把他的兵力置于撒丁岛和卡利塔之间。但是他在这样布署之后，又担心维伦纽夫会绕道撒丁岛北面，于是又把他的舰队移到巴勒莫以北50哩的乌斯提卡岛，并于4月7日到达该地。

同一天，维伦纽夫也到了卡塔赫纳海外，此时奉命封锁格拉维拉的奥德爵士已经接到了斯特拉汉爵士的警告，后者奉纳尔逊的命令，正护送返回英国的运输船只经过阿尔吉西拉斯，他于4月8日看到维伦纽夫从海峡中驶出。因为奥德手中只有四艘战列舰，这个消息使他左右为难。他是应该原地等候纳尔逊呢，还是应该向乌桑特集中呢？当斯特拉汉告诉他纳尔逊正在封锁通往埃及的海路时，他就作了最后的决定——奥德留下他的巡洋舰与维伦纽夫保持接触，自己在发了一个通信给海军部之后，就开始向北进发。

他的通信是非常高明的，尽管纳尔逊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对他进行辱骂，可是从这个文件上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略情况的了解要比纳尔逊清楚。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我相信敌人在卡迪兹不会停留太久，其向西进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样可以突然集中几个支队的兵力。拿破仑可能希望在海峡中获得一个暂时性的优势，使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一次致命的打击。”

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意图。在猜透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奥德就出发去增强战略重心——乌桑特。

4月9日，维伦纽夫在卡迪兹港口下锚，用讯号通知格拉维拉出来。但是他却非常担心纳尔逊会尾随而来，到下午一时，他不再等候格拉维拉，而是起锚开船，让西班牙人跟在他后面蹒跚前进。

不久，因为维伦纽夫并未在提尔亨尼亚海出现，纳尔逊就将他的部队从乌斯提卡移到托罗，这是靠近帕尔马湾的一个小岛。4月18日，他听说维伦纽夫的舰队，已于4月8日在直布罗陀海外被发现时，他向英国海军部报告说，因为他的森严戒备，敌人发现已不可能向地中海进犯了。第二天，他又发出另一个报告说他感到满意，因为已维伦纽夫不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而好像是以爱尔兰和布列斯特为目标，他则正在西西里岛的附近。虽然时间已经迟了，但却是绝对依照海军部早已确定的原则。

由于恶劣天气的延误，纳尔逊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碰到正在葡萄牙的坎贝尔少将，他告诉纳尔逊，维伦纽夫正在驶往西印度的途中。纳尔逊一向是容易冲动而且血气言刚，马上就下了决心，于5月10日，率领10艘战舰和3艘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上校作了如下评述：

“纳尔逊立即向西印度进发的决定是否合理，似乎颇有疑问。当拿破仑的“英格兰军团”在布鲁日的准备如火如荼的时候，维伦纽夫的行动与运输这支兵力越过海峡，似乎无可避免的具有关联。不管维伦纽夫已经到那里去了，他却已经比纳尔逊早了一个月，所以一个比较合理而谨慎的假定就是认为法兰西舰队是在进行诱敌行动，以引诱英国海军离开海峡地区。而且当这支诱敌舰队已经在西方和南方失踪时，不久就可能掉转头来，向最后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进发。所以当维伦纽夫已经失踪很久之后，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这实在相当冒险。从全面战略的观点来看，纳尔逊应该向布列斯特前进。在这种捉摸不定危机四伏的情形中，这似乎最安全的办法。”

格林菲尔上校也指出根据另一个理由，纳尔逊也应该与杰维斯会合在一起。英国海军部在5月10日，应该已经接到他在4月19日发出的通信。该部队对于维伦纽夫的行动真象必已早有所知，所以应该自有安排，对维伦纽夫进行追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纳尔逊也向西印度进发，那么追击的就不仅一个支队而有两个支队了。事实上也的确几乎如此。当海军部从奥德（4月30日）和间谍方面得知维伦纽夫已向西印度群岛进发的消息，海军部长巴尔汉勋爵立即命令科林伍德中将，率领11艘战列舰出发追击。当科林伍德已在追击途中时，仅仅是出于偶然，他才知道纳尔逊早已在追击中。如果这个偶然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会有21艘战舰去参加这个“追

逐野鹅”的行动。（注：在直布罗陀，纳尔逊曾经派贝克顿爵士去掩护克莱奇将军通过马耳他。其次，海军部命令贝克顿增强在维罗尔的卡尔德。5月17日，贝克顿驶向北方，10天后他接近芬尼斯特里，与科林伍德相遇，后者告诉他纳尔逊已经率领10艘战舰，早已在追击之中。）

6月4日，在迅速航行之后，纳尔逊进入了巴尔巴多斯，柯齐拉尼少将在那里率领两艘战舰加入进来。在那里他获得了一个错误的情报，说有人看到法国舰队在圣路西亚的上风方面出现，结果他错过了他的敌人。5月14日，维伦纽夫到达马丁尼克时，发现梅塞斯已经返回罗彻福特，而坎特曼还没有到达。后者仍被封锁在布列斯特港中，拿破仑已经不想拖延下去，已于4月29日，派马哥农少将率领两艘战舰，把一个命令送给维伦纽夫，命令他在西印度群岛停留35天，如果坎特曼还是不能与他会合，就驶往维罗尔，接出封锁在那里的15艘船，接着再救出困在布列斯特港中的21艘船，最后集中兵力进入英吉利海峡，出现在布鲁日的前方。

马哥农于6月4日到达，在6月7日又接获了纳尔逊已到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这个消息使维伦纽夫的神经大为紧张，于是竟不顾新命令，于6月10日匆匆返回欧洲。两天之后，纳尔逊到了安提瓜，他猜到维伦纽夫正在返回欧洲的途中，不是到卡迪兹就是土伦，更加可靠的是后者，因为他在这时曾经写信说：“他们可能幻想以为可以直达埃及，而不受到任何的阻碍。”——所以他决定返回直布罗陀。（注：拿破仑似乎十分明了纳尔逊的固执想法。4月20日他写信给狄克里斯说：“纳尔逊可能又会向埃及作第二次的航行。”23日，他又命令在荷兰报纸上发表法军一万人已在埃及登陆的消息以欺骗纳尔逊。）出发之前，纳尔逊派了比特斯华尔兹上校指挥的寇里克斯号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说他已经回来了——这艘船在回国途中，于6月14日看见法国舰队正沿地中海航向以北行进。这就足以证明维伦纽夫是驶往比斯开湾，而并不是象纳尔逊料想的那样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7月7日，寇里克斯达到了朴茨茅斯，而7月19日，纳尔逊也在直布罗陀海峡抛锚。

7月18日在斯巴特角岸边时，纳尔逊曾与科林伍德通信，后者正在担负封锁卡迪兹的任务，他给与纳尔逊的回信，足以使对方认清当前的战略情况。科林伍德的见解是：他相信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爱尔兰，维伦纽夫的舰队现在会首先接出维罗尔支队，绕着比斯开湾走，再救出罗彻福特的兵力，于是就有可能集中34艘舰船，出现于乌桑特前方，在那里可能再加入20多艘船只。他补充说：“当法国政府眼睛盯着大目标时，就决不会再留心细微末节。他们逃向西印度是为了躲避我方海军，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7月20日，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上岸，这是自从1803年6月16日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巴尔汉勋爵说，除非俄国的巡洋舰能够代替现在正从地中海北部撤出的科林伍德的兵力，否则法国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陆军前往沙西尼亚、西西里、莫里亚或埃及。为了这个任务，他一再要求增派巡洋舰和单桅船前来。从他列举的地名上，就可以发现他虽然已收到7月18日科林伍德的来信，纳尔逊还是没有改变其旧有观念。8月3日，纳尔逊才奉命驶往乌桑特以与杰维斯会合在一起。

正当此时，又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足以使拿破仑的计划受到巨大影响。1804年5月12日，皮特再度执政，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另一个同盟。他的计划一部分是以1804年杜莫里兹的《论英格兰的防御》一文为根据。同盟的构成预定为英格兰、俄罗斯、奥地利、瑞典和纳普尔。经过一年谈判，1805年4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9日，俄奥两国之间又签定了另一个条约。他们也曾征求普鲁士参加，但遭到拒绝。这些条约规定俄国应出兵18万，奥国30.5万，瑞典1.2万。英国对于每10万兵额，每年支付辅助费120万镑，但总兵力以40万为限，用来对法西两国作战。

当寇里克斯号到达朴茨茅斯之后，比特斯华尔兹上校前往伦敦，并于8月9日向巴尔汉勋爵报告。后者立即认识到了比特斯华尔兹报告的重要性，于是立即通知杰维斯，要他命令斯特林少将解除罗彻福特的封锁，去增援在维罗尔港外的卡尔德爵士。此外，杰维斯也应命令卡尔德，一旦获得了增援之后就应立即向华尼斯特里角进行，从那里再向西巡航，在六七天之间行走三四十里格的距离。因此，到1805年7月，拿破仑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除了布列斯特与卡迪兹以外，所有其他的法西两国的港口都已经解除了封锁。

维伦纽夫于7月2日已经通过了阿左里斯海，7月22日在浓雾之中，接近芬尼斯特里。如果浓雾不散，那么他可以驶过卡尔德的十五艘船只而不被发现，于是就可以与在布列斯特的坎特曼会合了。但是正午时候，雾幕升起了，卡尔德的一艘前哨巡洋舰报告发现了法国舰队。下午五时，双方进行了一次并非决定性的交战，有两艘法国军舰下旗投降。虽然7月23日双方舰队仍在接触中，但并未再战，次日卡尔德向北进发去会合杰维斯，维伦纽夫也张着满帆向维哥湾前进，于7月28日到达。从那里再驶向维罗尔，并于8月1日到达。

这一战的精神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维伦纽夫对自己的舰队缺乏信念，已经禁不住溢于言表。八月六日他写道：“在浓雾之中，因为我方舰长对于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跟随着前面的船只以外别无良策。在这里我们已经成为欧洲的笑料。”这次战斗使他的感觉有些麻痹。

在维罗尔，维伦纽夫收到了拿破仑在7月16日发出的通信，命令他解除维罗尔的封锁，然后再采取下述行动，以使法军成为多佛尔海峡的主人——或是与罗彻福特和布列斯特两个支队会合在一起，或是只与两者之一会合在一起。随后这支舰队速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行驶，以便与在提克斯尔的荷兰支队会合。如果因为会战或其他原因，维伦纽夫不能完成他的任务，则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入维罗尔港，而应驶往卡迪兹。

因为信托的是维伦纽夫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最后指示，对拿破仑来说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卡迪兹距离布列斯特最远，所以这也正是维伦纽夫心中所最想去的目的地，既然不准许进入维罗尔，他就把三艘已损毁的船只留在那里，而改向柯鲁拉前进，在那里他得到十四艘战舰的增援。

当斯特林为了增援卡尔德而从罗彻福特撤走时，7月17日，代替梅塞斯的阿里曼德少将也就从罗彻福特港口中溜了出来，于8月13日与维伦纽夫会合在一起。可是因为狄克里斯并未将此事通知维伦纽夫，不免铸成大错，终于导致大败。

那一天维伦纽夫出海航行，当他看见一些巡洋舰时，误认为那是英国人，于是立即改向南方行驶以躲避他们。实际上，这是属于阿里曼德支队的舰只，并正在寻找维伦纽夫的部队。如果维伦纽夫能与阿里曼德会合在一起，那么他的兵力可以增加至34艘战舰，如果再继续向北而不是向南航行，那么也许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在8月16日那天，杰维斯已经把他的35艘战舰分为两部分，派卡尔德率领18艘船前往维罗尔。所以维伦纽夫如果能依照命令向北行驶，如果再能侥幸躲过卡尔德，那么布列斯特的封锁真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拿破仑曾经这样感叹道：“维伦纽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如果直向布列斯特前进，他可能避开卡尔德的支队，从而打击杰维斯的舰队，他的30艘战舰就会击败英军的20艘战舰，从而获得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批评固然是对的，不过实际上却很有疑问，因为杰维斯所保留的兵力，有10艘“三层甲板”战舰，按照当时的计算，一艘“三层甲板”船在战斗价值方面可以相当于两艘“双层甲板”船。

维伦纽夫继续南行，于8月20日进入卡迪兹，封锁这个港口的是科林伍德，一共只有3艘战舰。8月22日，贝克顿爵士率领四艘战舰前来增援；8月30日，卡尔德又带了18艘战舰赶到。8月3日，拿破仑到达布鲁日。时间已经很迫切，因为已有许多征候表示在他的后方正在形成一个同盟。奥国正在瓦伦提亚和提罗尔集中部队；根据报告纳普尔也在大量召集民兵。8月13日，当拿破仑听到维伦纽夫已经与卡尔德交战时，他立即向维伦纽夫表示祝贺，并命令他与阿里曼德立即会合，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把法西两国舰只混合编组起来，再向海峡进发。同时他在写给狄克里斯的信中却埋怨维伦纽夫的行动过于迟缓。8月22日他又写信给坎特曼说，维伦纽夫已在与他会合的途中，在他到达之后，就不能迟误一天，立即向海峡进发，以求一雪六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同一天他也写信给维伦纽夫，并把该信寄往布列斯特：“赶紧扬帆，不要浪费一分钟。当我的舰队集中进入海峡时，英格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已上船。只要有四十八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次日，拿破仑仍然不知道维伦纽夫已经到了卡迪兹，他写信给塔里兰德说：“当我对欧洲的情况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有采取一个决定性步骤的必要。”他又说：“如果维伦纽夫和他的三十四艘船，能遵照我的指示，与布列斯特支队会合起来进入海峡，那么时间还来得及，我仍然可以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否则，我就要拔起我在布鲁日的营幕，改向维也纳进发了。”最后直到8月26日，他才下了决心，命令他的参谋长贝提尔准备把在布鲁日的兵力向奥国移动。8月31日，他写信给杜洛克说：“军队已全部处于运动之中，到9月27日，我一切都可准备就绪了。我把‘意大利军团’交给马塞拉，奥国非常傲慢无礼，正在加紧准备之中。我的支队已经进入卡迪兹。请保守秘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的。请尽量搜集多瑙河、美因河和波希米亚等地的地图，并让我知道奥俄两国陆军的组织情形。”9月2日他离开了布鲁日，于是“英格兰军团”变成了“大军团”，不是横渡海峡而是开始准备渡过莱茵河了。

前面已经说过，纳尔逊已于8月3日向北往乌桑特航行，8月15日，当他到达该处向杰维斯的将旗致敬之后，得到命令要他乘胜利号旗舰往朴茨茅斯，他于8月18日在那里投锚。在英格兰，他的时间消磨在伦敦与默顿之间，9月2日，巡洋舰“欧亚拉斯”的舰长布莱克-吴德带来一个消息，说维伦纽夫已经进入卡迪兹，于是纳尔逊的短假遂告结束。9月5日，他把他的行李送往朴茨茅斯；9月14日，他本人也上了船。第二天，“胜利”号由欧亚拉斯伴送，一同扬帆

出发。9月28日，他与科林伍德会合，并接管全部舰队的指挥权。

第二天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在给一个不知名友人的信件中，他曾经这样写道：“当我接管这个舰队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军官到船上欢迎我的归来，在热烈的气氛中几乎忘记了我的总司令身份。”纳尔逊把他的舰长们集合起来，把他的会战计划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他在默顿时拟定的，通常被称为“秘密备忘录”。在没有说明这个计划之前，最好先回顾他的前一个计划，就是他在前往西印度途中构想出来的，因为在这两个计划中，前者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纳尔逊与当时其他的海军将领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计划的要点就是一个“接近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这是纳尔逊的一贯目标。在这种会战中，部将们不应等待信号，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精神来采取行动，为了使他们在这种行动中不至于使整个会战秩序发生混乱，他们对于总司令的攻击“模式”必须要有充分认识。纳尔逊并不是以战斗为手段，以求达到执行一个计划的目的；反之，他是用计划为手段，以求达到执行一个战斗的目的。这二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这个备忘录的特点不在于其攻击的“模式”方面，而是当部将在执行攻击时，可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关于攻击模式，这里一共提到了两种，以便在不同环境中可以替换使用。在圣文森特之战中，纳尔逊还是一个部将，他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精神，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船长们也都能以他为榜样。他和拿破仑完全不同，后者不容许他的元帅们具有主动精神，而纳尔逊却希望他的舰长们都具有“纳尔逊”式的头脑。除了勇敢好斗以外，他自己的主动精神，再加上部下的主动精神，才是使纳尔逊成为英国最伟大海军将领的主要原因，尽管后者违背了当时严格的海军纪律。

当纳尔逊在默顿时，首先与凯茨讨论他这个“秘密备忘录”。其基本假定是纳尔逊的舰队有四十艘战舰，维伦纽夫则为四十六艘。要想不花太多时间把四十艘船都列成战斗序列，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全部舰队分为两队，每队十六艘船，另有一个“前进支队”或是“预备队”，共有八艘船。此外，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航行序列也就是战斗序列，而且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机会起见，这两个支队也完全可以独立行动。一个由纳尔逊指挥，另一个由科林伍德指挥，后者对于他的战线具有完全的指挥权。

攻击的“模式”是这样的：当科林伍德攻击敌方战线后半段的十二艘船只时，纳尔逊应攻击敌军的中央部分以阻止它攻击科林伍德，同时他的船只应夹在敌方中央与前卫之间，不让后者转过身来以援助敌人的后卫部队。此时，“前进支队”插入进来，他们应位置在敌人中央的前方，相隔三四艘船的距离，目的是全力搜索敌人的总司令，因为这也是敌人舰队在指挥和精神上的中心。纳尔逊说：“有些东西必须靠机会，尤其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一定把握的。炮弹可以击毁敌船，同样也可以击毁友船。但是当敌方前卫来不及支援后卫之前，我对胜利是确有信心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接受敌人剩余二十艘战舰的投降，如果他们企图逃跑，那么就可以全力追击。”

纳尔逊的战术观念与埃帕米农达斯在列夫克特累斯的战术观念极其相似。在那个会战中，底比斯军的右翼监视着斯巴达军的左翼和中央两部分，而底比斯军的左翼则击毁斯巴达军的右翼。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纳尔逊也是用攻击的手段控制着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和前卫，而好让科林伍德击毁敌人的左翼——后卫。因为这个战术观念事实上是古已有之，所以不一定要归功于吕岑会战中的菲特烈，或是特拉法尔加会战中的纳尔逊。在战争中，基本观念往往会再生——它们从这一代又传到了那一代。

纳尔逊曾经写信给他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对这次与各位舰长间的会议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我把这个‘纳尔逊秘诀’解释给他们听之后，这伙人简直像中了邪一样，有些人流了眼泪，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它真是新奇，真是特别，真是简单！’而将军级以下的人员，也都一再说道：‘只要让我们逮着了，就一定会成功！我的勋爵，你给了我们信心！’”

在10月9日或10日，这个秘密备忘录又以书面的形式流传。

在卡迪兹的维伦纽夫发现他的处境空前恶劣。他的金库已经一空如洗，粮食和供应品都感到缺乏。除了原来缺员2,000以外，还有1,731名伤病人员。更糟糕的是，法西两国的官兵之间经常发生争吵。9月2日，他写信给狄克里斯大诉其苦。虽然如此，到9月24日，他还是能够报告说已经装好六个月的补给，准备出发了。

拿破仑此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侵英的意图，可是对这个“可怜的”的维伦纽夫——这是拿破仑给他的评语——却另外指定了一个新的“送终”计划。他从圣克劳德给维伦纽夫发出如下命令：

“我决定把集中在卡迪兹港中的我方海军力量，投入地中海方面，作为一个强大的牵制。你应该明了我方的意图，立即寻找机会率领联合舰队，向该海域进发。首先去卡塔赫纳与在该港中的西班牙支队会合，再向纳普尔斯进发，并在某个海岸上让你船上所搭载的陆军登陆，以

便与圣西尔将军所指挥的部队会合。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如果认为有必要，你所指挥的舰队可以尽可能留在纳普尔斯海岸，以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并拦截意图派往马耳他岛的船团。在这个远征行动之后，舰队就可以驶入土伦，以便整理和修补。我们的意图是这样的：无论在何处，如果遇到一个处于劣势的敌人，你都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作战的成败，就要看你是否能够立即离开卡迪兹出发。”

两天之后，拿破仑又命令狄克里斯撤换维伦纽夫，而代之以罗西尼。因为考虑到不愿意刺激维伦纽夫，狄克里斯却没有立即通知他。10月10日，罗西尼到达罗德里戈。

10月1日，维伦纽夫开始作最后的准备，预定在10月7日出海，可是风向突然转变，迫使他在港口中停留了十天。10月8日，他召开作战会议，向他的舰长们解释他对未来的会战的战术观念。他主张把这个33艘战舰的舰队，分为两个集团：（一）战斗集团，共21艘船，由他自己指挥。（二）预备集团，共12艘船，由格拉维拉将军指挥，应位置在前者的上风方向。（注：到10月16日，最后的战斗序列都已完全决定。战斗集团又分为三个支队，每队七艘船。前卫为第二支队，由阿拉发中将指挥，旗舰为“圣安娜”号。第一支队为中央部分，由维伦纽夫亲自指挥，旗舰为“布森陶尔”。第三支队为后卫，由杜马罗尔少将指挥，旗舰为“杜古陶因”号。预备集团，由格拉维拉指挥，旗舰为“奥地利亲王”。）

接着，维伦纽夫又推测敌人所可能采取的战术，可以说非常准确。他说：“英国舰队不会构成一个与联合舰队平行的战线。纳尔逊会企图切断我方的战线，包围我方的后卫，然后集中力量来打击可以孤立和切断的船只，越多越好。”至于究竟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攻击，他却并无高见，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舰长们只能采取鱼贯而行的方式。他所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如果联合舰队占了上风，则应该追击敌人，然后一船对一船的作战。如果在下风，虽应排成一个紧接着的战线，等候攻击，而每个舰长也应各自为战。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法西两国的船只采取混合编组的。他们中间有一艘“四层甲板”的船“三叉戟”号，一共有131门火炮，是当时最大的船只；三艘“三层甲板”的船，两艘为112门火炮，一艘为100门火炮；一艘64门火炮的船只；七艘巡洋舰和中型巡洋舰。战舰中有18艘法国的，15艘西班牙的。所装有的“侧舷”火炮共为2,626门，短炮除外。

搭载的官兵总数为21,580人。所搭载的陆军是由卡迪兹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其中有“非洲”团和索里亚团，都是过去曾参加过西班牙无畏舰队的部队。英国舰队本应有33艘战舰，但当纳尔逊接管指挥权不久之后，路易少校所率领的支队，共有战舰六艘，奉命去保护一个驶向马耳他的运输船团，所以纳尔逊手中只剩下27艘战舰。在这些船只当中，七艘是“三层甲板”的，三艘100门炮，四艘98门炮。二十艘为“两层甲板”的，一艘80门炮，十六艘74门炮和三艘64门炮。此外他还有四艘巡洋舰，一艘双帆二桅船，一艘单桅快船。全部官兵16,820人。除了短炮以外，一共有“侧舷”火炮2,148门。

因为路易的支队不在，纳尔逊改变了原有观念，不再把舰队分成三线，而代之以两个纵队：（一）前卫或上风纵队，共有船十二艘，由他自己指挥，旗舰为“胜利”号；（二）后卫或下风纵队，共有船十五艘，由科林伍德指挥，旗舰为“王权”号。这是他第一次改变了在“秘密备忘录”中的原有观念，以后还有其他的改变。这些改变曾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更足以说明纳尔逊在这一战中的心理变化。

他的目的是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俘获或击沉敌方的二十艘战舰，因为他在临死时曾经说过：“我估计应该有二十艘。”正如秘密备忘录所说，旧式的平行战斗序列通常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它们是如此迟缓，无法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他认为那好比是用两个“单臂”来搏斗的拳师在互相格斗，而他所希望的却是能同时用“双臂”来搏斗。他的舰队可以同时向左右两方打击。上风纵队保护右面，而下风纵队则打击在敌人的后部。他为什么要选择敌人的后卫来当作打击目标，而不选择前卫呢？因为要支援其后卫，敌人的前卫必须调过头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反之若是打击前卫，则敌人的后卫只要继续照原有方向前进，而不必调过头来。

为了使他的打击具有极大的动量，他并不严格遵守传统的横线或直线的战术。反之，他却代以两个船团，只是依次航行而已。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当他在默顿向凯茨将军解释他的战术时，他曾经这样说：“这样会立即引起一场混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两个月后，科林伍德所写的一封信也可以作证，他说：“纳尔逊决定用两个独立的集团来代替一个严整的攻击序列。它的执行非常良好，所以获得了优异的成功；或许它的新奇性对于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料想我们一定会形成一个好像一条线的东西。”这也正是纳尔逊所早已预料得到的，因为在默顿讨论战术时，他曾经突然转向凯茨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它可以突袭敌人，使他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突然袭击

加上集中兵力，另外再加上优越的炮术。

秘密备忘录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心灵中的观念与行动中的观念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战术目标还是一样的，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不是腐儒之流所能够解释的。10月15日，维伦纽夫从拜昂尼获知罗西尼已经启程来卡迪兹，因为他知道罗西尼已经有十二年以上没有下过海了，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派他来担负某种行政上的任务。接着从马德里又传来消息说罗西尼是奉命来接替他的，维伦纽夫觉得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于是决定在他尚未到达之前，就先溜出卡迪兹港去。10月17日，当他听说纳尔逊舰队中已经调走了路易支队的消息之后——已经知道太迟了——更增强了他的决心。风向也有利于他，在与格拉维拉会商一番之后，他就命令旗舰舰长，发出“准备开船”的信号。可是在他发出信号之后，突然风又息了，接着是一点都没有了。

第二天，纳尔逊在他的日记中写着说：“天气清明，东风，联合舰队要想出海，这就算是最好的天气了。”虽然如此，维伦纽夫却踌躇不前，一直等到10月19日上午六时，他才命令他的舰队扬帆出发。两个半小时之后，纳尔逊在卡迪兹西南西方向约50哩远的地方，从他在岸边监视的巡洋舰获知敌军已经出港的信号，他立即发出“全面追逐”信号，因为他的目的是切断联合舰队往地中海的进路。接着又发出了“敌方舰队已在海上”的信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0月19日，只有马哥农的支队驶出卡迪兹，直到10月20日的正午，维伦纽夫的全部舰队才开始行动。10月20日天明时，纳尔逊正在直布罗陀的附近，还没有发现敌踪，于是命令舰队调换方向，向西北前进。上午七时，发现了维伦纽夫的舰队，在正午时得到报告说它向西行进。一个小时之后，“胜利”号停泊，科林伍德上船来接受最后的指示，因此纳尔逊知道维伦纽夫已经改变向东南行进，在日落之前，他命令他的巡洋舰在夜间始终与敌人保持接触。

10月21日，星期一。拂晓时分，当英国舰队仍然还处于没有严整的序列或阵线时，敌人却已经组成了密接着的战线，采取东微偏南的方向，双方相距约为十哩到十二哩。因为天色还太黑，不能辨识旗语，所以一直等到上午六时十分，纳尔逊才发出了一个普遍的信号：“成两个纵队依次前进。”于是科林伍德的纵队进到右前方。接着又发出“依照东北东方向行驶”。六时二十二分，命令“备战”。维伦纽夫正向着直布罗陀海峡前进，在他认识到因为风力轻微使他不可能避免会战时，于是在上午八时发出信号，命令全部舰队转向，这样好使卡迪兹港处于下风的位置，以便被击毁的船只有一个避难之地。这个在最后一分钟又改变计划的行动，实在是十分不幸，因为这不仅好像退却一样足以影响部队的士气，而且这样调一个头，需要两个多小时，结果所组成的战线仍然凌乱不堪。有些部分太挤，有些部分又太松而留有缺口，其中大部分向下风方向弯曲，整个舰队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新月形，长度约为三哩。这个调动使格拉维拉的支队拉在战线的后方，而杜马罗尔的支队反而变成了前卫。一旦方向变换完成之后，联合舰队就向北缓缓运动，其速度大约为一哩或较高一点。

当联合舰队正在调换方向之际，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不如说是船团——在满帆之下，慢慢赶来了。上风的纵队由纳尔逊指挥，下风的则由科林伍德指挥。从西北面吹来的风力甚微，海中只有向西推送的巨浪，英国舰队前进的速度是预先估计为三哩，不久降到了一哩半。因为纳尔逊并不收帆，所以这两纵队就不可能构成正规的战线。此后，他和科林伍德就好像两个小学生竞走一样，各自埋头疾走；前者已经又不照原定的计划，不以敌方中央前段为目标，而改向其前卫的中央冲去；后者则向敌人后卫部分的前段进攻。

为什么纳尔逊又调换方向的原因，似乎是他看到敌人转变方向时，突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维伦纽夫准备逃入卡迪兹。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之前不久时，他向科林伍德发出信号说：“我的意图是越过或通过敌线，以阻止敌人进入卡迪兹。”换句话说，就是挡住他们的退路。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八分时，他又发出其著名的通令：“英格兰要求每个人恪尽职守。”

这个信号发出时，科林伍德已经接近敌人的后段，因为时间早已过了十一时三十分。维伦纽夫已经发出“开火！”的命令，接着在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又发出“各舰各自为战”的信号。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圣安娜”号后面的“弗高克斯”号发射第一炮，这是以“王权号”为目标的，此时双方相隔尚在四分之一哩以外。此时，双方好像是一致行动一样，都升起他们的国旗。在法英两国的船上，鼓乐齐鸣，士兵举枪敬礼。

于是会战展开，这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科林伍德的攻击，纳尔逊的攻击和杜马罗尔的反攻失败。下面就按顺这个次序叙述：

当“弗高克斯号”向“王权”号开炮时，科林伍德的船团向左行进，每船之间的间隔约为两“链”（约四分之一哩），成为一个不规则的斜线，因为敌线的弯曲，所以双方几乎是平行的。在“弗高克斯”号开火后五到十分钟，王权号仍继续保持航向不变，接着“圣安娜”号又向它开了一炮。于是它靠近并钻入敌军战线，在“圣安娜”之后，“弗高克斯”之前。当他面

对“圣安娜”号的船尾时，就从左舷向它连发两炮，使它受到巨大损失。接着他又对“弗高克斯”发射右舷火炮，此后又驶近“圣安娜”的右后段，再次向它射击。

科林伍德不久发现他周围都是敌船，经过四十分钟的猛击之后，“王权”号已变成了一个无法控制的空船壳。不久就由“欧亚拉斯”号拖曳行驶了。下午两点二十分时，“圣安娜”号已经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乘员死亡104人，伤236人，开始下旗投降。于是布莱克-吴德上校过船去，把重伤垂危的阿尔发将军，运到“欧亚拉斯”号上面来。在“王权”号作战后八分钟时，“贝里岛”号也从弗高克斯的后面，切入了敌线，并且也和“王权”号一样，它立即为几艘敌船所包围。因为它的船桅损毁了，有一段时间连一炮都发射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在后桅杆上，继续战斗。后来它由三艘英舰救出。在“贝里岛”之后约一刻钟，“战神”号也投入战火，以后其他每一艘英国军舰，也都是这样分别切入敌人，向首尾两端的敌船用侧舷炮火猛击。其结果是每艘敌船都受到了连续的集中火力。

在科林伍德的后方各船中，“无畏”号加入作战时，已经在“王权”号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艘船是“亲王号”直到下午三时才开始有作战的机会。

当这个下风纵队的战斗结束后，科林伍德也已经完全胜利了。与他交战的一共有十五艘法西两国的战舰，其中十艘被俘，炸沉一艘——“阿基利斯”号，只有四艘逃去，其中有一艘为格拉维拉的旗舰“奥地利亲王号”，上面载着重伤的格拉维拉将军。

在科林伍德纵队开始作战后二十五分钟，纳尔逊也投入了战斗。和前者不同，它始终保持着不规则的鱼贯形队形。依照“胜利”号上军士长托马斯·阿特金森私人的日记，它是继续平行着敌人的前卫行驶。依照他的记载：“在十一点五十分（实际上为下午十二时十分），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在十二点过四分（实际上为下午十二点二十四分）我们的左舷炮开始向敌人的前卫射击。”从北到南，杜马罗尔率领着五艘领先的船只，可能是从“海王星”号起，到“德格-特洛茵”为止。依照杜马罗尔的记载，纳尔逊领导着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向他的前卫中央挺进，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始与它交战。经过四十分钟的炮战之后，纳尔逊向右旋转。

单以纳尔逊的三艘战舰而论，其炮击的时间比杜马罗尔所说的还要短，因为当法舰“恐怖”号开火之后，“胜利”和“勇敢”就开始向右旋转。纳尔逊是在寻找维伦纽夫的旗舰，因为他的主要愿望就是与它接舷战斗。虽然“胜利”号上的一切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的旗帜，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于是“胜利”号只好向前攻击“三叉戟”号，假定维伦纽夫可能是在这艘最大的敌舰上。（注：纳尔逊相信法军指挥官是狄克里斯。）根据“斯巴达人”号舰长的记载，当胜利号在下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向“三叉戟”号前进时，发现在该舰后面的一艘法国“两层甲板”船的前桅上，挂着总司令的将旗——即“布森陶尔”号。“胜利”号冒着炮火，不久就钻到“布森陶尔”号的后方，用船头上的短炮——六十八磅炮——和侧弦火炮，向“布森陶尔”号的舱窗中猛射，使它遭到极大的损毁。其次，当英舰“海王星”和“征服者”接近“布森陶尔”号之后，“胜利”号遂向右转，与法舰“敬畏”号接舷，该舰由鲁卡斯指挥。两舰立即纠缠在一起，双方的乘员都准备跃上对方的甲板，但是法国人的企图却为英方火力所制止，杀伤人数颇多。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两艘船还是绞在一起，当纳尔逊正在后甲板与舰长哈迪一同指挥时，从“敬畏”号的船桅上突然射来一颗子弹。子弹击穿他左肩的肩章，透进了胸部，嵌在他的脊椎骨上。他一下子扑倒在船面上，他在爬起来后说：“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哈迪……我的背脊骨已经被射穿了。”他被抬入船舱，到下午四点三十分，在知道了会战已经胜利的消息之后，才安心死去。

当“胜利”号正与“敬畏”号交战时，“勇敢”号驶向前去，向“三叉戟”号开炮，接着又向“海王星”号和“敬畏”号射击。不久以后，“弗高克斯”号在“贝里岛”号交战之后，又转过来协助“敬畏”号，于是又为“勇敢号”所抓住。在解决了这两艘敌舰之后，“勇敢”号又用其前炮痛击“三叉戟号”达半小时之久。

在“胜利”号突袭敌线十分钟之后，英舰“海王星”号先向“布森陶尔”号射击，然后进攻“三叉戟”号，一个半小时之后，其乘员战死245人，负伤173人，这艘巨型的四层甲板船遂开始下旗投降。对于在这艘船上的景象，英舰“海王星”号上的船员巴德柯克曾有如下描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初叶的海战情形。他说：“我踏上这艘大船去收容俘虏，其死伤人员数字在三四百之间，满处都是血肉，后甲板上堆满了伤兵，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

“不列颠”号接着也跟上来了，后面就是“列维坦”号和“征服者”号。后面的两舰夹击“布森陶尔”号，下午两点五分，维伦纽夫落下了他的将旗。在他船上的景象，“征服者”号上的陆战队上尉阿特切里曾经记载说：“到处都是死尸，景象非常凄惨。死伤总数在四百人以上，多数都是没有头的。”

在“胜利”号开始作战后四十分钟“阿贾克斯”号才开始作战，而“阿伽门农”号还要更迟。“非洲”号是一艘六十四门炮的船，也是双方最小的一艘战舰，所遭遇的情形也不平凡。在十月二十到二十一日夜里，它与全部舰队丧失了联络，在拂晓时位置在舰队北面，相距已有数哩远。在发现舰队位置之后，它立即向“胜利”号前进，在“王权”开始发动战斗之际，他已经到达敌方前卫的射程内。依照它的日志，在十点四十分时，它开始与敌方最前面的一艘船交战，然后穿过整个前卫，每经过一艘敌船都向其射击，最后又协助“海王星”号攻击“三叉戟”号，并与“勇猛”号交战。

“猎户座”号也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它的舰长，科灵顿看到敌方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单独向南行驶以协助“王权”号。以后他又回北边来协助“胜利”号。当维伦纽夫下旗投降时，纳尔逊纵队中的最后两艘船，“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达人”号都还不曾参加战斗。

现在再叙述杜马罗尔的反攻——这不过是个勉强的命名。

当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纳尔逊钻入联军中心之后，维伦纽夫发出了一个通令，要所有尚未参加作战的船只，都一律自动投入战斗。杜马罗尔对此并无反应，此后维伦纽夫即再没有注意他，半小时以后，杜马罗尔仍继续向北航行，结果就使前卫与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个空洞。此时他仍没有发挥主动精神，反而等待维伦纽夫的命令。虽然如此，维伦纽夫又不立即回答，直到下午一点五十分，他才命令杜马罗尔赶来协助正受着强烈压制的中央部分。

风力是如此的微弱，杜马罗尔要想转变方向是相当的困难，他本应使其整个支队集中在一起，以便可以作一次全力打击，可是他却把兵力又分为两部分。（注：可能是在转向时丧失了联络，也可能是有五艘船不听命令。）他的行动是如此迟缓，直到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胜利”号上的哈迪舰长才看见杜马罗尔的十艘船中，有五艘是逐渐向北行驶了。于是他立即发出信号，通知纳尔逊纵队中的各船准备迎敌。

哈迪所看见的五艘船是“英雄”号，“勇猛”号，“圣奥古斯丁”号，“圣弗兰西斯科”号和“拉约”号。当他发出信号之后，它们就与英舰“征服者”，“阿贾克斯”，“阿伽门农”和“列维坦”等发生了遭遇战。不久之后，“圣奥古斯丁”号即下旗投降，“英雄”号摆脱了战斗，逃往卡迪兹。

“圣弗兰西斯科”号和“拉约”号也企图逃走，前者船破沉没，后者于10月23日向“列维坦”号投降。“勇猛”号由恩维内特指挥，首先受到“非洲”号的英勇攻击，以后又受到“阿贾克斯”，“阿伽门农”和“猎户座”三船的夹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向科灵顿舰长投降。

此时，杜马罗尔的另外五艘船也调转了航向，“恐怖”号和其他两艘船都是靠小船拖曳，才转过头来的。现在也向南驶来，由“恐怖”号领先，跟随其后的是“蝎子”号、“布兰科”号、“德格-特洛茵”号和“海王星”。它们首先向“征服者”号开火，然后向前进，一路用侧舷炮火射击“胜利”，“勇敢”和“王权”等船。不久，英方尚未参加过战斗的“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乐特”号也立即赶上，切断了“海王星号”，迫使它投降。此时，其余四艘法舰都向南逃逸失踪了。11月4日，才为斯特拉汉爵士的支队所捕获。

下午四点三十分，会战已经接近尾声。维伦纽夫的三十三艘战舰中，有九艘逃向卡迪兹，四艘逃向直布罗陀海峡方面，其余二十艘之中，七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十二艘为敌人所俘，一艘正在起火燃烧。夜幕将垂时，风暴大作，一连就是四天，多数负伤的船只都自动沉没，包括所有的英军战利品在内，只有四艘例外，可是在整个会战和风暴之中，英国却未损失一艘船。死伤的数字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依照1805年11月27日和12月3日《伦敦公报》的记载，英方的损失为死449人，伤1,214人。埃塞尔在“特拉法尔加的敌军”一书中所估计的法西两国的损失是这样：法军阵亡和溺毙共3,373人，伤1,155人；西军死1,022人，伤1,383人，被俘约三四千人。因为法军被俘人数至少应与西军的相等，所以联军全部损失总数可能应该是官兵共14,000人。这个数字虽然很高，可是如果与雷班多一战的数字作一下比较，似乎还是很少。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的人员都英勇，虽然法西两军的英勇在最初阶段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其顽强程度却不亚于英军。同时，若与以后的会战作一个对比，则最值得追忆的是双方都具有古代侠士之风，彼此都很有礼貌。举个例子说，在被俘之后，鲁卡斯（“敬畏”号的舰长）在伦敦社会中获得了大家的尊敬。而维伦纽夫将军和马肯迪上校也获准参加纳尔逊的丧礼。尽管已经发生了革命，战争却仍然还是绅士阶级的职业。

10月27日，科林伍德派拉佩诺狄尔中尉指挥的小船“比克勒”号回国报捷。11月4日，拉佩诺狄尔到了法尔茅斯，在那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出发去伦敦。他一路换了十九次马，于11月6日清晨一时赶到英国海军部。几分钟之后，海军部长接见了。一见面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却失去了纳尔逊勋爵！”（注：拿破仑对于纳尔逊也是推崇备至，他命令在每艘法国军舰上，都悬挂纳尔逊的画像。）

纳尔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主要的就是他能够摆脱当时平行战斗序列理论的束缚，虽然他并不是采取这种作法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比前人更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观念。依照这个理论，一个由战舰所组成的横线，可以发出优势的火力，如果敌人成鱼贯纵队来犯，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可是纳尔逊却看出了这个理论的漏洞，他知道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极为有限，而且命中率也不高，所以被敌人横线集中火力所击毁的危险，事实上只限于最后几百码的接近距离之内。此外，他也认识到一旦双方发生接触之后，决定性的因素是优势的射击术，而不是数量优势和横线队形。在射击术方面，英国人比对方高明得多，不仅射击的命中率较高，而且射速也快了一倍，所以其毁灭力也高了一倍，只要比较双方的死伤数字，就可以知道此话不假。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在封锁之中，法西两国的海军丧失了练习机会，而英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科林伍德指挥“无畏”号战舰时，他的人员是经常在操练大炮，几乎很少有其他的船员，在火力的迅速和精确上，能与他们相比。科林伍德经常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分钟之内，能使侧舷的火炮作三发精确的射击，就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抵抗他们了。可是如果能有经常的练习，那么只要有三分半钟的时间就够了。”这些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进入战斗之后，一艘船的射击如能比敌人快两倍，那么火力也就相当于两艘船了。所以在纳尔逊看来，整个的战术问题是迅速与敌人接近。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也可称为“海上闪击战”。

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会战，它对于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把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完全击碎了。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战从此告一结束。它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海洋帝国，这个帝国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所谓“不列颠的和平”变得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后果是它告诉18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的。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大帝，以图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是作茧自缚，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到了绞杀。如果没有特拉法尔加之战，就不可能有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半岛战争，就不可能有滑铁卢会战。所以威尔逊先生在“剑桥近代史”中对这个伟大的海军胜利，所作的评语似乎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特拉法尔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确是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会战。”

## 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

---

在历史上的伟大君王和征服者中，只有两个人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亚历山大大帝和奥古斯都。他不仅具有前者的战士精神，也具有后者的行政能力，虽然他没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可是他却把中世纪的国家观念连根铲除了。此后许多国家都在摸索前进，试图完成他的统一美梦。

他出生在一个极为幸运的时代，因为在一七六九年，千年来欧洲旧的文明体系正要开始崩溃（注：拿破仑出生于一七六九年八月十五日，科西嘉），而且工业革命也在摇篮之中，在那一年，詹姆士·瓦特在英国获得了他的蒸汽机专利权；卡格罗特也在法国驱动了他的第一部蒸汽推进的车辆。美国革命正在徐徐沸腾，在这一切的上方，酝酿着更伟大的法国革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铸造之中，等候着一个天才来把握它，并依照他的意志铸造成形。

可能在一七六七年，吉尔伯特就已经预料到这一点，因为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人会升起来，可能在此以前，他湮湮无闻。这个人可能在静默地沉思，他可能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才能，直到实际运用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权力。他也可能不学无术。这个人会把握意见，环境和机会。他会向伟大的理论家说，正好像实际的建筑师向雄辩的演说家所说的一样：‘凡是我的对手告诉你们的一切，我都可以让它成为现实。’”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建筑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完全只依赖他自己，而对于任何事情都加以集约化。门瓦尔曾经这样评价拿破仑：“他不仅在思想上有主动能力，而且对所有的事情都能躬亲细务。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都足以带着他走：他感觉到他具有一切的能力和有时间来管理一切的事情，实际上，他亲自做一切的事情。”

考兰科的回忆录非常生动，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也大致相同，不过也许更加透彻：“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逃避任何痛苦和考虑任何困难。而且这个原则是事无巨细都一样适用。这个人可说是完全被他的目标所吸引。对眼前的任何行动和言论，他都总是使用其全部的能力，资本和注意力。对所从事的一切事情他都充满热情。所以这也是他比他的对手优越的地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同一时间内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一个思想或行为上。”

作为政治家和将军，这也是拿破仑成功的秘诀。要了解这个以耶拿-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为顶点的战役的重要性，必须首先认清他的政治目的。这个双重会战可算是以后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开始，而以滑铁卢之战为终点。

第一就是使法国具有秩序，繁荣，而更重要的还是光荣。第二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采取王国同盟的形式，以法兰西为宗主国。当他做上第一执政后，第一点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后，他就乘机巩固所得。他兴建巨大的公共工程，发起伟大的法律和社会改革，提倡科学、艺术和工业。简而言之，为了填补革命所造成的深渊，他热诚的希望和平。可是如我们所知，他的保护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需要是绝对冲突的，所以使和平变得不可能。

所以这个斗争并不是是非善恶之争，而是从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的两种生存价值之间的决斗。为了要维持繁荣强盛，英国必须输出制成品；为了要变得繁荣强盛，法国又必须保护它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所说：“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决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洋问题），因为这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拿破仑也认识这一点，所以他就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来绞杀英国的贸易和破坏它的信誉，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英国也就不能继续与他为敌。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只是寄生在他们强加于别国的专有权利上，而且完全以此维生。为什么要让他们独享呢？其他的人也应该可以分享。”拿破仑又说：“伦敦的商人一切唯利是图。他们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以满足他们的投机目的。如果他们的负债额不是那样巨大，那么他们可能会合理一点。因为必须要还债和维持他们的信用，所以才会牵着他们向前走……”

在他对英国的斗争中，拿破仑认清了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要煽动全世界，甚至于每一个人。所以他告诉考兰科说：英国是他的唯一敌人。他仅仅是以英国人为目标。但因为他们的贸易在各地都有分支，所以他到处加以追逐。而在这个追逐过程中，他的伟大帝国观念也就油然而生了。“大陆体系”本来是一个以毁灭英国为目的武器，但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可以使新的世界观念实现的工具：这也正是亚历山大式的梦想——使欧洲合而为一。

以法兰西作为他这个帝国大陆体系的原动力，他的“伟大目标”是这样的：重建波兰王国作为防御“北方野蛮人”的屏障。使西班牙脱离迷信的束缚，并为它制定一部宪法。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建立独立共和国。宣布匈牙利独立并解放希腊，瓜分奥地利和普鲁士，控制埃及，开辟苏伊士运河，瓜分土耳其，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之外，并约束“莫斯科的野蛮人”——欧洲的最大威胁。（注：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认为北方的野蛮人早已太强了，也许不久就将压倒全欧。）简而言之，就如菲舍尔教授所说的：想建立一个世界秩序，如利奥一世，铁槌查理，查理曼和奥托一世所曾经建立的那种帝国，他们曾经挽救了希腊和拉丁文明，使其不至于毁灭在野蛮人手中。

当他被囚禁在圣海伦斯岛上时，他通过拉斯卡萨斯的记载，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目的是联合欧洲各大国。这些国家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一直四分五裂，他想利用统一的法典，原则，意见，情感和兴趣，使他们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邦联”。在他的帝国保护之下，梦想建立一个最高中央会议。以美国国会和希腊同盟为楷模，专门负责保护这个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虽然他的梦想未能实现，可是他却预言迟早还是会实现的，因为这是势所必然。他说：

“在我失败和我的体系毁灭后，我相信除非主要国家能够集中和联合，否则在欧洲不可能建立任何的伟大平衡。在下次伟大的冲突中，君主若能了解人民的希望，就可以成为全欧的元首，一切随心所欲。”（见拉斯卡萨斯所著的《拿破仑皇帝在圣海伦岛上的私生活和谈话》一书。）

不管我们对他这个伟大计划的观感如何，但英国人对它却深恶痛绝。因为如果欧洲成了一个联邦，那么英国就不可能再维持海上霸王的地位。所以英法冲突是生死之争，拿破仑凭着他的将才曾经一再向联盟势力挑战。在这一斗争中，他的第一个最大的资本就是他能确保指挥上的统一，因为他同时是法国的独裁者和总司令；他的第二个资本是他坚决认为在战争中的推动力不是恐怖而是荣誉，这是合乎革命精神的，从而使新兴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对命运产生了一种英雄式的信心；第三个资本是他的天才。作为一个将军，弗伊将军对他的描写可说是最能表现其特点的。

“凭着他的热情，即使他也有错误，但是拿破仑仍不愧为近代的伟大战士。他在会战中显

出过人的勇气，有精密计算的耐性，心中充满突发的灵感，善于猜透敌人的计划。拿破仑具有军事这一行业所要求的各种特性，温和和雄健，善于出敌不意，对于有时会产生重要结局的细节也绝不放松。他在会战中十分冷静而且无比英勇，他的心灵不仅善于沉思，更能随机应变，充满迅速和突发的天才。”

在战场上，他的行动也很特别。在部队前进时，他通常总是留在后方，但是当接近敌人时，他马上就赶到前面去。他对一切事物都必须亲眼看过才算数，因为他曾经说过：“将军如果不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那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他格外珍惜时间，白天视察，夜间回来工作。考兰科说：“皇帝总是在夜里十一时起来，或者最迟十二时，此时各军的报告都已经送到他的手中。在工作三两个小时后，就开始颁发第二天的命令。”他用这种办法使部队在第二天吹起床号的时候就可以接到以最新情报为根据的命令。他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任何理由都说不过去，因为只有延误才会使作战失败。”

作为一个军人，拿破仑的出生时代又使他蒙受了双倍利益。因为从七年战争结束到这个世纪末，法国的军事组织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广泛的改变。虽然燧发枪并没有太大进步，可是格里包法尔却已经使炮兵有了重大改进。拿破仑本是炮兵出身，他在青年时期曾经研究过罗宾斯的《新炮兵技术原理》。在这一时期的会战中，因为火枪的有效射程太短，所以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前进到距离敌人三百五十码以内的地方，将敌人的步兵轰成碎片。可是说也奇怪，这一事实的充分意义直到拿破仑战争末期才被完全认清。

1759年，应该感谢沙克斯的试验，布罗格利元帅开始建立师的制度，到1804年，它演变成拿破仑的军的基础——这是一支完全自给自足的部队。不过最伟大的发明还是征兵制，这是1798年由茹尔丹将军和五百人议会所建立的。虽然强迫服役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可是执政政府却让它有了全国性的基础，每一个身体强壮的男性公民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根据法律有强迫为国家服役的义务。征兵制不仅使拿破仑的征服政策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因为一般兵员的智力水准大大提高，所以步兵战术也彻底改变了。

虽然法国所征召的新兵缺乏训练，可是他们的战术却很有特点，富有弹性，以一人一枪为基础，而不是机械地发射排枪。这些“散兵”，如威尔逊爵士所说的那样，眼光锐利如雪貂，行动灵敏似松鼠。一位普鲁士军官也说：“在森林中，士兵们都解散了行列，也不采取任何操练中的行动，仅仅依靠树木的掩护来发射，他们不仅可以与我们相比美，而且还更优越。我们的士兵惯于在开阔地形并肩作战，所以反倒很难适应这种几乎没有秩序的情形，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法军在敌国中就地取食，所以法军纵列所需要的牲口数量仅相当于普鲁士补给纵队的几分之一。这也使法军的机动性大为提高。

这就是拿破仑所继承得到的陆军——积极的，机动的，聪明的和狂热的，但是在纪律方面却有弱点，所以考兰科评论这位皇帝说：“他早已暗自承认他的这种战争体系是不能容忍严厉纪律的，正好像部队如无适当给养就只能勉强生活一样。”虽然如此，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原则，很难运用。在艾劳之战后有六万人逃亡；在瓦格拉姆之战前有数以千计的人员被灌醉了。但是以士气而言，这支军队的精神异常坚定。这支军队是以精神训练的，而与奥、普、俄、英等国的军队都不同。对于后者，戈德曾经说过：“他陛下（称拿破仑）认为英国军队未免太严厉了，结果常使个人无法发挥其荣誉感。”

作为战略家，拿破仑可说是前无古人，而他所处的时代也使他深受其利，因为当时的道路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因为繁荣的增进需要较好的道路，而道路发展之后，这个地区就会进一步繁荣。结果使军队在行军时较易就地觅食，于是从马尔波罗和杜伦尼时代起的仓库兵站旧有体系，就可以完全弃之不用了。

拿破仑本人是一个伟大的道路建筑家，他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他的战略大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说：“皇帝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方法，他所利用的是我们的两腿，而不是我们的刺刀。”或是如他自己所说：“战争的艺术也和力学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一个重要因素。”（注：在耶拿战役中，普军每天的行军距离很少超过十二英里半到十五英里。而在法军方面有些行军的速度是很惊人的。有一次，兰纳斯军在五十小时中走过了六十五英里；另一次，贝尔纳多特军在六十九小时中走过了七十五英里。拿破仑的许多成功都是高速行军的功劳。）

如果说速度为其战略的灵魂，那么计划就可以算是它的躯壳。拿破仑心中总是有一个计划的——这是战略性的，而不一定是战术性的——拟定这个计划的根据是他自己的意图，他对敌人的意图很少加以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1807年，他对苏尔特说：“一个人永远不必去猜想敌人的意图，因为我的意图总是一样的。”这句话的意义也就他把主动精神发挥到了极限。他的计划总是采取攻势的。早在1793年，他就曾经说过：“躲在堑壕后面的人必败无疑，在这一

点上经验与理论是一致的”。

以后在圣海伦斯岛上，他还是说：“简而言之，我的思想与腓特烈一致，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他的战术也和战略一样，几乎全是采取攻势。在他所有的战役中，只有一个战例是完全防御性的会战，那就是1813年10月18日的莱比锡会战。原因之一是他的进取精神，另一个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从防御的态势改变为攻击的态势，实在是最微妙的行动之一。”

作为战术家，他具有奇特的眼光。他说：“会战的命运就是一个单独时间、单独思想的问题。决定性的时机到了，精神的火花点燃了，于是一支最小的预备队就足以解决一切。”他又说：“在会战中有时只需采取一个最小的行动就具有决定性，从而获得胜利。一滴水就可以使水瓶中的水溢出来。”考兰科在评论他的战术才能时，也有这样一段话：“即使是在对敌人作乘胜追击时，或者是在他的最伟大胜利的热浪中，皇帝不管自己如何困乏，他对地形总是特别注意，准备一旦遭遇挫折时，可以有个退守之地。在这方面，他对于各地的局部情形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一个地区的图景好像已经印在他的大脑中，形成模型一样。从来没有第二个人同时有这样的记忆力和创造性的天才。他几乎是在一碗泥土中，撮成了人马和枪炮。”

在他的战争延长之后，他的步兵水准降低了，虽然他曾经说：“士兵只会射击还不够，一定还要能命中。”事实上，他对步枪的射击术却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比如说在1800年，当他的大军越过圣贝纳德隘路的前一天，他的参谋长布歇曾经命令所有的新兵都射击几发子弹，以便知道用哪只眼睛瞄准和怎样的装子弹。一直到1811年，我们才听说拿破仑批准新兵应作实弹射击练习，即使如此，还是只准用次等火药。事实上，在他全部的战争中，拿破仑所依赖的主要的是火炮而不是火枪。他说：“无论是攻城战、还是野战，担负主角的都是炮兵，它已经带来一个全新的革命……制造战争的就是炮兵。”下述数字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在马尔普拉特之战中，法军发射了炮弹11,000发；在瓦格拉姆之战中，为71,000发；而在莱比锡之战则为175,000发。在亨利四世时代，法军所有的火炮为400门，在路易十四时代已增加到7,192门；路易十五世时又增为8,683门；路易十六时再增加到10,007门。1815年，在拿破仑的指挥之下，共有火炮27,976门。

说也奇怪，虽然拿破仑是炮兵出身的军官，可是他却缓慢地改革他的炮兵战术。一直迟到艾劳（1807年），弗里德兰（1807年）和阿斯佩恩（1809年）会战，他的步兵还是直向敌方的炮兵冲锋，而被敌人击成碎片。在阿斯佩恩战役以后，他才开始把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在瓦格拉姆（1809年）和博罗迪诺（1812年）两个会战中，他都是用炮兵在敌人的战线和纵队中，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如果因为缺乏武器而使炮兵不能完成任务时，拿破仑就不免要采取一连串的攻击，结果使他消耗了不少人力和时间。在滑铁卢战役中，因为缺乏榴弹炮，或者说是使用不恰当，结果才使拿破仑无法把威灵顿从他的掩蔽阵地中赶出来，终于丧失了这场会战。如果用腓特烈代替拿破仑，则可能在两小时之内就把威灵顿完全击溃。虽然如此，拿破仑依然是一个伟大的炮兵专家。

如果普王威廉·腓特烈参加了1801年的对法同盟，那么他对于这位杰出的军人还可说是处于有利的挑战地位，但是到1806年来进行这个挑战，却可以说是愚蠢之至；因为奥地利已经被打垮了，俄国人也已经逃过了维斯托拉河；英国因为恼恨普鲁士占领汉诺威，已经与瑞典联合起来向它宣战；而纳普尔已经不再算是一个强权。此外，在1805年时，拿破仑还得要从包罗根前进到多瑙河上；现在他的胜利之师早已宿营在法兰克福与因河之间，到普鲁士边界不过十四天的行程。在这种环境之下向拿破仑挑战，实在无异于自杀。那么为什么威廉·腓特烈会这样做呢？因为普鲁士还是向往腓特烈大帝的全盛时代，他们还在靠腓特烈的余荫生活，回忆着罗斯巴赫一战的余威。威廉·腓特烈本人和他的将领臣民，对当前的事实完全是一抹黑，他们没有认识到自1792年以来战争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战争已经不再是两个有野心的国王之间进行的荣誉性的决斗，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生死之争，在这种战争中应该重视的是狂热的精神、个人的主动和机动性，而不是思想的服从；集体行动和巧妙的迂回运动还是次要的。

从战术方面来说，普鲁士军队完全是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他们的组织和序列都是为了在平原上进行堂堂正正的会战，用方阵对抗方阵，决定性因素就是整齐地行进，直到距离敌人四五十步远时，全体发射排枪。这种接近射程的战斗具有可怕的毁灭力。1758年在克雷菲尔德之战中，普军的第一发排枪据说曾把敌军击倒了百分之七十五；而在1745年的冯特罗伊之战中，英国近卫军的第一发排枪也击倒了690个法国人。虽然在这样的战斗中，法军因为缺乏普军那样的操练，所以远不如普军，但是在以散兵线作战时，他们却优秀得多。在蜂群式的散兵掩护之下，普鲁士的横线实在不是他们的机动营纵队的对手。此外，普鲁士人仅仅在战争开始爆发之际，才开始组织他们的轻型步兵；他们的纪律很差，一般说来毫无利用价值。而且自从腓特

烈大帝逝世之后，他的精锐骑兵就开始被分割，他的预备炮兵也大部分名存实亡，而且他们的后勤制度一直没有加以改良，依然如故，笨重的普鲁士补给纵列限制他们进行迅速的运动。

除了这些弱点外，普鲁士的高级指挥可以说是一个多头怪物。它的权力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71岁），霍恩洛赫亲王和鲁歇尔将军来掌握。沙恩霍斯特将军是不伦瑞克的参谋长，而马森巴赫上校则为霍恩洛赫亲王的参谋长。为了减轻这五个人之间的摩擦，威廉·腓特烈亲自担任名义上的统帅，因为他自己对于战争实在是一无所知，所以又选定了八十二岁的莫伦道夫元帅作他的亲信顾问，同时又把战时内阁也带上了战场，这个内阁由各部部长和训练总监组成。因为每个指挥官和顾问都可以向国王提出他自己的计划，结果就是永远的争持不决。

依照拿破仑9月28日接获的一个秘密报告记载，不伦瑞克因为害怕有损自己的一世英名，所以反对战争，他的态度是懦弱，迟缓和犹豫不决。莫伦道夫也害怕影响自己的名誉。霍恩洛赫和鲁歇尔是强烈主战的。卡尔克鲁斯多病无能。路易·菲迪南亲王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虽然精力充沛，可是私生活放浪，每天都要烂醉后才上床睡觉。唯一可算是名将的人，只有六十四岁的布吕歇尔，这是报告中未曾提及的——他是一个果敢的骑兵将领，精力旺盛，敢想敢干。

8月9日下达了动员令，普鲁士陆军总数约在二十万人以上，扣除预备队和留守兵力之后，余下的部队分为三个野战军团：第一军团由不伦瑞克指挥，人数为七万；第二军团由霍恩洛赫指挥，人数为五万；第三军团由鲁歇尔和布吕歇尔指挥，人数为三万。为了增强兵力起见，普鲁士又与萨克森和赫斯-卡斯-色尔谈判同盟条约，前者勉强同意支持普鲁士。9月13日，霍恩洛赫到达德累斯顿，于是有两个师的萨克森军加入他的军团，每师一万人。所以他的军团在数量上已经和不伦瑞克不相上下，而他自己就更加横蛮不讲道理了。

直到9月25日，当不伦瑞克的军团已进到莱比锡和劳姆堡之间，霍恩洛赫在德累斯顿，鲁歇尔在缪尔豪森，布吕歇尔在戈兴根时，普军才召开第一次战争会议，考虑作战计划。不伦瑞克认为所有人都喜欢采取防守态势，所以拿破仑也不例外，因此建议取道埃尔弗特前进到沃尔兹堡以切断法军的交通线，并破袭他们的营地。他相信法军营地位置在沃尔兹堡和阿姆堡之间。霍恩洛赫激烈反对他的意见，主张通过巴姆堡的法南根森林前进。事实上，他对这个行动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因为他已经命令托恩钦率领的一师萨克森部队推进到霍夫作为前卫。于是进行了冗长的辩论，一个会接着一个会似乎永无休止，最后威廉·腓特烈终于决定同时采纳双方的计划。因为这个裁决使双方都不满意，于是又提出了另一个新计划，可是仍然争论不决。到10月5日，大家才同意派莫弗林上尉去搜寻法军的交通线。他回来报告说法军的交通线毫无掩护。于是不伦瑞克命令对希尔德伯格豪森和纽斯塔特进行骑兵搜索，并以魏玛公爵指挥的师作为支援，预定占领梅林根。同时他又通知鲁歇尔留在图林根森林的北面不动。他自己的军团大约位置在埃尔弗特，鲁歇尔在埃森拉赫，霍恩洛赫则在布兰肯海因。因为这个计划使向沃尔兹堡进攻的念头完全打消了，霍恩洛赫不禁得意扬扬，立即命令他的两个萨克森师前进到米特尔-波尔尼茨，协助路易·菲迪南从耶拿前进到萨尔菲尔德，以便掩护在萨尔河上的全面运动，这却是当时尚未决定的。

这些行动的用意的确令人莫测高深，所以我们只好同意沙恩霍斯特的看法。10月7日是威廉·腓特烈9月26日最后通牒满期的前一天，沙恩霍斯特曾用失望的语气这样的记载道：“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做，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是我们将要怎样做，那却只有上帝才知道。”实际上，威廉·腓特烈应该采取的对策是退到易伯河后面——普鲁士的莱茵河——等候俄军加入。杜穆里兹现在正在英格兰避难，他就一再提出这种建议。他指明击败拿破仑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利用距离、气候和补给上的困难来对付他。这也正在拿破仑预料之中，所以当他知道普鲁士军正在易伯河以西集中兵力时，不禁大觉意外。虽然他们的这种推进无异于自投罗网，可是拿破仑却在准备长期作战，因为他料想到可能会有另一个同盟产生，奥地利可能会加入作战，而英国则会攻击他的后背。所以他的问题，第一就是确保自己的基地——法兰西；第二就是趁俄国人立足未稳之前，抢先击败普鲁士军。

当8月份威廉·腓特烈开始动员之际，在布歇指挥之下（皇帝本人在慕尼黑）的法国大军团的兵力分布如下：第一军20,000人，由贝尔纳多特指挥，位于安斯巴赫和纽伦堡；第三军27,000人，由达武指挥，在诺尔德林根的附近。第四军32,000人，由苏尔特指挥，在因河上。第五军22,000人，由勒菲弗尔指挥，在美因河下游地区。（以后改由兰纳斯指挥。）第六军20,000人，由内伊指挥，在依里尔河和上多瑙河。第七军17,000人，由奥热罗指挥，位置在法兰克福周围。老近卫军和青年卫军，共16,400人，由欧丁洛特指挥，留驻巴黎，后改由勒菲弗尔指挥。骑兵军共有28,000人，由缪拉指挥。可是拿破仑直到9月5日才颁发他的第一号作战命令。

那天他写信给布歇，命令他侦察所有从班门堡到柏林的道路，并准备使第四，第六，和第七这三个军，在接到开拔命令后八天之内，全部集结到巴姆堡。四天之后，他写信给布歇说一旦战争发生，他的作战线将是斯塔斯堡——曼海姆——马因斯——沃尔兹堡一线。第二天他又道：“普鲁士人的行动还是依旧莫明其妙。他们是想要接受一次教训。我的骑兵明天出发，近卫军在几天之内也可出发。如果消息继续传来，表明普鲁士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头脑，那么我会直接前进到沃尔兹堡或班门堡。”所以如波纳将军指出的那样，直到此时拿破仑还没有决定他的最后行动方向。如果普军进入美因河下游谷地，他就会把沃尔兹堡当作集中点，如果普军继续徘徊不前，他就会把班门堡作为集中点，再取道德累斯顿或莱比锡，就可以直扑柏林，迫使敌人后退或接受会战。9月13日，他又写信给布歇说：“如果普鲁士军进入萨克森，那么沃尔兹堡就将成为集中点。”九月十五日他又改变初衷，最后决定还是以班门堡为集中点。9月18日，他得知普军已经于9月13日进入萨克森，认为这就是宣战的表示，遂于当夜十一点钟命令近卫军沿着驿站，从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同时，他又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继子尤金亲王，命令他注意提防奥地利的动向。尤金此时指挥意大利境内的军事行动，他所辖的部队有驻在意大利北部的马塞纳军，共70,000人，以在达尔马提亚的马尔蒙军，共12,000人。

拿破仑对奥地利方面，几乎已经获得了确有把握的消息；他在9月18日和19日，一共口述了一百零二封信件、通信和命令，由他的军政部长克拉克将军笔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大军团集中的一般性指示》——这就是耶拿战役的基本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大军团所占领的位置是这样的：

第一军（贝尔纳多特）于10月2日占领纽伦堡。

第三军（达武）于10月3日占领班门堡。

第四军（苏尔特）于10月4日占领阿姆堡。

第五军（勒菲弗尔）于10月3日占领肯尼斯西芬。

第六军（内伊）于10月2日占领安斯巴赫。

第七军（奥热罗）于10月2日占领法兰克福。

辎重纵队于10月3日集中在沃尔兹堡。

野战司令部于10月3日设立在班门堡。

这个命令十分冗长而详细；它是在9月20日发出，在慕尼黑的布歇于9月24日才收到。

9月19日，拿破仑发了一封信给他的兄弟荷兰王路易，在信中他这样的写道：“依照我的意图，你是不必进攻的，但是我希望你能虚张声势来威胁敌人，以便吸引敌军向北。”其后他又告诉路易应在公报上故意夸张他在威塞尔的部队数量。他说：“我希望这些部队10月初已在行动中，因为你的行动只是虚张声势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我可以乘机对于他们加以迂回。”

同一天，他在弗兰德又成立了一个新军，第八军，由莫提尔指挥，与路易合作共同担负据守莱茵河的任务。

现在，在他的基地已经完全巩固之后，在9月24日到25日夜间，在皇后和塔里兹德随伴下，拿破仑由巴黎向马因斯进发，并于9月28日抵达。第二天，他从布歇那里得知直到9月27日普鲁士军还逗留在埃森拉赫、梅林根和希尔德堡豪森等地附近，所以他有充分时间进入萨克森境内而不会受到严重干扰。这也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知道的消息，所以他在9月29日，指示布歇命令贝尔纳多特占领萨克森隘路，勒菲弗尔监视弗尔达道路；因为如果敌人企图切断他的交通线，一定会取道弗尔达，然后打击在沃尔兹堡或马因斯方向上。

随后他又发了一封长信给荷兰王，在这里他谈到了他的战役计划。一共分为四大要点，在这一点中，拿破仑这样的写道：

“我的意图是要把我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在我的右翼方面，而让莱茵河到班门堡之间的地区几乎完全处于不设防状态。这样我在同一个战场中，就可能集中起来大约二十万人的兵力。如果敌军从马因斯与班门堡之间推进，也不会使我感到烦恼，因为我的交通线是以弗尔克海姆这个小要塞和沃尔兹堡为基地的。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无法计算的，因为敌人是假设我的左翼在莱茵河上，而右翼则在波希米亚，并相信我的作战线是与我的会战正面相平行的，所以也许会认为迂回我的左面大有好处。如果这样，我将可以把他丢进莱茵河……大约在10月10日或12日，第七军就可到达马因斯，骑兵兵力约为一万八千到两万人。它所奉的指示是不要让它与莱茵河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并且可以袭击敌人，远到法兰克福为止，必要时应退过莱茵河，并与你的左翼部队取得接触。”

第二个要点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我在第一个要点中所说的一切都属于预防措施。我的第一个行军就要威胁到普鲁士王室的中心，我的兵力部署将会像疾风迅雷一样；所以在巴伐利亚

的全部敌军可能会退到马德堡，然后会合所有兵力，用强行军赶回柏林以防御他们的首都。直到这时，你才能将前卫推进并占领马克、孟斯特、阿斯拉布鲁克和东加里西亚等地。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你仅是个旁观者，那就是说一直等到敌军被赶进易伯河时，你才会有事做。我只希望你的兵力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直到10月12日为止，到那时，我的计划也就可以公开发表了。最后，如果遭遇到严重挫折，比如输掉了一个大型会战，那么我就会退向多瑙河，而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兵力和第八军来防守威赛尔河和马因斯，第八军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从马因斯再向后撤，应努力阻止敌军渡过莱茵河和侵犯我的国境。”

第三和第四两个要点，都是根据前面两个作进一步的解释。第四点中又包括下面一段著名的论述：“如果你受到一点最小的挫折都会使我感到焦急，因为这种情形会使我的帝国整个北部丧失了领袖。反过来说，不管我这方面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知道你还守在莱茵河后方，那么我就仍然具有较大的行动自由；即令我遭到一些不幸，只要我还剩下五万人，我就依然能够击败我的敌人。因为只要能保持运动的自由，不受一切作战牵制，而在国内多数要点上仍能维持平静，那么我一定还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

这封长信的整个基础就是拿破仑的一句最重要的格言：“战争的全部艺术就是一个非常合理而十分慎重的防御继之以一个迅速而大胆的攻击。”

10月1日，拿破仑离开马因斯，次日很晚的时候到达沃尔兹堡。在那里他接管了布歇的指挥权。10月3日，他命令第一军和第三军进向克罗拉赫；第四军和第六军进向弗尔克海姆；第七军进向沃尔兹堡；第五军进向施韦福特。10月5日，兰纳斯元帅从勒菲弗尔手中接掌第五军。在那一天拿破仑又向苏尔特发出下述的一封信，这也是全部战役中最具启发性的文件，因为他在这里把他的大战术轮廓进行了详细说明。

“我已经让沃尔兹堡、弗尔克海姆和克罗拉赫三地成为兵力和补给的集中点，并决定将全军分为三个纵队，开始进入萨克森。你是右路纵队的领先者，在你后面是内伊元帅，与你相隔半天的行军里程，再后面是一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与内伊相隔一天的行程。这样使右路纵队有五万人以上兵力。贝尔纳多特元帅在中央纵队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他后面是达武军和骑兵预备队的大部分，总兵力约为七万人。他的前进路线是经过克罗拉赫，罗本斯坦和希莱兹。左翼纵队由第五军领先，接着是第七军，他们取道柯堡，格内芬沙和沙尔费德前进。这又是一个四万人。但你到达霍夫时，全军也都会分别达到各自指定的位置。我个人与中央纵队一同前进。”

“把这样强大的优势兵力集中在这样狭窄的空间之内，你一定感觉到我决心不受任何影响，无论敌人选择哪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用比他强过一倍的兵力攻击他。”

“如果敌人用来对抗你的兵力不超过三万人，那么你应与内伊元帅合作攻击他。当你一到霍夫之后，你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接通到罗本斯坦，艾贝尔斯多夫和希莱兹的交通线。那一天（10月10日）我将驻在艾贝尔斯多夫。”

“你一定要经常与我通信，把你所知道关于德累斯顿方面的敌情随时详细地向我报告，至嘱至嘱！”

“你可以想像得到，用一个二十万人所组成的“营方阵”绕着这个地方（德累斯顿）运动，那是多么壮观！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点艺术和一点运气。”

那么拿破仑所说的“营方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配合，不管敌人的位置在哪里，从哪个方向前进，拿破仑都可以用他兵力的一部分采取攻势来牵制他，另一部分兵力则迂回其侧翼或后方；而第三部分兵力保留着充当预备队。

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中，如果普军扑向法军左翼或交通线，于是第五军在第七军支援下，就担负前卫的任务，把敌军钉住不放。此时，第一和第三两军则实行迂回，打击在敌军的侧翼上，至于第四和第六两军则保留为预备队。反之，如果敌人向法军正面进攻，那么第一和第三两军就上前迎敌，而第五和第七两军，或第四和第六两军担负迂回任务。

10月7日的黄昏时，大军团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第四军在贝劳斯，内伊的第六军在他后面相隔一天的行军距离。中央方面，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骑兵预备队的主力（由缪拉指挥）已经到了克罗拉赫附近，达武的第三军和近卫军跟随其后。左翼方面，兰纳斯的第五军正接近柯堡，后面跟着的是奥热罗的第七军。”

10月8日，大军团越过了萨克森边界，缪拉的轻骑兵向罗本斯坦和萨尔堡前进，击退了在他们前面的普军骑哨。第二天，贝尔纳多特的先头部队与在希莱兹的托恩钦的萨克森师发生接触，后者丧失了秩序，向霍恩洛赫的主力所在地米提尔、普尔尼兹退却。为了支援托恩钦，霍恩洛赫首先命令越过萨尔河进行全面进攻；接着他又收回命令，可是已经迟了，这使得路易·菲迪南亲王无法从萨尔菲尔德撤出。10月10日，他在那里遭遇兰纳斯的部队，全军覆没，他自

己也战死了。当他战死的消息传到了耶拿后，普鲁士上下都大为震惊，这种恐怖现象一直蔓延到了魏玛。

那天黄昏，拿破仑在希莱兹接到苏尔特送来的消息说，在前一天夜间，敌军已经撤出了普劳恩，正在向吉拉撤退。拿破仑本已写好了一封信要发给苏尔特，于是他立即在后面加上一个“又及”：“根据你刚刚送给我的情报，使我认为吉拉毫无疑问是敌军的集中点。可是我很怀疑他能否在我的前方先集中起来。”此后他又发第二封信给苏尔特说：“在吉拉一切事情都会明朗化。我相信我还是能赶在他们的前面先到达德累斯顿；只要我感到左翼已经巩固，一切局势就会急转直下。”

此时，因为害怕敌人的前进，霍恩洛赫已经退向卡拉，而威廉·腓特烈和不伦瑞克则正在担心他们与易伯河之间的交通线。在获知路易·菲迪南在萨尔菲尔德失败的消息后，就决定在魏玛集中全军兵力。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拿破仑对于敌人的详细位置并不太清楚，可是他对于敌情的一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他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迫使普军向其交通线退却，所以向吉拉前进，大致的方向还是正确的。

霍恩洛赫又从卡拉向耶拿转进，10月12日，当他的军队从耶拿再次撤退时，又发生了另一个恐怖现象，因为兰纳斯的前卫正从南面逼近。此时，在埃尔弗特有谣言说法军已占领劳姆堡。等到下午，这个谣言被证实了，普王马上召开战争会议。这次开会的时间是在10月13日清晨，会议决定取道奥尔施塔特，弗莱堡和梅尔西堡，向易伯河撤退，并且在途中吸收在玛内的温森伯格公爵的预备队约15,000人。为了掩护这次退却，霍恩洛赫应向卡普仑多夫前进，这是魏玛-耶拿公路上的一个小村，位置在二者中间。霍恩洛赫在那里充任主力侧卫，而奉命进到魏玛的鲁歇尔，则对他进行支援。一直等主力完全撤出奥尔施塔特之后，他和鲁歇尔才重新会合，改充主力后卫。大约在十点钟时，普军主力开始向奥尔施塔特前进。霍恩洛赫一到卡普仑多夫，即将前卫部队作了这样的部署：（一）托恩钦的师共8,000人，三个营位置在克罗斯维兹，鲁兹罗达和依斯尔斯提德森林中，九个营位置在克罗斯维兹的后方，多恩堡及其西部森林中。（二）在这些兵力的后方为十个骑兵中队和两个炮兵连，位置在鲁兹罗达。（三）霍尔岑道夫支队约5,000人，位置在克罗斯维兹东北各村落中；前哨在森弗特指挥之下，一直远到多恩堡和康堡为止。

大约在上午十时左右，在雾中，霍恩洛赫听到从南面传来枪炮声，他命令他的步兵预备队上前接近敌人。当这个命令正在执行时，马森巴赫单骑赶来，带来了国王的命令，嘱咐霍恩洛赫不要与法军发生任何激烈的战斗，因为他的任务是防守。对拿破仑而言，真是十分侥幸。因为如果霍恩洛赫前进，并用相当的兵力占领了南德格拉芬堡，这是一个可以俯瞰耶拿的高原，那么10月14日的会战就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0月12日的上午，拿破仑从缪拉方面获得了普军并未在吉拉集中的消息；同时从俘虏的口中也得知普王仍留在埃尔弗特，手中尚有二十万人的兵力。以这个情报为基础，拿破仑得出两点结论：（一）普军的意图是想在埃尔弗特附近接受会战。（二）他们首先在埃尔弗特集中，然后退向玛内（他知道他们的预备队在那里），再退向马德堡。为了应付这两种可能性，拿破仑决定分派第一军和第三军以及骑兵的大部分，取道萨尔河左岸，进行一个迂回的运动。而其余兵力则从卡拉与耶拿之间，强渡萨尔河，向魏玛-埃尔弗特一线前进。所以，如果普军决心迎战，则法军的主力可以钉住他们，而那两个分遣的军则可以打击他们的右翼。如果普军继续后撤，法军的主力将尾随追击，而分遣的兵力则切断敌人与易伯河之间的联系，迫使他们接受会战。结果就是一连串命令，带来如下运动：缪拉从劳姆堡向莱比锡搜索前进；第一军从吉拉进到柴兹；第三军从米提尔、普尔尼兹进到劳姆堡；第六军从希里兹进到了米提尔、普尔尼兹；第四军从维达进到吉拉；第五军从纽斯塔特进到耶拿；第七军从卡拉进到萨尔菲尔德。所有这些点都于10月12日到达，而兰纳斯把敌人的前哨逐出了耶拿城，达武的前卫也进入了劳姆堡。

拿破仑于10月12日到达吉格，在晚八时开始睡眠，休息了几个小时，于午夜起床。直到10月13日上午七时到九时，才有重要的报告送来，而且一送就是三个。第一个报告是奥热罗从卡拉送来，他报告说敌军已离开耶拿，向埃尔弗特转进，这是普王与其主力的所在地。第二个报告是达武从劳姆堡送来的，他报告说从逃亡者和俘虏的口中，获知普军主力是在埃尔弗特，而普王则在魏玛。第三个报告是缪拉从柴兹送来的，他转来了一份间谍报告，上面说从弗尔达到魏玛，沿途都可以看见普军部队，普王和王后都在埃尔弗特。拿破仑始终认为普鲁士人决不会如此愚蠢，居然会在埃尔弗特接受会战——那就是说面对柏林而背向图林根森林——所以他认定敌人可能会采取他猜想的第二条路线。虽然如此，在他写给缪拉的回信中，开头固然很坚定，但后来仍然表示怀疑。他说：“黑幕最后揭开了。敌人已经开始向马德堡撤退。你应与在

多恩堡的贝尔纳多特军，尽可能加速前进。”

接着他又说：“我相信敌人如果不是想攻击在耶拿的兰纳斯元帅，就是决心撤退了。如果他攻击兰纳斯元帅，你在多恩堡的位置仍足以允许你支援他。”

口授这个命令之后，拿破仑就启程前往耶拿；下午三时，当快接近该城时，他接到兰纳斯送来的报告，说在该城上方的高原，已经有了敌军12,000人到15,000人。拿破仑立即命令勒菲弗尔率领近卫军进向耶拿；苏尔特和内伊也尽最大的速度赶往那里；而达武则从劳姆堡出发以迂回敌人左翼。接着拿破仑继续向耶拿进发，四点钟稍过一点，在南德格拉芬堡与兰纳斯会合在一起，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拿破仑斯堡。

一旦到达该地，拿破仑根据他所能看见的情况，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认为普军的意图是想在这个高原上接受会战。所以他决定把兰纳斯的全军和近卫军，都送上这个高原以钉住敌军，其次再分配两个军去钉住敌人的侧翼，而达武和贝尔纳多特的两个军则乘机打击敌军后背。

虽然取道缪尔沙尔可以迂回南德格拉芬堡，这也是耶拿-魏玛公路所通过的地区，但是从耶拿城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这条小路很窄，虽然步兵可能通过，可是炮兵和车辆却无法通过。于是工兵立即奉命去拓宽较窄的部分，拿破仑亲自提灯在那里监工。当他亲眼看到第一辆炮车通过之后，他又赶回南德格拉芬堡，并命令把他的御营安置在近卫军所组成的一个大方阵的中央，这个地点现在还留有一块“拿破仑石”做为纪念。从那里他可以看见霍恩洛赫的营火闪闪发光，占据了大部分的高原。较远还可以看到不伦瑞克的营火和艾卡特斯堡的敌垒。这个景象更使他确认普鲁士全军并不想撤退，而且有准备会战的意图。

接着在营火照耀下，拿破仑又口授命令决定第二天上午的行动：他的目的是要在高原上获得足够的空间，以便展开兵力，并且在10月15日以前避免决战。他命令奥热罗从卡拉前进，取道缪尔沙尔迂回托恩钦的右翼；苏尔特则从吉格进到本斯提德，再向罗斯维兹跃出，打击托恩钦的左翼；至于内伊和缪拉则迅速前进支援兰纳斯。（注：在这个命令中未曾提及任何村落名称，可能的原因是营火光线太弱，使他无法看清地图。）

由于认为普鲁士全军会向他发动进攻，所以在夜里十时，拿破仑又指示布歇命令在劳姆堡的达武，于10月14日清晨向阿波达推进，然后从侧面或后方攻击敌军。在这个命令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如果潘提阿尔弗公爵和你在一起，那么你们可以一同前进。不过皇帝却希望他已经到达指定给他的位置，即多恩堡。”达武于上午三时收到了这个命令。

霍恩洛赫的敌情判断也是完全错误的。他绝没有怀疑到他所面临着的是法军的主力。他相信敌人是只在南德格拉芬堡和劳姆堡，留下一个侧卫做为掩护，而主力肯定正向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赶进，所以他觉得目前并无危险。

10月14日的上午异常寒冷，在日出之前，拿破仑开始出发视察兰纳斯的部队。浓雾掩盖着整个高原，不得不由侍卫人员举着火把随护，皇帝骑着马从一个单位走到另一个单位，与军官和士兵谈话，鼓励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普鲁士人今天的处境，正好比一年前奥地利人在乌尔姆一样窘迫。他每到一处，部队都欢声雷动，高呼皇帝万岁！虽然雾很浓，可是敌人前哨的距离很近，所以他们可以看见火把的光辉。当听到法军的欢呼时，萨克森部队不禁为之战栗。

上午六时，拿破仑发出攻击令。在浓雾掩护下，舒切特的师从右面进向罗斯维兹；加桑的师从左面进向柯斯佩达。到八点半钟，这两个村落连同鲁兹罗达，都已落入他们手中。半小时后，在舒切特的右面，苏尔特的领先师也从罗本斯提德出现，向柴维提勒森林挺进，在那里面对着霍尔曾多夫。同时，在加桑的左面，奥热罗的领先师也取道缪尔沙尔前进，达到弗罗堡，以便展开在加桑师的左面。所以到了大约九点时，当雾开始消蚀时，拿破仑已经使其战役计划的第一部分完全实现了：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空间，可以展开他的兵力。所以他现在决定暂停前进，好让他的部队有时间到达他们的指定位置并构成战线。第六军已经到了耶拿，因为等得不耐烦和担心丧失参加会战的机会，内伊不等命令到达，就先率领了三千精兵赶去助战。

在遇见托恩钦师的逃兵之后，霍恩洛赫才知道他所面临的已不仅是一个法军侧卫。他留下三个萨克森旅在重要的魏玛大路上，命令他们不惜代价死守，接着就命令格拉维尔特将军率领大部分普鲁士步兵，去夺回托恩钦已经丢失的阵地。为了支援他，又命令狄希尔将军的萨克森旅跟随后面前进。他又命令托恩钦的溃兵在后方集合，并补充他们弹药。在向鲁歇尔发出了求救的紧急呼吁之后，他就率领他的骑兵和骑炮兵前进，以掩护格拉维尔特展开。

十点钟时，雾已经完全消尽了，霍恩洛赫的骑兵共计四十五个中队，已经接近了费尔曾海里根村，于是分为两翼，当他们正准备向苏希特和加桑两个师的前进散兵群冲锋时，却突然遭到一个猛烈的攻击，而不能不暂停前进。这个攻击并不是由那两位法国师长发动的，而是内伊乘着大雾掩护，已经率领他的三千精兵前进到了兰纳斯和奥热罗之间，这是连拿破也不知道

的。不久他就与普鲁士骑兵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终于被完全切断，于是被迫把步兵组成方阵以防止骑兵的冲杀。

此时在南德格拉苏堡的拿破仑听到在费尔曾海里根附近突然发生猛烈的枪声，不禁大感诧异；再等他听到这是内伊的行动，就更加莫明其妙，因为他还以为内伊仍留在后方。他立即派伯坦德率领两团骑兵前进——这是他手中仅有的全部骑兵，因为缪拉还没有赶到——同时他也通知兰纳斯前进。兰纳斯立即照办，攻下了费尔曾海里根，到达与格拉维尔特战线对峙的地位，后者正展开在该村北面。在遭遇到猛烈的排枪火力之后，兰纳斯的部队就缩了回去，并在房屋和果园中，利用掩护物向普军还击，火力非常可怕。霍恩洛赫的幕僚们力劝他命令格拉维尔特发动突击以夺回村庄，但是他却不听，决定等待鲁歇尔来到，此时他也已经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催促鲁歇尔赶紧前进。毛德上校在他的《耶拿战役史》中说：“接着就发生了一件怪事，这是军事史上最离奇和最不幸的怪事。”一个外表极为壮观的步兵方阵，人数约为两万人，在整整两个小时中，站在开阔地上，暴露在法军无情的火力之下，而法军却都躲在土墙后面，几乎使他们找不到可以还击的目标。结果到处死伤枕籍，只有少数还在继续射击。

当格拉维尔特的人员正在作无益的牺牲时，兰纳斯和内伊的步兵已经透入了依斯尔斯提特森林，切断了在魏玛路上的萨克森旅与普军中央兵力之间的联系。为了填满这个缺口，霍恩洛赫将狄希尔旅以及他手中所控制的若干萨克森预备队都投了进去。到一点钟，除托恩钦师的残部以外，他所有的全部兵力都已列成阵线以等候鲁歇尔到达。

奥热罗的左翼正在与魏玛公路上萨克森人交战，这个地点叫作蜗牛湾——是个一连串的湾道。在右翼方面，苏尔特的领先师，在圣希莱尔的带领下，除了留下少数部队监视霍尔曾多夫以外，其余兵力都向内旋转以攻击普军左翼。此时，缪拉的骑兵也到达近卫军后方，至于内伊和苏尔特两军的主力也已集中在他们的侧翼。所以在大约下午十二点三十分时，除已经交战的54,000人以外，拿破仑手里还有42,000人作为预备队。

拿破仑监视着两翼方面的发展，当他判断会战已经到了最高潮时，就命令全军前进。他的部队也都感觉到胜利是已经在掌握之中，于是立即迅速前进，压迫敌军向下退走，将他们赶到苏尔巴赫河谷中。最后霍恩洛赫承认大势已去，命令部队向大小罗门斯提德撤退。可是到了此时，他的人员是已经疲惫不堪，组织瓦解了，所以除了一个萨克森营方阵以外，其余所有部队都一哄而散——他自己也就以那个方阵为避难所。法军在逐步推进时，到处都可以收容到俘虏，全部炮兵都投降了。

现在只有一件事可以阻止霍恩洛赫军团的完全毁灭，那就是鲁歇尔能在卡普仑多夫与哈密尔斯提德之间的萨尔茨达赫河上构成一个防御阵地，那么所有残部就都可撤到它的后面加以收容重组，然后等到夜间再向后撤。可是事实并不如此，当马森巴赫在法朗根多夫附近与鲁歇尔相遇时，就指示他应用全速向卡普仑多夫前进，并攻击在霍恩洛赫右面的敌军。当得到霍恩洛赫的求救通知之际，鲁歇尔已经离开了魏玛，虽然他与马森巴赫相遇的地点，距离卡普仑多夫最多不过六英里，但是他的前进是如此迟缓，直到下午二时，他的领先部队才到达该村。他把他的主力展开在大罗门斯提德与柯特晓之间，那就是在斯普林斯堡山脊的脚下，在依斯尔斯提德西北，相距离为一英里多一点。他刚一站住脚，就有一支法国轻型炮兵开始在斯普林斯堡的山头出现，并立即向他们射击。虽然如此，普军还是继续前进，突然，法军步兵好象蜂群一样涌来，在炮兵支援下，冲过设伏地，发射强烈的火力。在十五分钟之内，鲁歇尔的多数步兵营就已减少了一半的兵力，再过一刻钟，法军骑兵发动攻击，普军就完全崩溃，向魏玛逃窜。鲁歇尔本人也受了致命伤。

因为鲁歇尔的溃退如此迅速，所以霍恩洛赫企图收集他的残部再去支援他的企图也完全变成了泡影。于是，他退过了依尔姆河，向萨切豪森和利布斯塔特逃走。此时，萨克森军在魏玛公路上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拒绝放弃他们的阵地，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没有一人幸免。

到下午四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法军开始追击。缪拉的骑兵一口气挺进到了魏玛，又俘获数千计的普军残部。那天夜里，兰纳斯前进到了乌门费尔斯提德，奥热罗和内伊进了魏玛，苏尔特到了士瓦本斯多夫。拿破仑和他的近卫军又启程回到耶拿，他深信已经击败了普军主力。

在回程途中，拿破仑首先注意的就是伤员后送问题，直到夜幕低垂之际才回到总部，在那里发现达武元帅的一位参谋正在那里等他。参谋向皇帝报告说，第三军已经单独击败了七万普军，地点是在奥尔施塔特附近，率领普军的主将是普王本人和不伦瑞克。这个消息使拿破仑大吃一惊，他不禁向这个参谋说：“你的元帅一定是把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来看的。”但是不久他就搞清了事实，于是对达武和他的部下大加赞扬。以下就是事情的经过。

当拿破仑在耶拿进行会战时，因为他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当达武在北面十三英里的奥尔施塔特进行另一个会战时，依照一切战争规律他都不可能获胜。前面已经说过，在10月13日，普军开始在魏玛-劳姆堡公路上运动，共有五个师，分为五十三个步兵营，八十个骑兵中队和十六个炮兵连，共有步兵四万人，骑兵一万人和火炮二百三十门，包括团炮兵在内。领先的师长是施密特将军，当他到达阿波达时，听到南方传来炮声，就命令停止前进。后来发现没有什么问题，又命令继续前进。那天夜间，普军宿营在奥尔施塔特，以道路计算，它在柯森桥以西，相距为八九英里。

10月14日，普军的命令是以一个师的兵力，加上一个骑兵中队，前进到柯森以掩护隘路，而其余军队在到达哈森哈森之后沿弗莱堡道路向北转进，越过恩斯陶特河，并在弗莱堡和劳卡宿营过夜。因为已经知道法军在劳姆堡，那么在十月十三日清晨不伦瑞克为什么不先派一支强大的骑兵并加上一个步兵师的支援去抢先攻占柯森隘路，一直等到后卫已经撤出了哈森哈森时为止，这一点几乎很难理解。不伦瑞克所作的事情可以说是糟糕到了极点。在10月13日黄昏时分，他派了少数骑兵去进行搜索，这实在无异于提醒了敌人，在与达武的前哨在陶格维兹相互射击了几枪之后，就退回来报告说这个隘路已被敌军据守。

这时达武还在劳姆堡，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策马前进。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普军主力在国王率领下已经接近了。他立即派了一个步兵营去增强柯森桥的防御。

达武在劳姆堡，共有步兵24,500人，骑兵1,500人，火炮44门，他奉到的命令是采取最短的路线，即经过柯森，向阿普尔达前进。那里的道路在萨尔河的左岸上成之字形延伸，一直通到一个高原中。在这个高原中央，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那就是哈森哈森，它距离奥尔施塔特约有五英里远。

贝尔纳多特的司令部也设在劳姆堡，而他的部队则在沿着劳姆堡到多恩堡之间的道路上宿营。他也奉命向阿普尔达前进，但是却应取道多恩堡，因为当拿破仑下令的时候，他还是认为贝尔纳多特可能会遇到普军主力。因为达武获得的情报，已经证明敌军的半数现在都在奥尔施塔特，所以这个命令当然应该改变。当10月14日上午三时，达武接到布歇在前一天下午十时发出的命令时，他就力劝贝尔纳多特与他一同取道柯森前进。也许是因为嫉妒，贝尔纳多特却表示反对，还是决定依照前面的命令行事。他向多恩堡前进，并于上午十一时到达该地。虽然阿普尔达沿着大路走，距离多恩堡只有八九英里远。可是他直到下午四时才到该地，此时耶拿会战已经结束了。（注：拿破仑看透了贝尔纳多特的用心，本已下令审讯他，以后因为他的妻子求情才收回成命。）

尽管贝尔纳多特拒绝合作，达武还是毅然前进，毫不犹豫的迎击普军，尽管他相信敌人总数有七万之多。在拿破仑的众将中，达武也许要算是最能干的。上午六时，他率领他的三个师向柯森进发，这三个师分别由古丁，福利安和莫朗德指挥。大约在八点钟时，前进到哈森哈森周围的平原上。在浓雾中，布吕歇尔率领六百名骑兵，直向他冲来。在布吕歇尔后面是施密特的师，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也都在一起。应该感谢浓雾的掩护，达武才有时间来展开古丁的这个师——它是领先的一个。这个师有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五和第八十五共四个团——后者留在哈森哈森。古丁把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五两个团，列成战线，位置在该村右面（北面），控制着第十二团作为预备队。

当古丁正在部署兵力时，普鲁士王，不伦瑞克和莫伦道夫三人也正在考虑应如何对付。不伦瑞克一向谨慎有余，他主张暂停前进，等后面的瓦尔特斯内本师赶到后再采取行动。但是莫伦道夫却主张立即进攻，而国王也同意他的见解，于是施密特也开始展开兵力，当他正在展开时，雾已消失，可以看清楚古丁的全部阵容。普鲁士军方面于是又命令布吕歇尔率领二千五百名骑兵攻击古丁的右翼，但是古丁却马上看清了敌人的意图，立即把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五两个团的侧面各营构成方阵，而第十二团则在后方构成一个单独的团方阵。布吕歇尔一连冲杀四次，每次都被击退，到上午九时，福利安师也赶到了，因为达武看到敌人是以右翼方面为主攻方向，以求打通弗莱堡公路，所以把古丁的师摆在哈森哈森的周围，把福利安放在他的右方，即夹在哈森哈森与斯普尔堡之间。

现在瓦尔特斯内本的师已经赶上了，后面接着就是奥南格亲王的师，他们是因为行李车辆阻塞道路而迟误了时间。前者进到哈森哈森的南面，帮助施密特进攻，因为莫朗德尚未到达，古丁就动用了他的预备队第十二团来增援这个村庄。在这次攻击中，施密特负了致命伤，不伦瑞克公爵看到法军的抵抗如此激烈，就亲自率领一个团的掷弹兵向该村冲锋，结果双眼为弹丸所伤。他被抬出战场，于11月10日死于汉堡附近。于是普鲁士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指挥官，因为普鲁士王既不指派一个接替者，自己又不亲自担当指挥。

不久，奥南格师的两个旅也赶了上来。一个旅由鲁措指挥，被派去支援瓦尔特斯内本的左

翼；另一个旅由亨利亲王指挥，赶往施密特师左方，在那边，福利安已经开始向切克瓦进展。莫朗德的师也已经到达，展开在哈林哈森左方（南方）。尽管面对重炮的火力，他还是逐渐压迫瓦尔特斯内本和鲁措后退。因为他们的撤退又使施密特师的左翼暴露出来，为了避免受到包围，于是也只好撤退。

为阻止莫朗德的进攻，普鲁士王集中了所有骑兵，交给威廉亲王指挥，他是在瓦尔特斯内本后到达的。此后莫朗德就又把他的各营构成方阵，他进入这个方阵，达武本人也进入这个方阵。当普鲁士军的骑兵冲来时，象所有对步兵方阵的冲锋一样，结果一定会被击退。普鲁士军一再冲锋直到筋疲力竭，才开始向苏尔查和奥尔施塔特撤退。接着莫朗德前进到了利豪森。

当莫朗德正在达武左翼作战时，福利安在他的右面，攻占了斯普尔堡和波佩尔，后者曾经失而复得，然后到了利斯多夫。所以到正午时，古丁仍然扼守着哈森哈森，而莫朗德在南，福利安在北，由他们的炮兵实行纵射来威胁施密特、奥南格和瓦尔特斯内本的撤退。当这些师后退时，古丁也随之前进，攻克陶格维兹，向吉恩斯塔特挺进。在普军方面，卡尔克劳斯已经在那里集中了两个预备师的主力。有了这个兵力，再加上全部的骑兵，布吕歇尔和卡尔克劳斯立劝普鲁士王再回戈一击。可是威廉·腓特烈却以为霍恩洛赫和鲁歇尔两个军团依然完整无恙，所以决定退向他们那边，准备会合之后再在第二天向法军挑战。

普鲁士军于下午十二点三十分开始撤退，法军的追击以艾卡特斯堡为限度，因为达武的部队已经力竭，而且他的骑兵也不足以逐退普鲁士军。在卡尔克劳斯的掩护之下，普鲁士军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一直退到马特斯提德为止。从那里可以看见阿普尔达周围地区的营火。他们还认为那是霍恩洛赫的部队，可是不久就碰到了惊弓之鸟似的溃兵，才知道霍恩洛赫已经被击溃了，那些营火是法军的。这也就是说魏玛道路已经被切断，普鲁士王立即命令他的军队向北旋转，改从索米达道路行走。在布特尔斯提德，这些精神已经涣散的人员遇到大批溃兵，如潮水一般从耶拿方面撤退而来。于是情形更加混乱。因为他们相信法军正在跟踪追击，所以各个单位都已经溃不成军。法军一共俘获了25,000人，火炮200门，军旗60面。

除第三军，法军其他各部的死伤数字都已不可考。这个军损失了军官258人，兵员6,794人，约相当于这个军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由此可以证明这个战役是何等激烈。古丁师的损失约为百分之四十一，在会战中，胜利部队的损失高到如此的程度，可以说是破了有史以来的记录。

10月15日，拿破仑在他的第一次公报中曾经这样说：“耶拿会战扫除了罗斯巴赫的耻辱。在我们的右翼，达武元帅的部队表现最为优异。不仅阻止了敌军前进，而且击败了敌军主力。这位元帅表现出来的过人英勇和坚定性格，都是战士的第一流楷模。”

10月15日上午，法军开始进行历史上最著名的追击：缪拉、苏尔特、内伊和贝尔纳多特，分别痛剿敌军残部，并消灭其抵抗力；而拿破仑则率领达武、奥热罗、兰纳斯和近卫军，沿大路向柏林进发。此外，路易和莫提尔也奉命向希斯进攻。

10月27日，拿破仑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柏林，虽然和约的条件已经讨论并决定了，普鲁士王还是接到圣彼德堡送来的一个通告，说如果他仍与俄国保持同盟关系，那么沙皇就将亲率十四万人来援助他，所以他就拒绝批准和约。这时，普国境内的要塞，都连续向法军投降，其中包括着埃尔弗特、普林兹劳、斯潘多、斯特丁、昆士庭、马德堡和哈密仑等地。11月7日，布吕歇尔也在卢贝克投降了。所以在二十四天之内，普鲁士和萨克森的全部军事力量都已经毁灭殆尽：战死和负伤者共25,000人，被俘者为100,000人，其余的兵力也都完全瓦解。法军所获得的战利品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单单在柏林就有火炮4,000门，马20,000匹和枪100,000枝。

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来看，很少有哪次胜利具有的决性能够与耶拿-奥尔施塔特双重会战相比拟。不过在政治方面，拿破仑却并未能达到他的目的。普鲁士的失败并未使英格兰退出战争，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这两个会战在历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它们没有带来和平，反之在它们之后，欧洲还是连年苦战，终至民穷财尽，结果当拿破仑最后被推翻时，英国的世界霸权也从此奠定了基础。从此英国变成了全世界的工厂和银行，这也正是拿破仑所竭力阻止的事情。

如果与这个后果比较一下，那么一个绝对王权的被推翻，一亿六千万法朗巨额战争赔偿，和萨克森和魏玛被迫加入莱茵同盟，都只能算是次要的事件。拿破仑对这一点也十分明了，因为在他大获全胜之后，马上就想转过身来解决其尚未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消耗英国人的存金和如何最后毁灭英国人的信用。

第一点，他没收了普鲁士和萨克森境内的一切英国货物。（注：在莱比锡，他没收了大量的英国衣料。所以他向每个法国军官赠送一套全新的军服，向每一名士兵赠送一件外套和一件上衣。）其次，他命令莫提尔占领汉堡和汉莎的城镇。最后于11月21日，他发布了他的《柏林

敕令》，这就是他准备用来毁灭不列颠贸易的伟大计划。它共有十一条，其中前八条是最重要的，内容可以略述如下：

第一条：不列颠各岛被宣布处于封锁的状态中。

第二条：一切往不列颠各岛的旅行和通信均应禁止。

第三条：所有在我军和联军所占有的国家中，如果发现任何英国臣民，一律当作战俘收容。

第四条：所有仓库、一切商品和一切财产，无论何种性质，只要是属于英国人的，都一律加以没收。

第五条：一切买卖英国商品的商业都在禁止之列，一切属于英国的商品，或是从英国工厂中和殖民地中出来的，都一律宣布为没收的对象。

第六条：一切充公没收的财产中，应提出半数来赔偿因为商船被英国巡洋舰所捕获而受损失的商人。

第七条：自本敕令公布之后，一切直接从英国和其殖民地开来的船只，以及曾经到过该地的船只，一律不准进入欧洲的任何港口。

第八条：一切假借名义，企图违反上述规定的船只，一律加以没收，对于船只本身和所载的货物一律视同英国货来处置。

这个敕令就成为拿破仑政策的奠基石。凡是愿意接受其约束者就成为法国的友人，否则就被当做法国的敌人。英国当然立即发动反击。1807年1月7日，英国发布命令，禁止任何中立国的船只在任何两个法国港口之间或其同盟国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如果违反这个规定，船只和货物都一律加以没收。为了报复，1月27日，拿破仑命令没收汉莎各镇市中的英国货，连同其殖民地所生产的都在内。这样，真正的战斗就开始了。

不过俄国尚未屈服，因为亚历山大是欧洲大陆上英国信用制度的大主雇，既然拒绝接受条件，所以拿破仑决心先击毁他。

本尼格森已经率领了六万俄军，驻在华沙；而布克斯霍登还有四万多兵力，在一个月内可准备就绪。11月25日，拿破仑已经离开柏林前往波森，缪拉于11月28日进入华沙；接着在12月18日，拿破仑也到了该城。此时，两个俄国军团已经联合在一起，由哈姆斯科伊指挥。1807年2月8日，在大风雪之中，拿破仑在普鲁斯希-艾劳向他们发动攻击。结果成了一场惨烈的血战，可是法军并未获得确实的胜利，因为俄军保持着良好的秩序撤退了。拿破仑在一个激烈的会战中失手，这几乎还是第一次；4月26日，普俄两国签订了巴森斯坦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沙皇和威廉·腓特烈应联合一致，把法国人赶出日尔曼。英国人对他们则作幕后支援，他们贴补普鲁士军费一百万磅，并派兵力20,000人到斯塔尔斯德增援古斯塔夫斯四世所率领的16,000名瑞典兵。

接着，拿破仑围攻但泽城，在它投降之后，本尼格森就开始愚蠢地采取攻势了。6月10日在弗里德兰会战中他被法军击溃了。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因为沙皇不仅求和，并且还提议与其征服者签订一个同盟条约。6月25日，这两位皇帝在涅门河中的一个木筏上会晤，花了三个小时谈判和约条件，而威廉·腓特烈则冒着大雨在河岸上等候他们的决定。拿破仑最希望的就是恢复保罗一世时的“武装中立联盟”，其意义就是封闭波罗的海，不让英国船只进入。两天之后，法普两国也在提尔希特签订了和约，依照这个和约，普鲁士丧失了易伯河以西的领土、1793年吞并的波兰省区和1772年获得的西普鲁士南部，而柯特巴斯则割让给萨克森。但泽则变成了一个自由港。普鲁士的面积只有从前的一半，并且还要与法俄两国采取一致行动以对抗英国。这时，拿破仑似乎已经彻底胜利了。

## 莱比锡会战

---

自从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之后，战争的全部性质就改变了。在此以前，除在西班牙外，与他对抗的都是一些旧王室；而在此以后，对抗他的却是普通民众了。正和他自己的青年时期一样，法国革命唤醒了法兰西的民族精神，使法国人民获得自信自强的精神，正因为这样，康宾一战才能把布伦斯维克的大军扫出法国。现在在1813年，由于法国在欧洲已经居有征服者的地位，所以也就把革命的种子洒遍了所征服的地区。莫斯科的火焰在精神上点燃了整个欧洲大

陆，所以在莱比锡平原上的战斗，的确可以称为“民族会战”——一个新欧洲就是从这个会战中产生的。

拿破仑对于如此巨大的变革却似乎缺少认识，所以在他回到巴黎之后，虽然感觉到情况已经变得很复杂，但仍然不感到失望。虽然他的威望受到了打击，可是他的军事力量却只不过暂时消沉了一下。在他的后面还站着法兰西，虽然饱经征战却忠诚不变，此外意大利、依里利亚、日德兰和除普鲁士以外的全部日尔曼也都还属于他，而奥普两国还是与他保持着同盟关系。他的敌人只有英俄两国，前者的兵力正陷在西班牙境内，而后者则已破产，并且分裂成为两派：库图佐夫是主和派领袖，认为在普鲁士边界一定要结束战争；沙皇本人是主战派领袖，目的是想要彻底歼灭拿破仑。可是亚历山大也知道凭他一己之力是无法让俄国人跟着他走的。

对拿破仑而言，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两个不可靠的因素。不过前者在军事上已经软弱无力了，如果它背叛——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也认为他有把握击碎普俄两国的联合兵力。后者的问题就比较严重，因为如果奥俄普三国联合起来，那么他就可能要在两个正面作战，或是在一个正面遭遇到压倒性的联合数量优势。所以他一回到巴黎就马上与他岳父谈判。

此时英格兰早在与奥地利进行谈判，拿破仑从他驻维也纳大使奥托伯爵的报告中已经知道了这个事实。奥地利人耍的是两面讨好的把戏：他们一方面不愿让野蛮的俄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到处烧杀掳掠；但另一方面也想摆脱法国人的控制。因为他们的战争准备尚未完成，所以拿破仑政策要点就是争取时间。

此时在涅曼河又发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意外事件。12月30日，指挥着三万普鲁士军队的约克将军——麦克唐纳元帅后卫兵力中的一半——突然自行与俄军签订了一项托-罗根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他这个军宣告中立。

这个意料之外的背叛产生的结果是两面的：（一）现在仍指挥着大军团残部的缪拉只好被迫撤退，在俄军主力越过涅曼河三天之后，即1月16日，他又把指挥权交给尤金亲王。这位亲王是意大利总督，完全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宫廷将军。（注：现在这个残破的军团只剩下十万人。在侵入俄国的六十万大军中，其中只有二十万人是法军，所以法国的损失并不如想像中严重）。（二）约克的叛变成了普鲁士全面叛变的一个讯号，结果2月26日，威廉·腓特烈就在加利斯赫与俄国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俄国出兵十五万，普鲁士出兵八万。3月13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普鲁士也同时向法国宣战。所以俄国人的目的已经有一部份算是达到了。

自从宣战之后，普鲁士境内就掀起了狂热的战潮。政府宣布全国皆兵。凡是不加入正规陆军和国民兵的人也都应该用对敌方交通线和后方作战的方式来支援陆军行动，人民都应使用他们所有的工具决死抗敌。大家阻扰敌人的行军，切断他们的补给，杀害他们的散兵游勇。这些游击队也不穿军服，在敌人的前进道路上，一切粮食都加以销毁，磨坊、桥梁和船舶全部予以焚毁，村落也应放弃，人民都躲到森林和山地去避难。正如拿破仑的内阁成员维恩伯爵所说：“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所想使用的新手段。”这也正是1792年法国革命后的情形重演。

此时，俄军也于1月18日渡过维斯瓦河，并于2月7日进入华沙，尤金在但泽、格劳登兹、托恩、莫德林等要塞中都留下了一些守军，一共是54,000人，其中有33000人是法军。到三月初，因为害怕普鲁士人民揭竿而起以及俄军的前进，尤金又放弃奥德河一线退到了易北河上。他在那里奉到拿破仑的命令，要他放弃德累斯顿，而把兵力集中在马德堡。3月12日，由于受距离限制，迫使尤金又非放弃汉堡不可。于是特滕布恩率领他的哥萨克骑兵，在人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

此时拿破仑正忙于一个伟大的工作，那就是要在四个月之内建立一支新军。正如考兰科特所写的：“法兰西已经变成一个大工厂。整个法兰西民族都忘却了过去的挫败，纷纷表现出他们的热诚和信心。这也是法国人高尚天性的一个光荣例证，同时也是皇帝个人的胜利。他发挥惊人的精力，指导一切工作。对这种伟大的民族性努力，只有他的天才才能够给予组织和指导。一切工作都有如神助。”

拿破仑的目的是想征召一支655,000人的大军。在前一年11月，他已命令召集1813年的新兵，预计有137,000人。在更早些时候，当他还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为了增强国内治安，他已经命令召募“国民兵”80,000人，这支兵力现在是由外国人组成。此外，他又召集1814年的全部新兵，共200,000人，以及1808、1809和1810三个年龄层的缓召人员，共100,000人。他又从西班牙的270,000人中抽出许多老兵和四个团的近卫军。从海军中抽出了40,000名有经验的炮兵。

从宪兵中抽出3,000名骑兵军官和军士。命令意大利供给一个军共30,000人，由贝特朗将军指挥。但因为逃亡人数颇多，所以这些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就全体而论，新召集的步兵似乎

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考兰科特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有组织的“乌合之众”而已，但尽管考兰科特把他们鄙薄得一钱不值，可是我们却不能不同意德·欧德拉本的说法。他说：“在战争中要找到像他们这样的军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英勇奋战，视死如归，而且在一切困难和危险中，他们还是照样效忠他们的将领和部队。”也和从前一样，炮兵还是极为优秀，但骑兵的数量和素质却都不够水准，到4月间，人数还不过15,000人，而且其中只有一半能够作战。原因在于老骑兵都在俄国牺牲光了。在法国再也找不到那么多的补充人员，新的青年骑兵军官还缺乏训练，而新的鞍具和恶劣的驯马术也使许多马匹丧失服役能力。由于缺乏有效的骑兵，使拿破仑在新的战役中从头到尾都感到束手束脚。

3月12日，拿破仑颁发了一个敕令，决定新军的编制如下：第一军由达武元帅指挥；第二军由维克托元帅指挥，第三军由内伊元帅指挥，第四军由贝特朗将军指挥，第五军由洛里斯通将军指挥，第六军由马尔蒙元帅指挥，第七军由列依尔将军指挥，第八军由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指挥，第九军由奥热罗元帅指挥，第十军由拉普将军指挥，第十一军由麦克唐纳元帅指挥，第十二军由乌迪诺元帅指挥。此外还有一些日尔曼部队。

到了4月中旬，拿破仑已经准备妥当，可以一战了。他所控制的兵力，共为官兵226,000人，火炮457门，分别组成两个军团。他自己指挥“梅因”军团，包括第三、第四、第六、第十二四个军，另加上近卫军和近卫骑兵。尤金亲王则指挥“易北”军团，包括第五和第十两个军，第一、第二和第七军的一部份，还有第一骑兵军。

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召集了差不多二十五万人的兵力，而且还要供给装备，此外在他们的后方还准备了相等数量的预备部队，凡此种种都可算是一个杰出成就。如果拿破仑的前途完全是靠物质力量来决定，那么很可能不到四个月之内他就可以索还俄国人的旧债了。他后来之所以未能成功，并非由于他缺少物质力量，而是因为过去使他累战累胜的指挥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了。自从瓦格拉姆之战以后，战争的条件已经改变。陆军的数量愈来愈大，作战的地区变得那样广大，所以即使是内线作战，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也都已经无法指挥全盘运动。不仅是战略方面，甚至连战术方面也是如此。在莱比锡会战中，人数太多，情况也过于复杂。所以拿破仑的个人指挥体系因此无法运用。

同样重要的是，过去拿破仑一向总是采取攻势，使用兵力有如电闪雷鸣一样。但是到1813年，他却被迫采取守势，而这个战场上的居民又具有强烈敌意。由于人民的敌对态度，不仅迫使他不能不用较多兵力来维护交通线、仓库和桥头阵地等，而且也使他很难搜集情报，又因为他缺乏轻骑兵，所以这个困难份外加剧。对于这个问题，德·欧德拉本曾经有过如下评论：

“拿破仑的将领们虽然费尽心思，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一方面由于居民的敌视态度——他们都曾受到法军虐待；另一方面也由于哥萨克骑兵的骚扰。简而言之，只有在敌军已经撤走的地区中，我们才能够了解一切情形。这样的情报在进攻战中也许还勉强够用；但是在防守作战中却是毫无价值。”（注：德·欧德拉本是一个萨克森军官，在拿破仑总部中充当译员，他的观察是非常公正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过去的成功已经使拿破仑变得愈来愈专横独裁了。他认为自己天下无敌，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够资格指挥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也使他看不起他的敌人，正和查理十二一样，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维岑萨克曾经说过：“不管工具是否合用，他的命令还是一样要彻底执行。他有一种用不充足工具来完成一切工作的习惯，一种不承认任何不可能的决心和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这都是我们胜利的原因，可到了结束的时候又成为失败的原因了。”

有些史学家在讨论拿破仑晚年的指挥艺术时，认为促成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放纵。体重增加之后，身体变得不健康，体力衰减。这种看法似乎少有根据，而可加以驳斥的证据却很多，在1812年征俄战役中，根据考兰科特的记载，可以看出拿破仑的行动还是非常活跃的，例如：“当皇帝在维尔拉的时候，他的活动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似乎一天二十四小时对于他还是不够长一样。”“他在整个白天和大部份夜间都在工作。虽然在前线上，他还要治理法国，而日尔曼和波兰也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心跳。”在1813年，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也可以证明他还是照样活跃。（注：在莱比锡战役尚未开始之际，拿破仑曾经说过：“我要以波拿巴将军的身份打这一仗，而不是以皇帝的身份督战。”事实的确如此。）

事实上，造成他覆亡的原因正和造成他兴起的原因一样。不是因为懈怠，而是因为活跃。他始终相信他一个人可以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结果是等到军队的数量愈来愈大，而优秀的参谋人员成为必要时，他却已经无法寻找这种人才了。现在再请看考兰科特的记载。

他在1812年曾经这样说过：“参谋人员几乎毫无先见之明，反过来说，因为皇帝一切都事必躬亲，亲自发布一切命令，所以任何参谋人员，甚至参谋长都不敢负责，连一个极不重要的

命令都不敢作主。”虽然在1812年，拿破仑在写给贝提尔的信中曾经说：“这种组织的参谋部几乎毫无用处。”可是1813年德·欧德拉本却说：“在这个战役中，似乎贝提尔总部中的参谋人员，在经验上和技巧上远不如过去。”整个说来，在这个战役中的军队，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和不完善的机构。发生了许多困难，是拿破仑的权威也无法克服的。拿破仑对他的元帅们所抱的希望不是指挥，而只是服从，他们都是奴才而不是领袖，有许多升到高位的人，都是由于宫廷、政治和私人关系。其中多数人都出身贫贱，大都不学无术。拿破仑使他们升官发财，他们的收入多到百万法郎以上，被封为王公等爵位。当他失败之后离开法国前往厄尔巴岛时，拿破仑曾经对考兰科特说他很后悔在他晚年，不应该再重用这些元帅们，因为他们都已经太有钱，养尊处优，对战争已经厌倦了。如果他能够提升好的师长，因为这些人刚刚抓到元帅的权杖，那么也许情形就会完全两样。

对抗法国新军的是俄普两国的联军。前者人数约为110,000万，其中有30,000人是骑兵和哥萨克人。哥萨克人都是没有纪律的骑士，他们仅攻击法军的后勤部队，而日尔曼的农民也饱受其苦。在他们中间还有许多巴斯基尔人和鞑靼人，还是使用弓箭作武器。耶拿会战使普鲁士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了半自由的国度，普鲁士陆军也从此走上了改革途径。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军队的半封建组织也改良了，而以爱国心当作兵役制度的精神基础。虽然依照1808年9月8日的巴黎条约，拿破仑曾经限制普鲁士陆军的官兵总数为42,000人，可是沙恩霍斯特却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使许多的兵员迅速而秘密的变成了预备役人员。沙恩霍斯特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真正的民族军队，但实际上直到1814年才成功。

当约克叛变时，普鲁士境内的兵力不超过38,000人；但是此前为了补充在俄国的损失，拿破仑曾经命令威廉·腓特烈再招募30,000人。其次，在1813年2月9日，普鲁士王曾发布敕令成立国民兵，这是一种征召式的民兵和志愿性的轻步兵单位，以及一些所谓“自由连”，大部份是由外国人充当。所以到4月中旬，当拿破仑准备完成时，普鲁士陆军总数也已经增加到了80,000人。

3月11日，拿破仑曾把他的第一个作战计划解释给尤金听，虽然这个计划始终未实现，但却相当有趣，因为在整个战役中，拿破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它。这个计划是准备在哈维尔堡渡过易北河，率领300,000人前进到斯特丁，然后解救但泽之围，这样就可以增加30,000人的兵力。但是这个计划的意义却不仅如此而已，因为这个北面的战役可以把战争带到普鲁士的心脏地区，使柏林受到拿破仑的宰割，可以使普鲁士的动员完全混乱。此外，再从北面威胁俄军通过波兰的交通线，也足以把普俄两军都向北吸引，使他们远离奥地利，而使奥地利处于孤立地位。

更进一步，如果拿破仑的行军速度能超过敌军——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可以绕到敌人后方，从而再创造一次耶拿式的机会，而这一次他的正面是对着法国的。正如约克伯爵所说：“这个计划，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到5月间，当拿破仑正想采取这种行动时，他所有的兵力还不敷需要——三十万人的三分之二。所以当他向哈维尔堡和斯特丁前进时，就不可能再有余力来把敌人钉死在德累斯顿。此外，在莱茵邦联诸国中，人心都在骚动，所以也不允许他前进得太远。日尔曼境内的民族主义精神正在高涨之中，开始使他的战略受到限制。

拿破仑的第二个计划是直接前进到莱比锡，然后再扑向德累斯顿，这样就迫使他的敌人要么接受会战，要么退到易北河后面。因为他的骑兵力量薄弱，不足以屏障他的机动和给予基地和交通线以适当保护，所以他被迫倚赖设防的河川之线。虽然他并不能确切知道联军的实际位置，但如果联军决定向他前进，尤金就应打击他们的右翼；反之如果联军决定向尤金前进，那么他自己就应打击他们的左翼。照我们看来，第二计划似乎并不是用来代替第一计划的，而只是完成第一计划的初步。拿破仑的主要观念还是想攻占柏林和进行北方作战。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观念，必须在南方先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来重振他的声威，使日尔曼地区不敢动弹。

4月15日，拿破仑离开圣克劳德前往马因斯，两天后才到达该地。25日他推进到了艾尔弗特——这是他集中兵力的地方——除了贝特朗的军以外。依照德·欧德拉本的记载，“他似乎非常不安，”很明显，因为他缺乏骑兵，所以使他无法发现敌人正在干什么。28日他前进到艾卡特斯堡，因为路上到处都有敌人轻骑兵骚扰，使他的马夫们迟迟未能到达——这对这个战役可算是个不详之兆。

在4月30日黄昏时候，易北军团，共62,000人，正留在梅尔西堡附近，而主力军团则在劳姆堡附近和它西面。此时联军共为步兵64,000人，骑兵24,000人，火炮552门，由俄国元帅维特根斯泰因亲王指挥，也正在劳姆堡——莱比锡大路的南面集中（注：库图佐夫已于4月28日逝世）。拿破仑能立即用来对抗他们的兵力，只有145,000人，火炮372门，仅有7,500人的骑

兵。他十分需要获得一次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使他这支年轻的部队获得一次经验以激励他们的精神，而且更是为重振他的威望。

5月1日，他命令易北军团从梅尔西堡前进到舒拉德巴赫，而主力军团的运动则是这样的：

（一）第三军（内伊）连同近卫骑兵从威森维尔斯前进到吕岑。第六军（马尔蒙）担负支援。

（二）近卫军前进到威森维尔斯。（三）第四军（贝特朗）和第十二军（乌迪诺）前进到劳姆堡。贝西里斯元帅就在这天被一颗流弹击毙。在这一天终了时，拿破仑也进入了吕岑。

2日，内伊奉命稳固吕岑，并用相当兵力据守吕岑以南的大小戈斯岑、拉纳和加亚等村以掩护易北军团前进到莱比锡和主力军团后续部队向吕岑靠拢。如果敌人进攻，内伊的侧卫就应变成前卫。一旦它钉住敌人，就可以获得充分的时间以便其余兵力实行迂回。

此时，俄军骑兵已向联军的总司令部报告说：法军正分成行军纵队，从威森维尔斯前往莱比锡，在加亚有一个兵力薄弱的侧卫。这个报告是准确的。因为内伊忽视了他在上午四时所接受的命令，并未向佩高等方向实行侦察。他并未把该军主力集中在加亚地区，反而把他五个师中的三个都留在吕岑。此外，他的前哨也不太活跃，所以对仅仅相隔两英里远的敌人都未曾发觉。当维特根斯泰因获得骑兵报告之后，决定先击毁法军侧卫，把敌军切成两半，并把所有在吕岑以东的敌军，都赶进埃爾斯特沼泽。

拿破仑并未料到在5月2日会受到敌人攻击，所以他在大约上午九点钟时离开吕岑，骑马前往洛里斯通的部队，后者奉命把克莱斯特逐出利德斯瑙并占领莱比锡。上午十一点钟，他由尤金和内伊陪伴快要达到莱比锡时，突然听到在加亚方面传来猛烈的炮声。内伊马上疾驰回到他的军部。拿破仑立即命令所有在莱比锡大路上行军的部队都转过来向加亚前进，至于仍留在吕岑以西的马尔蒙和贝特朗，也奉命进行同样的运动。此后拿破仑也赶回吕岑。

此时，在拉纳和大小戈斯岑等地都已发生激烈战斗。下午两点三十分，拿破仑飞马赶到时，第三军已经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可是他的出现对他的部下足以产生魔术般的效力。从各部队一致发出了“皇帝万岁”的呼声。德·欧德拉本的记载说：“任何伤员走过皇帝面前时，也一律向他敬礼并高呼万岁，即使是已经丧失了肢体甚至几小时内就会死去的人也都一样。”

拿破仑为内伊的部下打气，并率领他们前进。马尔蒙记载说：“在拿破仑的一生中，他在这个战场上所冒的个人危险要算是最大的。他一再暴露自己，率领第三军的败兵反复冲锋。”激战之中，普鲁士的沙恩霍斯特将军也负了重伤。

大约下午五点三十分，麦克唐纳在右，贝特朗和马尔蒙在左，都已逼近联军了（注：在下午一时，贝特朗的领先部队距离加亚已经不到四英里，可是他却并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停留到了下午三时以等候新的命令。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可以证明拿破仑的将领是如何缺乏主动精神）。于是拿破仑命令德雷欧在加亚西南面不远的地方集中八十门火炮。（注：在吕岑法军一共发射炮弹三万九千颗。）其次他把青年近卫军组成四个纵队，由老年近卫军和近卫骑兵担负支援，于下午六时三十分开始冲锋，一口气把拉纳、大小戈斯岑等村庄攻了下来。直到夜幕低垂会战才结束。联军方面得知克莱斯特已被逐出莱比锡城，害怕退却线会被切断，于是决定撤退。他们在撤退时秩序极为完整，携带着他们的伤兵，并由骑兵担负掩护。

法军赢得的胜利却不具有决定性，如果再有两小时的白昼，那么毫无疑问就可以成为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联军必然会被赶入埃爾斯特沼泽并被全部歼灭在那里。法军并未追击，因为他们的骑兵不是俄军的对手。胜利的成本极高：法军损失了18,000人（包括死伤被俘都在内），其中有12,000人可能都属于内伊军。联军方面损失了11,500人。

5月3日上午三时，拿破仑命令内伊的部队在吕岑休息二十四小时，然后取道维登堡向柏林进发。易北军团则向联军追击，他们现在正向德累斯顿全面退却。布洛率领普军三万余人留守柏林。经过许多争吵和辩论，俄普两军才决定取道德累斯顿撤往包岑，到那里他们可以获得巴克莱率领的13,000名俄军的增强。

5月8日，拿破仑进入德累斯顿，他决定在那里建立他的主要前进基地。他的交通线从马茵斯到魏玛，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取道耶拿和阿顿堡直达德累斯顿，一路取道劳姆堡通往莱比锡。接着因为增援源源涌到，他又开始改组军队，以便同时向柏林和包岑两方面作战。他把无能的尤金送回意大利，首先把易北和主力两个军团合并，然后再分为两个独立军团，一个由内伊指挥，一个由他自己指挥。前者包括第三军（内伊）、第五军（洛里斯通）、第七军（列依尔）和第二军（维克多），此外再加上一个轻骑兵师和第二骑兵军，共有步兵79,500人，骑兵4,800人。后者包括第四军（贝特朗）、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和第十二军（乌迪诺），此外再加上近卫军、近卫骑兵和第一骑兵军，共有步兵107,000人，骑兵12,000人。

在进行这个改组工作时，拿破仑又获悉奥地利人已经在与俄普两国谈判，但因为联军在吕

岑的失利，所以现在也在拖时间。他认为这是一个达到他的主要目的的开端——获得一个全面的和平，所以在5月17日，他命令考兰科特前往敌军前哨，要求谒见沙皇，同时为了加强这一步骤，认为联军可能会在包岑接受会战。他命令第十一军、第六军和第四军，并以第十二军担负支援，向该镇前进；同时也指示内伊，要他把第三军和第五军取道霍伊-维达向包岑推进，并把第二军和第七军向柏林推进。不久，他又取消了这个命令，改令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向包岑进发。不幸得很，内伊早已命令列依尔停止运动，而第二军（维克多）也早已启程，所以尽管有拿破仑的这个补充命令，第二军甚至还有第七军，都可能赶不上这场会战。柏林最多只是一个次要目标，如果联军在包岑遭受到决定性失败，那么柏林的失陷也就是其必然结果。可是当拿破仑在下达第一个命令时却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实在是很奇怪。如果他能够早料到这一点，那么包岑会战就不会成为吕岑第二，而一定能为他赢得他所热望的和平。

5月19日，拿破仑亲自去侦察在包岑的联军阵地，它位于施普鲁河东岸，由俄军64,000人和普军32,000人据守，名义上的统帅是维特根斯泰因。拿破仑决定在第二天以正面攻击来钉住敌军，而把内伊的兵力从北面倾倒在敌人后方，切断他们的交通线，把他们赶向波希米亚的山地予以击碎。若这个目的达到，那么奥地利因为尚未准备妥善，就不敢妄动，如果没有奥地利协助，这个已经被击碎的俄普联军就会被迫接受他所指定的和平了。

20日的战斗是完全有利于拿破仑的，因为沙皇完全不听将领的忠告，相信敌军的意图是想迂回联军左翼，而将他们向北驱离奥地利。这种想法无异于自动钻入拿破仑的罗网，他坚持要增强左翼而不惜减弱中央和右翼的兵力。这时，内伊的军团也正用强行军赶来，到黄昏时分，他们已经分别到达下述位置：第三军，斯迪尔；第五军，沙尔青；第七军，霍伊-维达；第二军，圣维顿堡。前两个军已经接近施普鲁河，第七军尚距离三十五英里，而第二军则在五十英里以外。

5月21日上午四时，内伊接到命令，要他向维森堡前进，于上午十一时在普莱提兹暂停，准备当拿破仑发动最后一次总攻击的同时打击敌军的后背。第三和第五两军在上午四时到五时之间，离开了他们的宿营地，在克里克斯渡过施普鲁河，于上午十时达到普莱提兹。于是内伊命令他们暂停，等候总攻击的发动。可是这个总攻击一直迟到下午三时才开始，而发动之后，内伊并未能向维森堡压迫，反而被敌军右翼纠缠住了。如果内伊的全部兵力都已赶到，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因为他还是可以命令第二和第七军继续向维森堡前进。

联军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遂于下午四时摆脱会战，由强大骑兵担负掩护，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向戈利茨退去。虽然如此，他们的情况还是十分危急，因为他们之间已经相互失去信心，彼此之间发生严重争吵，如果拿破仑此时进行一个强力的骑兵追击，那么他们也很可能迅速的土崩瓦解。

这一次法军未能获得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和内伊两个人都应负责。由于拿破仑第一个命令的错误，使维克多军完全丧失了参战的机会，而列依尔也只是在会战结束时才刚刚赶到。内伊这个人也的确冥顽不灵，他虽然一生追随拿破仑，却始终不明了拿破仑战略的真意，所以在普莱提兹才会发生混战。不过我们也可以这样反问一句，既然内伊是预定进行决定性打击的，那么为什么在5月21日上午拿破仑不亲自前往指挥呢？实际上克里克斯距离包岑不过八九英里。

双方的损失数字有各种不同的估计，可能都在二万人左右。法军虽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但收获却极为有限。正和吕岑之战一样，包岑会战又是一次虎头蛇尾的胜利。拿破仑对此也深有认识，当敌人开始退却时，他就准备不顾一切追击。几分钟后，站在他身边的杜罗克元帅突然被一颗炮弹击毙。他的死使皇帝的神经也大为震动，于是他命令吹停火号。

当5月22日再开始追击时，乌迪诺奉命留在后面，收集他的兵力向柏林进发。5月27日，他到达霍伊-维达，同一天法军主力也渡过了凯茨巴赫河，联军向西里西亚退却，以求与奥地利保持接触。两天之后，达武和旺达姆收复了汉堡。6月1日，联军撤到施维德尼茨，拿破仑也进入了布列斯瑙。

虽然在5月19日沙皇拒绝接见考兰科特，可是6月1日三个交战国还是同意休战，以后于6月6日，在布拉斯维茨又同意延期到7月20日，然后再延到8月16日，以便拟定和平条件，提交布拉格会议讨论。虽然当时派驻联军总部的英国代表布格赫斯勋爵认为这次休战对拿破仑大为有利，可是约米尼却认为这是拿破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此后除毛德上校是个显著的例外，其余史学家都赞同约米尼的见解。（注：在吕岑之战中，约米尼是内伊的参谋长，但不久以后他却逃到联军方面去了。）

如果专门考虑战略情形，毫无疑问，约米尼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如果联军在施维德尼茨接受会战——拿破仑虽然不知道他们已经下了决心——那么他所要做的就只是在正面钉住他们，然后迂回他们的右翼，从而把他们击成碎片，赶入列森河去。那么为什么拿破仑同意这个

奇怪的休战呢？他曾于6月2日写信给在巴黎的科拉克将军，从中可以找到他的理由：“我决定休战是有点理由的：（一）因为我缺乏骑兵，使我难以完成巨大的打击，（二）因为奥地利方面已经表现出了敌意。”可是约克却说：“我们很怀疑这两个原因是否能完全解释这个奇怪的行动。”

的确如此，在许多战史学者中，毛德上校是曾经对这个战役作过详细研究的。他指出的理由如下：（一）因为此时拿破仑的兵员中有九百人是病号，而且截至此时，他的损失已经比对方多出了25,000人，所以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行另一次会战，而如果这一战打败了，毫无疑问就会使奥地利投入战争。（二）对于拿破仑的战术而言，一支强大有效的骑兵是不可或缺的。毛德又说：“他的炮兵虽然可以用强大火力在敌人的战线上撕开一些缺口，可是面对敌方的优势骑兵，他的步兵却很难跟进。换句话说，这种延迟足以使敌人有时间摆脱战斗。”没有骑兵就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三）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弹药补给不足，因为他行军太快，所以补给纵队赶不上。此外他的交通线也经常被哥萨克和游击队骚扰。5月25日，哈里曾受到突袭；5月30日，一个炮兵纵队由一支六百人的部队护送，也在哈尔贝斯塔德附近被敌人俘获。所以事实的真象可能是这样的——固然联军战略形势十分恶劣，可是拿破仑的能量也已经用完了，所以他自动放弃了这个战役。

6月10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因为从汉堡到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渡口都在他控制之下，所以决定把这条河当作他的补给基地。他后来写信给圣西尔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到德累斯顿和易北河的交通被切断，至于到法国的交通是否被切断，我并不太在意。”

此时他的敌人也并没有闲着。6月15日，英国依照条约，给与俄普两国辅助费二百万镑，并宣称如果奥地利参加同盟，也可获得五十万镑。7月7日，瑞典皇储贝尔纳多特也倒向联军方面。于是7月19日，各国在莱茵巴赫开会，奥地利也参加了。依照条约，他们共同约定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不冒单独与拿破仑交战的危险。如果在战场上单独与他遭遇，就应立即退却，一直等到联军兵力集中之后再对付他。不久，奥地利向法国提出下述的和平条件：取消华沙大公国和莱茵邦联；依里利亚各省应归还奥地利；普鲁士恢复在1805年的地位。因为拿破仑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于是普俄两国在8月10日宣布废止休战，两天之后，奥地利也向法国宣战。

8月15日，也就是休战的最后一天，根据德·欧德拉本的报导，拿破仑非常忧愁而沉闷。他这种态度是绝对有理由的，因为敌方所集中的兵力的确十分强大。截至此时为止，他自己已经集中了442,000人的兵力，其中有四万余人为骑兵。共分为559个步兵营，295个骑兵中队，只有1,284门火炮支援。此外，拿破仑还有26,000人据守着易北河上的要塞，55,000人据守波兰和普鲁士境内的要塞，还有43,000人的二线兵力。他的对方为俄军184,000人，普军162,000人，奥军127,000人，瑞典军39,000人，还有盎格鲁-日尔曼联军9,000人，包括由布古上尉指挥的英国火箭连在内。这两个大野战军共分为556个步兵营，572个骑兵中队，68团哥萨克兵和1,380门火炮。在他们后面还有预备队和担负围攻的兵力143,000人和驻守普鲁士和波希米亚境内要塞的兵力112,000人。联军的野战军共分为三个军团：波希米亚军团，由施瓦尔岑堡亲王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布吕歇尔亲王指挥；北面军团，由贝尔纳多特指挥。

可是拿破仑却并不知道敌人有如此强大的兵力，8月12日他在德累斯顿所作的估计，认为敌军主力不过二十万人，是由沙皇和普王亲自指挥，位于西里西亚。因为奥地利人必须监视在茵河和伊松佐河上的法军，所以他们在波希米亚能够集中的兵力应该不会超过十万人。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他决定采取两个作战：（一）在南面取守势，以德累斯顿为基地。（二）在北面取攻势，以汉堡为基地。第一方面包括着预定在8月17日到达德累斯顿的第一军（旺达姆），在卢森堡的第二军（维克多），在利格尼茨的第三军（内伊），在哥德堡的五军（洛里斯通），在布恩兹瑙的第六军（马尔蒙），在洛温堡的第一军（麦克唐纳），在皮尔拉的第十四军（圣西尔），在德累斯顿的近卫军，以及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共四个骑兵军。这支兵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侧击西里西亚军团的前进线——向北通往柏林，向南通往波希米亚。

对柏林的攻击由乌迪诺指挥，并由达武从汉堡加以支援。前者的兵力有在佩兹的第四军（贝特朗）、在卡拉的第七军（列依尔）、在巴恩斯的第十二军（乌迪诺）和第三骑兵军。后者的兵力为汉堡附近的第十三军（达武）加上吉拉德的师。

圣西尔和马尔蒙两位元帅都反对进攻柏林，前者向拿破仑指出他对贝尔纳多特军的战斗价值不免估计过低。后者则预言似地说：“我感到非常害怕，不要以为你已经赢得了一个决定性会战，也许你会输掉两个。”在回忆录中，马尔蒙说拿破仑之所以想迅速进攻普鲁士，是因感情冲动的缘故，不过更合理的解释却还是像3月11日的计划一样，一个趋向柏林的运动可以把普俄两军向北拉，使其远离奥地利。

8月15日，拿破仑率领他的近卫军离开德累斯顿前往包岑。8月17日，他在包岑听到消息说从布吕歇尔军团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俄军被分派出来，正在转往波希米亚途中。于是拿破仑立即决定扑向布吕歇尔，一旦将他击败，再分别扑向波希米亚和北面的两个敌军团，实行各个击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命令旺达姆进到包岑，有两方面的意图：或者是把他移向兹塔——但如果敌人乘机威胁德累斯顿，则又可派他去支援圣西尔。他付与圣西尔的任务为“争取时间，放弃土地，但却坚守德累斯顿，与旺达姆和总司令部之间都确保积极的联系。”

8月18日在戈利茨，拿破仑又获得情报，证实有四万俄军正从西里西亚调往波尼米亚，他马上决定进到兹塔，以便侧击他们的行军路线。可是到8月20日，他又得知布吕歇尔正在向第三、第五和第六军方向前进，于是又把这个计划搁在一边，而改向布吕歇尔进攻，并于8月21日越过波伯河。但是布吕歇尔知道他到来之后，就根据以前议定的计划立即撤退。很明显，拿破仑并未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先已有整个计划的战略性行动。

8月22日，拿破仑从洛温堡写了一封信给在巴黎的马里特说：“一般说来，我们最糟糕的方面就是我的将领们对自己缺乏信心。只要我本人在那里，他们就会故意夸张敌方的兵力。”这也许是指他曾经接到圣西尔从德累斯顿寄来的报告，因为圣西尔告诉他他正前往波希米亚，然后在波伯河上占领一个防御阵地。如果布吕歇尔想向德累斯顿或柏林进发，即可以侧击其行军线。接着他又犯了一个错误，这是对整个战役影响深远的。他突然想到有进行一个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遂忽视了圣西尔的危险情况，不派旺达姆去支援，反而命令他前进到斯托尔本。

这个所谓大迂回运动是这样的：首先于8月25日集中近卫军、第一骑兵军和第一、第二、第六军等兵力于斯托尔本。第二天夜间，使十万人在肯尼格斯坦渡过易北河，占领佩尔拉，打击波尼米亚军团的背面，把它歼灭之后，再前进至布拉格以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

8月25日上午一时，拿破仑出发前往斯托尔本，从那里他派戈尔哥德将军到德累斯顿去察看圣西尔的情况。下午他听到一个谣言，说乌迪诺已经在贝伦被贝尔纳多特和布洛击败，这个地点在柏林以南约数英里，现在法军正在向维顿堡退却中。下午十一时，戈尔哥德回来报告说德累斯顿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他不敢冒险让德累斯顿失陷——这是他的主要补给基地——所以他又决定向这个萨克森的首府前进，26日上午一时，他下达下述命令：近卫军和第一骑兵军都在上午四时出发，而旺达姆则继续向佩尔拉方向前进。等他们到达斯托尔本时，马尔蒙和维克多也立即随近卫军后面进发。

于是，“大军如洪水一样奔流”。上午九时，拿破仑在疯狂的“皇帝万岁”呼声中乘马进入德累斯顿。上午十时，近卫军到达了，他们在过去四天之内，已经行走了120英里。到晚上，维克多和马尔蒙也赶到了。

当我们审视这一迅速的变化时不禁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拿破仑当初能够不变初衷，派旺达姆去增援圣西尔，则很可能集中他们二人的兵力，可以使德累斯顿坚守到8月28日为止，这样则佩尔拉的迂回运动可以不至于中途变计。在拿破仑的亲自指挥之下，击毁波希米亚军团应该是已成定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亲自赶往德累斯顿足以挽救他的主要基地，可是命令旺达姆单独向佩尔拉前进，却终于失去了胜利。如果他曾派维克多或马尔蒙两军中的一个去增援旺达姆，那么也许就可以赢得另一个“耶拿”，使他再度变成欧洲的主人。这种可能性也足以表示这次休战对拿破仑而言，并不像多数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大错特错。

当拿破仑转向布吕歇尔时，施瓦尔岑堡开始向莱比锡进攻，以求切断法军交通线，因为他误以为这是拿破仑的生命线。8月20日，当他听到拿破仑去兹塔的消息，担心他会向布拉格前进，便挥动他的人马转向德累斯顿，于8月25日到达该城之下。

第二天他决定在下午四时攻城——信号为三声炮响。26日上午，奥普俄三国的君主（法兰西斯，腓特烈和亚历山大）也都赶来看他准备，上午九点钟时，从雾中传来“皇帝万岁！”的呼声，使他们大吃一惊——拿破仑又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了一次战争会议，经过冗长的辩论，终于决定撤退。可是此时不知是谁放了那个号炮，于是没有进一步的命令而攻击自动开始了。

虽然拿破仑手里只有70,000人，面对着150,000人的敌军，但是他却很轻松地把他们击败了。（注：约克对这次作战曾这样评论：“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数量和士气都是重要的因素，可是一个人的天才却足以胜过它们”。）当战斗在下午九时结束之后，马尔蒙和维克多也赶到了。此时，旺达姆已经在肯尼格斯坦渡过了易北河，并且把沃尔顿堡的尤金亲王所指挥的联军支队逐回到彼德森林。

27日，拿破仑的计划是钉住敌人的中央部分，攻击他的两翼，将他们逐入山地，而旺达姆则进向特普里兹以阻塞他们的退路。上午六时，在大雨如注之下，会战重新展开。联军左翼实

实际上被完全歼灭，法军俘获了13,000人以上。到下午四时，联军开始撤退。拿破仑全身透湿回到德累斯顿，认为会战在明天还要继续举行。那一夜，他匆匆的写了三行信给巴黎的康巴西里斯：“我是如此疲倦和忙碌，所以无法多写。巴沙罗公爵可以为我代笔。一切进展都很顺利。”所以以往史学家们认为他已经是“疲惫无活力”，由此即可知其不尽然。

28日清晨，法军开始追击，由拿破仑亲自统率，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兵器，还有许多其他情形都足以使他确信敌军已经被击溃了。因为他感到不舒服，所以坐上马车回德累斯顿休息，而把追击的任务交给他的军长们去执行。有许多人批主他在28日不够活跃，这就是一个合理解释。下午四时，他命令旺达姆——此时在海伦多夫——向特斯岑、奥西格和特普里兹压迫，打击敌人的背面。下午八点三十分，他得到两个坏消息：麦克唐纳在凯茨巴赫被布吕歇尔击溃，损失了15,000人（被俘）和一百多门炮。此外，乌迪诺失败的消息也被证实了，他已经损失了3,000人。

29日，当拿破仑仍在德累斯顿时，旺达姆已经前进到了库尔姆，8月30日上午八时，当他正想击退一个俄国军团的时候，突然背面受到攻击，全军被击溃，被俘者达13,000人之多，包括旺达姆本人在内。当31日上午二时拿破仑获得这个失败的消息之后，他无语地望着地图，心里想这已经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了。

沙皇的副官布图林上校说：“库尔姆之战把本来已经遍布波希米亚谷地中的失望气氛一扫而空，变成了万众欢呼的声音。”因为自从这一战之后，整个日尔曼都为之震动，而且也确定了奥地利对三国同盟的效忠。

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虽然连遭挫败，却并没有使拿破仑放弃占领柏林的计划，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他的战略受到牵制。因为急于想阻止北面军团前进到易北河上，他命令内伊代替乌迪诺，并于9月2日命令内伊在6日前进到巴恩斯，而在那一天他自己也应该前进到路科考以支援他，然后再从巴恩斯前进到柏林，在9月9日或10日占领该地。可是到了第二天，拿破仑又被迫放弃这个计划中他自己所担负的部分，因为他接到麦克唐纳的紧急要求，他在波伯河上正遭受严重的压迫。

9月3日，拿破仑又从德累斯顿到了包岑，催促麦克唐纳的残部向霍彻克赫前进。布吕歇尔从法军攻击的激烈程度判断，知道拿破仑又在亲自指挥了，于是立即退走。这使拿破仑不禁暴跳如雷。

6日，圣西尔又送来警报，使拿破仑不能不赶回德累斯顿。8日，他在德累斯顿又听到一个坏消息，说内伊于6日在登纳维茨遭受了一次惨败，损失了22,000人，其中有13,000人被俘。虽然如此，圣西尔却说拿破仑还是能够保持冷静态度，好像是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一样。

接着在其他联军的胜利之后，登纳维茨的胜利使蒂罗尔倒向奥地利，而巴伐利亚也决定背弃拿破仑。此时，哥萨克部队在汉诺威、哈尔兹、西伐利亚等地大肆活动。当他们到来之后，当地人民也跟着揭竿而起。整个日尔曼都起来反抗拿破仑。

9月5日，当拿破仑正在压迫布吕歇尔后退时，波希米亚军团又已经恢复力量，于是施瓦尔岑堡再次向德累斯顿进发。不过当他出发后又听到拿破仑回来的消息，于是立即退往特普里兹。10日，拿破仑向他进攻，但当他发现施瓦尔岑堡的阵地太坚强无法攻下时，遂留下圣西尔监视它，而自己回返德累斯顿。

四天后施瓦尔岑堡又再度前进，而拿破仑却前往佩尔拉，并且在9月17日和18日亲自侦察联军阵地。正当此时，他又接到内伊一个“言之过早”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已经率领八万人在罗斯兰渡过了易北河。21日，拿破仑回到德累斯顿，次日他率领近卫军会合麦克唐纳，逐退了布吕歇尔，后者退到了他在包岑附近的既设坚强阵地中。当他面对着这个阵地时，他突然的又获得了内伊的过火的报告，说贝尔纳多特在瓦顿堡的易北河上已经架好了桥梁，于是他决定放弃易北河以东的一切土地，除了一些桥头阵地以外，并命令麦克唐纳也撤到西岸。这是迫于当时情况而不得不如此。自从8月16日以来，他已经损失了150,000人和300门火炮，另有50,000名病员，而其余人员中还有许多处于半饥饿状态。9月23日，他写了一封冗长而详细的信给后勤部长达鲁伯爵讨论补给问题，在信中他说：“军队的营养很差。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才是自欺欺人。”虽然如此，到9月底，他还是可以在战场上集中起256,000人的兵力和火炮784门，不过其中有许多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

贝尔纳多特在到达易北河之后，就在罗斯兰和维顿堡以下的地方架桥渡河，9月24日他率领全军出现于瓦顿堡之前。布吕歇尔决定向北移动与他会合。施瓦尔岑堡则决心放弃对德累斯顿的作战而向莱比锡前进。10月3日，布吕歇尔率领60,000人在瓦顿堡击败了贝特朗的15,000人，并于次日渡过了易北河，同一天，贝尔纳多特率领76,000人，也在罗斯兰和贝尔拜渡河，前进到了莫德河。这个行动又迫使内伊退向德雷切希。

拿破仑可以集中他的二十五万人向北面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联合兵力十四万人，也可以向南面攻击施瓦尔岑堡的约十八万人。因为他占有内线的便利，所以他的确有把他们各个击破的希望。所以并不象一般人想像的他已经是瓮中之鳖，事实上从战略方面来看，他还是掌握全局的主人翁。

10月2日，他把第二军（军长维克多，16,000人），第五军（军长洛里斯通，14,000人），第八军（军长波尼亚托夫斯基，7,000人）以及第五骑兵军都交给缪拉指挥，并且指示他，当圣西尔（第十四军，28,000人）和罗勃（第一军，12,500人）坚守德累斯顿时，他就应阻止波希米亚军团向莱比锡前进。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即拟亲率主力向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前进，在施瓦尔岑堡未能到达莱比锡之前先把他们击溃。

现在就发生了这个战役中最奇怪的事件。在10月6日下午，拿破仑曾经与圣西尔作了一次长谈，特别向他强调说明防御德累斯顿的重要性。可是到了午夜，拿破仑又召见他，告诉圣西尔说他已经决心放弃该城，要他和罗勃一同北上。圣西尔的回忆录中记载拿破仑的话说：“我可以确定会有一场会战发生；如果我赢了，我对没有把我所有的部队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会感到遗憾，如果我输了，把你留在这里也毫无用处，而对我的会战将毫无贡献。而且，德累斯顿在今天又有什么价值？”所以在7日，他命令圣西尔于10月8、9两日撤出德累斯顿城，可是十二小时之后，拿破仑又改变了决心，违反了他一向所重视的集中原则，又命令圣西尔留在原地不动。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猜想得到的理由是因为他担心放弃德累斯顿会使萨克森倒向联军方面。

10月8日，拿破仑在莱比锡以东集中了十五万人的兵力。贝特朗在斯切丹构成他的右翼，而马尔蒙与拉托尔在杜加构成他的左翼。他认为布吕歇尔是在杜本，而贝尔纳多特在拿骚，这个猜想也是不错的，不过对他们的兵力却估计过低。9日，他向前攻击布吕歇尔，可是当他的先头部队进入杜本时，他们却发现布吕歇尔又溜走了。实际上，10月10日，布吕歇尔在哈里附近已经与贝尔纳多特会合，这却是拿破仑所不知道的。

对于这个玩弄他的老把戏，拿破仑感到非常恼怒，他现在该怎么办呢？他不能无限制的向北前进，因为他知道施瓦尔岑堡正在向莱比锡前进，而缪拉并不能够把他挡住太久。但如果他现在迅速的回过头来进攻施瓦尔岑堡，那么毫无疑问施瓦尔岑堡也会立即撤退。所以很明显，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让施瓦尔岑堡前进，等他与缪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再象雷霆一样的打在他身上。

所有史学家都责备拿破仑不应在杜本徘徊不前，照本书作者的看法，这是一种误解。拿破仑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埃伦堡，一直停留到10月14日。德·欧德拉本说，他看见皇帝在他自己房间里，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维恩说他老是关着房门召见他的将领。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不过在10月10日到10月13日之间，他还口授了62封信，这在他的《通信集》中占了四十二页之多。同时他也得知巴伐利亚降敌的消息。10月12日，他正式放弃了攻击布吕歇尔和贝尔纳多特的念头，通知缪拉说他已经决定向莱比锡前进，拟于10月14日在那里集中二十万人。同时他也写信给马里特，内容相同。14日上午三时，他命令部队开动。下午七时，他写信给麦克唐纳说：

“毫无疑问，明天（15日）会受到波希米亚军团和西里西亚军团的攻击。”

14日正午，拿破仑到达莱比锡，从那里他可以听到南方传来的缪拉的枪声。那一天在列伯特-沃尔科维茨发生了此次战役中规模最大的骑兵战斗，但并无决定性结果。

15日上午，在缪拉陪伴下，拿破仑视察了整个战场，到了夜幕低垂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第四军（贝特朗）在恩特里塔希；第六军（马尔蒙）在林登萨尔；第八军（维莱托）在马克里堡和杜森；第二军（维克多）在瓦赞；第五军（洛里斯通）在列伯特-沃尔科维茨；第九军（奥热罗）在茹克豪森；第三军（索汉）在莫考和杜本；第十一军（麦克唐纳）在杜加；第七军（列依尔）在杜本。近卫军作为总预备队，位于劳德尼兹和克罗顿多夫。第五骑兵军（赫利迪）在南段正面右方；第一和第四两个骑兵军（拉特尔和克勒曼）在中央后方；而第二骑兵军（塞巴斯坦尼）则在其左面。

在联军阵营中也发生了怪事。布吕歇尔在哈里，而贝尔纳多特则在他北面相距约十五英里，布吕歇尔希望在波希米亚军团从南面前进时，他们也从北面向拿破仑逼近。可是贝尔纳多特却害怕拿破仑，希望避免与他接触，而主张保护与柏林之间的交通线。结果是布吕歇尔单独前进，后来贝尔纳多特也只好勉强跟着走，最后还是到得太迟，赶不上16日的重要会战。

施瓦尔岑堡率领16万人于9月26日出发，但是行军速度极慢，直到10月14日才到达阿顿堡。十七天一共只走了70英里。他也不希望与拿破仑发生直接冲突，宁愿迂回而不进行会战。但是10月13日，他接到布吕歇尔的通信说：“现在三个军团已经如此接近，如果能够同时向敌人集中兵力地点进攻，则可能一下子把敌人击溃。”于是沙皇亲自指挥，派维特根斯泰因率领

大批骑兵去搜索敌军。这就是与缪拉之间所发生的巨大骑兵战斗。10月13日，联军方面正忙着准备次日的会战，布吕歇尔奉命加速前进，以便在莱比锡西南面九英里处的马克兰斯塔特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在。

1813年的莱比锡还是一个居民只有三万人左右的城市，周围都是古老的要塞工事，在工事外围就是郊区。在它的西面为普莱西河和埃尔斯特河，中间构成了水网，上面设有桥梁，最主要的桥梁在林登朗，道路由此通往梅西堡和威森维尔斯。在该城的北面有巴尔塔河，它在帕芬多夫村与普莱西河会合。南面为一连串的低缓山岭，最高的是加尔根堡。

联军的攻击计划是由施瓦尔岑堡拟定并由沙皇加以修正，内容如下：当布吕歇尔率领兵力54,000人向莱比锡西北前进时，另外有三支兵力，从西面和南面也向该城进攻。格莱率领19,000人攻击利德斯瑙并切断法军的交通线。梅维尔德率领28,000人向北前进到普莱西与埃尔斯特河之间的地区。维特肯率领96,000人在左翼普莱西河上负责攻击缪拉于10月14日占领的阵地，其中央位置在瓦赞。这种广泛的兵力分布结果形成了四个分别的战斗，在北面为莫克恩和利德斯瑙的会战，在南面为多里茨和瓦赞的会战。

关于第一方面，拿破仑尽管在写给麦克唐纳的信上曾经提到这一点，但他却不相信布吕歇尔会参加10月16日的会战。在这个战役中，他似乎已经丧失了精力和勇气，在1815年的战役中也是如此。10月15日下午十时，他写信给在林登萨尔的马尔蒙说，贝尔纳多特据报已经到了梅尔西堡，同时也可以看见在马克兰斯塔德有许多营火，于是他补充说：“这使我相信敌人不会沿哈里大道前进，而会取道威森维尔斯，以便在佩戈附近与波希米亚军团会合。”他的假设就是这样的，所以在10月16日上午七时，他指示马尔蒙把他的军移到莱比锡与列伯特-沃尔科维茨之间的中点位置，如果利德斯瑙受到攻击——拿破仑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从那里救援，同时也可以向南运动。采取第二个行动的原因是拿破仑已经决定用麦克唐纳的军来迂回正面在瓦赞的联军右翼；并为了使这个侧击能确实生效，他就想起要马尔蒙去支援麦克唐纳。

对拿破仑而言，他的假设错了，这真可以说是不幸之至。虽然在10月15日到16日之间的夜里，马尔蒙从林登萨尔的教堂尖塔上，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远处布吕歇尔的营火闪闪发光，但是在接到上述命令之后，却还是勉强准备执行。他刚开始行动，布吕歇尔的前卫就已经把法军前哨逐出了拉德-维尔德、斯塔米恩和瓦伦等地。马尔蒙认识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执行那个命令，于是回过身来在莫克恩和埃尔斯特河之间选择了一个防御阵地，接着他就向内伊求救，后者现在负责指挥整个北面战线。大约在上午十点钟时，内伊指示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去代替马尔蒙。贝特朗刚出发就在途中受到阿利希从利德斯瑙发来的紧急求救呼吁，因为他正受到格莱的优势兵力攻击。贝特朗深知利德斯瑙桥梁对全局的重要性，立即赶往救援。他把格莱击退了。以后当索汉第三军从杜本赶上之后，内伊遂派其中一个师去支援马尔蒙，而其余两个师继续执行贝特朗的原定任务。当他们接近麦克唐纳之时，马尔蒙的情况又变得十分危急；于是一再派人来恳求他们回去。所以结果就如维恩所说，这一整天中，他们奔走于两个战场之间，连一枪都没有放。维恩说：“在皇帝眼中看来，这是那一天最大的不幸”。

在莫克恩，马尔蒙受到约克军的猛烈攻击，这个村落曾经一再易手，但最后到下午五点钟，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之后，约克终于在该村站稳了脚跟，于是马尔蒙退往哥里斯和欧特里希。日出后不久，拿破仑与缪拉一同骑马到了加尔根堡。这个上午寒冷而阴雨霏霏，地面上盖着一层厚雾。直到九点钟雾才开始消散。于是三声炮响表示联军开始攻击了。接着双方开始了猛烈炮击，一连打了五个小时都没有停下来。

在炮兵掩护之下，联军分为四个纵队，沿宽广正面前进，这是一个要命的兵力分配，因为彼此都看不清楚，所以他们的攻击是毫不协调的。沃尔顿堡的尤金前进到了瓦赞，在那里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直到上午十一时为止。最后，他的人马还是被赶出了该村。在尤金左面，克莱斯特向马克里堡冲锋，但在那里被法军炮兵阻住了；在尤金右面，戈萨科夫前进到了列伯特-沃尔科维茨，也一样被炮火击退。这个撤退又使他与克勒瑙纵队之间现出一个缺口，后者于上午十时，已经向大波斯拉前进。最后，在普莱西河与埃尔斯特河之间，梅维尔德也被击退，并被迫转入防御。

上午十一时，法军的位置大致如下：波尼亚托夫斯基守住了马克里堡、孔尼维茨和多里茨。奥热罗在杜森支援他。维克多扼守列伯特-沃尔科维茨，莫迪尔和乌迪诺各指挥两师青年近卫军充担预备队。老近卫军则在加尔根堡后方，而麦克唐纳在霍兹豪森等待马尔蒙到达。此时，德罗特已经奉命在瓦赞与列伯特-沃尔科维茨之间，集中150门火炮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拿破仑的意图是想用他的全部骑兵（除塞巴斯坦尼的军），在古登戈萨地区突破敌军中央

部分，然后乘着混乱用步兵纵队来进行攻击。此时麦克唐纳和跟在后面的索汉就打击在联军的右翼上，把他们向已经碎裂的中央逼去。

下午二时以前不久，拿破仑已经不能再等索汉到达，下令进攻。在炮兵掩护之下，缪拉率领骑兵一万到一万二千人猛冲向前，步兵则集中他们后方。麦克唐纳则进向色维尔萨因。

最初缪拉横扫他前面的一切，当者披靡，一连冲散了两营步兵和俘获26门火炮。如果步兵能够立即跟在马蹄后面前进，那么这场会战可能已经获得胜利。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突然北方远处传来轰鸣声。贝蒂尔认为是远处的雷鸣，可是拿破仑却立即听清了这是炮声。他转过马头向莫克恩方向飞奔而去。可是在瓦赞方面，此时却正需要他在场督战，他一走之后，一切都丧失了重心。

这时缪拉已经深入到古登戈萨南面，维克多已经进入了奥恩汉的牧羊场，乌迪诺正在向克罗本前进，莫迪尔正在向大学树林前进，洛里斯通向古登戈萨前进，而麦克唐纳也向色维尔萨因前进，但是此时联军方面也已经召集了他们的预备队。缪拉的马匹现在正遭到轰击，而侧面也受到俄国骑兵13个中队的攻击。洛里斯通的军也被击散，向德罗特的炮兵阵地退却。在法军方面，这种混乱逐渐扩大及于全军：维克多被迫放弃了牧羊场，乌迪诺也被迫退出了色维尔萨因。在法军右翼，梅维尔德已经渡过了普莱西河，并进入多里茨，但被击退，他本人也被法军所俘虏。

这次战斗结束之后，拿破仑命令把他的御营设在斯托特里兹的干潭内，照惯例周围由老近卫军围护。于是他召见被俘的梅维尔德将军，这本是他的熟人，从梅维尔德方面他才知道巴伐利亚的维内德将军已经在茵河与奥军携手，并在准备进攻法军在马因斯和法兰克福的交通线。这个消息使拿破仑认为必须退却，为了争取时间，他决定把梅维尔德送回联军司令部，并请他转达一个谈判休战的建议。自然这不会有什么结果。

现在拿破仑决心退却，照我们看似乎已经毫无疑问，因为在下午七点，他已命令贝特朗率领第四军准备出发，以确保在梅尔西堡、弗莱堡、威森维尔斯、柯森等地的萨尔河和恩斯塔特河上的渡口。而莫蒂尔则率领两师青年近卫军来接替他在利德斯瑙的防务，不过也似乎可以看出，他一直等到10月18日才真正打算实行退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现在手中仍然还有十六万人的兵力，若能在10月17日向莱茵河上前进，虽然这是自动放弃了日尔曼，但却毫无疑问仍然可以确保法国东疆，这比他以后在1814年的处境好得太多了。

10月17日，只有零星战斗，双方都准备明天的行动。18日上午二时，雨仍在下，法军从他们的营地中撤出，开始向孔尼维茨-多里茨-普罗布斯希达-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兹维朗恩多夫-庞斯多夫-希内维尔德一线退却，此后再沿着巴尔塔到帕芬多夫和哥利斯。列依尔的军于该日达到。

也和法军一样，联军在17日这一天留在原地不动以等待柯罗里多、贝尔纳多特和本尼格森到达。当他们到达之后，联军兵力可以增加至295,000人和1,466门火炮。施瓦尔岑堡18日的行动计划是准备分为六个攻击纵队：黑森伯格亲王攻击罗斯尼格，巴尔克莱攻击普罗布斯希达，本尼格森攻击茹克豪森-霍兹豪森，布吕歇尔攻击莱比锡东北，格莱攻击利德斯瑙，贝尔纳多特则在他与布吕歇尔之间。

17日下午21时，拿破仑命令把他的总部移到斯托特里兹的烟草工厂中，三个小时之后，他乘马往普罗布斯希达，由那里转往劳德尼兹去与内伊元帅会晤。他在劳德尼兹一直停留到上午五时，然后再前往利德斯瑙，依照唐恩的记载，他曾经命令在那里架设额外的桥梁。

上午八时，他回到斯托特里兹，正在吃早餐时，敌方的火炮开始发射。他立即命令贝特朗向萨尔河上进发。直到下午二时为止，法军的前哨还只是缓缓的被击退，联军极小心的前进。只有黑森伯格亲王率领的左面纵队，在多里茨和杜森经过了激烈战斗，并将两地攻占。接着他前进到孔尼维茨，但被波尼亚托夫斯基的波兰部队击退。巴克莱在后者右面等待本尼格森的到达。后者还落后很远，正在缓慢前进。但是仍没有贝尔纳多特到达的消息。此时在利德斯瑙，贝特朗已经完全击败了格莱，并挺进到了威森维尔斯。

下午二时，在罗斯尼格周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但是奥热罗和波尼亚托夫斯基仍然坚守孔尼维茨，而在普罗布斯希达，维克多在洛里斯通支援之下，也一再击退巴克莱的纵队。巴克莱屡次突击都不能成功，随后奉到施瓦尔岑堡的命令，才改取守势。此时本尼格森因为数量比麦克唐纳占优，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了霍兹豪森和茹克豪森。他再前进又占领了柴维劳多夫，但是在斯托特里兹还是被击退了。于是贝尔纳多特终于在他右方出现，下午三时，他们二人合力攻下了莫尔考。在强大炮兵火力支援之下，包括波古上尉的火箭炮在内，他们又向庞斯多夫进攻，也把它攻下了。不久，拿破仑又用青年近卫军和老近卫军将该地夺回，在发现无法据守后又自动撤出。内伊也把他的右翼撤到色尼尔豪森和斯图兹。正撤退时，列依尔的两个萨

克森旅和一个野炮连，本来位于希勒尔豪森正面，现在却开始投降敌方了。当他们通过时，法军骑兵还以为他们是向前进攻，不禁向他们欢呼。

虽然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三个据点仍在坚守之中，可是到了傍晚，其他各点的法军都已经被迫退到莱比锡的城郊。马尔蒙已经被赶出了谢尼菲尔德，退到劳德尼兹，在下午四时，内伊和索汉也都已经负伤。到此时拿破仑才认识到此地不可再留，所以当夜幕低垂之后，他就在营火下用他习惯的精确态度，开始口授撤退的命令。这个命令本身已经遗失，但是它所规定的行军序列却是大致如下：老近卫军领先，接着就是乌迪诺所率领的两师青年近卫军，第四骑兵军，第一和第二两军，最后是第二骑兵军。以上各部队在其余兵力掩护下，应立即经过利德斯瑙开始撤退，直到下午八时，拿破仑还留在野战营之中，以后才回到莱比锡城内，留宿在普鲁士旅馆。他在那里与巴沙罗公爵（即马里特）一同工作到深夜。

布吕歇尔在黄昏时才知道贝特朗已经在向萨尔河行军，于是也立即命令约克军开始行动，占领了梅西堡和哈里。当10月18日的战斗停止时，还是没有获得决定性战果。法军仍守着从孔尼维茨到普罗布斯希达、斯托特里兹、克罗顿多夫、劳德尼兹一直抵达莱比锡城北之线，而在西面，拿破仑的退却线也依然畅通无阻。关于这一夜的情形，道伊列斯基有下述生动描写。

“夜幕垂下，天空照耀得通红。斯托特里兹、谢尼菲尔德、多里茨和莱比锡城的郊区，都已起火燃烧。我军（联军）方面充满了欢乐气氛，从各方面都有捷报传来，反之敌军则陷于混乱之中。他们的辎重、炮兵、残破的团队，几天没有吃饭的士兵，都挤在一块，因为莱比锡周围河上的桥梁不够用。当我们的炮弹落下时，在狭窄的街头上到处都可以听到无数伤兵的呼号。战场上，刚刚还有两千门火炮在那里怒吼，现在却已像坟墓一样沉寂。这种会战后的沉寂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使人感到别有意味。”

18日黄昏，施瓦尔岑堡颁发次日作战命令。还是和他的惯例一样，完全是一个平行的攻击，仍然和过去的攻击命令一样，并没有企图集中在任何一点上。此外，除了布吕歇尔曾经采取前述步骤以外，也不再有任何切断法军交通线或准备追击的意图。

19日上午二时，法军留下前哨在孔尼维茨，普罗布斯希达和斯托特里兹等处，撤出了那些村落，麦克唐纳率领第七军和第十一军，共约三万人，奉命坚守莱比锡城以掩护大军退却。同时也命令在德累斯顿的圣西尔设法自行逃脱。

上午七时，联军继续展开攻势，不久又暂时停顿下来，以便谈判使这个城市投降，因为沙皇希望能兵不血刃攻下该城。上午九时，拿破仑与他的盟友萨克森国王道了再会，在混乱之中策马走过了利德斯瑙桥。当时的混乱情形，德·欧德拉本曾经有下述描写：“车辆、火炮、牛羊、妇女和兵员，伤的、死的和幸存无恙的都挤在一起。在这种混乱情形之下，连继续行军都已不可能，当然更谈不上自卫抵抗。”

在混乱之中，卡陶将军在距离桥头不远的地方，看到一个人只带着少数随从走过来。他以为是个普通人，等到走近时正想前去盘问，才知道正是皇帝本人。拿破仑还是保持着冷静常态，似乎对周围的毁灭景象并不关心。拿破仑于上午十一时过桥，在利德斯瑙的磨坊里下马，口授了一些命令之后就熟睡。此时，沙皇的谈判也已破裂，于是在莱比锡的战斗开始爆发，法军和波兰部队在绝望之中仍然死战不休。

下午一点不到的时候，拿破仑仍在熟睡之中，虽然炮声并不足以惊扰他，可是一声巨响却把他惊醒了。一个工兵班长过早的把利德斯瑙大桥炸毁了，他的上校并不在场——正上前方去看是哪一军最后渡河。这对法军的后方部队而言是一个惨重打击，因为另外那座便桥早已垮了。麦克唐纳、波尼亚托夫斯基和许多官兵都跳入河中。麦克唐纳侥幸到了西岸，而那位英勇善战，刚刚在战场上晋升为法国元帅的波兰亲王却不幸淹死了。不久，在埃尔斯特河东岸上的战斗就以法军全面投降为结束了。

20日，败军主力在威森维尔斯渡过萨尔河。23日进入了埃尔弗特，在那里一直停留至26日以补充给养。在埃尔弗特，拿破仑知道维内德亲王率领四万人的巴伐利亚部队，在哈南挡住了他的退路。他一点都不在乎，领兵直向维内德前进，在10月28日到31日之间，把他打得惨败，使其损失超过9,000人。拿破仑一直通过法兰克福前进，于11月2日到了马因斯。他在那里停到11月7日，然后返回巴黎，于11月9日到了圣克劳德。两天之后，圣西尔在德累斯顿投降了。这个战役如此方告结束。

10月18日的损失数字并无确实的统计；可能双方都在25,000人左右。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联军的死伤总数估计约为54,000人，而法军则为38,000人，如果把俘虏、医院中的伤兵和逃亡者都计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要加倍。联军所获得的战利品十分可观，包括二十八面军旗、325门火炮、900辆弹药车和40,000枝步枪。在法国的将军有六个战死，十二个负伤，将官被俘共三十六人，包括洛里斯通和列依尔在内。此外维恩还告诉我们说，在10月18日那天，

法军一共发射了95,000颗炮弹，而在10月16日到19日之间，又再加上200,000颗。在10月19日，法军炮兵所余炮弹只有16,000颗了。

德·欧德拉本说：“在他一生之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位法兰西的领袖在文明的欧洲中心，于众目睽睽之下被敌人击败了。换句话说，他已经丧失了一个决定性的会战。”这一次是一点借口都没有，既没有波兰的烂泥，也没有俄罗斯的严冬。他已经输掉了第二个“特拉法尔加”之战，这次是在陆上。他的主动权已经丧失了。

虽然他忍受着这个震动，充分表现出其英雄本色，但这却是一个致命打击，使他的元气永远无法恢复。联军的胜利已经在欧洲历史上点燃了新的烛光。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是完全两种局面。欧洲大陆上到处都是欢呼声，正好像雷班托之战以后的情形一样。到处都展开了反对拿破仑的激烈宣传。

可是这个“民族大会战”，今日看来还具有更深远的影响，这是英国体系的胜利，现代普鲁士从此兴起，而法国开始衰颓。此外，个别国家之间的斗争已经逐渐成为过去，这种原始性的冲突不久即将为世界性战争所取而代之。

拿破仑的战略是失败了，不仅是因为他的工具不适当，或是因为他的假设有错，而主要原因却还是他的政策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精神。他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跟着过去那些伟大征服者的足迹前进。可是时代已经改变，欧洲已经不再是一盘散沙，许多民族都已团结起来，从而形成一个个结晶化的民族国家。它们各自分道扬镳，使他的个人神化主义的假定无法实现。

在耶拿会战中，拿破仑不仅毁灭了一个封建陆军，而且也肃清了封建观念的一点最后的余烬。从这些灰烬之中，却产生了新的民族性陆军，终于在莱比锡会战中把他自己击败了。在埃尔斯特河边的战场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代欧洲却从此脱出了中世纪的蛋壳。